

我深信人类精神是不朽的，它就像太阳。永远不落，永远不停地照着。

——歌德——



尚丹梅、尹文胜编著

歌德传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风流首相 桂冠诗人

歌 德 传

尚丹梅 尹文胜 编著

目 录

一、楔子 1

一首《恋人之旁》的脍炙人口的诗篇，
揭开了德国最伟大的抒情诗人《歌德传》
的篇章……

二、幸福的童年 3

生于特权家族的歌德自幼聪颖、好学，
对多彩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探索。受其母天
性达观、热情宽容、喜好文艺和音乐的熏
陶，对歌德性格塑造起到很大影响。

童年时代的歌德就在诗歌、戏剧、绘画
方面表现出很高的感悟力。这位“天才少
年”对幸福的希冀——就是能够戴上诗人
的桂冠。

三、初恋的迷惘 22

少年歌德感情丰富细腻，与格丽琴的邂逅，使歌德陷入初恋的迷惘。他既品味着初恋的甜蜜和温馨，也饱尝失恋带给他的震颤和苦恼。

歌德渴望飞翔的心灵，引导他到更广阔的世界去展翅翱翔！

四、在莱比锡求学的日子 28

遵从父亲的旨意，歌德前往美丽的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对文学艺术的酷爱，使歌德难以静心于法律学习，对绘画、铜版雕刻也浅学辄止。和安妮特相恋的快乐和痛苦激起歌德的创作热情，第一部诗集《新歌集》和第一部剧作《情人的脾气》由此问世了。

五、在家养病的黯淡时光 42

1768 年夏天～1770 年春天是歌德一生中最黯淡、最不幸的时光。精神上的失落，创作上的茫然，肉体上的病痛，使歌德思考艰深的宗教问题，他构思的上帝叛逆者“魔鬼创世说”成了歌德世界观根本转变的前奏。也决定了他诗歌的人道主义的古

典的基本内容。

六、施特拉斯堡的恋爱插曲 49

康复后的歌德来到法兰西王国的施特拉斯堡，准备完成大学学业。这里美丽的风景，哥特式的建筑，拓宽了他的眼界和胸襟，与法国漂亮的安美梨姐俩的三角恋爱插曲使歌德难以忘怀……

七、和赫尔德尔相遇 54

歌德与博学睿智的赫尔德尔的认识和交往，为他指明了全面认识时代的根本方向。在德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并由此揭开富有政治意义的文学运动——“狂飙突进”的序幕。

八、《五月之歌》和“诗的忏悔” 62

乡间清澄的天空，肥沃的大地，和煦的阳光，温柔的夜色，雨后的彩虹，林中的芳草鲜花，歌德与美丽、善良、纯洁的乡村姑娘弗里德里克沉浸于自然与爱情的融合之中。歌德创作了《五月之歌》、《野蔷薇》，运用了新的创作手法，体现新的进步诗歌观念。

九、律师生涯的背后 76

别出心裁、新颖大胆的学位论文结束了歌德的大学时代。当上律师后的歌德漫不经心地对待他的职业，而埋头于诗歌的创作和萨翁作品的研究。

《葛茨·冯·伯利欣根》剧本的创作，标志着歌德同古典主义戏剧的决裂，也使他一举成名，成为“狂飙运动”的代表人物和文坛上熠熠发光的新星。

十、《少年维特之烦恼》 85

“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子谁个不善怀春？”同学不幸地自杀殉情，引爆了歌德胸中埋藏已久的炽烈的感情。《少年维特之烦恼》的问世，引起社会各界狂风暴雨般的反响，成为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名篇，24岁的歌德一举登上了世界著名文学家的台阶。

十一、讴歌普罗米修斯 115

歌德发表了普罗米修斯的独白诗，讴歌了普罗米修斯扰乱天庭以及其他巨人对抗众神的伟大精神。普罗米修斯让歌德的灵魂受到洗礼；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的思想给歌德以营养。

十二、接近真正的幸福 124

歌德被银行家的女儿安娜·伊丽萨白·薛涅曼的美貌和气质所打动，情不自禁写诗讴歌得到的《新的爱，新的生活》。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两人分开，但歌德认为那是他“接近真正的幸福。”

十三、进入魏玛宫廷 134

歌德受到魏玛卡尔·奥古斯德公爵的赏识，1779年担任魏玛公国的枢密顾问，财政大臣，成为公国内极具政治影响力的人物。

歌德励精图治，但终因保守落后的贵族势力，使改革难以实施。

十四、施泰因夫人 145

“你了解我的性格的每一个特征，你听出我心弦的最纯的声音。”歌德与施泰因夫人的恋情，使他创作出德国抒情诗中最高的杰作——《对月》。

歌德把施泰因夫人对他的影响与莎士比亚并提，称自己“隶属于一位唯一的女性，崇拜一位唯一的男性，促使感情和精神合一”。

十五、又一次危机 153

十年的大臣生涯，并没有给歌德带来多少真正的快乐。倒是热衷自然科学的研究，使歌德认识到：“我就是为科学和艺术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为了呼吸“新鲜空气”，歌德神秘地前往意大利。

十六、意大利之行 161

到达梦想中的罗马，歌德沉浸于艺术的海洋和新结识的朋友之中，找到了“四海为家的感觉”，理解到“风格才是一个艺术家应当追求的最高境界”。意大利之行是歌德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逗留 4 个月，歌德以深情幽婉的笔触抒发了离情别绪……

十七、克里斯蒂安娜 177

意大利之行，歌德重新发现了自我——艺术家的自我。他脱下了政治家的外衣，一心一意地遨游于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的天空。

“我在一只贝壳里找到一粒珍珠，”歌德与质朴、善良、纯洁的制花女工克里斯蒂安娜结婚了。

十八、进入科学和艺术王国 189

歌德担任魏玛公国科学和艺术机构的最高行政长官，又兼任魏玛美术院和耶拿大学的总监。他投入极大的热情关注剧院的建设和剧本的创作。出现了西方文艺中戏剧的第四次高峰——歌德时代。

歌德对自然科学的热爱仅次于文学创作，说来有趣，即使身在战场，炮弹横飞，歌德还有闲情逸致观摩弹坑里的小鱼，探索科学。

十九、和席勒建立伟大的友谊 207

相通的志趣，共同的历史使命，使歌德和席勒的双手握到了一起。由于他们的合作，有意识地走由浪漫主义转到古典主义的道路，不但把各自的文艺创作推进到高度的成熟，而且也替德国建立了一种辉煌的民族文学。

二十、会见拿破仑 235

歌德对优秀的法兰西文化的热爱，战胜了对入侵的法兰西军人的仇恨，文明与野蛮代替了民族的界限。歌德对拿破仑入侵的消极态度，受到进步势力和德国人民的谴责。这是歌德一生中不小的败笔。

歌德毕生关心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然而终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

二十一、贝蒂娜和明娜 246

年届花甲，两位年轻貌美的少女贝蒂娜和明娜闯进歌德的生活，给他要干涸的诗的心田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流水，创作了优美的十四行诗以及长篇小说《亲和力》。

歌德与贝多芬有过短暂的接触。贝多芬的铮铮铁骨、倔强之极与歌德追求灵魂平静、怡然自得难以相容，两人互存芥蒂，各奔东西了。

二十二、《诗与真》 260

歌德自传《诗与真》叙述了 26 岁前一代天才的成长轨迹，心路历程。留给后人珍贵的研究资料。“一个人最有意义的时期就是他的发展时期”。《诗与真》成为歌德的传世名著之一。

二十三、苏莱卡之歌 273

感觉自己生命之花行将枯萎的歌德渴望再一次旅行。玛丽安妮以其魅力使歌德再一次涌起爱的激情，创作《西方诗和东方诗诗集》。这是歌德晚年最重要的作品之

一。

二十四、《玛丽恩巴德悲歌》 287

74 岁的歌德爱心未泯，对乌尔丽克爱的失败，使他写成晚年最著名的爱情诗篇《玛丽恩巴德悲歌》，诗篇纯洁、真挚、激昂高亢，读来让人荡气回肠。这首诗表明歌德对一切热情的放弃，经过悲痛欲绝的哀诉而进入永远宁静的境界。

二十五、《歌德谈话录》 303

歌德晚年的私人秘书爱克曼，根据歌德笔记整理成《歌德谈话录》。它忠实地记录了歌德晚年有关文艺、美学、哲学、自然科学、政治、宗教以及一般文化的言论和活动。这是一本别具一格的歌德传记。

二十六、《浮士德》 312

歌德“用一种神圣纯洁的心态来创作这部具有非凡意义的巨著”。《浮士德》作品蕴含了歌德 50 年的构思，经过歌德点铁成金的妙笔，刻画了文艺复兴时代一个巨人的形象，是对人类的一首颂歌。

《浮士德》——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熠熠生辉的宝石。

二十七、世界文学的呐喊者 328

歌德晚年，声誉日隆，高屋建瓴地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揭示出“文学艺术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小小魏玛城，俨然成为文学家朝圣之地。

这就是作为世界公民的歌德，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作家更杰出的地方。

二十八、拉上生命的大幕 342

歌德生命的暮途是舒缓而境界阔大的。《浪游人的夜歌》表达了歌德对生命的眷恋。“把窗户打开，让更多的光进来”。这是歌德弥留之际最后的话……右手在空中书写，然后慢慢垂下，谁也不知道他想写的是什么……

二十九、绵延不断的影响 360

歌德去世后，德国文学界乃至欧洲文学界都为之悲痛。歌德塑造人性的力量使他成为人类生命的一个代表。

“人类会在前进道路上摸索，但最终不会迷失正途。”

一、楔子

我想到你，每逢从大海上面射出日光；
我想到你，每逢在泉水上面映着月光。

我看到你，每逢远方大道上扬起尘沙；
每逢深夜，行人在狭路之上心惊胆怕。

我听到你，每逢水波在低鸣，汹涌奔腾；
我常在那沉寂的林中谛听，万籁无声。

我靠近你，即使你身在远方，依然很近！
太阳将落，马上就照出星光。愿你光临！

这首诗题为《恋人之旁》，写得深情款款，优美流畅，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很多音乐家如贝多芬都热心地为本诗谱曲。它便是德国最伟大的抒情诗

人歌德的作品，是他上千首脍炙人口的抒情诗中的一首。

歌德不唯诗歌成就巨大，小说、戏剧、散文各方面都卓有建树，《少年维持之烦恼》、《浮士德》名播四海，在我国也几乎家喻户晓。在中外文学史上，像歌德这样娴熟地运用各种文学体裁、创作丰富且都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作家实属凤毛麟角。

二、幸福的童年

“1749年8月20日上午，时钟敲了12下，我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降生了。”这是歌德自传《诗与真》的第一句话。由于接生婆技术不熟练，这位天才诞生时并不顺利，生下来处于休克状态，经过一番手忙脚乱的抢救才苏醒过来。在一旁焦急地注视着的老祖母不禁惊喜地嚷道：“他活下来啦！他活下来啦！”在第二天洗礼时，家人给他起了外祖父的名字：约翰·沃尔夫冈。歌德的外祖父当时任法兰克福市市长，他因自己的小外孙出生虚惊一场，从此就雇佣了一个产科师，向市民灌输助产知识，后来出生的小孩很多人得到好处。

歌德的父亲叫约翰·卡斯帕尔，是位为人古板的律师，到过意大利、法国、荷兰等地游学观光。1741年31岁时，才回到故乡法兰克福。他原想在市议会谋取一个合适的职位，但没有成功。为了能在一个

重视门阀地位的社会中立足，便花钱买了个皇家顾问的头衔。因为工作上不顺利，赋闲在家，所以总是闷闷不乐。歌德的母亲名叫卡塔琳娜·伊丽莎白·特克斯托尔，比丈夫小 21 岁，性格正和丈夫相反，是一个乐天派，热爱生活，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歌德气质中诗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她编造寓言故事的能力，而他从父亲那里，只不过得到了身材，还有那严格的生活方式。歌德和父母亲之间的感情并不深厚，他长大离开家以后，只回去四次看望自己的母亲。

作为特权家族中的小成员，歌德童年生活是无忧无虑，优渥有加的。他在一所古老宽敞的房子里长大，小时候很是顽皮。有一回正好是卖陶器的市集期，家人不单置备了些厨房用品，还顺带给歌德买了一些小巧的炊具和食器。一天下午，家中很宁静，歌德拿出这些陶器玩耍，借以消磨时光。玩得无聊，便把其中一件抛到了街上，破裂的清碎声让歌德觉得有趣，也招来邻居的小伙伴。他们乐不可支，拍起小手掌，嚷着“再来一个”，歌德毫不踌躇地又将一个小陶锅扔到街石上，在不断地叫嚷声中，一个个盘子、锅碗等统统被摔了出去。为博得小伙伴们欢心，手头上的摔完了，歌德又跑进厨房，把陶瓷的盘子拿

出来，继续刚才的壮举，直到把他能够拿到的陶瓷用品摔了个精光。

歌德幼年大部分空闲时间在他慈祥的祖母身边度过。祖母温柔、和蔼、亲切，老是穿着白色整齐的衣裳，她想方设法替孩子们制作各种小玩具，给孩子们准备各种零食。有一年圣诞节的前夜，她让人给孩子们演了一台木偶戏，给童年的歌德留下了强烈而久远的印象。但是好景不长，在歌德 5 岁时，祖母去世了，从此家庭情形发生了改变。

最显著的变化是歌德的父亲按照自己的设想对旧居大加修整，给小歌德带来了新奇和惊异。原先的房子式样老旧，弯弯曲曲，好些地方幽暗沉沉，常常在歌德幼稚的心灵中引起畏惧。大人们照例爱谈些鬼怪故事，歌德每每早睡，便不自觉地联想起故事中的恐怖情节，赶紧披衣下床，去找佣人作伴。而他的父亲听到动静，便可怕地反穿着睡衣，挡在通道中间，把歌德吓回到卧室中去。歌德就在这双重可怕的氛围里战战兢兢地进入梦乡。他的母亲觉得儿子又可怜又可笑，为鼓励歌德晚上战胜恐怖，许诺每天早上赏给他一些桃子吃，这一办法果然奏效。

歌德的父亲游历过意大利，对于意大利语言和一切与意大利有关的东西都酷爱。房子重新修整后，

在家中前厅挂上了一排罗马铜版风景画，画面上有罗马圆形剧场、圣彼得广场、圣彼得教堂等意大利著名建筑，寡言少语的父亲向歌德介绍这些建筑时却能够有说有笑、滔滔不绝。歌德后来酷爱罗马艺术，就深受他父亲的影响。

法兰克福是当时名存实亡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直辖市，不隶属任何封建小邦，一向是皇帝加冕的地方，也是商业和交通中心，虽然人口至多只有3万人，但地位和当时的罗马、巴黎、伦敦和维也纳不相上下，当一个法兰克福市民是很体面的。

年幼的歌德有时独自一人，有时跟小伙伴们一起，自由快活地在法兰克福城里遛达，他最爱在美因河的大桥上漫步，当大桥十字架上的金色风信机在阳光下闪耀的时候，看着桥下郁郁的流水，小歌德感到非常愉快。他还经常散步到萨克森豪森去，花一个“克罗家”（一种辅币）舒服地享受摆渡过河的乐趣。他还喜欢在码头上等待起锚的船只，观察从船上上岸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古老的商业区，小歌德花好多小钱购买一些印着金兽的彩纸。饱经沧桑的城堡、美丽的花园、庄严的教堂……法兰克福的景物令歌德目不暇接，极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法兰克福浓厚的精神文化氛围，深深地濡染了他的心灵。

歌德的母亲一共生了 6 个孩子，只有歌德和他小一岁的妹妹科内里娅存活下来。兄妹俩自幼在一起生活，游戏，十分亲密，他们经常缠着妈妈讲述自编的故事。歌德的母亲喜欢文艺和音乐，爱好诗歌和童话，读过很多德国和意大利优秀的文艺作品，她能把童话、民间传说和《圣经》的故事描述的栩栩如生，小兄妹俩往往听得入迷，随着妈妈的故事进入一个个奇妙的世界。这些引人入胜的故事激发了歌德的想象力，歌德 8 岁就能创作诗歌，跟他母亲的启蒙是分不开的。更为重要的是，歌德的母亲天性达观，热情宽容，遇事沉着冷静，对歌德的性格塑造起到很大的影响，歌德一生在爱情和生活上遭受过很多挫折，但始终未被压垮，来自他母亲的性格遗传功不可没。

周围的人很快就发现，歌德天分很高。他父亲决定自任家庭教师，希望自己所不能成就的事业在儿子身上得到完成。他先教歌德一些基础知识，让他欣喜的是，歌德领悟敏捷，理解、消化、吸收得都很快。同时歌德开始学习书法和音乐。不久就通晓父亲和其他老师所授的功课。歌德不喜欢文法，但在修辞学、作文和这一类的习作上都远远超过别人，在记忆和推测能力方面也显示早熟异慧的特征。10 岁时，歌

德已能阅读父亲藏书室中伊索、荷马、维吉尔和奥维德等人的著作，还阅读了《一千零一夜》，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和施纳贝尔的《石堡孤岛》以及大量当代德国诗人的诗歌，聪颖的天份和勤奋的阅读，为歌德未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少年歌德置身于语言、文学这丰富多彩的世界中，但他仍无法满足，他那充满探索欲望的目光注定要寻遍世界的每个角落。他在学习之余，又渐渐地迷恋上神秘莫测的大自然，他开始注意和审视花草树木，甚至鸟雀以及可能弄到手的小动物，不仅是出于顽皮和一时的好奇，而且是出于一种相当稳固的兴趣，他会久久地望着这花瓣出神，好像要从这中间寻找出对大自然的某种解释。

一天傍晚，当夕阳向法兰克福城投来最后的一瞥的时候，小歌德兴奋地在桌前舒展了一下胳膊，然后不无骄傲地在他的拉丁文练习本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正式文科中最高年级的拉丁文练习是我自己主动抄下来并翻译出来的。”

写好这句话，小歌德满意地端详了一下，这才轻轻地合上本子走到窗前。沉落的夕阳在天边留下一片诱人的玫瑰红，伸向赫希斯特的平原在暮色的笼罩下显得宁静而温馨。成功使得小歌德感到振奋，他

想起了尚未完成的写给外祖父母的那首诗，还有那只被他捉来当实验品的麻雀，他希望今晚能像完成拉丁文作业那样一切顺利。

烛光在跳动，纯真的诗行在小歌德的笔下流淌。当他写完最后一个德文字母时，母亲敲响了房门：

“该睡觉了。”

“噢，我马上就睡。”

母亲的脚步声从楼梯上消失了，小歌德却兴致盎然地从盒子里翻出了那只羽毛已经残缺不全的麻雀和一堆新鲜的树叶认真端详起来。“羽毛怎么可以从柔软的肌肉中生长出来？”“布满叶面的脉络是不是和现在一个模样？”一个接一个的疑问在小歌德的大脑中不停地跳跃。虽然至今还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但这一切毕竟太有趣了，它们无论如何也不会使小歌德感到乏味……

撕碎的树叶一片片撒满了桌面，疲惫不堪的麻雀也悄悄地合上了眼睛……小歌德仍旧坐在烛光前，他沉浸在思索的世界里。

从童年就萌发出来的广泛的兴趣爱好和不可遏止的求知欲望，从小就把歌德引向了无限广阔的未知世界。

这一时期，歌德对韵文和诗歌的狂热已露端倪，

他学会了押韵和运用抒情辞汇。在星期日孩子们的集会上，大家都拿出自己的诗作，歌德的作品总是受到称赞。保存下来的《伯沙撒》残篇和《有关基督地狱之利的诗思》在构思上已显出了非凡的宏伟气派。1757年歌德把一首祝贺新年的诗献给他的外祖父和外祖母，诗的结尾两句是：“如今您们接受的这些都是处女作，这支笔今后将更加娴熟。”小小年纪已透出十分自信。他的预言幸而在不久的将来得到了印证。

外祖父家是歌德的避风港。有时为了躲避学业上的压力，歌德便借故到外祖父家去玩上两天。外祖父精心收拾的小花园是歌德游玩的最好天地，园径大部分用蔓生着葡萄的栏杆围着，园地一部分专种蔬菜，一部分种花卉，四季鲜花不断，色彩缤纷。几颗桃树生长得很茂盛，每到夏季硕果累累，有栅栏围着，防止歌德和别的小孩馋嘴偷摘。桃树对面的醋栗和刺莓，孩子们可以任意采食。外祖父身为一市之长，公务繁忙，但每天傍晚仍心情闲适、态度勤勉地护理自己种下的果木花卉，从不厌倦。歌德和家人对风度儒雅，总是从容不迫的老人都很尊敬。据说老人具有预言的本领，成功地预言了自己能当上陪审官以及市长的职务，所以外祖父在歌德眼中始终有层

神秘的色彩。歌德一生也都相信人生具有某种神秘性。

歌德少时虽很顽皮，但从不说谎，待人接物很真诚，常受到大人们的夸奖，他甚至过早地养成和自己年龄不相称的克己的习惯。当时歌德的老师喜欢体罚学生，孩子们硬着头皮承受。不爱学习的孩子学会了老师这一手，相互殴打取乐。有一次上课老师没有按时来，孩子们三三两两走出去玩。这时班上的三个平时对歌德怀有恶意的同学乘机从屋外拿来几根用扫帚制成的鞭子，残酷地鞭打歌德的脚和腿肚。一开始歌德决定默默忍受，不加抵抗，但愈打愈烈，痛楚难挨，于是歌德奋力还击，很快就占了上风，把三个同学打得落花流水，当众宣称今后谁再侮辱他，只会落得更坏的下场。这件事发生以后，孩子们在一起上课的时间逐渐减少以至后来完全取消了。歌德不得不长居家中，和妹妹科纳里娅快乐地学习和游戏。

像所有的德国儿童一样，歌德洗礼后便是一名基督教徒，他对上帝的存在深信不疑。他自幼阅读《圣经》，听教堂里的布道，恪守所听到的一切教条教规，但他又喜欢思考，希望看到真正的上帝出现，并想直接去接近那位天地的创造者和维护者。一次偶然的事件，让他对上帝产生了一丝疑问。1755年11

月1日，葡萄牙里斯本发生大地震，一个商业发达的美丽的海港大都会，顷刻间灰飞烟灭，沦为废墟。王宫被海水吞没，6万居民葬身火海。噩耗传来，人们惊慌不已，以为是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歌德恬静而幼稚的心灵第一次被深深地震憾了。在听大人们宣讲《圣经》时，曾感到作为天地的创造者和保护者的上帝是那么明智而仁慈，但这一次却不问善罪，把人一律抛入死亡之渊，未能表现出一丝一毫的父爱。小歌德为之困惑不解。

另一桩历史事件像里斯本大地震一样在歌德平静的心田里激起波澜。1756年8月28日，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爆发了战争，战争持续了7年。歌德第一次感觉到了普遍的政治关系对自己生活的影响。战争让世人“不仅要当观众，而且要当裁判”。世界分裂为两派，歌德的家庭正好是这两派的缩影。他的外祖父接受过奥地利皇后颁赐的勋章，深感骄傲，自然倾向于奥地利，而他的父亲崇拜普鲁士国王，便坚定地站在普鲁士一边，亲人之间时有齟齬，聚会常常不欢而散。

1759年1月，战火烧到旁观者的身旁，与奥地利结盟的法国人突然袭击并占领了法兰克福。倾向于普鲁士的歌德父亲不得不眼巴巴地看着自己收拾整

齐的房子里住进一群法兰西人。为首的军政长官是皇家少尉多伦伯爵，他外貌严峻，举止凝重，很有风度，具体负责民事和军民之间的纠纷。前来找他办事的人很多，他又爱在住处宴请名流显要，所以家中人流不息，日夜难得安宁。虽然歌德父亲会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但他和入侵者格格不入，从不主动搭腔，更对家中的嘈杂局面感到厌烦。一次，多伦伯爵以胜利者的口吻和他说话，惹得他勃然大怒，诅咒入侵者要下地狱，幸亏歌德母亲和翻译官一再求情，多伦伯爵才没有将他看管起来。

有意思的是，多伦伯爵对小歌德却怀着慈父般的友好，歌德对他也深抱好感。多伦入住后，不肯把他的地图钉在墙上，以免弄坏新的壁衣；并严格约束部下，教导他们静肃而有规矩。这些做法都让歌德为之钦敬。

多伦伯爵还很有艺术修养，尤其钟情绘画，歌德家的画室引起他的浓厚兴趣，入住第一天就进去观赏。不久就向他打听到的法兰克福和附近达姆施塔特城的许多画家订购作品，并请他们到住处来创作。在布置优雅、光线充足的顶楼上，歌德目睹了荷兰画派的希尔特、苏兹等人的绘画情形，因能当场说出宗教题材绘画中的寓意，受到这些成名画家的称许。

一个法国剧团随占领军到法兰克福演出，让歌德第一次领略到伟大的法国文化的一个侧面。歌德被允许经常去看这个剧团演的戏，舞台上的悲欢离合紧紧揪住歌德的心，他由此而熟悉了莱辛和莫里哀、高乃伊和狄德罗，早先被一个木偶剧所激发起来的对戏剧的兴趣这时变得更为浓烈。尽管外国戏剧的台词和情节他不太懂或根本不懂，但歌德很欣赏演员的动作、表情、道白和唱腔，常常看得如痴如醉。很快，他依葫芦画瓢，写了一个剧本，并想象着把他的剧作的名字用大字标贴在街道和广场的四周。一开始，歌德父亲对儿子痴迷法国戏剧很不赞成，但看到儿子的法文程度因看法语剧而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提高时，做父亲的便不再加以指责了。

法国文化对歌德的影响是久远的，以至于后来拿破仑的军队占领他的祖国时，他对法国入侵者一点也恨不起来。

1761年6月，法国军队终于退出了法兰克福，歌德正常的学习恢复了。父亲重新开始督导子女的学习生活。除了语言文字外，又增加了数学、音乐和绘画。他请来了教师给他们讲解、指导。歌德在书写方面没有什么才能，音乐只学会了大键琴，一种老式的钢琴，后来也能拉拉大提琴，不过绘画倒是很有天

赋，而且终生乐此不疲。父亲对子女的学习要求有所侧重，认为女孩子应该多懂些音乐，因此，妹妹每天必须花更多一些时间守着他们新买的一架大钢琴。至于儿子，那非学会绘画不可，据说十五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曾经颁布过一道命令：每个人必须学会绘画，父亲很赞同这位大皇帝的主张。其实，歌德早已对绘画很感兴趣了。现在父亲请来教师教他画画，他当然是喜不自禁。

歌德学习语言很有天赋，在短短几年里，他学会了多种外国语言。为了提高学习的兴趣和水平，他曾虚构一个故事，讲述一家六七个兄弟姐妹散处世界各地，他们彼此通信，使用的都是当地或适合本人职业的语言，于是，一封封用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希腊语和犹太人德语写的信构成了一篇妙趣横生的小说。

再往后，他还学习骑术和击剑，这个天才少年一天天地成熟了。

学习音乐时，家人为替歌德兄妹找不到合适的钢琴教师而苦恼。有一回歌德偶然到一位小朋友家去串门，发现这位小朋友的钢琴教师非常古怪，他给双手的每一个指头都起了诨名，运指的时候，便以诨名来称呼。黑白键也有有寓意的名字，甚至调子也有

形象化的名称，这对初学的琴童很有吸引力，练习起来觉得新鲜有趣，指法和节拍便容易掌握，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歌德马上恳求双亲延请这位钢琴教师来家辅导，结果大失所望。

为了提高音乐鉴赏力，歌德常去听音乐会。音乐神童莫扎特 7 岁时，到法兰克福巡回演出，歌德为莫扎特的演出倾倒。演出结束后，14 岁的歌德跑到莫扎特面前祝贺，并表示自己钢琴老弹不好。莫扎特天真地建议：“为什么？你再试试看，如果不行，就作曲吧。”歌德为难地回答：“我写诗。”莫扎特对诗的概念很模糊，他问歌德：“写诗大概比作曲还难吧？”歌德不加思索地回答：“不难，容易极了，你也可以试试。”遗憾的是，这两个天才少年以后没有再见过面，但莫扎特曾为歌德的许多诗作谱曲，相得益彰，传遍了世界。

歌德学习剑术时，先从师一位法国教师。这位教师以进退灵活的步法和轻捷快速的刺击取胜，刺击时常伴随着几声吆喝。法兰克福城内还另有一名德国教练，教学方法迥然不同。各人门下少年弟子都觉得自己的老师技高一筹、教法得当，常由争吵引发起争斗。为见分晓，两个武师决定比武，结果法国人败北。于是，歌德和另几名少年便转换门庭。经过很长

一段时间，他们才将先前的击剑习惯改变，而新师傅对他们这几个“变节”过来的弟子总是不满意。

学习课本之外，歌德也一步步地接触现实社会。作为一个大城市的少年居民，他时而置身于这个事物之中，时而为那样事所吸引，目不暇接，而在城市的宁静和安全中间也免不了有可怖的事件发生。有时，一宗近处或远处的火灾使他们全家从和平处境中惊醒；一会儿，一件被发现了的刑事案子，它的侦查和惩处，使全城有好几个星期哄动起来。歌德目击过种种死刑的执行。更值得说的是有一次焚书时他也在场。被焚的是一种法国滑稽小说的版本，它没有攻击国家，但却不放过宗教和礼教。看见刑罚施于一种无生命的东西，的确是一桩可怕的事情。一大捆的书籍在火中爆裂，然后有人用火钳去拨弄，让它与火焰多接触一点。不消一会儿工夫，着火的书在空中片片飞舞，观众们争相去抢，歌德也抢到一册。

歌德的父亲对歌德毫不娇惯，常让年幼的歌德替他办些力所能及的事，尤其好派他去督促替他做工的拖拉的手工艺人，这样，歌德对下层劳动者有了初步的了解。歌德回忆说：“我因此能够到各种作坊去，有机会设身处地地体验形形色色的人类生活和分享别人对于他的生活的喜乐。这种小差事使我度

过许多很愉快的时光，认识了各种的作事方法，以及这种或那种生活方式的不可少的条件所挟以俱来的喜悦、悲愁、困难和顺利。我由此得以接近这个勤劳的、联结下层和上层的阶级。因为在一方面站着从事于简单和粗糙的生产的人们，在他方面站着愿意享用精制过的物品的人们，而手工艺匠藉着智慧和两手做那两种人媒介，使他们彼此间各有所获，各得其所。各种手工业者的家庭生活随其行业的不同而有种种的形态，也是我暗地里注意的对象，由是平等——纵然不是一切人平等，也是一切人的境遇平等——的感情在我心里发展和加强起来，因此我觉得为生存而生存是人类的主要条件，其余的一切却是无关轻重和偶然的。”歌德还屡次受父亲的委托到画家那儿去催促定下的画。他父亲认为绘在木板上的画总比绘在布上的画强得多，因此收藏种种的优美櫺木板是他父亲很关心的事。他父亲很知道轻率的艺术家的每在这种要紧的事情上头倚赖着细木工。他权力搜罗远年陈旧的木板，叫细木工极其精细地把它们胶接、刨滑和调整，然后把它们整年的搁在楼上一个屋子里，以便能够晾得十分的干。这样一块贵重的木板交给一位工艺画家去画，要他以艺术和纤巧的方法拿一个花瓶和一些极鲜艳的花卉在上面来写

生。那时刚是春天，歌德不怠慢地每星期二三次把手上能够得到的最美丽的花送到他那儿，他马上就把它插进瓶里去，照着这些实物忠实地勤勉地逐步画成。有一回歌德偶然捉到一个小耗子，就把它拿到他那儿去，他把它当作是一个可供观赏的小动物，高兴地来替它写生，这个小耗子蹲在花瓶下偷食麦穗也写得栩栩如生。还有同样的天真的自然物，如蝴蝶、甲虫之类也捉到画家那里去，让他写生。这样本是一件枯燥的差事，歌德却做得兴趣盎然。

画家诺特拿格尔创立的制造蜡布的工场，也是少年歌德喜爱盘桓的地方。在一个很大的院子和园子内，制好种种的蜡布，最粗的一种是以刮铲着色的用于遮盖货车和相似的用途的蜡布，再就是印花的壁衣，最后还有较精致和最精致的蜡布，在后一种蜡布上头是由熟练的工匠以毛笔绘画中国式写意的花卉或自然的花卉、人物或风景，种种色色无穷无尽的花样，很引起歌德的兴趣。那么多人从事工作，从最平凡的作业到总带有一点艺术价值的工艺，让他觉得十分引人入胜。他很快和工人们熟稔起来，并亲自动手做过，体会到劳动和创造的快乐。

由于家庭背景，歌德自幼更多的接触许多法兰克福的上层人物，并受到重大影响。

冯·奥伦斯拉格是法兰克福市陪审员，英俊、乐观、热情，他特别看得起歌德，常向歌德介绍自己的爱好。他认为少年演习戏剧特别有益，曾排演莱辛的《不列颠》，歌德扮演剧中的尼罗王，受到众人称扬。

旧贵族出身的冯·莱纳克，是个能干而固执的人，常在家请老朋友宴饮，每次都邀歌德参加，他爱和歌德闲谈，把世界和德国的情势给歌德详细讲解。皇室顾问官许士根穿戴整洁而相貌丑陋，是个极优秀的法学家，能够自由无碍地用别人的名义在法兰克福和帝国法庭执行律师的业务。歌德因和他的儿子一块儿学写字，所以常上他家。许士根也爱和歌德聊天，他信奉巫术，爱看神秘哲学著作，并向歌德力荐。因此，他也就不把上帝放在眼里，他对歌德说：“连上帝我也发现有缺陷。”

对这些关心他的人，歌德一直心存感激，终生不忘。他说：“与这些人作种种的谈话不是没有意义的，每一个人对我都各有其特殊的影响，每个人对我都像对他自己的孩子那样关心，甚至还深切一点。各人都想把我当作爱子一样，因我而增加他们的快乐，并且力图在我身上再塑造他们精神上的复制品：奥伦斯拉格想陶冶我使我成为廷臣；莱纳克想使我成为外交官，这两人——特别是后者——企图使我厌弃

诗歌和著作；许士根想让我成为像他那样的愤世嫉俗的人，此外，却愿意我成为一个能干的法学家，他认为这是一种必需的职业，靠着它，人们可以合法防卫自己和家人以免歹徒无赖加害，帮助被压迫者，而且大抵还可以惩罚恶人，不过后一种不是特别可行和合适的。我喜欢在这些人的左右，好利用他们的忠言和指导。”

不过，指导归指导，歌德所选择的道路最终背离了他们设定的轨道。虽然当时歌德的人生目标还没有宣布，但志向已悄悄选定：“以我而论，我也常以干出非凡的事业自期；可是，它是什么事业呢，我却不清楚。正如世人多想及他将会得到的报酬，而少想及他应立的功绩那样，我也不否认，当我想及一种值得希冀的幸福时，对我最有吸引力的，就是能够戴上装饰诗人的桂冠。”

三、初恋的迷惘

歌德自幼感情丰富细腻，在他 14 岁那年，一伙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借助歌德的诗才，怂恿歌德撰写虚拟的爱情书信，把歌德当“枪手”使，以达到在善良的少女们面前招摇撞骗的目的。虽然歌德对这种恶作剧感到不快，但可以借机卖弄自己的诗才，还是应允了。因这一事件他结识了一个叫格丽琴的女孩。

一天晚上，歌德和伙伴们参加晚宴，尽情地喝葡萄酒。要添酒时，有一个人便喊使女出来，可是出来的却是一个令这伙年轻人难以置信的漂亮女郎，她便是格丽琴。在亲切地道过晚安之后，她说：“使女生病了，已经睡下。让我伺候你们好吗？”于是年轻人纷纷嚷着再拿两三瓶酒来。格丽琴拿起空瓶走出门去。她的背影在歌德的眼里更为美丽，头上戴着一顶雅致的小帽，脖子柔美细长，歌德为之心动。对同伴们打发她一人深夜出门去买酒，歌德心中不安，好

在她很快就平安回来了，并坐下来和他们一起喝了一杯酒。

歌德心中对格丽琴非常迷恋，却不能找借口到她家中看望她。在上教堂做礼拜时，歌德发现了格丽琴坐的地方，于是在悠长的新教礼拜仪式中，目不转睛地把格丽琴看了个饱。出教堂时不敢同她搭讪，也不敢陪着她走。格丽琴偶尔对他一瞥，像是点头答礼时，歌德已觉得幸福极了。

歌德逐渐有机会和格丽琴接近，并为格丽琴朗诵他为人代拟的情书，他试探着说：“假如有一个认识您、敬重您、崇拜您和恋慕您的人，献给你一纸这样的信，十分迫切地、深情地和诚挚地追求您，您将怎么办呢？”格丽琴嫣然一笑，沉吟半晌，拿起笔来，把名字签在后头，歌德狂喜不已，跳起来要拥抱她，被她冷静地拒绝了。临别时两人深情款款双手相握，双眼湿润，搞得歌德迷惑无主。

就在歌德对格丽琴倾心相爱之际，1764年4月3日，约瑟夫二世在他于1765年继承他父亲弗兰茨一世的帝位之前便在法兰克福被加冕为罗马——德意志皇帝，这让恋爱中的歌德更加兴奋。

格丽琴出身低贱，歌德替她操心，多方设法替她张罗庆典的入场券，找朋友，寻门路，以便她什么场

所都能进去，好一饱眼福，格丽琴对此心存感激。

格丽琴历史知识贫乏，歌德便热心地为她讲述皇室的珠宝一类的掌故，格丽琴听得津津有味，不知不觉间已讲至半夜，歌德突然发现自己没有带家里的大门钥匙，回家去敲门动静太大势必会影响严厉的父亲，进退两难之际，格丽琴邀请歌德和几个同伴一起过夜，喝咖啡和斗牌。夜深了，睡意袭上来，格丽琴靠在歌德的肩膀上，两人都进入了梦乡，清清白白地度过了一个良宵。第二天早晨吃早茶时，歌德的母亲知道儿子没有归家便加以遮瞒，说歌德一清早就出了门，所以歌德没有受到父亲的斥责。

1764年4月3日，加冕大典正式举行，那天天气很好，全城的人都轰动起来，歌德和几个亲戚朋友事先在市议事堂罗马厅内上头一层弄到很好的座位，从那儿可以鸟瞰盛典全景，广场上人山人海，拥挤杂沓。加冕队伍极为庞大，贵族们华丽的服饰和高头大马，堂皇浩荡的仪仗，令歌德看花了眼。“这时叫人只恨少生了眼睛，我们真希望有一种魔术可以把眼前的景象定住，哪怕只是一瞬间也好；可是这个璀璨的美景刚刚走过，才空了的地方立刻就给如潮涌来的民众填满了。”

庆典之后是张灯结彩的狂欢之夜，歌德和格丽

琴手挽着手到处游逛，以惊异的眼光观看种种不同的灿烂灯景和奇异的火树银花。后来，他们踱到偏僻安静地区，在一家陈设宜人的饭馆吃宵夜，两人极其畅适愉快地在爱情的亲密感受中消磨了大半夜。歌德送格丽琴到她的家门口，格丽琴第一次吻了歌德的额头，不曾想这也是最后一次，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面了。

因为不久这伙年轻人中有几个干起违法乱纪的勾当，把歌德也牵连进来。歌德的父亲得知儿子与一伙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大为震怒。歌德也觉心中不安。法院开始调查。在供词中，格丽琴很爽直地谈到了她对歌德的感情：“我不能否认，我曾常常并很喜欢见他；不过我一直把他当作小孩子看待，我对他的爱慕的确是姊弟一般。在好些场合，我曾好好的劝告他，我不但没有引诱他做暧昧的勾当，而且劝阻他参加一种会使他受累的恶作剧。”歌德闻言既悲伤又愤慨，格丽琴把他当作一个孩子，这极大地伤了他的自尊心。一开始，他还为格丽琴的处境担心，为格丽琴被遣还原籍感到不平，至此便由爱而怨而恨，决心抛弃对格丽琴的感情了，他的初恋就这样草草收场，想象中的罗曼蒂克彻底毁灭了。

案情真相大白后，歌德一家人松了一口气，大家

都知道歌德是无辜的，于是都转过头来宽慰因此事而变得烦恼狂躁的歌德。作为性情中人，歌德既厌恶格丽琴的世故和逢场作戏，又非常怀念初恋的甜蜜和温馨。毕竟，他还是个少不更事的孩子，所以一段时间里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经常悲叹，哭泣甚至撒泼。大人们告诫他，要摒除这种病态的心理，只有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当中。他到了该上大学的年龄，应当为进大学做些必要的功课准备了。歌德沉浸于书本里，心灵渐趋平静。

格丽琴是第一个给歌德留下持久印象的女性。“在格丽琴身边，我觉得真像在那极乐园中逍遥着。从树上摘下水晶杯，马上就满盛着自己所需的葡萄酒；把果子从树上摘下来，马上就化成任意一种心爱的食物。”晚年的歌德曾这样深情地回忆。

天气晴朗的日子，为了散心，歌德便和朋友一起到郊外和环城开设的许多娱乐场所去，为避免碰上闯祸的那帮同伙，歌德更愿到美丽茂密的树林中去隐藏自己可怜的受伤的灵魂。朋友对歌德很不理解，他给歌德讲大道理，不让歌德在树林深处逃避外面的世界，歌德这样叙述当时的心情：

“我的有理智的朋友却不让我多流连于这种短短的欢乐之中；但是，我一旦回到现实的世界，纵使

在明亮而枯燥乏味的环境中再刺激起我这种感觉也是徒然，甚至连它的回忆也不能保留了。我的被宠坏了的心仍是不能安静下去：它也曾体验过恋爱，而爱的对象却给人夺了去；它也曾尝过生活的味道，而生活却日渐失去乐趣。一个太清楚地显出有意陶冶你的男朋友，引不起你的好感；反之，一个陶冶你、而又像是姑息你的女人，却被当作是带着欢悦来的天人那样崇拜。但是在我心中唤起美感的人已消逝到远处去了，在林荫下，她常出现于我的眼前，不过我不能固留着她，因此我觉得有一个强烈的冲动，要在遥远的地方找寻一个相似的东西。”

是的，法兰克福已经容纳不了歌德那颗渴望飞翔的心灵了。事实上，他对这座城市已感到厌倦。另一方面，作为市长的外孙，他对法兰克福的政情了如指掌，这个城市的阴暗面，对民众的种种不公平，都引起歌德徒然的愤恨。他羽毛渐丰，已有能力到更广阔的世界去展翅翱翔！

四、在莱比锡求学的日子

1765年9月29日，是基督教纪念米迦勒天使长的节日，这一天，歌德终于顺从他父亲的旨意，放弃了去哥廷根大学学习古典文学的想法，动身前往他父亲的母校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

莱比锡同样是一座庄严美丽的城市，有“小巴黎”之称，以“莱比锡博览会”著称于世，散发着由新近的贸易繁荣和富足所标志的时代气息。

刚到莱比锡，歌德很是兴奋，他觉得自己像一个挣脱了锁链的囚犯，打算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在10月1日给家中的信中开心地写道：“今天我开始上课。听些什么课？这还用问？法学提要，法学史，优帝法典以及法典前七章和后七章的专题研究课。这些就足够了，其余的以忘记为好。……我在这儿颇出风头，但目前还没有达到招摇的程度，我也不想这样。我要有点办法才对这种繁忙生活应付自如。这阵

子聚会、音乐会、喜剧、请客、晚宴、乘车旅行等活动真不少。哈，真有意思。好是好，但也真费钱，我已捉襟见肘了。刹车吧！”一心想抛弃法学而致力于古典文学的歌德就这样开始了在莱比锡的三年法律系学生生涯。

安顿下来后，歌德首先持朋友的介绍信去拜访讲授历史和宪法的宫中顾问官博麦，在交谈中坦露了自己不愿意学习法律而有意文艺的意图，不曾想这位学者对一切带有文艺气味的东西都表示厌恶，反对语言学和美术，给了歌德当头棒喝。他的温柔和蔼的夫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对诗歌同样不屑一顾，有几次歌德将自己的诗作隐瞒了名字向她背诵，便受到她的讥评。她不许歌德写那些模仿的肤浅的诗，差一点毁掉歌德的诗歌前程，歌德这样追忆当时的情形：“短时期内，我那喜欢德国诗神流连其间的山脚下长得美丽缤纷的丰草，便给人毫不留情割下来了，我甚至被迫亲自将这些变干的草翻动，把不久以前还给我以生气盎然的欢悦的东西，当作是已枯死的东西加以嘲笑。”当然，博麦夫人的阻拦不久就被歌德弃之一旁了。

歌德还去拜访了当时著名作家格勒特，格勒特的作品是一度公认的文学范例，但这位大作家在文

学习作讲授中，却屡屡劝止年轻人投身诗歌。他介绍给大家的只是说教的散文作品，认为韵文是一种讨厌的额外负担。对当时已开始闪耀灿烂光芒的文学界新星莱辛、维兰德等闭口不提，最糟的是，他对歌德的散文看不顺眼，因为歌德总是照着自己的套路，拿一个小传奇当引子，以书信体的形式写出来。格勒特虽然对歌德的文学才能不加垂青，但对他的作文的批改却像对别人的一样精细，在不少地方添上一些涉及道德的评语。歌德把这批作业保留了很久。其时格勒特的名声日渐趋微，颇受时人非议，歌德也渐渐对他冷淡起来，不再拜见他，害怕因他而走入歧途。

1766年4月，歌德和同乡好友，后来成为他妹夫的施洛塞尔一起去拜访了伟大的启蒙者、诗人、戏剧家戈特舍德，歌德记述了会面的情形：

“我们叫仆人替我们通报，仆人领我们到一间屋子内，他说，主人马上就来。我们是否看明白他所作的手势，我说不清；不管怎样，我们相信他是指一间隔壁的屋子，让我们进去。我们进去之后，便看见了奇特的一幕：因为一转眼，戈特舍德已从对面的门踱进来，他是一个高大、肥胖、魁梧的人，披着一件绿缎面红绸里子的睡衣；但是他的大脑袋却光秃秃的，

没有戴什么东西。可是他的头马上就要覆着，因为仆人手托着一副长而卷曲的假发（发一直垂至肩膀）从侧门连跳带跑的进来，以恐惧的姿势把头饰递给他的主人。戈特舍德绝不露出一丝不快，用左手从仆人的手上拿起假发，当他很熟练地披在头上的时候，便用右掌赏给这个可怜的人一记耳光，以致这个仆人像在喜剧中所常见的那样从门口滚出去了。跟着，这个有名望的老翁很严肃地坚持请我们坐下，很客气地跟我们作颇长的讨论。”

这位 1740 年以前德国文学界的权威人物此时已是日薄西山，他在年轻的歌德眼中是如此一副滑稽可笑的模样。歌德后来对德意志文学作了通盘的考察之后，曾痛斥戈特舍德的洪水曾是泛滥德意志文学界真正的祸水，甚至有淹到最高的山岭之势。

那么，真正的优秀的文学作品的标准是什么呢？没有人告诉歌德。年轻的歌德陷入了文学批评的困惑之中。人们都反对他的癖好和倾向，但是他们推荐给他的，一部分与他相去甚远，以至于他看不出它的好处，一部分又离他太近，以至于歌德觉得比起自己被指责的东西也不见得半点高明，歌德真不知道从哪儿可以得到文学批评的标准。“真没想到文学课也这样糟糕，莱比锡啊！莱比锡！你究竟能给予我什么

呢？”

受恶劣心境的左右，经过一段时间和多次思想斗争之后，歌德对已经开始或要完成的著作非常鄙视，有一天竟把所有的论文包括写作计划和提纲统统付之一炬，房间里浓烟充塞，把善良的房东老太太吓了一跳。这样，我们今天基本无缘得见这位天才诗人的少年诗作了。

创作上陷入困顿，学业上歌德也不认真对付。有人向博麦揭发，说歌德在听德国国家法时不用心记笔记，反而在笔记上描画那些在场的人，如戴着奇怪的假发的高等法院院长、陪审官的容貌，惹得邻桌用心听讲的人分心大笑，博麦对这种恶作剧行为很是愤慨。

在歌德苦闷彷徨之际，出现了一个为他指点迷津的人——宫廷教师恩斯特·沃尔夫冈·贝里施。贝里施是 1760 年由格勒特介绍到莱比锡林登瑙伯爵家任家庭教师的，被歌德称为世上可能有的、最奇特的乖僻之人：“他的外表够特别的了。瘦高个儿，健美的体型，大大地过了 30 岁，鼻子很大，面部线条分明，从早到夜戴着一团假发，他穿着整洁，足不出户，身旁佩剑，腋下夹着帽子……他的最大乐趣是一本正经地做些逗笑的事情，他还喜欢冥思苦想荒唐

的事情。”

此外，贝里施学问渊博，精通现代语言和多种文字。歌德很快和他熟识，他对歌德很亲切，善于使歌德经常不断地克制自己的焦躁不安和缺乏耐心的情绪，同时，贝里施文学知识丰富，鉴赏力甚强，他常以嬉笑怒骂的态度对某些歌德颇为欣赏的当代作家作冷酷无情的评论。不过他对歌德的作品很是宽容，尽管对歌德当时用阿那克里翁风格所写的诗作没几首看得上眼，却乐于用自己出色的书法替歌德抄写诗集，编纂成一本《安娜诗集》。诗题用古代德国字体，诗正文用一种垂直的萨克森字体，在每首诗的末尾，绘一幅与本诗内容切合的装饰画，这些画或是挑选来的，或是自己创作的，所需的木刻和铸版的阴影线，他都能够纤巧地描绘。诗作被抄写得如此精美，更加激起歌德写诗的热情。这一阶段，歌德创作的倾向已渐渐趋于自然率真，力求简洁、明晰地表现诗的题材。

他们沉湎在写诗抄诗的乐趣之中，不想莱比锡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市的文学丑闻，而且把他们俩都裹了进去。原来当时莱比锡的名作家克洛迪乌斯教授创作了一部迎合市民口味的夸张的诗剧，歌德和贝里施等人看后写了一首题为《致糕点师汉德尔》的

打油诗加以攻击，而且矛头针对所有妄自尊大的保守作家，这下激怒了莱比锡的上层人物，他们绝不允许几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如此冷嘲热讽，最直接的后果是，贝里施的家庭教师一职被伯爵解雇了。歌德觉得这一作法很不公正，出于义愤，写了一首颂诗献给贝里施：

你甘愿离开
这可憎的国土，
对我的友谊和花环
也不能把你留住。

撕碎那花环吧！我不会责怪。
没有任何高尚的朋友
能够阻止
一位难友逃走。

在监狱里
他这样想：
朋友的自由
和他的一样。

你走了，我留下，
但这几年的轮辐
绕着冒烟的轴
转动得多么迅速。

我数着轰鸣的轮子
声声冲击的次数，
门闩迟早会被砸落
那时我和你一样摆脱束缚。

在诗中，歌德表达了挣脱保守樊篱的愿望。不过，贝里施的骤然离去使歌德再次隐入混乱，回到杂乱、倔强的故态，和不少朋友的关系疏远了，常常穿着时髦的金丝花边的衣服到处游荡，正像他晚年带着嘲笑口吻回顾的那样，“他成了普雷塞河畔的一个牧羊人。”

填补贝里施离去而在歌德生活中留下的空白的是莱比锡画院院长奥塞尔。歌德第一次见到他即被深深吸引，觉得这位艺术家布置精妙、寓意深刻的住所也充满了无穷的魅力。奥塞尔一心想把歌德培养成大画家，他非常崇拜法国美术史的开山鼻祖温克尔曼，便指导歌德钻研这位艺术理论家的思想。歌德

接触并接受了古典主义的艺术观点，第一次失去了对纤巧、华丽和繁琐的洛可可风格的兴致。

歌德还向莱比锡另一位艺术家约翰·米夏埃尔·施托克学习蚀刻和铜版雕刻，但和学绘画一样，都是浅尝辄止。

此时对歌德思想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是莱辛1766年发表的《拉奥孔》，歌德称这本卓越著作把他从贫乏的直观世界带入开阔的思想原野，“像电光一样照亮了我们，以前的所有的指导或粗断的批评，都可以弃如敝履了，我们感到已从一切弊病中解放出来。”

不仅仅是贤哲，德累斯顿城的一个普通鞋匠也给歌德的心灵以同样的震撼，对歌德的世界观起了很大的影响。这位鞋匠是歌德隔壁宿舍的神学生的亲戚，他常和神学生通信，信中显露出乐观的生活态度，对忧患苦痛不以为意。歌德看了这些通信，很想和他结识，进一步了解他。神学生便为歌德写了一封介绍信。

鞋匠很和气地接待了远道而来的歌德，看完介绍信后，微笑着说道：“我从这儿看出，年轻的先生，你是一个奇怪的基督徒。”“怎么讲，师傅？”歌德显得有些莫名其妙。“我说奇怪的不是坏的意思，”鞋匠

解释道：“人们把不像他自己的人就称做奇怪，我称你作奇怪的基督教徒，因为你在一个剧本里承认自己是主的信徒，而在另一个剧本里却不是。”歌德请他说下去，他接着阐述自己的观点：“看起来，你想给穷苦人和下等人宣布一个福音；这好啊，这样模仿主是值得赞许的；但是你该知道，主喜欢和养尊处优的阔佬坐在一起，那儿一切顺遂，而且他自己也爱闻凤仙花的香味，而你在我这儿能闻到的只是相反气味。”

这场有趣的寒暄让歌德感到非常愉快，他们互相调侃，度过了欢乐的一夜。歌德到晚年还不能忘怀这位诙谐的鞋匠，给了他很高的评价：“他的态度始终如一，一切言行都像是从一个源头涌出来似的。他的无形的财产就是一种基于乐观的心境的健全的常识，他对于一成不变的传统的劳作怡然自得。不断地工作是他的第一桩最必要的事，其余一切都被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因而能够保持他的快乐，我不能不把他看作足以称为讲求实际的哲学家和不自觉的智者的一流人物中的佼佼者。”

莱比锡培养了歌德对艺术的爱好，同时也给了17岁的歌德爱的激情。从1766年起，歌德常常在舍恩科普夫酒家吃饭，从而结识了店主的女儿安娜·

卡塔琳娜·苟科普，歌德叫他小安妮特。她父亲开饭店，在集市时，也接纳旅客住宿，但平时只经营包饭。安妮特差不多天天帮忙预备歌德的饮食，晚上给歌德端酒，他们很快就相爱了。

安妮特比歌德大两岁，歌德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介绍她：“发育很好不太胖，圆圆的可爱的脸，并不是什么特别的美人，可是天真、温柔、惹人喜爱，心直口快，非常聪明，但并无多少教养。”尽管两人出身不同，地位悬殊，但倾心相爱，度过了不少快乐时光。他们经常见面，一个吹长笛，一个弹钢琴，沉浸在快乐之中。有时，他们在私人排演的戏剧里扮演一对恋人。可惜好景不长，歌德因诗的尝试的失败或在哪儿碰了钉子等原因，回来后就向安妮特发火，安妮特委曲求全，竭力讨歌德的欢心。糟糕的是歌德又嫉妒心极重，常掀起醋海风波。有一次一个大学生请安妮特和她的母亲去看戏，歌德闻讯后赶忙到戏院去察看，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我的头气得快要炸开了……我的心乱跳……”这引起安妮特极大的不快，一开始她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忍耐忍受着，向歌德解释原委，但往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歌德得寸进尺，很快便将自己培养了两年多的爱情一手断送了。

歌德年轻时，像那些时髦的年轻人一样，爱到处

题写自己的名字。有一次他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一棵古老的菩提树的光滑的树皮上。和安妮特相恋之后，他又不厌其烦地在自己的名字上面刻上恋人的芳名。第二年春天，他和安妮特闹过一场别扭，偶然又跑到那棵树旁，看到菩提树白色的树汁，正在安妮特的名字处和没有结痂的切口处喷出来，一直流到歌德的名字上，像泪痕一样，歌德的心一下子缩紧了，觉得是恋人在哭，眼泪也不禁流淌下来，赶紧跑到恋人那里，三番五次地请求她宽恕以前的一切。

和安妮特相恋，快乐和痛苦交织在歌德心头，他需要用诗歌创作来摆脱内心的疲劳和不安。他在自传《诗与真》中写道：“于是我就开始一个方向——我一辈子不能背离的方向，这即是说，把那些使我喜欢或懊恼或其他使我心动的事情转化为形象，转化为诗，从而清算自己的过去，纠正我对于外界事物的观念，同时我的内心又因之得到宁帖。因为我的天性常常把我从一个极端抛到另一个极端去，我需要有这样的才能比任何人更为迫切。”

在这期间，歌德写了一部抒情诗，以安妮特的芳名作为诗集名。在序诗中，歌德解释这样做的缘由：

从前的古人用神名

缪斯和友人的名字
给他们的书命名，
却无人用恋人的名字。
安妮特，你是我的神，
我的缪斯和友人，
我的一切，为什么
我不该用你的芳名
给我这本书命名？

1770 年，歌德出了一部处女诗集《新歌集》，其中有好些诗也是根据这一段恋爱经历写成的。

1767 年至 1768 年之间歌德还写了他第一部完整的剧作《情人的脾气》，描绘了他对安妮特沸腾、奔放的激情，同时对恋爱失败表示沉痛忏悔。

歌德与安妮特分手后，还常给安妮特写信。1769 年，安妮特与法学博士康涅订婚，歌德也去信祝贺。

失恋后，歌德心中空落落的，外加艺术创作方向上的茫然，他陷入内心激烈斗争的漩涡，他看不到未来希望的曙光，不仅在精神上憎恨自己，而且以种种愚妄的方法摧残自己的肉体。1768 年夏天的一个夜晚，他因大吐血而躺倒了，幸而他还能叫醒同室的同学请来大夫，一连几天他痛得死去活来，熟人们都尽

力照顾他。几个星期后，他的病情稍微稳定，便离开莱比锡，失魂落魄地回到他的故乡法兰克福。

五、在家养病的黯淡时光

当两手空空、一身是病的歌德踏进自己的家门，着实把全家人都吓了一跳，母亲流下了伤心的泪。做父亲的，看到儿子没有如他所期望的衣锦还乡，心中大为不快，但儿子一副弱不禁风的可怜相摆在眼前，便不好发作，只得冷静地抑制住自己的怨怒。自幼和歌德秉性相投的妹妹一如既往，热情周到地担负起照料哥哥病体的责任。

随着时间的推移，家中不安定的气氛愈来愈浓，也愈来愈使他苦闷了。父亲愈来愈明显地流露出对他的失望和不满，父子间保持着一种冷漠的不愉快的关系。父亲除了埋头于他那心爱的游记写作以外，就是指导女儿的学习，但是他那迂腐的暴君般的教育方式只能引起女儿内心的憎恨，科内里娅经常向哥哥吐露自己的苦楚。父亲与子女之间的对立常使慈祥的母亲左右为难。

真是祸不单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歌德又病倒了。这一次患的是严重的肠胃病，消化系统发生故障，甚至可以说完全不行了，医生束手无策，歌德相信这一次准会送掉性命了。在这危险的关头焦急万分的母亲逼着医生拿出他的万灵药来。原来这位内科医生信奉炼丹术，秘密自制了一些药品，谁也不公开提起这些药，因为根据法兰克福的法律，医生自制的药品是不合法的。有一种是助消化的药粉，他不那么保密，但是还有一种重要的药剂，那是医生准备在病人极其危险的时候才应用的，而且也只给那些相信他的人服用。不过，还没有人看见过或体验过它的功效。俗话说，病急乱投医，母亲在万分无奈之下恳求医生拿出他的自制灵丹妙药，救她儿子一条命。他推脱了好一会儿，最后才在深夜赶回家里，拿来一小瓶结晶体的干药，用水溶化后，让病人吞服。没想到，歌德的病竟逐渐好了。

歌德的母亲有一群信仰宗教的女友。歌德在家中养病，常和她们接触，被其中的冯·克莱顿贝格女士深深吸引。歌德后来创作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游学时代》中有关《美丽灵魂的自由》章节，就是根据这位女士的谈话和信札而创作的。冯·克莱顿贝格女士穿着整洁，举止优雅。她的心境始终是愉快宁

静的，她把病痛看作是她正常的身体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以极大的耐性来忍受，她活泼健谈，最爱好、甚至唯一的话题就是人能够经过反省而获得道法的体验。歌德对真理的追求，在以克莱顿贝格女士为代表的具有个人色彩的虔信派身上看到一丝希望。

虔信派认为宗教事务是个人的事情，而不是从外界强加的教会的神圣义务。虔信派的进步意义在于讲求宽容，反对教条，使信奉者具有某种自我意识和更高的道德责任感。歌德常和这位女士讨论有关宗教的问题，开始认真研究虔信派的著作和神秘主义者的著作。虔信派戈特弗里特·阿诺德的《教会和异教徒史》雄辩地提到了平民的原始基督教，给了歌德很大启发，他明白了阻碍人们挣脱官方宗教信仰是多么矫揉造作，多么虚伪！也明白了国王为什么要求宣传教条，为什么要严厉惩处异教徒了。自此以后，歌德决意和新教命的神职人员教给他的一切决裂。

平凡的克莱顿贝格成了不平凡的歌德的思想引导者，最直接的影响是歌德在莱比锡期间养成的不安的心绪在其鼓励和安慰下慢慢消除。歌德在《诗与真》中回忆这位女士，仍然满怀感激之情：

“她拿她的方法解释我的不安、我的焦躁、我的

追求、我的探索和研究、我的沉思和动摇；她对我并不隐瞒她的信念，而是并不夸张地、明确地对我说，我之所以表现出上述种种精神状态，是因为我没有同上帝和解。从少年时代开始，我就一直相信我同我的上帝相处得十分不错，甚至我根据我的一些经验，自认为上帝在一些地方有负于我，而且我有足够的胆量相信，在一些事情上我可以原谅他。这种自负态度是以我的无限的善良意志为基础的，像我所想象的那样，上帝本应扶助我的善良意志才是。可以想见，我和我的这位女友经常就这个问题争论不休，但每次争论都总是以十分友好的方式结束。有好多次在结束争论时，她说我是一个应该不时得到人们谅解的傻小伙子。”

肉体的苦痛令歌德夜不能寐，他翻来覆去，思考艰深的宗教问题，他想，上帝在创造神子和圣灵的同时，一定同时创造出了魔鬼，魔鬼是反对上帝的第一个叛逆。他为此开始构思出了诗歌中的一些新的形象，他用普罗米修斯这个叛逆者来代替背弃上帝的魔鬼，因此，魔鬼创世说就成了歌德世界观根本转变的前奏，同时和别人对叛逆者形象的描述相反，歌德特别强调上帝与人之间的冲突，因而对于人与叛逆者的同一性的肯定就包含了积极自主和自我负责的

行为，这是从普罗米修斯颂歌直至浮士德诗歌的主要特征。因此，创世说首先对歌德美学观点的形成起着很大的作用，后者第一次认真地推动他去掌握那伟大的人类形象，而这形象的能动本质结果也就决定了他诗歌的人道主义的古典的基本内容。

虽然死亡的阴影还笼罩在歌德的病榻之上，但年轻的歌德不甘忍受死亡的摆布。“等待吗？在死亡的恐怖中悄无声息地告别人世？不，即使属于我的时光已经屈指可数，我又何必把它白白留给恐怖。时间也许并不多了，但它是属于我的，应该由我自己来支配。”想到这里，迈进死亡门槛的歌德脸上从生病以来第一次呈现出生动的表情，他感到窗前的阳光又恢复了往日的明媚。

在寂寞之中，歌德曾重操画笔，画房中家具和家人的素描，并将听到的城中种种趣事用画表现出来，这些画谈不到有多高水平，但却博得他父亲的欢心。不过在家中从事铜版刻蚀，却惹了一桩意想不到的祸事。身体本来虚弱的歌德喉咙疼得十分厉害，小舌发炎，吞咽困难，医生查不出病根，还是歌德自己觉得这种怪病跟长时间地刻蚀铜版有关。果然，放弃这项工作后，怪病也就不治而愈了。

病中的歌德还再次焚毁旧作，但对《恋人的脾

气》和《同罪者》这两部作品不仅保留，还加以整理利润色。《同罪者》是歌德自己特别喜欢的，在全部内容完成之后，又把楔子重新改写，使它更加动人和容易理解。这是一部论战性剧本，以莱辛的《米娜·冯·巴恩海姆》为范本，刻画了莱比锡那些迫害他和贝尔施的伪君子的丑恶嘴脸。

常给歌德看病的医生约翰·弗里德里希·迈茨，不仅治疗歌德的病体，也积极修复歌德心灵上的抑郁残缺。在他的指导下，歌德钻研医生和自然科学家巴拉赛尔苏斯的著作以及犹太人的神秘哲学，并像古代炼金术士那样做实验，想借此来揭开大自然的奥秘。他在1769年2月给朋友写的信中说：

“我现在正在研究哲学。我处于闭塞和孤独之中，全部装备就是圆规、纸、笔和墨水，还有两本书。用这种简单的方法，我常常深入于对真理的认识之中，比那些专啃书本的人深入得还要多。一位大学者很少同时是一位大哲学家。那些耗费精力读了很多书的人，十分轻视自然这本简单而又纯朴的书，然而除了纯朴的东西之外便没有什么东西是真实的。”

歌德把研究自然看作是在哲学的意义上追求真理，他一生一直都保持着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并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而且，歌德的实验和研究对后来《浮

士德》写作极有帮助，诗剧中那位老博士在书斋中冥思苦想以及炼丹的情景，正是这时候的歌德的自身写照。

1770 年的春天到了，万物复苏，歌德一生中最黯淡、最不幸的一年半时光过去了，他基本恢复了健康，心灵抑郁症也抛到了九霄云外，青春朝气又勃发出来，于是他再度渴望离开家庭。不过，他不愿重返莱比锡。3 月底，他乘上舒适华丽的驿车，一路没有停留地到了法兰西王国的施特拉斯堡，准备完成他中断了的大学学业。

六、施特拉斯堡的恋爱插曲

到达施特拉斯堡，稍加安顿，歌德便急不可待地去游览神往已久的大教堂，登上教堂顶上的平台，城市的美丽风景尽收眼底，莱茵河蜿蜒着向远方流去，两岸草木繁茂，平野绵亘，一片葱绿。看到这一切，歌德心中舒畅，默默为自己将要开始的新生活祈祷祝福。从平台上下来，歌德仍在大教堂内流连忘返，他为大教堂哥特式的气派所倾倒，尽管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哥特式建筑是一种野蛮的建筑艺术。两年之后，他仍热情地赞美，称它是“德意志式的建筑艺术”，是祖国形象最美丽的化身：

“当我走到它面前一看到它，我就感到多么地出乎意料和惊奇不已啊！一个完整的、巨大的印象充满了我的心灵。我可以欣赏和领受这个由千余个和谐的部件所构成的印象，但我却不能辨清和说明它们。有人说这就是天堂里的欢乐，我多次返回这里，来享

受这人间的天堂之乐，来领受我们的古代兄弟在他们的这件作品中所显示的博大的精神财富。我多次返回这里，从各个侧面、从各种不同距离、在日光的不同照射强度下，静观它的庄严和壮丽。一个人如果看到他的古代兄弟的作品如此崇高伟大，使他只能屈膝膜拜，他的心情该有多么沉重啊！有许多次，晚霞那友善的宁静之光在我因探察这建筑物而已疲惫的眼前闪现，在霞光中，这建筑物那无数的部件融为一体了，它简朴大方地耸立在我的心灵之前，我欢欣若狂的让自己的力量尽量扩展，以便去欣赏和辨认它，此刻，创造大师的这件天才之作才微嗔地展现在我的面前。”这座大教堂对于醉心于新古典主义艺术的歌德来说，是个新天地，扩大了他的眼界和胸襟，帮助他逐步从法国新古典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他心中播下了狂飙突进和浪漫主义的种子。

歌德到施特拉斯堡后，他的法语就成了当地人嘲笑的话柄，正像当初刚到莱比锡时被人嘲弄他的法兰克福土气的乡音一样。他是自小就学会法语的，但是发音不纯正，因为他小时候经常模仿那些仆人、卫兵、牧师和演员们说法语的腔调，积习难改，有点不伦不类，怪腔怪调，在上流社会人士的耳朵里听来自然有些异样。他们的嘲笑严重地伤害了他的自尊

心，他下定决心，除非必要，不再说法语，他要用自己的母语——德语——表达一切，证明这种语言多么富有表现力。一个向往外地文明的人，一旦踏上异国他乡，反而对祖国和故乡滋长出亲切的感情。

歌德住在鱼市街一所舒适的寓所。鱼市街是一条又长又美的街道，整天人来人往，很是热闹。公寓包饭的有十几个人，差不多都和歌德意气相投，其中也有不少大学生，首先博得歌德好感的是医科学生迈耶，虽然迈耶的体态和长相不佳，但举止温和，品德善良，且记忆力出众，模仿各科教授的讲课维妙维肖，常惹得歌德开怀大笑。

因为一起吃饭的人中有不少医科学生，饭桌上常不免谈论医学知识，歌德在这方面知识贫乏，所以歌德在听取法学专科课程之外，在第二学期，还饶有兴趣地去旁听医科课程，并下了不少真功夫。很快，他的医科水平就受到饭桌上同伴的好评。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歌德对人体解剖学有一种天生的厌恶感，但他还是努力加以克服，试图习惯那些看一眼就令人恶心的被解剖了的肢体。这对他后来的动物学研究极有帮助。

饭桌上的总管萨尔兹曼博士年纪甚长，斯文庄重，歌德信任他，向他咨询深造法学需要学习哪些科

目等问题，博士给他介绍了一位补习教师，帮助歌德掌握有关法学的必要知识。不久，歌德极容易地得到了博士应考者的资格。

萨尔兹曼博士是位知名人士，在施特拉斯堡认识很多人，到处可以出入，歌德和他一起出行遇到很多方便，尤其是夏季，在各处庭园都能得到盛情款待。在一些喜庆的日子里还能受到邀请。为了迎合新的环境中的礼仪要求，歌德不得不让理发师替他卷起美丽的头发，而不情愿地戴上假发，为防止假发露出马脚，歌德外出活动更加文静有礼，出门时把帽子夹在臂下，穿鞋着袜，绅士派头十足。

在乡间别墅时常有私人舞会，涉足社交界的歌德当然不会置身舞外，他兴致勃勃地练习跳舞。由于不会跳华尔兹，朋友给他找了一位舞蹈教师，是一位爽快、精细地法国人。让歌德愉快的是，这个法国人有两个不到 20 岁的漂亮的女儿，舞跳得非常娴熟，常陪伴父亲的学生跳舞。大女儿璐仙德对歌德一见钟情，小女儿安美梨态度矜持，对歌德表现冷淡。造化捉弄人，偏偏歌德对安美梨情有独钟，愿意和安美梨呆在一起聊天，而把姐姐抛在一边。璐仙德非常嫉妒妹妹，她找巫婆算卦，认定是妹妹夺走了她的心上人。安美梨很为难，请求歌德不要再来她家上舞蹈课

了，以免一个因他的爱慕而陷入困境，一个因他的冷淡而陷入痛苦。告别时，安美梨对歌德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谈话了，你多次要求亲吻，我一向拒绝你，现在就满足你的愿望吧！”说完，搂住歌德的脖子，非常温柔地亲吻他，歌德将安美梨紧紧地拥抱。璐仙德突然闯进来，把妹妹大骂特骂。安美梨极力安慰她的姐姐，同时示意歌德赶快离开，璐仙德看出了妹妹的用心，扑向歌德，说道：“我知道，我已经失去你了。我不会再打你的主意了。但是，妹妹，你也不该占有他！”一边说，一边用力抱住歌德的脑袋，把两只手插进歌德的发卷，脸压着脸，连番亲吻歌德，弄得歌德手足无措，吻完后，她对歌德也是对她的妹妹大声嚷道：“好！惧怕我的诅咒吧！谁在我之后最先吻这个嘴唇，就永远永远蒙灾惹祸！现在还再敢跟他厮缠吗？我知道上天这回已听见我的诅咒了。”听完璐仙德的诅咒，歌德赶紧沿着楼梯飞跑下去，从此再没有踏进舞蹈家的门，一场小小的三角恋爱的插曲结束了。歌德对这一段有趣的经历，一直不能忘怀。几年后创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时，还很怀念妩媚可爱的妹妹和率直多情的姐姐，将她们的名字写进这部名著第一篇的第一页。

七、和赫尔德尔相遇

这一时期对歌德最有意义并且产生重大结果的事是他与赫尔德尔的认识和交往。赫尔德尔是德国卓越的先驱思想家、享有“北方智者”之称的约翰·格奥尔格·哈曼的学生，只比歌德大5岁，上过康德的哲学课，和狄德罗、莱辛都有交往。在神学、哲学、美学、诗学、历史、语言学等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特别推崇并且继承莱辛倡导的民族文学的精神。在歌德和他相识之前，他已因《近代德国文学散论》和《批评之林》而名躁一时，在这些著作中，他坚持用历史的眼光来观察世界，认为文学是不断地发展着和消亡着的历史现象。赫尔德尔陪同一位伯爵前来施特拉斯堡游玩，因患眼病而暂留。

歌德听说赫尔德尔到了施特拉斯堡，很想前去拜访，便向人打听到了赫尔德尔下榻的饭店。当他急匆匆地走进饭店，在三楼的拐角处，他遇见了一位陌

生的青年牧师。陌生人披着绸斗篷，下摆撩起，塞进衣袋，扑了粉的头发卷成一绺，盘在后脑勺上。歌德马上猜到服装古怪、举止潇洒的教士就是赫尔德尔。他立即向这位知名人士作了自我介绍，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我非常想去拜访您，并听听您对文字的见解，希望您不要推辞。”

歌德的坦率赢得了他的好感，他答应与这个年轻人交往。让歌德到医院的眼科病房去找他。歌德很快被赫尔德尔深刻的思想所吸引，开始频频光顾赫尔德尔的眼科病房，他几乎每个晚上都去，有时甚至一连几天都泡在病房里。

窗外，和煦的阳光铺满林间，受到阳光抚慰的小鸟发出愉快的鸣啭；窗内，由于主人受着病痛的困扰，病室内一片阴郁。然而，赫尔德尔病床前的气氛却与这股低沉的调子迥然不同，赫尔德尔正利用他那演说家的天赋在向歌德滔滔不绝地讲解自己的文学见解：

“以阿那克瑞翁诗派为代表的洛可可文风意味着什么？那不过是封建王朝没落在文学中的投影，充其量是在拍宫廷趣味的马屁。作家应该把文学看作是宣扬启蒙思想、唤醒民族意识的舞台，只有这样才能期待德国文学的繁荣。”

歌德双手抱在胸前，静静地聆听赫尔德尔的讲解，他钦佩赫尔德尔的博学和睿智，他愿意像个谦虚的学生那样专心地听下去。

赫尔德尔像个天生的导师，他仿佛已经习惯了这个角色，讲起话来从不知道疲倦：

“文学应该反映客观现实，表现人的个性和情感……如今德国的戏剧舞台上比法国人还法国化，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民族戏剧，应该把市民阶层搬上舞台，普通人也可以有不平凡的命运，因而更容易引起大多数人的同情……”

赫尔德尔也觉得眼前听他演说的年轻人谈吐不同凡俗，抱负异常远大，同时庆幸自己收了一个撞上门来的好学生。他在1772年3月21日给女友的信中这样评价他所认识的青年歌德：“歌德真是一个好人，只是太轻率，过于轻率，有点忘乎所以，我一直责备他不该这样，”“他是我在施特拉斯堡逗留期间拜访我的唯一的一个人，也是我乐于会见的一个人。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也给他留下了一些好印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起作用的……”

赫尔德尔的自信非常有道理，在不久的将来便得到了印证，是他第一个为歌德指明了怎样去全面地认识时代的根本方向；是他第一个向歌德阐明这

样的文学道理：要理解文学的发展史，就必须认识人民的历史与人民的诗歌之间的密切关系；一个作家只有当他和人民利益一致时，才能发挥他特有的写作诗歌的能力。晚年的歌德仍不能忘情赫尔德尔对于他思想启蒙的重大作用，虽然此时他已与赫尔德尔彻底决裂：

“这个好心的大嗓门儿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显著的。他比我大 5 岁，这种年龄上的差别在人们年轻的时候特别显著。我承认他的声望，我尽量尊重他已经取得的成就，因而他必然成为高于我的权威。但是，情况并不令人满意：因为直到现在为止，与我交往的那些年岁较我为大的人们，都以宽容和爱护的精神来培养我，或许还有些娇惯我。但是，在赫尔德尔这里，永远也别期望他会同意人们按自己的想法去行动。正因此，我一方面倾向于他、尊重他，另一方面，他使我不愉快。这两方面经常互相斗争着，使我的内心形成一个分裂，我在我的生活中感觉到了这一点。他的谈话对我随时都很有意义，他能够用提问、回答或者其他什么方式随便就说明某些东西，因而，他每天、甚至每小时都在促使我去获得新的见解。以前在莱比锡的时候，我已经习惯于一种狭隘的、精思细斟的作风，我对德国文学的一般知识面也

由于我在法兰克福时的状况未能有所扩展；那些神秘的、宗教性的炼丹实验确实把我引入了昏暗的境地，近几年来在广阔的文学天地中所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大多都是陌生的。现在通过赫尔德尔的介绍，我一下子就了解了文学上所有新的成就和其所遵循的各种方向。当时赫尔德尔已经十分出名，而且由于他的《散论》和《批评之林》等著作，他已置身于长期以来就受到国人关注的杰出人物之列。他的那种引人激动的精神和那种促人奋起的性格是无法让人理解的，也是无法加以描述的。但是，如果想到他在许多年之后仍然在各个方面还发生着影响、起着作用的话，人们就很容易理解，他那时所作的的不露声色的努力确实是伟大的。”

歌德在自述中提及赫尔德尔让他不愉快，是因为赫尔德尔脾气乖戾，常常不留情面地教训歌德甚至拿歌德的名字开玩笑，让歌德受不了。歌德藉着交游广泛的好友的帮助而凑集了一大本文章，借以熟悉各国各州的大小诸侯情况，在向赫尔德尔炫耀时，受到后者的无情嘲笑，认为还不如去搜集民歌。歌德回忆说：“我从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方面，即从与人们过去的理解不同的意义上了解诗歌，也就是说，在我十分乐意接受的意义上了解它们。”还有一件事让歌

德汲取教训。那时歌德整洁的书架上放了很多精美的书籍，却因为杂事烦多而无暇翻看，这同样招致赫尔德尔的不满和嘲讽。赫尔德尔认为歌德应当认真阅读荷马的史诗、品达罗斯的颂歌、莎士比亚的戏剧等。歌德为之愧作不已。从此更加服膺赫尔德尔了。

可以说，赫尔德尔在很大程度上打掉了歌德身上的贵族习气，让歌德的思想更趋活跃，视野更加开阔，文学口味得以净化。但是赫尔德尔也破坏了歌德对从前所爱好的种种事物的兴趣。比如歌德对异维德的《变形记》一书的推崇就受到赫尔德尔的非难。这样，在赫尔德尔面前，歌德小心翼翼地隐瞒对某些题材的兴趣，不敢自由地陈述自己的文学思想，这些题材就是葛茨·冯·伯利欣根和浮士德的故事。前者的传记深深打动了歌德，在野蛮和混乱时代的一个粗野而心地善良的自助的英雄形象，引起歌德深深的共鸣。浮士德是一个著名的木偶戏传奇，它使歌德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这两种题材，植根于歌德心中，最终都付之笔端，化成伟大的诗篇。

赫尔德尔的眼疾未能如期治好，快快不乐地离开了施特拉斯堡。他和歌德这次短暂的会见在德国文学史上的意义是重大的。要知道，新文艺运动的纲领最基本的核心在他们两人的谈话中慢慢形成了。

当然，赫尔德尔是主要制订者，是这一运动的理论家。这个运动按照歌德少年时代的好友弗里德里希·马克西来利安·克林格尔的一部戏剧的名称而称作“狂飙突进”运动。

“狂飙突进”运动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在19世纪之前，德国比欧洲的英、法等国要贫穷得多，并且四分五裂，不能统一。受英、法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影响的被压迫的市民和手工业者非常不满，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更是愤愤不平，不断掀起反专制、反封建、反神权的文化运动。18世纪40年代，诗人弗里德里希·哥特里普·克鲁普斯托克用诗歌反对旧的理性主义的束缚，抒发友谊、爱情、自然和对祖国的感情，发出了对一切新的文学运动的呼唤。而歌德和赫尔德尔相遇相识，成为“狂飙突进”运动的真正开始。

“狂飙突进”运动推崇卢梭的民主主义思想。继承德意志的民族意识，鞭笞封建割据造成国家、民族的分裂，要求把整个德意志民族视为一体，同时，他们反对生活的异化，要求根据生活习俗创造具有民族风格、民族特色和民族内容的文化，因而，他们特别关注刻画德国人民的自由、友谊、爱情、祖国及自然而恬静的田园生活。“天才”是“狂飙突进”运动

倡导的口号，因为只有天才才有胆略披荆斩棘，向罪恶的封建专制制度发动冲击，有智慧判明造成民族分裂的原因，有能力果断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同时，“狂飙突进”运动强调理性与感情的融合，这一条，成为文学创作的强大推动力。

一大批年轻的作家站到“狂飙突进”运动的旗帜下，以自己的优秀作品显示“狂飙突进”运动的实绩，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次富有政治意义的文学运动。这一运动的意义因歌德、席勒等“天才”式人物的参与而变得异常重大。

八、《五月之歌》和“诗的忏悔”

和歌德同桌吃饭的人当中有一个韦兰德的年轻人，他出生于阿尔萨斯州，熟悉当地风土人情。

1770年10月初，他和歌德结伴郊游，到离施特拉斯堡约十五六英里的塞森海姆镇一位牧师家作客。那天歌德穿了一身怪诞的破衣服，行为举止古里古怪，惹得韦兰德一路上大笑不止。牧师的房子看上去像一所破旧的农舍，但里面却清新如画，让歌德感到心旷神怡，更让歌德分外惊喜的是牧师也有两个美丽可爱的女儿，当小女儿弗里德里克走进房间，走进歌德的视野，“这时，真好似在这个乡间的天空升起了一颗最娇美的明星。两个女儿都还是通常所说的那副德国打扮，而这种几乎受排挤的民族服装穿在弗里德里克身上特别合身。一条不到脚踝的镶着绉边的白色圆短裙，下面露出她那双极其秀丽的小脚；一件白色紧身马甲和一条黑绸短围裙，她的这身

打扮既像乡下人又像城里人。她身材苗条，步态轻盈，显得一无牵挂；同那俊俏的小脑袋上两条粗大金色辫子相比，她的脖子显得太柔嫩了。她有明亮的蓝眼睛十分认真地向四下环顾，用美丽扁平的小鼻子自由地呼吸着空气，仿佛世上不可能有任何叫人发愁的事情。她手臂上挂着草帽，我一见到她就很高兴，一下子就看出了她的全部优雅和娇媚”。于是歌德就有点不大好意思地扮起了他的角色，拿主人开玩笑来了。

弗里德里克对家中的不速之客也抱有好感，马上和歌德愉快地交谈起来，并为歌德弹奏钢琴，演唱流行小曲。

“我来自一座黑黝黝的森林，相信我吧！我爱着你，这是我唯一的欢乐。暖哟！暖哟！暖哟！暖哟！”

歌德陶醉在这甜美的歌声中，觉得姑娘是为他而唱。

吃晚饭时，她坐在歌德身边，向歌德介绍当地的风光。夜幕降临，明月临空，她换着歌德同到旷阔的田野散步，向歌德描述她的经历和她特别尊重的人物，歌德忽然觉得不早点成为她的知己是件深可惋惜的事。看到弗里德里克如此推心置腹，歌德觉得她内心一定非常纯洁。

在朴实的弗里德里克面前，爱心萌动的歌德觉得自己拉丁骑士的怪相显得滑稽可笑，为自己的寒酸扮相抱愧。第二天一早，他便赶到镇上向旅店老板的儿子乔治借节日礼服。巧合的是，歌德和乔治长相上相似，于是歌德心血来潮，开了一个新的玩笑。他用烧焦的树枝把眉毛描粗描黑，梳起和乔治一样的分头。在返回的路上遇到弗里德里克，她果然把歌德认作乔治了。直到在村外林中重逢，她才看清假乔治的真面目，又惊又喜。歌德的乔装打扮给她一家人都带来了欢快，这一天，就在大家的谈笑戏谑中度过了。

歌德于10月14日离开塞森海姆，回施特拉斯堡，15日就给弗里德里克写信，用含蓄的措辞表达了对她的爱慕，这是存留下来的两人爱情的唯一证据：

“亲爱的新女友：

我毫不犹豫地这样称呼您，因为如果我稍微懂得看眼神的话，那末我一下子就看出了您眼睛中充满的对友谊的渴望，我要为我们的心发誓。您，我知道您温柔而善良，既然我这样爱您，难道您不该回报我一点好意吗？

亲爱的、亲爱的女友：

我是否有要对您说的话，这是不用问的。但是我

是否正好知道为什么我恰好现在想写信给您，并知道要给您写些什么，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觉察到了我内心的某种不安，这种不安是如此之强烈，它表明我非常乐意呆在您的身边；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对于呆在这里、呆在喧嚣的施特拉斯堡市中心的我来说，您的一张纸片就是最有价值的安慰，就是一匹带翼的骏马；如果您真正强烈地感到您离您的朋友们多么遥远的话，那么我想这纸片对您，对于处在宁静之中的您也有同样的意义。

我们归途中的情形您大概能够想象得到，如果您能看出在分手时这分离使我多么难过……

最终我们还是必须离别，首先值得回味的是我们在路上所感到的愉快，这回味很快就被一个念头所代替：我必须在不久之后与您重逢。

再能见到您是一件最令人心旷神怡的事情。我们这些心灵娇弱的人，一旦稍感不适，就马上给自己开出自慰的药方，说：可爱的心，你静一静吧，你是不会长久地远离他们、远离那些你爱着的人们的；静一静吧，可爱的心灵！这样，我们就给心灵一个幻觉，它如愿以偿了，它变得乖巧和安祥，就像一个幼童从妈妈那里得到的不是苹果而是不能吃的洋娃娃的情况那样。

好了，我们就到这儿吧，您看，就是您错了！您不愿相信，当我想起您那里甜美的田园乐趣时，这城市里的喧嚣真使我难以忍受。

的确，小姐，施特拉斯堡在我看来还从未像现在这样显得空空荡荡。虽然我希望，如果时间能够稍微淡化我们对那优雅的、尽情的欢乐活动的回忆，如果我不再如此强烈地思恋我那可爱的女友，情况将会好一些。然而难道我能够或者愿意忘掉这些吗？决不！我更愿意经受着心灵的微痛经常给您写信。”

到了月底，歌德又迫不及待地骑马到塞森海姆，再次受到牧师一家的热情接待，弗里德里克竟向家人预言那天歌德会到来，并准备了一些晚上吃的小食，恋人间的心灵感应是如此的奇妙和灵验。晚上，歌德高兴地和村子里的小伙子们一起到教堂后广场上围着篝火跳舞，弗里德里克的轻盈舞姿和安详举止再次拨动歌德的心弦。两人的关系愈加亲密。

从此以后，歌德常到牧师家里，老是跟弗里德里克在一起，牧师一家人日益习以为常，恬不为怪。他们听其自然，而不问及这对年轻人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按照当时这地方的一般风俗，他们放任这对年轻人和别人一起作短暂旅行，游览莱茵河两岸的风光。歌德喜欢泛舟到莱茵河的岛屿上，围着篝火烤鱼

吃，他和弗里德里克的爱情随着旅游的顺利进行而更见增长。他在弗里德里克身边感到那么幸福：“我同她谈笑风生，心情舒畅，机智幽默，踌躇满志，而感情、尊重和依恋又使人的举止很有分寸。她也一样，坦率、开朗、热心、健谈。我们似乎只是为了聚会而活着，只是为了对方而活着。”

爱情让歌德精神焕发，乡间清澄的天空、肥沃的大地、和煦的阳光、温柔的夜色、雨后的彩虹、林中的芳草鲜花，让歌德耳目炫迷，他久已淡漠的诗兴不觉油然复生，禁不住按着著名的曲调为弗里德里克创作了许多短歌。赫尔德尔的影响发挥了作用，这些诗歌运用了新的创作手法，体现了新的进步诗歌的观念，《塞森海姆之歌》被赫尔德尔称为是这个天才的伟大的创造性突破。《五月之歌》描绘自己跟恋人在塞森海姆村外原野上散步时的情怀，将自然和爱情融合成一体，简洁明快，是歌德打破向来模仿的安娜克瑞翁诗作的技巧，展现新生命的力作，贝多芬曾为本诗谱曲。

天地多绚烂，
对着我照耀！
太阳多明亮，

原野在欢笑！

根根树枝上，
繁花怒放，
灌木丛中，
百鸟在竞唱！

个个心胸中，
快乐又高兴，

哦，大地，太阳！
哦，幸福，欢欣！
哦，爱情，爱情！
美好如黄金！
你好似朝云
浮游云峦间！

你庄严祝福
清新的原野，
花香扑鼻的
这整个世界。

哦，姑娘，姑娘，
我对你情深，
你眼睛明媚，
爱我多真诚！

像云雀喜爱
凌空高唱，
像朝花喜爱
大地的芬芳。

我爱你爱得，
热血要沸腾。
你带来欢乐、
勇气和青春。
我高唱新歌，
我婆娑起舞，
只要你爱我，
就永远幸福！

这首小诗运用阶梯式的结构，在赞美了春天和生机勃勃的繁花似锦的大自然之后，诗人祈求爱情。歌德针对德国市民的恋爱生活和婚姻生活的那种由

经济基础决定的不合时代潮流的准则发出了爱情至上的呼声，宣布相爱者道德上是平等的，同时指出了这种恋爱关系的社会意义。由于这种爱情赋予诗人以谱写新的曲调，编排新的歌舞的乐趣和勇气，所以，这意思不外是说，这种爱情给人以有鼓舞作用的力量，从而感觉和行动，个人幸福和艺术创作实践结合起来。把颂诗的结构和民歌的形式融合成一种新的抒情诗体，这种情况在德国诗歌中还从未有过。歌德这首诗大量运用动词和感叹词，给人以生动有力的感觉，这反映了作者的充满胜利信心的乐观主义情绪以及对自己的力量和大自然恩赐的信赖。

牧师有一位亲戚居住城里，平时交往不多，弗里德里克认识歌德后，才有机会随母亲和姐姐到施特拉斯堡拜访，并借机与歌德相会，没有想到，她们的一身农家穿戴在时髦庸俗的女市民中间引起了纷扰，歌德为之惴惴不安，他看到一堵无形的高墙横亘在他和纯朴的农村姑娘面前。虽然这之后，他还到塞森海姆去看望女友，圣灵节期间，在牧师家度过了近一个月的时光，但歌德心中已是摇摆不定，浪漫的爱情协奏曲中夹杂进了不和谐的音符。1771年夏季，歌德终于负心地斩断情网，是由于感到弗里德里克有点土气？是由于他不愿跟一个乡村姑娘过一辈子平

凡的生活？是由于他本来就是個对爱情不忠实的人？我们不得而知。1771年8月，歌德获得学位后要离开施特拉斯堡返回法兰克福。临走以前，他去跟弗里德里克握手道别。当时歌德并未告诉他将不再来，但敏感的弗里德里克已觉察到会有这一天。可除了黯然神伤地流泪，又有什么办法？自歌德走后，她生了一场大病。病愈后，一位青年诗人追求她，她没有接受。1779年9月歌德去瑞士旅游取道看望她，她对他依旧保持不变的爱情。后来她终生未嫁，带着永远没有愈合的心灵创伤，在61岁病逝于塞森海姆。

歌德虽是负心郎，但他自己也忍受着离别带来的深切痛苦，他晚年回忆说：“弗里德里克对于我的诀别信的答复撕裂了我的心……这时我才意识到她所受的伤害，我找不到任何办法弥补对她的这种伤害，哪怕只是使它有所减轻也行。她时时都逼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时时想念她，而最糟糕的是：虽然我自己也感到十分不幸，但我并不能以此而宽恕自己……在这件事上，我有生头一次觉得有负于人；我深深地伤害了一颗美丽的心灵，这一时期我的忧郁的心情无比悔恨，此时那在平常令人神采飞扬的爱情已经消逝了，真是痛苦至极，简直不可忍受。”

著名的《野蔷薇》一诗便属于“诗的忏悔之作”，

以自责自苦的惩罚来得到内心的赦免：

少年看到一朵蔷薇，
荒野的小蔷薇，
那样娇嫩而鲜艳，
急急忙忙走向前，
看得非常欢喜。
蔷薇，蔷薇，红蔷薇，
荒野的小蔷薇，

少年说：“我要采你，
荒野的小蔷薇！”
蔷薇说：“我要刺你，
让你永不会忘记，
我不愿被你采折。”
蔷薇，蔷薇，红蔷薇，
荒野的小蔷薇。

野蛮少年去采她，
荒野的小蔷薇；
蔷薇自卫去刺他，
她徒然含悲忍泪，

还是遭到采折。
蔷薇，蔷薇，红蔷薇，
荒野的小蔷薇。

这首叙事歌体的诗极为抒情，动人心弦，采用了民歌调子自然流畅，许多大音乐家如舒伯特都曾为本诗谱曲，总共被谱成一百种以上不同的歌曲。

歌德到施特拉斯堡，是为了考取学位，但并不把学业当成头等大事，考试时也掉以轻心，付之等闲，但毕业论文却不能不做，因为这既是校方的要求，也是他在法兰克福动身时答应过他父亲的。

歌德论文的主题别出心裁，新颖大胆。他当时对教会、公众承认的宗教礼拜在两方面所起的冲突感兴趣，他阐述道：“教会一方面要同国家争夺最高权力，因而不断发生纠纷，他方面又与它所欲集拢到自己方面来的各个个人冲突。在国家方面，它不肯承认教会的支配权，而个人又反抗教会的强制权。国家要求一切事情都以公共的普遍的目的为依据，而个人则要求以跟家庭、心情有关系的目的一切事物的标准。我从幼小的时候起就亲见亲闻过僧侣有时与他们的上级官员有时与教区信徒发生摩擦的种种风波，结果，照着自己的稚气的见解，我确信国家

——立法者——有规定宗教信仰的形式的权力，教会应以此为准来行事和宣教，而世俗中人在外表的和公开的行动上也要严格遵守这个准则。至于每个人内心怎样思想、感觉，抱有什么信念，是不成问题的。我深信，这样子就可以一举把所有的争执解决。因此，我选出这个问题的前半做我的论文的题目，即是说：作为立法者的国家有权来建立某一定形式的宗教信仰，而且还有这个义务。无论是僧侣也好，俗人也好都不许逸出它的范围之外。一方面我从历史的角度，他方面列举论据来阐明这个题目，指出从来一切的公认的宗教都依靠军事领袖、国王和其他权势的人物来树立和推广，即便基督教也不是例外。”

歌德对自己的学位论文很是满意，觉得有根有据，文笔也好，他的父亲对他的标新立异、富有新教精神的见解也很赞赏。论文交到法学院，教授们不置可否，而院长却把它看成是一篇危险的东西，认为不宜当作学位论文由院方公开发表，不过可以交付答辩，以便获得一个法律学士的头衔，在当时，这个头衔与法学博士相差无几。答辩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举行，少时对于罗马法记诵上的熟练帮了他的忙，他因而博得富于法学知识的美誉，仪式顺利结束后，

照例殿以盛大的酒宴。

歌德的大学时代就这样结束了，1771 年 8 月底，他从施特拉斯堡回到了故乡。

九、律师生涯的背后

在回故乡途中，歌德顺道到曼海姆和美因茨游玩。在曼海姆古物馆，歌德欣赏到了著名的雕塑作品《拉奥孔》。在去美因茨的途中，歌德碰到一位弹竖琴的少年，非常喜欢他，便邀他同行，到即将到来的法兰克福大市集上卖艺，答应给他找地方住和予以赞助。回到家中，歌德母亲觉得把一个大市集日上的卖艺人安排体面的家中，且还要让他去旅馆和酒店里弹琴赚钱，甚为不妥，歌德的父亲一定会看作是一桩怪事，于是她赶忙在附近替弹琴少年找到一个适当的食宿的地方，将事情掩饰过去。大市集日期间，歌德向友人介绍，使得弹琴少年过得不坏。这是歌德母亲第一次尝试着调停和掩饰歌德父子间的分歧，此后，在歌德居家时节，他的母亲都发挥了重要的居间调停作用，使得父子之间基本上相安无事。

回到法兰克福后，22岁的歌德被委任为陪审法

庭的律师，这自然不合他的心意，所以对待这一职业漫不经心，据统计，4 年之中，他总共只办了 28 件诉讼案。

歌德要做的是一些远比一个称职的律师更为重要的事情。他每天早晨起床后，先埋头于诗歌的创作研究，然后才去应付一些法律事务。他在法律事务所的办公室里兴奋地思索着，终于做出最后决定：“我目前的活动应该集中于文学上面，应该用手中的笔为德国文坛投进一股清新的空气。至于诉讼、辩护，那只会让我苦恼、枯竭，我的生命不该白白地在无聊的法律事务上耗费，我应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至于父亲的愿望，如果非得为此付出代价的话，那就让我付出吧，我决不再因为别人的意愿而回心转意。”

早在莱比锡时，歌德就热衷于阅读莎士比亚的诗作。莎翁的超群绝伦的特长，掷地作金石声的名言佳句，恰到好处的描写，幽默的情调，深深铭刻于歌德心中。在施特拉斯堡，由于维兰德用散文体大量翻译莎翁的作品，又由于赫尔德尔推荐，都对歌德发生重大影响，使他成为一名“莎翁通”，整日沉缅于莎士比亚著作之中，甚至在现实生活中加以模仿。莎士比亚成为青年歌德精神上和思想上的支配力量，莎士比亚作品中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和创作时一扫过去

陈规旧习的清新文风，让歌德为之醉心。他向朋友介绍了自己读莎士比亚作品时那种强烈的感受：“我初次看了他的一页著作之后，就使我终生折服；当我读完他的第一个剧本时，我好像一个生来盲目的人，由于神手一指而突然获见天光。……我没有片刻犹疑，拒绝了有规则的舞台。我觉得地点的统一好像牢狱般的狭隘，行动和时间的统一是我们想象力的讨厌的枷锁，我不由自主地要跳向自由的空间。”回到法兰克福，他希望通过进一步研究为自己打下一个更崇高、更自由，既真实而又有诗意的世界观和精神生活的基础。1771年10月14日，他在自己和妹妹的朋友们面前作了《莎士比亚的命名日》的讲演，这篇讲演虽然简短，在德国文学史上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讲演着力介绍了当时在德国还不广为人知的莎士比亚，更进一层阐明了后来被称为“狂飙突进”运动的文学革命的纲领。歌德发现莎士比亚的所有著作“全都是围绕着哲学家们还未看见并不确认的一个神秘的点，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自我’的本质特性，我们所要求的意志自由同整体的必然性进程是相抵触的。”进而受到启发，反对洛可可风格的戏剧，同法国人及其模仿者的拘泥于旧章法的戏剧决裂，在生活以及诗歌创作中确立毫不

人为做作的、自然纯真的精神的统治地位。追求自然从此成为歌德文学创作的目标。

讲演之后不久，歌德开始写作在施特拉斯堡就感兴趣的题材——法兰克福地区的强盗骑士葛茨·冯·伯利欣根的故事。伯利欣根是16世纪一个真实的人物，勇敢正直，不畏强暴，追求自由，常常站在弱小者和受迫害者一边，无助的人们往往企望他那坚硬的铁手的保护。1525年农民起义，将伯利欣根推举为领袖，与封建诸侯血战，后来他动摇不定，背弃农民，死于敌人的围攻之中，死前还高呼：“自由万岁！”伯利欣根凭借自己的力量反抗社会，争取自由的精神，正符合“狂飙突进”运动的宗旨，和歌德的追求目标一致。歌德说：“我要把一个最高贵的德国人的故事写成剧本，以便了却对这位勇敢正直的人物的怀念的心事。”

于是歌德把充满于自身的全部力量倾注到葛茨的创作上，他一头扎进书房，除了眼前的书籍，他几乎忘记了外部世界。有人前来拜访，他客气地加以回绝。他的母亲和妹妹只能在餐桌上才能见到他的身影，但无论用什么话题去吸引他，都无法把他从自己的世界中拖出来。法兰克福早已进入梦乡，可坐落在大鹿沟街上的那座寓所的三层阁楼上，依旧闪烁着

明亮的烛光，歌德在灯下专心致志地阅读。他好像不知疲倦似的，累了，就站起来伸展一下肢体，伴着灯影在阁楼内徘徊一阵，然后又回到桌前……

长时间艰苦的案头工作，使歌德头晕的老毛病又犯了，他的脸色也开始变得苍白起来。他的母亲担心3年前险些夺走歌德生命的病魔重新回到儿子身上，于是小心翼翼地提醒歌德应该注意身体。可是，歌德虽然答应母亲，却依旧不顾一切地工作着。这天，当家人都睡去以后，妈妈敲响了歌德的房门：“孩子，你不能再这样无休止地干下去了。”妈妈望着儿子苍白的脸庞心疼地说。歌德从妈妈的眼神里看到了异常的关心和忧虑，于是搂住妈妈的肩头说：“您放心吧，我感到累了自然就会去睡的。”既然是这样，那还是让我把灯拿走吧，否则你是不会让我放心的。”说着，母亲慈爱地端起烛台走出了房间。

当母亲的脚步消失在楼梯上时，歌德顽皮地自言自语：“放心去睡吧，亲爱的妈妈。”接着就从橱柜里拿出一根新的蜡烛点燃。这个晚上，歌德桌前的烛光一直燃到黎明降临这个城市。

母亲的担心与日俱增，歌德却一点也没有放松寻觅的步伐。就这样他用了不到6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剧本的初稿。这个剧本共分59个场次，打破

了古典主义戏剧坚持的时间、地点、情节的统一性，塑造了一个用暴力同日益衰败的现存秩序作斗争的好汉，葛茨成为“狂飙突进”运动的典型英雄形象。这个剧本从形式到内容都标志着歌德同古典主义戏剧的彻底决裂。

《葛茨·冯·伯利欣根》初稿完成后，歌德先将其寄给赫尔德尔，但这部初稿直到 1832 年才作为歌德的遗著公开发表。1773 年出版的是这部戏剧的改写本，它是轰动当时德国文坛的一件大事，葛茨这个野蛮乱世中的粗野但是善良的自救者形象唤起了广泛的民族激情。德国国王弗里德里希对此剧很不满。但 1859 年在伦敦的马克思在一封信中对歌德创造葛茨的形象作了充分肯定：“那么剩下来的就只是一个葛茨·冯·伯利欣根了。在后期这个可怜的人物身上以同样的形式表现出了骑士对皇帝和诸侯所作的悲剧性的反抗。因此，歌德选择他做主人公是正确的。”

各阶层人们争相阅读，都为年轻剧作家的大胆和深刻所深深震动，青年歌德也因此一举成名，成为“狂飙运动”的代表人物和德意志文坛上熠熠发光的新星。恩格斯极其深刻地指出这个剧本是“通过戏剧的形式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敬意”。赫尔德尔在

给妻子的信中说：“这个剧本有着异乎寻常之多的德意志的力量、深度和真实……”著名诗人毕尔格尔则兴高采烈地把歌德比作“德国的莎士比亚”，并说：“我要为他建立一个神龛，表示我的敬畏，不管花多大的代价，我要得到这个剧本……就是把伏尔泰和高乃依的所有著作都卖掉也在所不惜。”

回到故乡后，最让歌德愉快和有助于他的是施罗塞尔兄弟。其中哥哥是一位法学家，也从事律师职业，歌德常向他请教生活和事业的方向问题。通过这两兄弟的介绍，歌德结识了达姆斯塔特城的陆军参议默尔克。默尔克富于理解力和才智，学识广博，对于德国近代文学造诣极深，又博览各时代各国的通史与人文史。他具有准确而敏锐的判断力，为人虽然尖刻，脾气古怪，但本性善良正直，果断可信。热心于文学创作，风格豪放粗犷，不同凡响。不久他便代替以前一直对歌德起着巨大影响的赫尔德尔，成为歌德创作的批评指导者。在他的约请下，歌德为他主编的先锋派杂志《法兰克福学者报》写过不少评论文章。这本杂志的作者多为文艺界的名流，文章立意高远，鼓吹人道主义、世界大同思想，以观察深刻、论断公正著称，让世人为之惊叹。歌德的评论文字独抒己见，洞中肯綮，也博得一致好评。1772年3月，歌

德第一次到达姆施塔特林城访问，和当地一个叫“圣若社团”的感伤主义团体成员交往密切，这些成员包括赫尔德尔德才兼备的未婚妻弗拉克斯兰、枢密院顾问官赫西、达姆施塔特城师范学院院长等。他们喜欢倾听歌德朗诵已完稿的或在执笔中的作品，不时地给歌德以真诚的鼓励。

歌德回到法兰克福之后才给弗里德里克写了一封诀别信，弗里德里克的回信让歌德为之心碎。为排遣内心的苦闷，他常在附近一带漫游，因此获得一个“浪游者”的绰号：

“我习惯于过旅行生活，就像一个信使在山区与平川之间来往穿行。我常常独自或者与人结伴遍游我的故乡城市，仿佛这个城市与我丝毫无关，我在通衢大街上的大旅店中用餐，而饭后又继续赶路。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面向广阔的世界和无拘无束的大自然。在路途中，我高唱古僻的赞美诗和酒神颂歌，其中有一首保留下来了，它叫《暴风雨中的漫游人之歌》。我充满激情地唱着这支半疯半癫的歌儿自欢自乐，因为我半路上遇上可怕的天气，我必须冒雨迎风继续前进。”

为使身体和精神恢复元气，歌德还积极从事体育活动，骑马驰骋，击剑滑冰。在晴朗的霜晨，歌德

吟诵出这样的诗句：

健康之感使我的心喜悦，
在遥远岸边覆着晶莹的冰，
我使它更踏成白雪。

冬天破晓的曙光，
照亮了温柔的湖，
夜撒满了像星辰般的璀璨的霜在它上面。

歌德就这样常常在滑冰场上消磨一个白天，有时一直滑至深夜。

十、《少年维特之烦恼》

1772 年 5 月，歌德根据父亲的建议前往韦茨拉尔帝国最高法院实习，以提高自己的律师水平，歌德本人也想换一个新的环境。

当歌德到达这个小城后，很快和当地的青年作家打得火热，以自己优雅的风度和非凡的谈吐征服了众人。人们竞相一睹他的风采，并向无缘得见的朋友热情介绍。

不莱梅公使馆年轻秘书克斯特纳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记述了和歌德相识的经过以及他对青年歌德的印象：

“春天这里来了一位法学博士歌德，23 岁，一位有钱人的独生子，他来这里是他父亲的主意，为了使他可以在实习中获得一些经验，然而，按照他自己的打算，他可能想研究荷马、平达以及他心中喜欢的东西。

起初，这里的‘文化人’向公众宣布，称他们是他们的同行，新出版的《法兰克福学者报》的撰稿人，也是一位哲学家。我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也不常参加一般社交活动，并不知道歌德，直到最近由于偶然相遇才认识了他。我们‘文化人’中一位最杰出的人物、公使馆秘书戈特尔要我陪他散步，一起到加本海姆村。我发现歌德仰面朝天地躺在一棵树底下的草地上，和站在他周围的几个人谈天，这些人中，一位是伊壁鸠鲁派哲学家冯·古埃，他是一个伟大的天才，一位是斯多噶派哲学家冯·基尔曼斯埃格，还有一位是处于两派之间的人物柯尼希博士。歌德高谈阔论，怡然自得。过后，他向我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和我相识，他感到高兴。他谈得很多，有些事谈得非常有趣。你知道我不是个迅速作出判断的人，然而这一次我对他形成这样的印象，觉得他不是个平常人。我马上发现他有天才，有生动的想象力，不过这些还不足以使我对他作出很高的评价。

他有很高的天赋，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一个有个性的人物，拥有极其生动的想象力，因此，通常他喜欢用形象和譬喻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他自己常说，他说话总是用比喻，不会用一是一、二是二的言语说话，还说等他多长了几岁年纪以后，他希望他所说的

是真正思想本身。他热情奔放，但是经常有巨大的力量克制自己。他的思想是高贵的，没有什么偏见，自己认为合适的就去做，不管旁人是不是满意，不管是不是合乎时尚，也不管生活习俗是不是允许。一切勉强的事都是他所憎恶的。

他很喜欢孩子，能够全心全意地和孩子们待在一起。他是个‘怪物’，在态度上和举止上，有些事情叫人看不入眼。但是对孩子、女人和很多其他人来说，他却是特别受到他们的喜爱。他对女性非常尊敬。在‘原则’方面，他还没有定型，他还在努力寻求一个可靠的体系。就这一点来说，他很赞赏卢梭，但不是卢梭的盲目崇拜者。他也不是所谓‘正统派’，这倒并不是因为他骄傲或者任性，也不是使自己成为一个角色。在某些重要的问题上，他很少向人陈述自己的意见，也不愿与人作梗，扫别人的兴。不错，他讨厌怀疑论，努力寻求真理，甚至自以为已经有了很深的信念，但是据我的观察，他还未必如此。他不到教堂去，不领圣餐，也难得作祈祷，因为，据他自己说，他还没有虚伪到如此程度。他尊敬基督教，但不是我们神学家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形式。他相信一种处于较好生存条件的未来生活。他努力追求真理，然而他重视对真理的感情，而不在于它的表现。

他勤奋研读，成就很大，收获很多，但是他认为自己还要作更大的努力。他主要潜心于‘纯文学’和美术，也钻研各样知识，只有一件事他漠不关心：怎样挣面包。

总之一句话，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歌德虽已写出《葛茨·冯·伯利欣根》，但并未公开发表，他的身份仅仅是帝国最高法院的一名实习生，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律师，他的头上还没有戴上各种桂冠，头顶上也还没有被加上神圣的光圈，无人会对他说溢美之词。克斯特纳的文笔又朴实，娓娓道来，如叙家常，忠实地客观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青年歌德的真实面貌。

充满戏剧性的是克斯特纳对歌德满怀敬意，歌德却在一次舞会上对克斯特纳的未婚妻绿蒂充满柔情蜜意，坠入情网而不能自拔。克斯特纳在另一封信披露了歌德和绿蒂相识的经过：

“1772年6月9日，歌德碰巧参加了一个舞会，我的未婚妻和我也参加了。我因事耽搁，只能在大家去后，骑马赶去。因此，我的未婚妻和别人一起乘车先去了。马车里有歌德博士，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绿蒂。……这地方的女人没有一个是他喜欢的，绿蒂却使他一见倾心。她年轻，虽然不是十分美丽，容貌却

非常动人。她的眼光像春天的早晨一样明亮，那天尤其如此，因为她喜欢跳舞。她情绪愉快，穿了一身简朴的衣裙。他看出她喜欢自然的美，欣赏她那种并不矫揉造作的机智——与其说是机智，毋宁说是幽默。他并不知道她已经订了婚。我晚到了几个钟点；按照我们的习惯，我和她在公共场所是不能有任何超过通常友谊的表示的。他显得很快活（他常常如此，虽然有时候显得很忧郁）。绿蒂使他着了迷，尤其因为她自己毫不在意，完全忘形于当时的欢乐中。不消说，歌德在第二天就去访问她了。他已经看出她是个可爱的姑娘，喜欢跳舞，爱寻乐趣，现在他又看到她另一方面的品质，一个更强的方面——持家方面的品质。”

绿蒂当时才 19 岁，是个聪敏、俏丽、活泼、性格开朗的姑娘，她的母亲在 5 年前因病去世，还留下绿蒂的十个年幼的弟妹。母亲临终前把家庭重担托付给绿蒂，要她好好照料父亲，抚育弟妹，做弟妹们的“好妈妈”。绿蒂虽是次女，但他们的长姊卡萝莉妮不善于理家，这十多人的家务重担就落在这位少女身上。绿蒂很能干，把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加深了这一层了解，23 岁的青年歌德马上爱上这位妙龄女郎，从此，成了绿蒂家“德意志馆”的常客。

歌德非常喜爱孩子，他很快和绿蒂的弟妹们成了最好的朋友。他每次到“德意志馆”来，都给孩子们带来极大的欢乐，他会给他们讲故事，让他们爬在他的身上，和他们一起坐在地上玩游戏。绿蒂看到孩子们和歌德这样融洽相处，感到很高兴。她也喜欢歌德，佩服他的才能，怀着同情的心情倾听他谈论自然的美，谈论诗歌，听他朗诵他所喜爱的荷马史诗；有时，他也帮她做些家务，在园子里采摘成熟的水果。两人已到了难舍难分的地步。这种愉快的情形歌德晚年还不能忘怀：“这样子我们消磨了一个晴和美好的夏季，像是一首纯粹的德国风的牧歌似的丰饶的田野构成散文诗的部分，而我们间纯洁的爱构成韵文诗的部分。在布满清露的早晨，我们悠然自得地在黄熟的玉米田间漫步，云雀的歌声和鹌鹑的鸣声像音乐似的，极为悦耳。酷暑的季节紧接着来了，雷雨大作，我们因此而更加亲近，借着持续的爱，好些家庭的小小烦恼事也容易解消了。这样子，一天又一天地消磨过去，天天都像是过节那样，我们的日历整个都要印红色的了。”

令人称道的是，绿蒂和歌德虽意气相投，但发乎情而止乎礼，她没有把歌德渴望的恋情付予歌德，她已经订婚，她忠实于自己的未婚夫，不能三心两意，

朝秦暮楚。歌德认识她后不久也知道她已经和克斯特纳订了婚，那可望而不可即的热恋使他十分苦恼，终于演出了一幕爱情的悲剧，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一个深深的伤痕。

克斯特纳沉着、真诚、见多识广、富于理智，和才华横溢、热情奔放的歌德对比，恰恰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他和歌德由于那次偶然的机缘而相识，等到歌德成为“德意志馆”的常客后，他们经常相聚，彼此友谊加深了。但是，歌德、绿蒂和克斯特纳三人之间那个纠缠着爱情的结越发难解了，歌德对绿蒂的恋情一天比一天炽烈，几乎达到不能自拔的地步，善良的绿蒂眼看歌德对她如此痴情，追求着一个徒然的希望，痛苦不堪，心里也非常难过。她始终忠实于对克斯特纳的爱情，她可以给予歌德的，只能是友谊，她不忍心歌德再这样痛苦下去，曾经非常委婉地规劝歌德，希望他不要再自寻烦恼。克斯特纳是个胸襟非常开阔的青年，明知歌德热恋着自己的未婚妻，对他却没有产生一点妒忌、猜疑或憎恨的心情，他始终尊敬歌德，爱慕他，同情他的痛苦；他信任绿蒂，真诚地爱着绿蒂，有时甚至想到，让绿蒂和歌德相爱，是不是比起和他结合更能够使她幸福，但是想到要他失去绿蒂，也实在受不了。歌德的心情更是复

杂，他处在这友谊和爱情、欢乐和痛苦、希望和失望种种矛盾相互交织的情况下，经过几夜内心痛苦的斗争，终于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韦茨拉尔，离别了绿蒂。

歌德是在 1772 年 9 月 11 日离开韦茨拉尔，回到老家法兰克福的。他在 9 月 10 日深夜给克斯特纳和绿蒂写了两封信，第二天清晨就不告而别。在给克斯特纳的信上写道：

“他（歌德自称）走了，克斯特纳，你接到这封短笺时，他已经走了，请你把附笺交给绿蒂。我本来十分镇静，但是你们的谈话把我的心撕碎了。当时我除了‘再见’两字，一句话也讲不出来。要是我和你们再多呆一会儿，我就无法控制自己了。现在我是独个儿，明天我就走了。唉，我这可怜的脑袋！”

他给绿蒂的附笺上写道：

“我当然希望再回来，但是天知道在什么时候？绿蒂，你的话是怎样深深地坠入我的心底，我知道这是和你最后一次见面了。不是最后一次，可是我明天就要离开了。他走啦！不知道怎么会鬼使神差叫你们谈到那个话题上去，使人可以讲出我所感受的一切，唉，我在这儿所关怀的，是你的手，我最后一次亲吻了它；还有那间屋子，我将不再进入；还有你那亲爱

的父亲，他最后一次看着我走出门外。现在我独自在这里，我可以哭泣了；我让你们幸福，我将留在你们的心中。我会再见到你们的，可是总不是明天！告诉我的孩子们，他已经走了。我不能再写下去了。”

第二天清晨临走时，他又在信笺上添上几句：

“已经收拾好了，绿蒂，天也亮了，再过一刻钟，我就离开了……你知道一切，你知道这些日子里我是多么幸福。我正要到我亲爱、最好的人们中间去，但是为什么要离开你呢？就是这样，这是我的命运……再见！一千遍再见！”

关于歌德不告而别的经过，关于那次把歌德的心都撕碎了的有关生离死别的谈话，以及他离去后在“德意志馆”里产生的悲痛的气氛，克斯特纳那两天的日记给我们留下了最真实、最生动的记载：

“1771年9月10日

今天歌德博士和我在花园里一起进餐，我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晚上，歌德博士来到‘德意志馆’。他、绿蒂和我有过一场关于来世的谈话，谈到逝世和返阳等等，这个话题不是他提起的，而是绿蒂开的头。我们大家约定，谁先死了，要是可能，他应该把另一个世界的生活情况通知活着的人。歌德没精打采，想来是明天早上就要离开的缘故。”

“1771 年 9 月 11 日

今天早晨 7 时，歌德不告而别。他派人给我送来一封短笺和几本书。他很早就谈起，打算到科布伦茨去一次，那儿驻军的军需官默尔克正在等候他。他说他会突然启程，不会来辞行的。所以我已经预料有这么一天。虽然如此，我还不曾料到今天离开，我感到非常难受。上午我回家，家里人告诉我：‘十点钟的时候，歌德博士派人送来这些东西。’我看到书籍和短笺，想到短笺上写的‘他走了！’这句话，心里很悲伤。一会儿后，汉斯跑来问我：‘他是不是真的走了？’……绿蒂为了弄清真相，派人把歌德留在她那儿的一只箱子送到他的寓所去，他已经不在了。……‘德意志馆’的孩子们一个个都说：‘歌德博士走了！’中午时分，我和冯·博尔恩先生谈话，他曾骑马陪伴歌德一直到达布鲁费尔斯，歌德把我们昨晚的谈话内容告诉了他。歌德出发时情绪非常低落。下午，我把歌德的短笺交给绿蒂。他的离去使她很难过。读信时，泪水涌上她的眼眶。然而，他走了，她又感到宽慰，因为她不能给予他渴望中的热情。我们的谈话只是谈到他；的确，除了他，我没法想到别的。有一个傻家伙对他离去的方式进行谴责，我为他辩护，我非常热烈地为他辩护。……”

这是多么纯真的感情，没有妒忌，没有幸灾乐祸，孩子们为了失去他们最好的朋友而惊呼，一对情人为了他们的朋友的离去而悲伤，这次离别以后，也许他们再也见不到这位天才横溢的朋友了。的确，歌德除了在八星期以后又回到韦茨拉尔暂住几天外，以后他和克斯特纳虽然书信往来，却从此天各一方。绿蒂呢，直到过了44年，当她已是一位63岁的老太太时，带了未婚的小女儿到魏玛公国探亲，才重新见到她少女时代的朋友——当时魏玛公国的枢密顾问，世界文坛泰斗，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这次重逢在小小的魏玛城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近代德国杰出作家托马斯·曼采用绿蒂访问魏玛和歌德久别重逢这一段事迹，写成长篇小说《绿蒂在魏玛》，描绘了绿蒂在魏玛听到和见到有关歌德的事，也让她重温了年轻时在韦茨拉尔和歌德度过的那个充满爱情、值得回味的夏天。

歌德离开韦茨拉尔，先在一位著名的女作家莎菲·拉·罗歇的别墅里小住五天，观赏莱茵河的秀丽景色，他和莎菲·拉·罗歇的可爱的女儿玛克西米莉安妮朝夕相处，直到歌德晚年，他还没有忘情于这位少女的黑晶晶的眼睛。

歌德回到故乡法兰克福后，重操旧业，从事律师

业务，他虽然才华出众，出口成章，但不是个打官司的能手，在唇枪舌剑的较量中并没有占多少便宜，因此业务清淡。这倒给了他较多的时间从事他所喜爱的文学和绘画，他写了一些剧本、诗歌和理论批评文章，在法兰克福的刊物上发表。

歌德身在法兰克福，心却还没有离开韦茨拉尔的“德意志馆”。他一回到老家，就给绿蒂寄去大量的信件，向她倾诉自己的相思之情，求她不要忘记他，还在自己床头的墙上挂着绿蒂的剪影，可以朝夕相见，但是他总是害怕绿蒂的心中已经没有他了。他在这一时期写给克斯特纳的一封信上说：

“绿蒂并没有梦见我，对此我感到难受，我要她今晚就梦见我，而且不把这件事的情况告诉你……在我能够悄悄告诉绿蒂，我已经堕入情网之前，我不想再见到她……如果我不写信给你，让我宁静地浮想联翩，那会比较好些——然而那幅剪影还挂在那儿……还有那个浅红色的蝴蝶结依然如故，只是我觉得比起赶舞会那天她系着的那个要淡些。”

绿蒂结婚的佳期日渐临近，克斯特纳已在汉诺威觅得了一个新的职位，他们婚后将迁往那里定居。这段时期歌德的心情特别激动，他写信给绿蒂的弟弟汉斯，要求他在绿蒂结婚以后至少每星期给他一

封信，虽然“德意志馆”里的那颗明珠将迁往他处，另营新居，但是他不愿和那给他留下最美好记忆的地方割断联系。他又写信给克斯特纳，祝他们幸福，说他们在他们结婚那天，他要取下他床头墙上绿蒂的剪影，珍藏起来，直到听说她做了妈妈时才取出来，他将从此把他对绿蒂的爱移到她的孩子们身上，要求同意他做他们未来孩子的教父。他还要求他们接受他送给他们的结婚戒指，他在给绿蒂的附笺上写道：

“在你幸福的日子里，愿我的记忆随同这枚戒指永远陪伴着你。亲爱的绿蒂，将来有一天我们重新见面时，你的手指上戴着这枚戒指，我，一如既往，永远是你的。”

1773年4月4日，绿蒂结婚了，歌德没有去参加婚礼，他但愿离得愈远愈好，虽然他的心比以往任何时候离她更近。他们为什么不愿接受他的结婚戒指？他心里捉摸。他只是写了封祝贺信；他也没有取下床上绿蒂的剪影，仍让他日夜对着他微笑。

这几天里，他的心境特别混乱，在绿蒂婚后一个星期，他又给他们写了封信，这封信与以往的信件不一样，字迹潦草凌乱，可以看出，他写信时激动得手也发抖了，信的最后几行写道：

“所以，祝你们晚安，克斯特纳先生和夫人。我本来早就结束这封书信了，如果床上陪伴的不是我那亲爱的弟兄‘睡眠’，而是有更好的盼望的话。只消瞧瞧我这张床，它像沙漠一样荒芜。我至今自己也弄不明白我怎么能够离开绿蒂的……告诉我，这是崇高的行为还是怎么的？我感到自豪，又不感到自豪。我至今还不能想象我怎么能够这样做的。……不过有一点我很明白，我们的上帝一定是个非常冷酷的人物，让你得到了绿蒂。”

在绿蒂结婚前的几个月，从韦茨拉尔传来歌德的另一个朋友耶鲁撒冷自杀的消息。他和绿蒂不寻常的恋爱已使他念念不忘，耶鲁撒冷的遭遇又使他十分感慨，这件事促使他写成了不朽名篇《少年维特之烦恼》。

耶鲁撒冷是驻韦茨拉尔的布隆斯维克公使馆的年轻秘书，和克斯特纳是同事，他在莱比锡大学读书时曾和歌德同学。他父亲是位著名的神学家，一个古老的修道院的院长。耶鲁撒冷和莱辛很要好，莱辛很赞赏他的才华，常在自己编辑的报刊上发表耶鲁撒冷的文章。他爱好文学和艺术，这方面和歌德的兴趣相似，歌德来韦茨拉尔后，和他偶尔相聚，克斯特纳第一次和歌德相遇时，站在歌德的身边默默听着的

有一位神色忧郁的青年，身穿蓝色燕尾服，黄色背心，褐色长靴，便是耶鲁撒冷。与《维特》有关的三位男主人翁就是在这个偶然的场合相遇在一起的，这两位布隆斯维克公使馆里的年轻秘书根本没有想到躺在树底下草地上高谈阔论的法学博士将会使他们两人成为文学史上的不朽人物。耶鲁撒冷生性比较沉默抑郁，好幻想，他在公使馆里郁郁不得志，和官僚习气很重的上司们格格不入，在社交场合也屡遭挫折。这个受到压制的孤独青年常常深夜独自在月光底下漫步，在一些悲剧中寻找自己的知己。他爱上了一位同事的妻子，和歌德爱上绿蒂一样，是在追求一个没有希望的爱情。他在工作上、社会上、爱情上处处碰壁，尤其受不了当时封建社会中低沉的气压，他的性格忧郁懦弱，没有像歌德那样毅然从不幸的漩涡中脱身出来，而是采取了消极的手段，借了克斯特纳的手枪，用一粒子弹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歌德听到耶鲁撒冷的死讯后，立刻给克斯特纳写信，对这个不幸的消息表示震惊。克斯特纳回信将耶鲁撒冷失恋和自杀的详细情形告诉歌德。耶鲁撒冷的死成了一根点燃的导火索，引爆了他胸中埋藏已久的炽烈的感情。歌德自己叙述了当时的心境和写作情形：

“因与友人的妻的不幸的恋爱而导致的耶鲁撒冷之死，把我突然从梦中撼醒。我不只静观冥想，我与他共同的遭遇是什么，而且把现在恰碰到的使我热情沸腾、焦灼不安的同样的事加以观察，因此，我禁不住把正要动笔来写的作品灌上炽烈的热情，以致诗的情景与实际的情景的差别丝毫不能分辨出来。我特使自己与外界完全隔离，连朋友的探访也谢绝，在内心上也把一切与这作品无直接关系的思念搁在一旁。在他方面我把一切与我这个意图有多少关系的思绪搜集起来，把还没有运用作为诗的材料的新近的生活经验加以追忆。在这种新情况下，经过那么多的暗中准备，在四周间握管疾书，没有把全部的计划或一部分的处理方法预先打下草稿，《维特》这部作品就一气呵成地写出来了。”

《少年维特之烦恼》是一部自传体和书信体小说，小说的情节是这样的：

年轻人维特到一座小镇来处理母亲的遗产，同时也想在这个安谧恬静的所在平息他对一个少女的怀念。这儿的大自然景色、纯朴的农民和天真的儿童等等给予他极大的快乐。

然而他的心灵上的平静不久就被一种爱的激情所破坏。在一次乡村舞会上他认识了一名叫绿蒂的

少女。她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无不令他倾倒。她也对他怀有好感。在舞会之中，维特情不自禁吻了她。从此之后，他便沉醉在爱情之中，忘记了存在，忘记了一切。“整个世界在我周围消失了”。

绿蒂有一个男友阿尔伯特，他和绿蒂有如一对未婚夫妇。他从外地归来，这使维特陷入一种尴尬和痛苦的境地。维特清醒地认识到，他无法赢得绿蒂。不幸在折磨着他。在朋友威廉的劝告下，他决定离开他心爱的人。

维特做了一位公使的秘书，他试图在事业上有所作为，然而鄙陋的环境、污浊的人际关系，令他无法忍受；他辞去了职务，应邀到一位伯爵的庄园上去。这位伯爵尊重维特，但却无法理解维特的内心世界。维特百无聊赖。几天之后就又离开了。

在现实社会中，维特无法施展他的才能，感情无所寄托。对绿蒂的思念又使他回到她的身边。这时绿蒂已和阿尔伯特结婚。阿尔伯特虽是个庸碌之辈，但为人善良，性格忠厚。他爱自己的妻子，也尊重自己的朋友维特。绿蒂虽然内心爱着维特，但却不能越出道德的樊篱，她不得不设法规避维特。

维特陷在爱情中不能自拔，他决定以一死求得感情的解脱。他前去向绿蒂诀别。在吟诵苏格兰诗人

奥西安的《塞尔玛之歌》时，他情感迸发，在狂热中把绿蒂拥入怀中，发狂地吻她。绿蒂庄重地拒绝了他。他又爱又恨，说道：“你不会再见到我了。”

第二天，他派仆人去借阿尔伯特的手枪，说是路上备用。绿蒂亲手把枪递给仆人，心中充满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可她不能把发生的一切告诉自己的丈夫。

这枪是他所爱的人亲手给的，维特为此感到幸福。他所爱的人在他走生命的最后一步时帮助了他。晚间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用这支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维特》交付出版商出版，正在排印过程中，从汉诺威传来了喜讯，绿蒂做了妈妈了。歌德分享了两位朋友的喜悦，同时他也没有忘记要把对绿蒂的爱移到孩子身上的诺言，向他们提出，要求他们给这个新生的男孩取名沃尔夫冈：“我要他取这个名字，因为这是我的名字。”

《维特》出版的日子渐渐近了，在绿蒂的孩子出生后一个月，歌德怀着激动的心情把他自己的“孩子”介绍给绿蒂：

“不久，我将给你们送来一位朋友，他和我非常相似，希望你们喜欢他。他的名字叫维特，他现在和过去都是……好吧，让他自己来告诉他们吧！”

这一年9月，差不多刚好在歌德离开韦茨拉尔两年以后，《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了。这一本薄薄的小书，倾倒了成千上万的读者。歌德兴匆匆地给绿蒂寄去了这本新书，他在信上写道：

“绿蒂，你读它时，你会感到，这本小书对我是多么亲切！对我来说，这本书是如此宝贵，仿佛它是世上唯一的孤本。绿蒂，它将是你的；我已经吻了它一百遍了，我曾把它锁了起来，免得有人接触它。哦，绿蒂！……我希望你们每人单独读它，你独个儿读，克斯特纳独个儿读，每人给我写上几笔，谈谈它。绿蒂，再见吧，绿蒂！”

他是多么兴奋，多么高兴，没有想到这本书在绿蒂家中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正当千千万万的读者为维特的命运流下热泪，对可爱可敬的绿蒂啧啧赞叹时，正当“德意志馆”里的孩子们看到自己的形象印成文字，出现在书本上，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时，那位女主人翁和她的丈夫却闷闷不乐，尤其是克斯特纳，他很生气，感到受了伤害，他们的私生活被公开发表，有些情节十分逼真，与事实丝毫不差，有些被改动了，有些是张冠李戴，根本与他们无关，有些完全是虚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交织在一起，叫人弄不清真相。尤其糟糕的是，好奇的读者很快就探

听到书中人物的原型是些什么人，他们不明底细，道听途说，把这对年轻夫妇完全看作这出悲剧的主人翁，一些流言蜚语开始向他们两人袭来，连一向冷静沉着的克斯特纳也沉不住气了。他给歌德写了回信，表达了自己的愤慨和不满：

“你的《维特》本来可能给我带来巨大的欢乐，因为它能使我回想起很多的有趣的情景和事情。可是，事实上，它已经在某些方面给了我一点教诲。你知道，我喜欢坦率地说出我的心里话。

不错，你给每一个人物编织进某些新的因素，或者把若干人物融合成一个人。这样很好嘛。不过，如果你在进行这样的编织和融合时同你的心商量一下的话，你就不会把你借用了形象的真实人物如此糟蹋……真正的绿蒂，在很多情况下，要是她像你所描绘的那个绿蒂，准会感到悲痛，……我只消想到它就太使我痛苦了。还有绿蒂的丈夫——你把他称作你的朋友，上帝知道，他以前的确是这样。——那一个阿尔贝特，这个可怜虫！尽管他可能是一个幻想中的模型，而不是一幅肖像，但是他和原始模型却有着如此相似的特征（仅仅外表上相似，感谢上帝，仅仅外表上相似），读者很容易猜出这个原型是谁。如果你要让他这样，难道有必要把他塑造成这样一个傻

瓜吗？”歌德显然没有料到这本书给绿蒂夫妇造成这样的后果，他感到惶恐，他向他们解释，恳求，请他们宽恕：

“亲爱的愤怒的朋友，我必须立刻写信给你们，我要解除我心头的重负。木已成舟，书已经出版了，如果你们能够原谅我，原谅我吧。我迟早会听到，事实证明你的忧虑是多余的，你也确实感到这本书是虚构和实事交织起来的。亲爱的克斯特纳，你已经竭力使我的辩解站不住脚，我还能说些什么呢？然而我心中还有很多的话想说，虽然我无法表达。我只好沉默，但是我必须依旧保留那甜蜜的预感，我希望永恒的命运会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联系得更加紧密。亲爱的朋友，我多么爱着你们，为了我的……（随便你们怎么称呼它吧！）已经给你们带来了不安的时刻，我不得不继续成为你们的债户，成为你们孩子们的债户。……亲爱的朋友，当怒火在你们的心头升起时，想一想，哦，只消想一想你们的老朋友歌德，他永远，永远，是你们的。”

这封信发出后，歌德焦急地等候回信，盼望绿蒂两人的怒火消失，盼望流言蜚语不至于妨碍他们的友谊，庆幸的是，这一对善良的年轻夫妇很快原谅了他。歌德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在 1774 年 11 月 21 日

向克斯特纳夫妇表达了自己的感激、期望和友情：

“我终于收到你的信，克斯特纳！在一个陌生人的桌子上，在一位画家的画室里，因为我昨天开始画油画，我收到你的信，我必须向你道谢。多谢你，亲爱的朋友！你始终是那么合情合理！哦，我巴不得捧住你的脖子，跪倒在绿蒂的脚旁！一分钟，一分钟，一切，一切都会烟消云散，说明清楚，这一切即使我写满了成堆的纸张，也是说不清楚的。哦，你这没有信心的人儿！我会这么高叫。哦，你这缺乏信心的人儿！《维特》在成千人的心上意味着什么呀，如果你能够有他们的千分之一的感受，你就不会计较你所遭受的磨难。这儿有一封信，你读一下，请你尽快把你的想法告诉我，正像我现在给你写回信一样。——你寄来亨宁斯的信，他没有谴责我，他原谅了我。亲爱的兄弟克斯特纳，如果你有点儿耐心，你的焦虑就会和缓。我不会撤回《维特》的，即使我的生命危如累卵，不过请信任我，信任我，只消你有耐心，你的忧虑，你的委屈，就会像夜间的幽灵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深情地、热烈地答应你，不消一年，我会把喜欢说东道西的公众中间残存的怀疑和误解扫除干净，正像北风驱散迷雾，正像驱散一群猪一样。维特必须——他必须生存！你没有感到他，你只感到

我和你自已，你把它称为你名誉上的一个污点，然而，不管你，也不管别人怎么说，它是交织起来的……如果我还活着，我欠下的是你的恩惠。所以你不是阿尔贝特，所以……

请代我热情地向绿蒂问好，告诉她，要是她知道她的名字被成千个敬慕的嘴唇崇敬地念叨着，不是足以补偿她的忧虑不安吗？处在这种单调无聊的生活环境中，谁也免不了被长舌妇们当作话柄，说长道短，谁也不当它一回事。

如果你宽容大度，并不折磨我，我将按照维特的方式给你写信，向你倾诉、叹息，如果你有信心，要相信一切都会很好，流言蜚语不值一顾，要把你那位哲学家朋友的信记在心里——我吻了那封信——你没有认识到这个人是多么了解你，安慰你，在你的和绿蒂的可贵品质中，他在悲惨的情况下也找到足够的慰藉，而这种悲惨情况，即使是在小说中的，已经使你们感到惊恐。绿蒂，再见吧，——克斯特纳，还有你，爱着我，别折磨我。

歌德

不要把这封信给任何人看！只有你们两人！否则谁也不要看它。——再见，亲爱的！克斯特纳，代我吻你的妻子。

记住我的诺言。我有办法使你完全摆脱一切流言蜚语，摆脱那一点儿猜疑。我有此力量，不过时间还太早！代我向那位亨宁斯热诚地问候！

昨天有一位年轻姑娘对我说，‘我倒不知道绿蒂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名字！在《维特》里它听上去是如此完美！’最近又有一位写信给我：‘看在上帝份上，我求你别再叫我绿蒂！——叫我小绿特或绿绿，都随你便，只是不要叫绿蒂，直到我比现在更配得上这个称呼时再叫。’

哦，爱和友谊的魔力！

再见，亲爱的朋友。”

《维特》的出版在这三位主人翁之间产生的一场风波平息了，友谊恢复了，这桩爱情纠葛的公案也结束了。但是，在外界，这本小书却引起狂风暴雨般的反响，毁誉交加，围绕这本书，反对和赞美的声浪一阵高于一阵。

在反对者中间，有的是恶毒攻击，肆意诋毁，有的是善意的批评，诚恳的建议。最狠毒的声音来自一本正经的天主教会，《维特》被斥为“淫书”，作者“该遭雷霆”。教会人士口诛笔伐，不遗余力。封建反动当局，还利用手中的特权，采取禁售和没收的手段，企图将该书扼杀在摇篮里，莱比锡等城市明令禁

售，违者处以罚金；意大利米兰刚出现《维特》，当地大主教便吩咐僧侣们在各地区把整版译本都买去，然后偷偷摸摸地销毁；其他国家如丹麦，也把它列为禁书。

但是，禁售和反对的声音远远敌不过赞美的声浪。《维特》一出版，立刻风靡德国和欧洲，倾倒了一代青年，很快译成英、法、意、西等二十多种文字，有些国家还出版了几种不同的译本。在青年中间掀起了一股“维特热”，他们穿上维特式的蓝色燕尾服，黄色背心，讲着维特式的话，模仿维特的一举一动，极少数人甚至依照维特的自杀方式，一枪结束自己的生命。这股热浪不但在德国流行一时，还波及到英国、法国、荷兰和北欧诸国。在各个阶层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文艺界的知名人物，像歌德的前辈、当时最负盛名的诗人克洛普施托克，对《维特》也赞美备至。连叱咤风云、戎马半生的法国大皇帝拿破仑也对《维特》十分喜爱，共看过七遍之多，在远征埃及途中，也不忘记把它带在身边。1808年拿破仑在魏玛附近的埃尔富特会见歌德时，还十分认真地和歌德谈论《维特》，歌德说他对这本书“像刑事法官研究证据那样仔细研究过”。维特和绿蒂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甚至当时闭关自守的大清帝国，在它出产的名贵的

瓷器上，也画上维特和绿蒂的肖像。

不论是赞美声或反对声，这部小说受到议论最多的，是小说的结尾部分：维特的自杀。

当时天主教会把这一部揭露腐败反动的封建专制制度的作品看作眼中钉，那些封建卫道士抓住极少数青年模仿维特自杀的事件，借题发挥，大肆攻击。英国主教布里斯托有一次会见歌德时，当着歌德的面，大骂《维特》是“一部极不道德的该受天谴的书”，谴责歌德不该写出这样的作品，引诱人走向自杀的道路。歌德对盛气凌人的主教大人毫不示弱，立刻针锋相对地反驳道：“你对一部被某些心地偏狭的人曲解了的作品横加斥责，而这部作品至多也不过使这个世界甩脱十来个毫无用处的蠢人，他们没有更好的事可做，只好自己吹熄生命的残焰。我自以为这是替人类立了一大功，值得你感谢。”歌德这一番话，说得主教大人哑口无言，转而变得对歌德彬彬有礼。主教的攻击当然是别有用心，歌德的反驳也未免有点儿片面，不过面对主教的挑畔和无理诽谤，为了压下封建卫道士的气焰，保卫自己的作品，歌德这样做是完全应该的。

有些人爱读这部小说，但是对结局的安排并不赞赏，认为美中不足，德国著名文艺评论家和剧作家

莱辛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维特》出书一个月后的 10 月 26 日结友人艾森堡写信，评论这个问题，信上写道：

“蒙惠借歌德的小说，使我得享这份快乐，对此深表谢意。现在我提前一天奉还此书，让别人也能尽早享受这一乐趣。

不过，一部如此温暖的作品不该使得害处超过益处，你是否认为，它还必须有个简短而冷静的尾声？有几点要指出，维特如何发展成如此冒险的性格，换了另一个有类似天性的青年，他也许不致出此下策。要知道这样的人容易把诗的美当作道德的美，并且相信，凡是如此强烈地引起我们同情的，那么可以说这个人一定是好的。然而他并不是真正的好人；嘿，如果我们的耶鲁撒冷的精神完全处于这样的状态，那么我几乎要——鄙视他。你是否相信，罗马或希腊的青年会这样，而且因此会自寻短见？当然不是。他们知道怎样防止自己陷入谈情说爱的困境，在苏格拉底那个时代，人们对这种导致作出违反天性行动的情绪，连一个小姑娘也几乎不会原谅。只有基督教教育才会创造出这些既渺小又伟大、既可鄙又可爱的原型，这种文化善于把肉体上的需要转变成精神上的完美。所以，亲爱的歌德，还是在结尾处写

上短短的一章，越是愤世嫉俗就越好。”

《维特》一书的自杀结局和它后半部所流露的孤独、伤感、绝望的情绪确实或多或少地在某些青年身上产生影响，受到当时一些人的批评，就是在《维特》已确立了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歌德逝世多年以后，这个问题仍有人提出。

关于有人不同意维特自杀的结局，还有一段令人捧腹的插曲。德国启蒙主义思想家、文学家尼古拉成就卓著，但对歌德、席勒等人的新兴文学不感兴趣，对与自己志趣不一致的东西不免要贬低排斥。于是，他写了一本《少年维特的喜悦》来唱对台戏。歌德称这本小说“像是由家制粗麻布裁成的笨拙的东西，仗着人类的常识费了一番工夫为自己家属造出来的粗糙品”。尼古拉照用歌德的处理题材的方法，但感觉不到维特的烦恼已到了无可解救之境，维特的青春之花早已像是为致命的毒虫所啮食，于是他设计了这样的情节：当精神错乱的维特准备自杀的时候，一个明察秋毫的医生偷偷地用一把装着鸡血的手枪换下了维特的真家伙，结果便出现了自杀不成，喷了一身的鸡血这一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后来绿蒂嫁给了维特，故事以大团圆结束，皆大欢喜。

对这种拙劣的作法，歌德打算作无恶意的报复，

写了一首很短的嘲笑诗《维特的墓前的尼古拉》，又写了一段绿蒂与维特对话的小剧，将尼古拉戏谑一番。

需要指出的是，歌德后来也意识到维特自杀的负面影响，写了一首小诗《绿蒂与维特》，劝诫青年切勿沉溺在失意的爱情中不能自拔而效法维特：

“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
妙龄女子谁个不善怀春？
这是人性中的至洁至纯，
为什么从此中有惨痛飞进？”

可爱的读者哟，你哭他，你爱他，
请从非毁之前救起他的声名；
请看，他出穴的精灵在向你目语：
做个堂堂的男子，不要步我后尘！”

有些文学评论家把维特所代表的颓废倾向称作“世纪病”，但歌德并不承认维特与时代有关，强调产生《少年维特之烦恼》的阴郁心情只涉及个人的特殊际遇：“使我感到切肤之痛的、迫使我创作的、导致产生《维特》的那种心情，无宁是一些直接关系到个

人的情况。原来我生活过、恋爱过，苦痛过，关键就在这里。”

产生《维特》的那种心情，歌德一生只有过一次，他甚至害怕有第二次。他在晚年对爱克曼说：“我像鹈鹕一样，是用自己的心血把那部作品哺育出来的。其中有大量的出自我自己心胸中的东西、大量的情感和思想，足够写一部比此书长十倍的长篇小说。我经常说，自从此书出版之后，我只重读过一遍，我当心以后不要再读它，它简直是一堆火箭弹！一看到它，我心里就感到不自在，深怕重新感到当初产生这部作品时那种病态心情。”

《少年维特之烦恼》是体现“狂飙突进运动”实绩的最主要作品，维特那种渴望摆脱时代一切束缚的叛逆者形象，同葛茨·冯·伯利欣根一样，也是“狂飙突进运动”中的一个英雄形象，被誉为“钉在十字架上的普罗米修斯”，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典型。

就这样，24岁的歌德一举登上了世界著名文学家的台阶。

十一、讴歌普罗米修斯

《少年维特之烦恼》为歌德赢得了更多的朋友，在歌德新结识的朋友当中，瑞士苏黎世有名的神学家和作家拉瓦特尔和歌德过从甚密。他们常常争论宗教问题，不过谁也不能说服对方。拉瓦特尔创立了人相学，认为人的外形与内心有密切的关系，惹得那些外貌丑陋的人对他怀恨在心。歌德此时已与虔信派了不相干，所以对拉瓦特尔的理论漠然视之，不过出于友情，还是帮助拉瓦特尔出版了他的著作，并陪同他到埃姆士城去观光，一路上两人倾心交谈。

这个夏天，歌德又和拉瓦特尔以及以博爱主义教育法著称的教育家巴西多一起从埃姆士城出发游览腊恩河和莱茵河两岸风光，这次舟行极为愉快，令三人心旷神怡，到达科隆，他们一行受到雅可比兄弟热情接待，身为哲学家和小说家的弟弟弗里德里希·雅可比对能接待歌德一行感到十分荣幸：“我越是

仔细思量就越是强烈地感到，没见过歌德，也没听过歌德讲话的人，就不可能对上帝造就的这位非凡人物有什么了解。按照海姆斯的说法，歌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天才，是一个看了魔的人。我补充一句，歌德在任何情况下几乎都是按某种神秘意志的规定而行动。只需要同他相处一个小时，你就能发觉，如果你希望他在实际思考和实际行动的时候应该另有一番表现，那就是可笑的奢望。我不想借这个机会暗示，似乎他的形象不可能变得更美好，我只是说，他的成长将会像鲜花开放，果实成熟，小树参天成荫。”歌德也非常喜欢和弗里德里希·雅可比交谈，有时晚上各自就寝之后歌德还跑到他房间里畅叙，月光在广阔的莱茵河面荡漾着，他们站在窗前，尽情地享受夜色温柔和精神交流的愉悦。

在游览莱茵河的归途中，歌德感悟到拉瓦特尔和巴西多用精神的甚至宗教上的手段来达到尘世上的目的，由是生发出这样一种思想：卓越的人物定然会将他心中具有神性的东西向外传播，然而一旦他与粗俗的世界接触，为着能在当时起作用，便不得不把自己放在与它同等的水准上，可是这样一来，他们高贵的特性便要大作让步，终于全部丧失。天上的东西，永生的东西被埋没于世俗的泥沼里。为阐明这一

思想，歌德拟写了一部歌颂穆罕默德的戏剧。这部戏剧并没有保存下来，只有题名穆罕默德的礼赞歌，留存在歌德的诗集中。

与礼赞穆罕默德相对应的，是歌德对基督教教会的批判态度，他在 1773 年写了一本匿名的小册子《某地牧师致某地新牧师的一封信》，借一个路德教乡村牧师之口，指出在人世间从未有过一个真正的教会，基督教学说只是在它产生后的最初一个世纪是纯洁的，而后它便越来越世俗化了，越来越远地离开了它的创立者的精神。歌德在这封信中表明了自己的宗教观点：拒绝教条主义、正统派和理性主义，拥护具有虔信主义特征的、富有感情色彩的基督教，特别是拥护态度热情的宽容学说。

1774 年，歌德还根据俗本流传已久的永世流浪的犹太人的故事，准备写一篇史事诗，再次表明上述宗教态度，批判现存的教会机构。鞋匠阿哈随鲁是象征流浪的犹太民族的基督教传说的人物。基督背着十字架，被押赴刑场的途中，在他的店里歇息，阿哈随鲁却恶狠狠地赶他走。因此，在基督复活之前，罚他在世界上彷徨流浪。但歌德这一史事诗剧只有草案，没有完成，残篇在他去世后面世。歌德对《圣经》和基督教会的批判持续了一辈子，在临去世前几

天，还对教会的罪恶不依不饶地揭露：“教会规章中有许多是荒谬的。但是教会要想统治，就要有一批目光短浅的群众向它鞠躬，甘心受它统治。拥有巨资的高级僧侣最害怕的莫过于让下层大众受到启蒙，他们长久禁止人民大众亲自阅读《圣经》；能禁止多久，就禁止多久。可怜的教众面对拥有巨资的大主教们会怎样想，如果他们从‘福音书’中看到基督那样穷困，他和他的门徒们都是步行，态度极谦卑，而高级僧侣们却乘六匹马的轿车，招摇过市，神气十足？”

当然，歌德不会完全抛弃基督教，他的许多作品都包含基督教的内容，虽然他也有很多作品违背基督教义。他对路德和一般宗教改革都持赞赏态度。他眼中的上帝是这样的形象：“归根到底，这事情本来是怎样，又应该是怎样的呢？——上帝自从人所共知的、凭空虚构的六天创世工作之后，并不曾退隐去休息，而是一直和开始一样在继续起作用，用一些单纯原素来建造这个笨重的世界，让它年复一年地在阳光里运转，这对上帝也许并没有多大意思，如果他不是按预定计划还要在这种物质基础上替精神世界建造一个苗圃的话。所以上帝现在仍继续不断地在一些较高明的人物身上起作用，以便引导较落后的人跟上来。”很明显，歌德是把自己算作“高明的人

物”之一的。

歌德潜心于创作，他清楚地感觉到，一种重大意义的创作只能在孤独之中完成，他的广为人唱的作品也都是孤独的产物，他由此联想起神话传说中的孤独者普罗米修斯。1774年，歌德发表了普罗米修斯的独白诗，讴歌了普罗米修斯扰乱天庭以及其他巨人对抗众神的伟大精神。喊出了“遮住你的天空吧，宙斯！”这样的口号，这首诗同样富有宗教意味。

《普罗米修斯》中的普罗米修斯的独白，在歌德青年时代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造福人类的神，因从天上盗火给人类而触怒了主神宙斯。宙斯为了惩罚他，把他赤身锁在高加索的山崖上，每天派神鹰啄他的肝脏，晚间使其伤口愈合，天明神鹰复来，以此折磨他。但坚强的普罗米修斯并未因此向暴君宙斯屈服。后来，希腊神话中的一位大力神赫拉克勒杀死了神鹰，救出了普罗米修斯。在同一时期的欧洲各国文艺中，普罗米修斯由于其不屈的精神成为作家们反抗暴政的典型形象，像拜伦、雪莱等都曾用这一神话为题材表示他们对封建暴君的反对态度。

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写过著名的剧本《被囚的普罗米修斯》，但是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

米修斯在山崖上发出悲叹和哀怨，而歌德的普罗米修斯却具有坚强的性格，深信自己的斗争必然获得胜利。他对宙斯发出了愤怒的反抗之声，他对暴君宙斯完全抱高傲的鄙视态度，显示出不屈的意志和力量。普罗米修斯宣告他要按他自己的形象来造就新的人类。

诗中的宙斯便是封建暴君的象征，普罗米修斯则是当时反封建制度的狂飙突进分子，普罗米修斯的反抗意味着上升时期资产阶级自我意识的觉醒。但是歌德的普罗米修斯像葛茨一样，虽是一个反抗者，却是一个脱离集体的反抗者。他在高加索的山崖上进行的是孤独的反抗，这正是脚踏实地的狂飙突进分子共同的气质。歌德笔下的普罗米修斯多的是充沛的感情，而不是启发性的理智。

普罗米修斯让歌德的灵魂受到洗礼，同一时期，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也给歌德的思想以极大的影响。阅读斯宾诺莎的著作，让歌德觉得有阵阵和风吹拂，精神世界一片宁静和明澄，他观书而省察自己的内心，对现实生活有了更深刻的洞察力。他后来把读斯宾诺莎著作的感受写进《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曲中。至于斯宾诺莎对他终生的影响，歌德自己曾详加阐述：

“自然循着永恒的必然的规律而运行，而起作用，这种规律是那样神圣的，以至连神也不能怎样变更它。关于这一点，一切人都无意识地一致承认。人类想到自然现象怎么暗示它的背后有悟性、理性甚至任意性的潜在，使我们起惊异以至惊骇之心。

当我们看见动物也显示一种类于理性的行动时，我们为之惊异，因为动物虽与我们人类这样接近，但它与我们间像是仍隔有一条无边的鸿沟，它们仍是局限于必然的王国内。所以，有一种思想家认为动物的机械行动虽有时极其巧妙，而仍严密地被规定，是完全机械的，我们对于这种学说不能加以非议。

再进而把植物加以观察，我们的主张便更明显地被证实。当我们以手触到含羞草时，它那羽毛一般的叶子便一对一对地合起来，终于那叶柄也像是关节的转动那样卸下来。我们看见这样的现象而唤起的莫名其妙之感，有人加以记述。更或把鸡头草来观察，我们这种感觉就更加强。那是，这种植物的叶，没有可以见得到的外来的诱因，就上下舞动，像是自己玩自己似的，同时又向我们的理解开玩笑那样。试想象一下，如果芭蕉也具有这样的本领，它把庞大的罗伞似的叶子自行上下舞动起来，第一回看见的人

恐怕总会骤吃一惊而倒退几步吧。我们自信人类特具有优越性的意识既深植于我们的脑海之中，所以我们绝不肯承认人类以外的万物也多少具有这样的优越性，如果办得到，甚至连同我们类似的东西，我们也喜欢加以抹杀。

可是，当我们看见别人的行为不合理地违反普遍承认的道德法，愚昧地损害自己和他人的利益，我们也为同样的惊异之感所袭。为了摆脱在这种场合所感到的惊骇，我们就把它化成非难、憎恶，我们想实际上或想象上摆脱这样的人。

这种对立，斯宾诺莎很使劲地表达出来，并加以强调，我则很巧妙地把这种对照论应用到我自己的身上，不过上头所讲的本来只是用来使下述的情况比较容易明白一点。

即是，我可以把包括自己内在的诗人的才能完全当作是自然来看。加以我习惯于把外部的自然视为它的对象，我更作如是观了。这种诗才的运用，虽可为外部的诱因所引起和规定，但是，最欢畅地最丰富地表现出来，却是它无意地甚至违反自己的意志地流露的时候。

漫步于田野森林之中，

信口哼出我的短歌，
这样子一天又过了。

这样的即兴的诗作，即在晚上醒来时，也会在脑海中涌起，因此我学某一个先辈那样常常喜欢叫人替我做一件轻皮的短衣，练惯在黑暗中起床把我的蓦然涌起的诗意写下。我惯常冲口吟出一小诗，而马上就不能把它照原来的样子再凑起来，因此有几回我一个劲儿直跑到一张斜面的书桌上，连斜置之纸也无暇放好，身体动也不动地打斜把诗从头到尾写下来。正因为同一的缘故，我觉得铅笔远比羽毛笔为便利，用铅笔写字较听使唤，有几回羽毛笔的咝咝作声和溅墨水，使我从作诗的梦游状态中醒过来，分了我的心，那小小的作品便流产了。我对于这样子写成的诗特别尊重，因为我对于这种诗的态度，恰像母鸡之孵出雏鸡来听它们在自己身边啾啾地叫那样。我从前有以朗诵这种诗来与少数亲友共赏之癖，今又复活。但是拿这些诗来换钱，我却觉得是可憎的事。”

可见，歌德虽是天才式的人物，但他也从无数先贤的著作中汲取营养，不断地丰富自己的思想，同时引导了自己的创作倾向。

十二、接近真正的幸福

创作力旺盛的歌德还热心于法兰克福年轻人的游乐会，他们每周一个晚上聚到一起，做一些别开生面的游戏，有一回的游戏是假扮夫妻，歌德接连三次拈阄得到的假妻都是同一个女子，名叫安娜·西比拉·明奇。她是一个年仅 16 岁的商人的女儿，体态美丽匀称，举止安详娴静。虽是假的，但两人在公共场合夫唱妇随，很是亲密，年老的歌德愉快地回忆当初的情形，说道：“如果我们一伙人中有一个僧侣的话，我们恐怕真会毫不踌躇就请他当场替我们主持婚礼吧。”歌德的母亲也很喜欢这位游戏中的女伴，相信她会是一位贤妻，同时也可做孝顺的媳妇。因此，当歌德父亲提出要偕带歌德一同去意大利旅行时，做母亲的便急于想让歌德在动身之前把与女友的婚事定下来。歌德的房间被布置一新，歌德婴孩时用过过的胡桃木的摇篮也被抢了出来备用，对歌德终

身大事的假想，使全家沉浸于一片宁静的氛围之中，而歌德自己则一声不响。显然，歌德在等待真正的爱情。

1775 年元旦，歌德同友人到一位银行家家中参加家族音乐会。银行家已去世多年，女主人不满 17 岁的女儿安娜·伊丽莎白·薛涅曼坐在宽敞的客厅里为来访的客人弹奏钢琴。演奏完之后，歌德礼貌地称赞薛涅曼的音乐天才，姑娘不禁留心打量起歌德，歌德同时被她的美貌和气质打动。她就是后来歌德在诗中昵称丽丽的那个姑娘。丽丽和歌德相识后，渐生爱慕之心，两人经常在一起倾心交谈，歌德不久也坠入爱河，和丽丽难舍难分了。丽丽向歌德描述了自己作为富家闺秀在世俗环境中的生活经历。她一点也不隐瞒自己性格中的弱点，其中有卖弄风情的毛病。她承认：“对你也使用了这种才能，但是我这样做，自己也受到了惩罚，因为现在我发觉自己也被你吸引住了。”又一次恋爱赋予歌德新的激情，歌德情不自禁地拿起笔，讴歌得到的《新的爱，新的生活》：

心，我的心，这却是为何？

什么事使你不得安宁？

多么奇异的新的生活——
我再也不能将你认清。
失去你所喜爱的一切，
失去你所感到的悲戚，
失去你的勤奋和安静——
唉，怎会弄到这种地境！

是不是这青春的花朵，
这丽人的可爱的清姿，
这种至诚至善的眼波，
以无穷魅力勾住了你？
我想赶快地离开了她，
鼓起了勇气躲避着她，
我的道路，在片刻之间。
又把我引到她的身边。

这种充满魔力的情网，
谁也不能够将它割破，
这位轻佻可爱的姑娘，
就用它强迫罩住了我。
我只得按照她的方式，
在她的魔术圈中度日；

这种变化，唉，变得多大！

爱啊，爱啊，你放了我吧！

这首诗广为传唱，贝多芬曾为之谱曲，老年的歌德在《诗与真》里还深情地再一次收录。

春天到来了，丽丽到美因河畔的奥芬巴赫去看她的姨父。那里空气更加新鲜，草坪绵亘，风景秀丽，恋爱中的歌德，找到了最可容自己感情驰骋的地方。

奥芬巴赫离法兰克福不远，歌德白天因为律师事务及其他琐事，不能到奥芬巴赫与丽丽在一起，俩人便在晴和的晚上户外相聚。歌德说：“白天黑夜对于我们都是一样，白天的阳光不能盖过恋爱的光辉，夜里却因热情发射的光芒而灿同白昼”，他们在野外散步，直到深夜歌德才把丽丽送回家，然后歌德顺着大道回法兰克福。走累了，坐在路边的椅子上，在极寥廓澄澈的深夜的静寂里，聆听着天籁之声，构想着自己和丽丽未来的幸福。途中有一座葡萄园，有一次歌德倒在园中睡着了，醒来时已是黎明。

4月中旬，歌德和丽丽订婚了。这本是符合两人心愿的好事，但生活的现实接着迫人而来，首先歌德为结婚而准备的资财不足，歌德的家庭地位要比丽丽家低一等级，双方家庭因此不免有些矛盾，丽丽家

族的亲友们对歌德的家庭很有些瞧不起。还有，双方的宗教信仰也不相同，歌德家是路德教派，丽丽家是革新教派加尔文派，这自然很难调和，因此歌德的父亲和妹妹都不赞成攀这门高亲。歌德也意识到“如果可爱的丽丽现要稍微继续她在家时的生活方式，她便会在我的不大宽敞的家里感到局促不安，没有施展的机会和余地”。于是歌德有些动摇不定，他既迷恋丽丽，又怀有躲避现实的心理，倒是丽丽意志坚决，她倾倒于歌德的才华，心甘情愿嫁给他。

正是这时，歌德的好友斯托尔堡伯爵兄弟在前往瑞士旅行途中，顺道来拜访歌德，并邀歌德同行。歌德想试行一下看是否能离开朝夕相聚的丽丽，便欣然同意，他的父亲不仅赞成，还劝歌德如果时机凑合，不妨转道到意大利去看看。于是歌德下了决心打点行装。和丽丽会面时，没有正式辞行，只暗示要到远方去，便离开了她。

途中，歌德特意取别道到埃门丁根看望自己心爱的妹妹。妹妹嫁给施罗塞尔后，随丈夫来到这个荒寂的小镇，生活非常枯燥、郁郁寡欢，因为歌德事先已在信中将自己和丽丽的事告诉了她，她根据自己的境遇和经验，极诚恳地、甚至用命令的口吻劝歌德与丽丽断绝关系，这让歌德感到心中难过，同时更激

起他对丽丽的感情。

在瑞士的旅行顺利而愉快。在苏黎世，歌德见到了自己的老朋友拉瓦特尔，拜访了有瑞士的“弥尔顿”之称的老诗人博德麦。尽管如此，在远眺苏黎世湖的美景时，歌德不禁又思念起丽丽：

如果我，亲爱的丽丽，没爱过你，
这美景应给我何等的乐趣！
可是，如果我，丽丽，没爱过你，
我能在这里、那里感到幸福？

旅行到意大利边境时，对丽丽的思念终于占了上风，歌德决定掉头返回法兰克福，两人热恋时，丽丽曾给歌德一块金鸡心，而且用亲自编织的带子拴好，挂在歌德的脖子上。这一块小小的纪念品提醒了歌德：

你是消逝去的欢娱的纪念，
我还老拴在我的颈上，
是否你联结我俩比心灵的纽带还久？
是否你要将短促的恋爱延长？

丽丽哟，我为避你而远去呢！
我走遍了外国，迢迢的山谷和森林，
你为我结的丝带还是不离我身！
呵，丽丽的心怎能那样快的从我心头消泯。

恰像一头啄断了绳的小鸟飞回高林，
脚上还系着赤绳一段，
留着笼中生活的残印；
它已不是生下来时那样自由的鸟，
它已有了主人。

歌德毅然掉转马头，决心回到丽丽身边，但情形已发生了变化。丽丽的家族和亲友，对歌德的不辞而别极为愤慨，认为歌德并没有结婚的诚意，主张解除婚约，歌德的父亲当然也同意。用情专一的丽丽感到非常苦恼。在歌德外游时，已有不少亲友劝她斩断情丝，但她实在难以割舍对歌德的爱情，她甚至决心抛弃现时的富贵生活跟歌德一道到美洲去。然而她未曾料到，她所倾心相爱的歌德再一次举棋不定，他一方面深爱着丽丽，一方面又觉得固定的家庭幸福生活并不能使他满足，他是一只渴望高飞的大鹏，不希望有什么的羁绊，在给十分知心的女友奥古斯特的

一封信中，他写道：

“我亲爱的，您可以想象到有这样一个歌德：他身穿镶有闪光的金银花边的上衣，要不然就是从头到脚都打扮得还可以使妇女们觉得他的确有风度；在他四周闪耀着壁灯和吊灯的淡雅的光辉，他活动在各式各样的人物中间，牌桌上有一双美丽的眼睛正盯着他，他不断地改变着消遣的方式，时而与人交谈，时而去听音乐，时而又去跳舞，而且用尽情的挑逗去博得一个金发美女的青睐。这时，您所看到的是正处在节日之夜里的歌德，他新近曾结结巴巴地给您表白过一些深邃的感情。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歌德：他身穿灰色的海獭皮服装，围着咖啡色的丝绸领巾，穿着长靴，他在二月轻拂的微风中就已经预感到春天，预感到一个可爱的广阔世界即将在他面前重新展开。他永远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拼搏、写作，不久以后，他就要把他少年时代天真无邪的感情写成一首首小诗，要把生活中浓郁的趣事写成戏剧，并根据他的标准用粉笔在灰色的纸上画出他朋友们的形象，画出他周围的环境，画出他心爱的家庭用具。他独出心裁而不顾及左右。因为他在工作中总是能够立即就登上更高的一阶，因为他并不趋附任何理想，而是让他本人的感

受在斗争中、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发展成为一种禀赋。这就是时刻牵挂着您的那个人，他在一天清晨突然觉得要给您写信，他的最大的喜悦就是与同时代最优秀的人们在一起生活。”

从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出歌德的远大抱负以及矛盾心态。犹豫不决的结果是，这年的9月20日，歌德与丽丽解除了婚约。让人痛心的是，憧憬幸福的丽丽遭此打击，一辈子都未能赢得真正的爱情，不幸始终伴随着她。一年后，她与一个商人订婚，不久，那个商人破产，逃之夭夭。1778年8月，丽丽嫁给施特拉斯堡的银行家、后来担任市长的伯恩哈特·冯·图尔克海姆男爵。婚后的大家庭生活并不愉快。1793年，法国革命的浪潮冲到施特拉斯堡，革命政府要逮捕男爵，他只得逃亡。受连累的丽丽不得不带着五个孩子，扮作农妇模样逃难。

1794年冬，一位与歌德有交往的将军夫人与丽丽谈话，丽丽自称是歌德的创造物，并且表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对歌德怀着宗教的崇敬，她请将军夫人向她的这位“忘不了的朋友”转达她的心意。1817年5月，丽丽在施特拉斯堡去世。

歌德也终生都对丽丽抱有好感，1779年去瑞士旅行时曾到施特拉斯堡看望过她。1830年春，丽丽去

世十几年后，有一位丽丽的女亲戚到魏玛访问歌德，触动了歌德的往日情怀，他忧伤地说道：“我又像清清楚楚地看到丽丽出现在我的眼前，又好像感到接近她的气息。事实上，她是我真心深爱的第一个女性，我也可以说，她是我最后的一个……我从没有像跟丽丽相爱的时代那样接近真正的幸福。”这是歌德回顾一生的爱情生活发出的肺腑之言。

十三、进入魏玛宫廷

还有一桩偶然事件帮助歌德实现了与丽丽的分离。这一事件同时帮助歌德努力挣断了把他绑在法兰克福的绳索，使他的人生旅程发生了重大转折。

早在 1774 年 12 月，歌德结识了为刚刚上台执政的魏玛卡尔·奥古斯德公爵效劳的克内贝尔大尉，进而与公爵相识，公爵钦敬歌德的才华，歌德也很赞赏公爵高贵的气质和过人的才干，两人一见如故。他们在最初的交往中就谈到了政治。歌德在各方面都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很有说服力地陈述了关于政府的想法。卡尔大公发现一个诗人对富有行动的生活如此津津乐道，对世事知识如此丰富而感到惊异，他暗中思忖：“这位诗人将是我一个多么好的大臣！”而且，他看中歌德是一个猎趣的伙伴，一个极妙的感情解说者。因此他断定没有别的良师益友比歌德更有能力帮助一个尚未成熟的统治者。在歌

德身旁是多么美妙，一个年轻而相貌堂堂充满智慧的伙伴，而不是那些一味顺从巴结的廷臣。于是，在1775年9月，公爵和新婚夫人路过法兰克福，便邀请歌德前往魏玛小住，歌德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不曾想这中间又出了点小麻烦。公爵派来迎接歌德的宫廷侍者并未在10月初如期到来，而歌德已事先向众亲友辞别，行装都预置好了，处境很是尴尬。

在这种情形下，歌德只好蛰居家中，埋头创作计划中的戏剧《埃格蒙特》。由等待到失望，是一段难熬的时光，好多夜晚，歌德不能安心呆在家中，他披着宽大的外套在街上闲游，有时静悄悄地站在丽丽屋子的窗下。丽丽房间里绿色的百叶窗垂下来，但歌德仍清楚地看到灯还放在往常的地方。他听见丽丽优美的琴声和歌声，丽丽唱道：“为什么你牵着我毫无抵抗”，歌声如泣如诉，这是歌德一年前献给她的情诗。在寂静的夜里，丽丽唱得愈加动人，歌德听得如醉如痴，唱完之后，歌德看见丽丽印在百叶窗上的影子移动，知道她站起来了，厚厚的窗帘遮挡住了丽丽可爱的容颜，歌德很想再见丽丽一面，但终于打消念头，悄然离开了。

看到儿子焦急不安心乱如麻的样子，歌德父亲再次劝儿子不妨乘机去意大利旅游。1775年10月30

日，歌德从法兰克福动身，先到达海德尔堡看望朋友，恰在此时，因种种原因耽误了行程的魏玛宫廷武官快马加鞭赶到法兰克福。得知歌德已经外出，赶忙送快信到海德尔堡将歌德截住，歌德为自己的轻率和耐心不足而抱歉，决心随武官访谒魏玛。海德尔堡的朋友殷勤挽留歌德，歌德不禁热情激动地喊出《埃格蒙特》里的一句有名的道白：

“孩子，孩子，不要说下去了！光阴的白驹像是被不可见的幽灵鞭策那样拽着我们的命运的轻车走了，我们已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勇敢地镇定地紧握着马缰，催动车轮，时而左，时而右来闪避这儿的石头，躲开那儿的悬崖吧。到哪儿去，谁知道呢？从哪儿来，差不多也记不清了！”

歌德迈上了前往魏玛的豪华马车，从此，歌德开始了新的生活，并永远地离开了他的故乡。

卡尔·奥古斯特是 1775 年 9 月接替他母亲安娜·阿玛丽亚担任魏玛公国大公的。虽自幼养尊处代，但年轻的公爵却胸怀大志，希图大有作为。歌德晚年和爱克曼交谈，叙述了当时他眼中看到的公爵：

“我来到魏玛时他 18 岁，但当时他已经显示了有朝一日将长成为栋梁之材的萌芽。不久，他就和我心心相印，并十分关注我的一切活动。我差不多比他

大 10 岁，这种差距给我们的关系带来了好处。他许多次整个晚上坐在我这里和我深入地谈论艺术和自然的话题，谈论各种有趣的事情。我们常常谈到深夜，有不少时候我们互相挨在沙发上就睡着了……

他像一种名贵的酒，但仍在充分地发酵之中，他不知道把他的力量往何处发挥，我们经常干一些近乎危险的蠢事，整天骑着烈马跳越篱笆和沟壑，整天爬山涉水，搞得精疲力尽，到了晚上就露宿在野外，有时在树林中燃起一堆篝火：这正合他的心意。他继承了一个公国，但并不在意，然而如果让他去袭击、去攻打、去占领，那他可能会当成一回事的。

好奇心引他走向远方，
不畏山岩险峻小路如羊肠；
险情隐伏在路旁，
把他推向痛苦的怀抱。
而那过度高昂的痛苦激情，
将他时而此时而彼地粗暴推搡，
从那烦恼的激动中，
他又烦恼地安静下来。
在那些明朗的日子里，
他依然郁闷放纵，毫无快意，我行我素，

他身心交瘁，进入梦乡，
在一张硬挺的床上。

我不否认，最初他曾使人感到有些忧虑和担心，然而不久以后他的才华出众的本性得到了净化，形成最美好的品质，使人感到与他在一起生活和工作是一件愉快的事。”

歌德很快就适应了魏玛的生活，他和大公朝夕相处，几乎形影不离。在开头的两个月里，他们经常在一起寻欢做乐，成天骑着烈马，跋山涉水，外出狩猎，晚上就在旷野里露宿，有时生起一堆篝火，和乡村姑娘们翩翩起舞。冬天湖面结冰，魏玛人还没有时兴溜冰这玩意儿，歌德带头在冰上施展飘逸潇洒的舞姿，一时间，在“天鹅湖”上溜冰成了上流社会人士时髦的娱乐。有时候，在湖上点燃火炬和灯火，点放烟火，奏起音乐。一些贵妇人乘着冰橇，在喧闹的湖面上来回疾驶，她们的脸上还带着假面具，恣情嘻笑，简直是在过狂欢节，正如歌德给默尔克的信上说的：“我们这里有点像发疯，玩着魔鬼般的游戏。”宫廷里举行宴会和假面舞会，当然更少不了青年诗人和青年公爵的身影。所有这些狂欢的娱乐活动中，两人成了一对分不开的伴侣，他们在一起吃饭，经常

在同一个卧室里过夜，有时彻夜谈论着艺术、大自然以及彼此感兴趣的话题。彼此之间已摆脱世俗的礼节，随便称呼对方。歌德的魅力已把卡尔·奥古斯特完全征服了，维兰德在一封信上说：“歌德不会再离开这里了，没有他，卡尔·奥古斯特不再游泳，也不再涉水出游了。”

歌德以他的才华、风度和青春的活力不仅征服了年轻的公爵，也使宫廷圈子里的不少人为之倾倒。女公爵热爱天才，歌德了不起的才能令她心服。维兰德曾经是歌德的一首讽刺诗（《上帝、英雄和维兰德》）的嘲弄对象，但他和歌德第一次会晤后，前嫌尽释，对他赞美备至。他在会晤后发出的一封信上说：“第一眼看到他，我感到多么完美，他正是我心目中的人物！当我在餐桌旁坐在他的身边时，我是多么热爱这个了不起的青年！自从那个上午以来，我的灵魂里充满了歌德的形象……我相信，这位上帝般的人物将继续留在我们这里，比他原来打算停留的日子要长。如果魏玛能够做什么事情的话，有他在就会完成它。”这些话出自公爵的老师、一位著名的前辈诗人之口，可见歌德已赢得一些重视文化的魏玛上层人士的心。克内贝尔也说：“他像一颗星星升起在天空中，每个人都崇拜他，尤其是女士们。”

但是恶意的攻击同时也从宫廷中流传出来，甚至在德国到处传开，说魏玛宫廷中种种胡闹行为的罪魁祸首就是歌德，他是种种恶作剧的教唆犯，他和公爵像野孩子般到处乱逛，有损宫廷和公爵的尊严。

然而，度过这最初的两个 month 狂欢的日子后，诗人的本性使歌德对那些喧闹的游戏感到厌倦了，于是便在年底前带了几个人离开魏玛，来到山区，重新领略宁静孤寂的乐趣。

公爵不能没有歌德，他要歌德回到魏玛，留下来协助他治理国政。诗人站在严冬的天空下，在阵阵的松涛声中望着天上的星星，心里翻腾着一个问题：我究竟应该留在魏玛还是离开？终于他决定延长在魏玛的逗留时间，他给法兰克福的朋友写信说：

“我大概将留在这里，尽我之所能好好发挥自己的作用，逗留时间的长短只好听从命运对我的安排。哪怕只有几年时间，也总比呆在家中虽有志向而无所事事要好得多。在这里，我的地位够优越的了，现在该我来认识一下这块土地了，只是这就已经给我带来了许多欢乐。公爵也因我的到来而热爱工作了，而且，由于我完全了解他，我对许多事情就毫不担心。”

1776 年 6 月，奥古斯特公爵力排众议果断任命

歌德以公爵私人顾问的身份作为枢密参事正式参与魏玛国政，这一任命确实大胆，因为歌德虽享有文名，但究竟有没有处理行政事务的能力尚不可知，首席国务大臣冯·弗里奇便表示坚决反对，甚至以辞职要挟大公，对此，公爵解释说：“如果不把一个天才人物放到能发挥他的不寻常的才能的位置上去，那就是糟蹋人才……世人反对我把歌德博士安排到我的最重要的枢密院去工作，说我不考虑他以前既非行政官员、教授，又非宫廷职员或政府职员。世人的这种反对是根本不会改变我的决定的。他们的反对是出于偏见，但是我和每一个愿意履行自己义务的人一样，并不是为了得到荣誉干事的，而是为了对得起上帝和自己的良心。”大公的决定赢得了克内贝尔等年轻的贵族们的支持，他们寄希望于歌德大展鸿图，改变其时死水一潭的政治局面。实践表明，歌德并没有辜负公爵的厚望，他雄心勃勃、兴致冲冲地投入到新的工作当中。诚如他在给好友的信中说：“如今，我已经尝到宫廷生活的滋味，现在我还想对治国安邦之事一试身手，并这样干下去。”

歌德分管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大到参与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时期欧洲宫廷之间的高级政治谈判，小到制订防火条例，重新开发关闭的铜矿和银

矿。刚开始时，歌德并没有多少职权，但他的行政能力在处理实际事务中渐渐表现出来。1779年，他先后担任军备大臣和筑路大臣，从此在魏玛公国各地奔波；招募和装备新兵，统领全邦500多名士兵从事警卫和联络工作，主管邦内的道路建设以及防洪和水道设施的建设，不久又接受委任，监督纺织品的生产，调查各地地质状况，组织木材贸易等等。歌德陷于各种事务之中，确信只有坚持才有成功的希望，他在日记中写道：“各种繁忙的压力对灵魂来说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一旦灵魂从这种压力下解脱，它就能更加自由，并享受生活的乐趣。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舒适度日而无所事事，在这种情况下，人对最美好的馈赠都感到厌烦。”

歌德的努力得到魏玛公国最高统治者的奖赏，1779年，公爵正式提升他为枢密顾问，歌德在接受新的任命后说：“真像做梦一样，在我30岁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德国公民能够达到的最高职位。”但是，种种恶意中伤也随之而起，那些不满意他的人又发起了攻击。维兰德说：“自从我们的歌德被任命为枢密顾问后，这里的人们对他的憎恨达到了顶点，几乎要爆炸了，虽然他并没有伤害过任何人。”1782年，卡尔·奥古斯特为歌德向皇帝申请贵族称号，这一年6

月3日，歌德接受了皇帝约瑟夫二世颁发的贵族证书，成为一名功勋贵族，从此，有资格在他的姓氏前面加上一个贵族的标志“冯”字。公爵的这一举动把一些世袭贵族激怒了，表示激烈反对：一个法兰克福市民阶层出身的人竟然挤进了贵族的行列，和他们平起平坐，叫这些生来就是贵族的人怎么咽得下这口气？歌德后来和爱克曼谈起这件事时说：“当授予我贵族证书的时候，许多人以为我会因此趾高气扬。其实，我并不把它当作一回事。”这一年，公爵又任命他为财政大臣，掌管公爵以及群臣的预算；自此他大权独揽，成为公国内极具政治影响力的人物。

歌德凭借自己的朝气试图在公国内进行一些改革，行政管理的方法得到改善，但涉及到贵族利益的重大改革却无法实施，皇室领地的分封，农民赋税的减免等方面的政策蓝图都成了泡影，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愤怒指责那些保守落后的贵族：“诅咒我们侵吞土地的人决不会有好下场!!! 我们的道德世界和政治世界已被地道、地窖、阴沟搞得满目疮痍……谁也不会去考虑一下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其居住者的状况；有朝一日，当大地塌陷时，风闻此事的人就会理解得清楚得多了。”每当歌德路经田野，同农民谈话

时，每当歌德与登门拜访他的手艺人聊天时，他往往有一种爱莫能助的感觉。歌德的工作越来越艰难，最终，势单力薄的他对公国的变革失去了信心。

十四、施泰因夫人

给歌德枯燥生活带来活力的是一大堆朋友围绕在他的身边。赫尔德尔在歌德踏足魏玛后很快迁来，并应邀出任教会总监。在施特拉斯堡时结识歌德的伦茨也来到魏玛，并宣称“歌德是我的首领”，但他不久就离开宫廷，1777年后一度发狂。来自歌德故乡的画家克劳斯被延聘为魏玛绘画学校的校长，还有作曲家克内贝尔，“童话之父”姆佐依斯、女艺术家施勒特尔……更为重要的，歌德结识了一位对他一生和创作都有极大影响的女性——夏绿蒂·冯·施泰因夫人。

施泰因夫人1742年12月25日出生于魏玛，父亲是魏玛内廷总监，她16岁时成为魏玛公国女摄政安娜·阿玛丽亚的宫廷女官，22岁时嫁给了御马总监冯·施泰因男爵，由于她久病缠身，同男爵的婚姻又缺乏感情基础，因此郁郁寡欢。她比歌德大7岁，

歌德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已是几个孩子的母亲了。

施泰因夫人并非出众的美人，但魅力超群。她多才多艺，能歌善舞，精通音乐，善于鉴赏诗歌，画也画得不错。但由于生育过多，身体瘦弱，是一个愁怨的少妇，和歌德以前见识过的少女形象大不相同。两人第一次见面，歌德就为她的冷艳所吸引，她成了歌德在魏玛的最知心的朋友。歌德发自内心地称她为“抚慰者、天使、圣母。”歌德的好友曾警告歌德与施泰因夫人交往会有很大危险，但歌德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两人几乎天天见面，经常一起用餐，歌德还几乎天天给她写信。他们在一起朗读歌德喜爱的荷马诗篇和斯宾诺莎的作品，她为他誊写草稿，彼此融洽无间。歌德给好友写信解释说：“这位夫人对我的重要性，对我具有的力量，我无法另作解释，只能说是由于轮回。——是的，我们前世是夫妻！——现在我们互相了解了——却蒙在幻雾里。”这位天才的诗人经过感情的激发，为施泰因夫人写了大量的情诗。著名的《你为何赋予我们的慧眼》一诗中有这样一段剖白：

沉湎于空虚之梦的人很幸福！

怀着空洞的预感的人是福人！

而我们的现状和眼力，真不幸，
却更使我们的梦和预感有确证。
说吧，命运要对我们干什么？
说吧，它怎么把我们紧缚在一起？
唉，在前世里，你大概是
我的姐妹或者是我的妻子。

你了解我的性格的每一个特征，
你听出我心弦的最纯的声音，
任何凡人的肉眼都难以看透我，
而你，却一眼就能够看得分明。
你给我的热血滴注清凉剂，
你指引我脱离狂乱的迷途，
躺在你那天使一般的怀中，
我的破碎了的心会获得康复。

在爱情的培育下，歌德这一阶段所写的抒情诗，
艺术上更加纯熟，写于 1778 年的《对月》是一首极
为优美的月光诗，被誉为德国抒情诗中最高的杰作：

你又把幽谷密林
注满了雾光，

你又把我的心灵
再一次解放；

你用慰藉的目光
照我的园邸，
就像知友的眼光
怜我的遭际。

哀乐年华的余响
在心头萦绕，
我在忧喜中彷徨，
深感到寂寥。

流吧，可爱的小溪
我永无欢欣，
嬉戏、亲吻都消逝
更何况真情。

但我曾一度占有
可贵的至宝！
永不能置之脑后，
这真是烦恼！

喧响吧，莫要停留，
沿山谷流去，
流吧，合着我的歌，
鸣奏出旋律。

不论是你在冬夜
汹涌地高涨，
或是你绕着幼蕾、
掩映着春光。

福啊，谁能无憎地
躲避开尘网，
怀里拥一位知己，
共同去欣赏，

那种不为人所知、
所重的风流，
在胸中的迷宫里
作长夜之游。

在这首诗中，歌德运用高超的艺术技巧，清丽的语言，把对施泰因夫人的爱和对大自然的热爱融合

到一起，水乳不分，如行云流水一般晓畅。

在施泰因夫人面前，歌德那颗烦躁不安的心灵渐趋平静下来，他开始追求一种平静的生活方式和创作风格。在这一心态下，歌德创作了戏剧《伊菲格尼》，阐释古典人道主义的理想，伊菲格尼在戏中的道白：“毫无瑕疵的灵魂才是平静的”正是歌德的心声流露。这部戏中的女主人公，也以施泰因夫人为原型。狂飙时代的激情在歌德笔下渐渐地消失，与施泰因夫人性格相仿佛的沉着和平静成了歌德新的创作风格。

在当时的魏玛，男女交际很是自由，歌德和施泰因夫人的交往更是大胆亲密而少顾忌。施泰因男爵宰相肚里好撑船，他忙于自己的事务，乐得大名鼎鼎的诗人歌德陪伴闺中寂寞的妻子，他把歌德对她妻子的爱慕看作中世纪爱情歌手对宫廷贵妇人的赞美一样。也许他并不知道，歌德对他的妻子已不仅仅是爱慕——歌德曾向施泰因夫人这样表白：“每逢我拥抱你那可爱的娇躯，从你唯一的、贵实的嘴唇上面尝到贮藏多年的爱的甘露，我就欣然对我的心灵说道：这种酒器，除了爱神阿摩，任何天神也不能制造、收藏！”（《酒杯》）当然，施泰因夫人极富教养，懂得节制自己的感情，她和歌德之间，终究没有越雷池一

步，有席勒一封信为证：“她确实是一位富有特性的有趣的人物，我很了解歌德为什么那样依恋着她。她谈不上漂亮，不过她的脸上有一种温柔端庄的表情，流露出相当独特的坦率。她的性格中具有健康的理智、真实和感情。她从歌德那里收到一千多封信，在意大利，他每星期都给她写信。大家说他们的关系是完全纯洁的，无可指责的。”歌德和施泰因夫人的恋爱关系一直维持到1788年从意大利旅行归来、与克里斯蒂安娜同居以后。施泰因夫人对歌德出走意大利极为不满，同时，对歌德与一个没有文化修养的普通制花女工结合十分不屑，她怀着强烈的嫉妒心责备歌德，认为歌德此举不仅有损朝廷和大臣的名声，而且对她本人也是种侮辱，于是对歌德极尽诽谤之能事。1789年6月8日，被惹怒和感到无奈的歌德给施泰因夫人写了一封绝交信。

在绝交时，伤透了心的施泰因夫人把自己写给歌德的信都要了回去，这些信在她临死前全部被焚毁，庆幸的是，歌德写给她的信完整地保存下来。

1792年，施泰因夫人根据这一段经历创作了一部悲剧《狄多》，借古讽今，嘲骂歌德。狄多是迦太基女王，埃涅阿斯在特洛亚灭亡后，投奔到她处，她盛情接待并跟他结婚，但后来埃涅阿斯却抛弃了她，

前往意大利，迫使狄多自杀。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来，这部悲剧的讽刺对象是歌德。其实，歌德并不是一个如埃涅阿斯那样的负心郎，他对施泰因夫人的指责始终以宽容大量的沉默。

1793 年施泰因夫人守寡，第二年她和歌德又恢复了通信。两人互相原谅，重归于好。1803 年，歌德写下《泪中的安慰》一诗：“你为什么这样悲伤？大家都很快活，只要看看你的眼睛，肯定，你曾哭过。”再一次抒发对施泰因夫人的恋情。而作于 1820 年的《两世界之间》则以虔敬的口吻感谢施泰因夫人赐给他的精神财富，把施泰因夫人对他的影响与莎士比亚并提，称自己“隶属于一位唯一的女性，崇拜一位唯一的男性，促使感情和精神合一。”

施泰因夫人于 1827 年 1 月 6 日在魏玛去世，遗嘱吩咐送丧队伍不要经过歌德家门口，以免歌德伤心。可见，一度忿恨歌德的施泰因夫人至死还怀着对歌德不渝的爱情。

十五、又一次危机

在创作之外，施泰因夫人带给歌德的平常心表现在对日常政务的处理上。在一些始料未及的事情诸如自然灾害面前，歌德镇定自若。一次，公国内德波尔达发生大火，歌德赶往观场指挥扑救，整整一天受到大火的烘烤，双眼被火熏得又干又痛，脚掌也被灼得发痛，然而歌德却心平气和地宣称：“对我来说，痛苦已经逐渐变得像壁炉里的火焰那样平淡无奇，但是我并未放弃我的想法，即使我的胯骨脱臼，我也要同那无姓无名的天使搏斗到底。没有人知道我做了一些什么，没有人知道我同多少敌人进行斗争才取得了这一丁点儿成绩。我请你们——冷眼旁观的神灵们——对我的追求、力争和苦斗不要耻笑。说不定你们还会微笑着站在我的一边呢！”

身为枢密院顾问，歌德希图自己治理下的魏玛公国的日益强盛，一系列改革措施不能实行之后，他

只好把希望寄托到卡尔·奥古斯特大公身上，指望大公励精图治。《伊菲格尼》一剧中就含蓄地公布了当个好皇帝的标准。1783年9月3日是大公的生日，歌德献上了一首《颂歌》，表达了对大公的祝愿，同时谆谆告诫：

君王啊，但愿你的每一寸国土，
都成为你的治世的楷模！
你早知你身肩重任，
且逐步收敛你放荡的灵魂。

遗憾的是，歌德的进谏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公爵对他恩宠有加，并不意味着顺从他的政治主张。歌德要减轻赋税，但公爵执意铺张浪费使老百姓的税务负担反而加重。歌德向往和平安宁，公爵却想穷兵黩武，1785年8月同普鲁士结盟反对奥地利，要求增加军事预算，歌德对此极力阻挡。现实终于让歌德进一步醒悟，让他从对公爵的幻想中摆脱出来。

政治上的失意给了歌德不小的打击，创作上的危机更让歌德心灵焦灼不安，虽然和施泰因夫人相爱写下了一些极为优美的情诗，但没有写出有广泛影响能与《少年维特之烦恼》相比的力作，心中庞大

的创作计划总是由于烦杂的政务而搁置。他在晚年和爱克曼谈话时说：“我在魏玛做官的宫廷生活头十年中几乎没有什么创作，于是在绝望中跑到意大利，在那里带着创作的新热情抓住了塔索的生平，用这个恰当的题材来创作，从而摆脱了我在魏玛生活中的苦痛阴郁的印象和回忆。”可见十年大臣生涯，并没有给歌德带来多少真正的快乐，既没有赫赫政绩，也没有著书立说，宫廷的奢糜无耻和烦杂的政务日复一日地销蚀着歌德的抱负和才华。

其实，歌德 1779 年写过一部戏剧《依菲格尼在陶里斯岛》，称得上是十年从政生涯中的一部力作，虽然这部戏剧在歌德一生创作中并不占重要位置。

这出戏取材于希腊神话，是部散文剧，后来在意大利旅行时，他又把它改写成诗剧。剧中的主人公是古希腊传说中特洛亚之战希腊联军统帅阿加门农的女儿伊菲格尼，阿加门农出征时，伊菲格尼被狩猎女神狄安娜掠至陶里斯岛做女神的女祭司，阿加门农凯旋回家后遇害，他的儿子奥瑞斯特为了替父报仇，被复仇女神到处追逐，根据神喻，他只有到陶里斯岛取得狩猎女神狄安娜的神像才能获救。这个岛国不准岛外的人进入，偷入者将被作为牺牲献给女神。奥瑞斯特踏上海岛即被擒，送往女神庙，姐弟相逢。伊

菲格尼作为女祭司，必须主持这种以人为牺牲的残忍仪式。她以高贵仁慈的言行促使岛国国王废除了这种陋习。当她拒绝国王的求婚时，国王又要拿她的弟弟当做牺牲时，她又一次以自己的善良真诚感动了国王，放他们返归故乡。

这出戏剧脱胎于古希腊著名悲剧家欧里庇得斯的《伊菲格尼》，但是歌德笔下的伊菲格尼已与欧里庇得斯的那位女祭司不同，歌德给了她高贵的人性，成为理想的人道主义的化身，善良纠正了罪恶，宽容替代了暴力。它与“狂飙突进运动”鼓吹的叛逆精神大相径庭，标志着他在创作上已脱离“狂飙突进运动”，进入古典主义时代。

这出戏在宫廷内首场演出，歌德亲自登台，扮演奥瑞斯特，伊菲格尼由漂亮的女演员科罗娜·施勒特扮演。²⁵岁的科罗娜身材修长，举止端庄，嗓音甜润，她多才多艺，来自莱比锡，是魏玛城里最美丽的女性，曾使公爵和歌德倾心，歌德作诗赞美她是缪斯（文艺女神）的宠儿，大自然的杰作，她和歌德同台演出，引起施泰因夫人的嫉妒，竟谢绝观看。

众人簇拥之中的歌德感到非常孤独，他努力寻找摆脱孤独的机会。1777年底，歌德突然出走，前往哈尔茨山旅行，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描述道：“我独

自一人骑马，带着旅行袋启程，途经施洛林、弗罗斯特和科特，直奔诺德豪森哈尔茨山农夫的栖身之所，再翻过韦尼戈罗德、戈斯拉尔到了巍巍的哈尔茨山，一切详情，将来我再向你口述：我克服了重重困难，我想是在12月8日午后一时吧，我伫立在布罗肯山峰，上面是炽热的太阳，光彩夺目，下面是深达一米的积雪。从这里眺望德国的土地，一切都被云雾遮盖住了，连我好不容易才劝说领我前来的林人也十分惊讶地亲眼看到他过去一直认为是不可想象的情景，因为他多年住在山脚下的缘故。这是我独来独往的14天，谁也不知道我究竟在哪里。”在缄默无言的大自然的怀抱，歌德焦灼孤独的心灵稍微安静下来。也只有沐浴在山林的清风中，歌德才会诗兴飞动，并对自己10年大臣生涯痛加反思：“几年来，我倾尽全力，可得的是什么呢？我为改革政治甚至不惜放弃了钟爱的文学，但顽固的封建势力却未受到丝毫的触动。现在，我空有一对健壮的翅膀，却已经不会在空中飞翔，无望的宫廷生活和无休止的事务榨干了我心中的诗情，只有重新置身于自然的怀抱，才能还我诗人的歌喉。”不过，归隐山林并不是歌德的人生目的，在山光水色中留连也非长久之计，这时的歌德非常苦闷。在找不到解决心灵困境的突破口之前，在政

务一如既往的枯燥乏味之中，歌德愈加喜爱出游。1779 年——1780 年，歌德陪同公爵到过瑞士。这次访问途中，歌德顺道看望了旧日的情人弗里德里克和丽丽，拜会了旧日好友施洛塞尔和拉瓦特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歌德陪同公爵给斯图加特的卡尔学校的年轻学生颁发奖品时，见到了一个比他小 10 岁的年轻学生弗里特里希·席勒，若干年后，他们之间建立起牢固的伟大友情。

在魏玛的头 10 年，歌德还把很多精力投放到自然科学的研究上。他骄傲而又遗憾地对施泰因夫人说：“如果我能从政治力量的斗争中解脱出来而把全部精力都献给科学和艺术那该多好啊！我就是为科学和艺术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位诗歌天才科学研究领域非常宽泛，从地质学到矿物学，从植物到人体。差不多要比达尔文早 100 年，歌德就提出了自己的一种生物进化学说，更让歌德在自然科学领域青史留名的是 1784 年他证明了人的颞间骨的存在，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兴奋地宣布：“3 月 27 日于耶拿，晚上……我已发现……既非金子，也非银子，但却使我感到说不出的高兴——这是人的颞间骨啊！我激动地把人的和兽的头盖骨作了比较，看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因而发现，这就是问题之所在！我请求你现

在千万别声张，因为事情必须保密，这必然使你也十分高兴，因为这颞间骨恰似使人最终变成人的最后那块石头一样，没错，准是它！多有意思！”在此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动物才有颞间骨，所以歌德据此所写的论文遭到一位专家的否定，歌德只好将稿子留在身边没有发表。很多年后，这一发现才广为人知。

歌德研究地质学和矿物学，担任伊尔美瑙矿总监一职给他提供了便利。他每次到矿区视察，总是随身带着锤子，采集岩石标本。在歌德眼中，群山峻岭，不只是风光秀丽：“山岭和峡谷是多么赏心悦目。的确，现在，当我向它攀登时，打动我的，并不是那如诗如画的美景，而是另一种绘画，另一种诗歌。”有一次，他爬上一个危险的斜坡，站在一个同行的小伙子的肩头上，要去敲下一块有趣的岩石碎块，那是一种表面蓝黑色的原始花岗岩。他们在向上爬的过程中，小伙子嚷嚷着危险，歌德高声喊到：“没有关系，继续向上爬！在我们摔断脖子之前，我们两人有伟大的事情要做！”他采集到了那块宝贵的岩石。

转眼间，在魏玛生活已近十年。魏玛的天空愈来愈显得狭窄，歌德感到愈来愈大的压迫，他急切的想呼吸新的空气，舒展自己有点发僵的躯体，经过一番

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心逃往心慕已久的几次未能成行的幸福之邦意大利，于是他向公爵请了一个没有期限的长假，幸蒙恩准，并答应提供旅游经费，但歌德并没有把自己的真实打算告诉公爵，只是说自己“将消失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里”，行前他也不曾向最为亲近的施泰因夫人透露。如此谨慎，足见歌德对此次出行非同寻常的重视。

十六、意大利之行

1786年9月3日凌晨3时，歌德从疗养胜地卡尔斯巴德偷偷溜出来，提起行囊，独自一人钻进一辆邮车，向南方奔驰而去。此行他化名菲利普·米勒，身份是一名德国画家。

由于怕人发现他的行踪，所以歌德星夜兼程，两天后赶到雷根斯堡，三天后越过慕尼黑，五天后翻过奥地利的布伦纳山口，旋即进入意大利境内。在意大利美丽优雅的边境小城博岑，歌德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意大利的阳光驱散了压在歌德心头的魏玛宫廷的阴影，他在日记中记述道：“我确实找到了一种四海为家的感觉，不像寄人篱下，也不像流亡他乡。我很喜欢这个地方，仿佛我在这里出生和受教育，现在好像是从格陵兰探险、捕鲸归来。”

歌德此次意大利之行的目的是学习古典艺术。9月17日他在维罗纳城参观了几座画廊，大饱眼福，

他说：“我做这次神奇的旅行，不是为了欺骗自己，而是为了熟悉绘画。说实在的，我对艺术，对画家的技艺不大在行。我的注意力，我的观察一般只限于实践部分，针对观赏对象和画法。”“我的天性是崇拜伟大和美。”在帕多瓦的隐士教堂，歌德欣赏了 15 世纪帕多瓦画派大师芒特尼亚的油画以及集威尼斯画派大成的提香的作品，“芒特尼亚是一位老画家，我对他的油画感到惊羨。这些画里有着多么强烈的、肯定的现实感！我从提香的画注意到，下列画家的出发点是：完全真实。不是虚假、欺骗，不是只靠想象力虚构的生活，而是健壮的、纯粹的、光明的生活，这既详细、认真、柔和、有限，又严格、勤劳而艰辛。画家们在其先辈精神光辉的照耀下，在自己实力的基础上，他们天才的生气、天性的坚毅，便一直升腾向上，越来越高，从而产生天仙般美丽而真实的形体。艺术家就这样在野蛮的时代之后发展起来。”

歌德的下一站是闻名世界的水上城市威尼斯，歌德非常兴奋，他在日记中记录道：“终究命运之书在我的那页上写着：1786 年 9 月 28 日晚，按我们的时钟 5 点，从布伦塔河驶入泻湖，我第一次望见威尼斯，不一会儿就要进入这个奇妙的岛城，这个海狸之国。谢天谢地，对我来说，威尼斯终于不再是一个名

词，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名字。这个名字曾多次使我恐惧不安，我简直成了这个词音的死敌。”如今，歌德成了威尼斯的客人。

歌德在威尼斯盘桓了半个月，乘坐有名的“贡多拉”游览水上风光，参观教堂，观看戏剧，参加天主教大弥撒，甚至去旁听案件的公开审理。虽然浮光掠影，但歌德却充分地适应并享受了威尼斯的生活，一个十分清晰的真实的威尼斯概貌深深地印在歌德的脑海里。

由威尼斯乘船，途经费拉拉和波洛尼亚，跨过亚平宁山脉，远远地便能看见但丁的故乡佛罗伦萨静静地躺在广阔的山谷中。“我想穿过佛罗伦萨直达罗马，在我的这个首要愿望实现之前，我对任何东西都毫无兴致。……如果实现了这个愿望，以后我还有何求？”所以歌德在佛罗伦萨只匆匆停留了 3 个小时，便又赶路了。

1786 年 10 月 29 日，歌德到达了梦寐以求的罗马，他内心的喜悦不言自明：“是的，我终于到达了这个世界的大都市。要是在 15 年前由一个精明的向导导游，我本会额手称庆的，但是如果我独自一人亲眼去游历和参观，那么这迟来的喜悦对我倒是件好事。”“现在我到了这里，……我看到我青年时代的一

切梦想又复活了。我记起了最初的铜版画（我父亲曾将罗马的风景画挂在前厅）。现在我真正见到了。以前我在油画和绘图、铜刻和木雕、石膏像和软木雕上早已熟悉的一切，现在全都聚集在我面前。我所到之处，都能在一个新世界中找到我熟悉的东西，一切都如我之所料，而一切又都是新奇的”，“今后我将在一个完全重情感的民族中生活，这对我的道德修养多么有益。”

客处他乡，在高贵的罗马面前，歌德自命不凡的傲慢溶解了。他投宿在德国画家约翰·海因里希·威廉·梯施拜因家里。画家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描述他眼中的作家兼大臣的歌德：“通过您和其他朋友的介绍，通过我所听到的、人们对他的许多描述，我对歌德已经相当熟悉，而且我发现他与我所想象的完全一样，只是不曾想到在这个活跃而感情丰富的人身上会有这样多的庄重和安详，也不曾想到他对一切都很熟悉、很内行。他的简朴的生活尤其使我十分高兴。他要求我给他安排一个能够睡觉和不受干扰地进行工作的小房间，要求我给他提供最简单的饮食，这一些我都能很容易地做到了，因为他对如此微薄的条件也感到十分满足。现在他就坐在这里。他每天早晨 9 点钟以前都在忙他的《伊菲格尼》，然后

他外出去观览此地的那些伟大的艺术品。他究竟是以什么样的一种眼光和见解来欣赏这一切的，你是很容易想象到的，因为你知道，他考虑问题是很讲求实际的。他很少让那些大人物们来打扰他；除了有艺术家来访外，他不接见任何人。”

歌德就是这样几乎隐姓埋名，克勤克俭地在罗马逗留了四个多月，沉浸于罗马艺术和新结识的朋友之中。他每天早起“忙他的《伊菲格尼》”，是将《伊菲格尼》译成抑扬格诗行。吃过早饭后，歌德常常一身手艺人打扮到大街上去和行人谈天，与流浪的少年开玩笑，吃街头巷尾小摊贩们制作的简陋的饭菜，贵族的习气在歌德身上荡然无存，在魏玛时折磨歌德的神经衰弱症也不治而愈了。当然歌德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博物馆和宫殿。

在罗马和歌德交往的艺术家除梯施拜因外，还有平民出身的作家兼美学家的天才卡尔·菲利普·莫里茨，瑞士人海因里希·迈耶尔，以及女画家安格莉卡·考夫曼等。莫里茨是《旅行家安东》的作者，一次不小心摔断了胳膊，在40天里歌德在他身边充担当看护人，让莫里茨非常感动。迈耶尔常和歌德交流思想，歌德对他抱有特别的好感，曾介绍他和赫尔德尔通信，但他墨守陈规，后来对歌德的影响很是恶

劣，在魏玛担当歌德艺术问题顾问以后一再阻止歌德把注意力转向其他文学流派，要求歌德仅仅严格遵循古典主义。

歌德对罗马的认识渐渐由表入里，以他的慧眼洞察罗马的历史和现实。他在 1787 年 1 月 25 日致魏玛友人的信中描述自己的心态：“现在我越来越难说，为什么我要留在罗马。常言道，走进大海越远，海就越深。我对这个城市的观察也是这样。不了解过去，就不能认识现在。今昔对比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宁静。”

对罗马的研究非一日之功所能完成，要慢咽细嚼才行，1787 年 2 月，为了对罗马以外的意大利有更全面的认识，歌德抽身前往意大利南方旅行。“如果我想到那不勒斯，甚至想到去西西里，那是因为这两个人间天堂地方的故事和风光都引人注目，火山洞穴张开大口，几千年来使居民和游客望而生畏和迷惑不解。”歌德决定前往观光冒险。到达那不勒斯后，歌德在 3 月 2 日第一次登上维苏威火山，找到了两个月又 14 天的新熔岩，甚至找到了一块薄薄的、已冷却了 5 天的熔岩，看到刚喷出的火山到处冒着热气。歌德试图靠近火山口，但蒸气浓得几乎让人看不见自己的鞋子，浓烟呛鼻，戴上口罩也无济于事，只好

作罢。4天后，他在梯施拜因陪同下再次登山，目睹火山爆发的壮丽情形。从火山口深处发出巨雷巨响，然后成千上万块大大小小的石头被抛到空中，被火山云包裹住，绝大部分石头又落回火山口，也有些石头落到歌德一行的周围。冒着生命危险，在火山两次爆发的间隙，歌德成功地到达了火山口，站到了万丈深渊的边缘，不禁受到梯施拜因亲切的责备。半个月后，歌德第三次去攀登火山，观察火山熔岩的流动，并从熔岩商那里找到了真正的熔岩样品，探险猎奇的心理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

维苏威火山下的庞贝古城自然不能不去凭吊一番，但歌德对这座木乃伊化了的城市印象不佳。随后他参观了帕埃斯图木的神庙，神庙里那些让歌德心中为之不安的锥形大柱子，是歌德见过的为数极少的古希腊建筑艺术的珍品。

4月2日，歌德在那不勒斯学院教授、法国风景画家克里斯朵夫·海因里希·克尼普的陪同下乘船渡海到达西西里岛的巴勒莫港。在歌德看来，意大利若没有西西里岛，就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概念，西西里是打开意大利之门，了解一切的关键。在巴勒莫植物园，歌德顿发奇想，希望找到原始植物，结果如愿以偿，他对动植物进化的规律非常感兴趣，认为原始

植物是世界最奇妙的创造物，利用这个模式和钥匙，人们能在今后发现无限多的、连续不断的植物，也就是说，有的植物虽然现在并不存在，但将来可能存在，这其中具有内在的真实性和必然性，这个规律适用于其它生物。这是歌德此次巴勒莫之行意外的收获。

罗马神话中最高的天神朱庇特和他的妻子朱诺的寺庙废墟位于巴勒莫吉尔根蒂城的东端，蔚为壮观。朱诺庙处于风化的巨崖上，岌岌可危。而朱庇特庙十分荒凉，犹如一座庞大的骨架，里面杂草丛生，原有的建筑只剩下一个巨大的陶立克式三陇板和一块同样比例的半个柱子。歌德张开双臂测量它们，根本无法合抱，只好快快不乐地离开了。

5月14日，歌德一行，乘船前往那不勒斯湾，日落时分，海面景象极为美丽，远近群山层林尽染，光辉夺目。离船最近的卡普里岛矗立海上，笼罩在透明的浅蓝色薄雾之中。天空万里无云，清澈明净，海面风平浪静，浮金泛银宛如一个小小池塘横卧在歌德眼前，歌德如醉如痴地注视着眼前的美景，心旷神怡。他并不知道，几乎纹丝不动的大海让那些有经验的航海者极度惶恐不安，他们说：“我们已处在激流中，激流在围着海岛转，通过浪涛的特别冲击，慢慢

地，不可抗拒地向悬崖绝壁冲去，在那里我们也就没有什么优势，也没有港湾可以避险求救了。”于是很多游客纷纷指责船上的舵手和船长，大吵大闹之际，歌德挺身而出，要求人群平静下来，向圣母祈祷，相信上帝会带来风和雨。船夫便乘机积极想办法拯救并准备应急之计。船越来越摇晃，激流汹涌澎湃。就在大家近乎绝望之时，海面上刮起了微风，危险过去了。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1787年6月，歌德重新回到罗马。对罗马不再有好奇之心了，代之以潜心的创作和研究。他特别注意观察古代雕像、希腊的造型艺术和宝石雕刻，他精心细致地研究解剖学，绘制人体图，制作模型，常常光临芭蕾舞、音乐会、歌剧的演出，他从这些艺术中汲取营养，加以归纳总结，后来据此写成一篇有名的论文《对自然的单纯摹仿、手法、风格》。在歌德看来，单纯摹仿不过是受到限制的对象的个别表现形式的摹写，而表现手法既十分重要，又是需要避免的不良倾向，“这种表现手法越是因方法比较简单而接近于忠实的摹仿，越是努力从另一方面企图把握和明确表现对象的特征，并通过纯洁、活泼和积极的人性而使二者结合在一起，它也就越是变得崇高、伟大、可敬。如果一个艺术家脱离和不去考虑大自然，那么他

将变得离艺术的基础越来越远，他的表现手法将变得越来越空虚和毫无意义，也将越来越远地离开单纯摹仿和风格。”歌德认为风格才是一个艺术家应当追求的最高境界，并指出风格是建立在最深刻的认识基础上，是建立在事物的本质上的，一旦艺术通过对大自然的摹仿，通过努力创造共同的语言，通过对对象的细致而深刻的研究，而终于能越来越清楚地认识事物的特征和它们存在的方式，纵观一系列形象，并懂得了把各种不同的有特色的形式加以比较和摹仿，那么风格便成了它所力求达到的最高境界，达到了堪与人类的最大努力相匹敌的地步。

歌德的文艺思想贯彻在他的创作中，在第二次逗留罗马的11个月里，《伊菲格尼》改写完成，四幕戏剧《埃格蒙特》创作完毕，写出了《浮士德》中的《魔女厨房》和《森林洞穴》，搜集了《威廉·迈斯德》的材料，《塔索》也已动笔，还有一篇文稿记述罗马狂欢节的情形。歌德还以高度的热情作画，描绘意大利的风物，不下1000多幅。歌德以这些优秀的成績从罗马这所没有课堂的大学毕业了。他把自己在罗马的转变称为“我的第二个生日。从我踏上罗马的那天起，是真正的再生。”在1786年11月4日给他母亲的信中也自豪地宣称：“我将变成一个新人回

来。”由此可见，意大利之行是歌德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

在罗马写的剧本《埃格蒙特》是歌德一部重要作品，1774年在法兰克福时就已动笔。这部剧本尚有狂飙突进运动的余音，但已经显示出妥协的倾向，因此《埃格蒙特》算是歌德从狂飙突进时期的反抗主题走向妥协主题的过渡作品。

剧本取材于16世纪尼德兰的历史。16世纪的尼德兰包括今天的比利时、一部分法国、卢森堡和荷兰。当时的尼德兰是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比较快的国家，然而却受着封建落后的西班牙的统治，是西班牙的殖民地，16世纪末尼德兰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后，其中一部分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成为荷兰共和国。歌德的《埃格蒙特》便是反映16世纪尼德兰人民反对西班牙异族统治，歌颂民族自由的剧本，其中主人公埃格蒙特、阿尔巴等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但剧中的“历史人物”并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艺术形象。当时的尼德兰人民因不堪天主教与西班牙的统治和压迫正在酝酿暴动，并在一部分地方已经发生了骚动。埃格蒙特伯爵是尼德兰的贵族，他为了自身利益虽也反对异族统治，但反对运用暴力去推翻西班牙人的统治。当一个市民在布

鲁塞尔的广场上发表意见，要尼德兰人民不再屈辱地生活下去，鼓动市民起来推翻异族压迫时，埃格蒙特刚好经过这个广场，于是他针对这个市民的意见向广场上的人们说道：“同胞们，你们应该保持平静……不要再激怒国王，归根到底权力是在他的手里啊！一个老实而规矩的市民，靠勤奋诚实劳动，那么，他到哪里，哪里就有他所要的自由……不要以为权利是可以用叛乱取得的！好好地呆在家里，不要在街上聚众滋事，只有明白事理的人才能做出些大事来。”

西班牙国王菲力普二世听到尼德兰人民骚动的消息后，便指派以残忍闻名的阿尔巴公爵前去镇压。这时埃格蒙特正热恋着一个名叫克莱欣的市民女子，他沉湎于个人的爱情之中，并没有把阿尔巴的到来放在心上，并且还对西班牙国王寄托着不少幻想。阿尔巴知道埃格蒙特在市民中享有威信后，故意以冒犯国王罪把埃格蒙特逮捕，并把这个阿尔巴心目中的危险分子投入了死牢。他的恋人克莱欣获悉埃格蒙特将被处死的消息后，站在广场上号召市民武装起来去解救他们一向敬重的埃格蒙特，因为在她心中，民族解放已经和她的个人爱情是否实现完全结合了。然而市民对她的号召十分冷淡，并流露出害

怕的情绪，克莱欣感到十分绝望，深感她个人无能为力，回到家后便服毒自尽了。埃格蒙特在临刑前的晚上梦见克莱欣成了自由女神，她递给他鲜花，并对他说，他的死可促成尼德兰的独立。最后，歌德让埃格蒙特发表了一段慷慨激昂的英雄独白，让他像《葛茨》中的葛茨一样高呼：“我为自由而死，为自由而生，为自由而奋斗……”。在结尾处，歌德把埃格蒙特塑造成一个自由英雄。剧本最后以埃格蒙特被杀结束。当埃格蒙特被处决时，人们听见人民胜利的旋律已经响起，预示了人民即将迎来胜利。

身为魏玛重臣的歌德，虽远在罗马，但和魏玛的关系一直藕断丝连，他常给卡尔大公写信和报告，表示归国后，要更好地为大公服务，大公也一步步地延长了他的假期，且薪俸照旧，虽然魏玛城中流言四布，说休假中的大臣光挣钱不干活，施泰因夫人虽对歌德出走很是气愤和伤心，但俩人的爱情和友谊不曾中断，时常通信，歌德在意大利的日记便是准备回魏玛给施泰因夫人看的。不曾想回魏玛后两人之间风云突起，这本日记差点被付之一炬，直到1829年，歌德在朋友一再催促下，才将这册日记连带其它的信件和材料加以整理，改名《意大利游记》出版，《意大利游记》是承接《诗与真》的有关歌德的别具

一格的生平文献。这是后话。

罗马虽好，毕竟是异国他乡。歌德心里清楚，他不可能永久地呆下去而有所成就。1788年4月23日，歌德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罗马，取道回国。临行前几天，他再次漫游罗马城，依依惜别，将梵蒂冈的名画和雕塑观赏了又观赏，甚至量了尺寸，请人做了石膏复制品。在《意大利游记》的结尾，歌德以深情幽婉的笔触记录了当时的离情别绪：

但是我告别罗马也许要准备采取特别隆重的方式。告别前的三个夜晚，皓月当空，它像一个魔术师，将清辉洒遍了这个特大的城市，经常被人感觉到，现在变得最清晰可见了。这一个大银盘把大地照耀得如同白昼，即使浓荫隐蔽之处，也因反射而有时发光，根据个人的预测，它使我们处于另一个更平凡、更伟大的世界。

在度过愉快的、有时痛苦的日子之后，我完全只同几位朋友单独交往。我走过长长的科尔索大街（这大概是最后一次），然后登上圆形广场，它好像沙漠里的一座仙宫。奥雷尔的立像唤起了《堂·璜》中那位司令官的回忆，使那位漫游者明白，他作了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情。尽管如此，我从后面的台阶走下来，馆面竖立着塞普提米乌斯·塞韦鲁斯的凯旋门，它

投下十分黯淡的、黑暗的阴影。在萨克拉街的寂静中，平常那么熟悉的东西显得陌生、如同幽灵一般。当我接近斗兽场的崇高的残余并从窗棂向锁着的内部看去的时候，我不可否认，我不寒而栗，回去时更加害怕。

一切大型建筑给人独特的印象，既崇高又可以理解。通过这些接触，我仿佛给我的意大利的逗留作了一个不可忽视的总结。我心情激动，感触很深，这个总结引起的情绪我可以称之为英雄般的悲壮。我真想用诗的形式写成一首悲歌。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怎能不想起奥维德的悲歌呢？他也被放逐，据说是在一个月夜离开罗马的。“我回忆着黑夜！”他远在黑海边的后方，处于悲怆不幸的状态，他的回忆我永远没有忘记。我反复吟诵这首诗，部分诗句能详细地在我记忆中出现：

从那夜我心里感到悲伤，
这是我在罗马最后晚上。
留下了那么多贵重物品，
一想起那一夜泪珠盈眶。

人无声狗不吠夜静悄悄，

月当空引诱我驾车奔逃。
望卢娜去广场看看寺庙，
家神哟离庙近也是徒劳。

十七、克里斯蒂安娜

1788年6月18日，踌躇满志的歌德回到了魏玛，回到卡尔公爵所赐的位于弗劳恩普兰的寓所。在罗马时他就已写信给公爵，建议重新安排他在宫廷中的工作，能让他有更多的精力从事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我多么感谢您给了我这宝贵的悠闲。从年轻的时候起，我的心一直有着这些爱好，除非我达到这个目的，我的心永远不会得到安宁。我跟职务的关系根源于我同您个人的关系，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让一种新的关系从旧有的关系中产生出来吧。我可以确切地说，在这一年半的孤独生活中，我重新发现了我自己。我是什么呢？是个艺术家！除此我还能是什么呀！您将能够做出判断，给予使用。让我在您的身边尽力吧。我已看到这次旅行给了我什么好处，它是怎么使我的身心清澈，照亮我的前途。您到目前为止一直对我十分宽容，所以，在将来也请多多

关照。您给我的恩惠超过我自己能够做的，也超过我能够要求的。我已经见识了这个世界的一大部分美丽的地方，最后，我仍只希望和您生活在一起，生活在你们中间。是的，如果您让我做只有我做得了的事，而把其他的事让别人去做，我将对您更有用，胜过我以前所做的一切。”

歌德自以为满载而归，可以大展鸿图，但魏玛的现实并不因他的暂时离去而有所改变，其时德国的文坛一片混乱，朋友们对他从意大利带回来的新思想并不太感兴趣，歌德不得不感叹道：“我从意大利，从气象万千的意大利回到浑浑噩噩的德国，晴朗的天空一下子成了一片阴霾。朋友们并没有使我得到欣慰，并没有把我重新纳入他们的圈子，而是使我感到绝望。我在他们面前表现出的对远方的、他们不熟悉的事物的兴奋激动以及对失去这些事物的痛苦和感叹好像就是使他们受到了侮辱似的。没有人了解我，没有人能听懂我说的话。”

倒是大公买了歌德一个人情，保留了歌德枢密院成员身份和伊尔美瑙矿山总监职务，但同意他不再掌有实权，同时卸去他财务大臣的重担，改任他所乐于承担的艺术科学事务总监。歌德终于脱下了政治家的外衣，从此一心一意地邀游于文学艺术和自

然科学的天空。

回到魏玛，歌德自然希望马上和施泰因夫人相会。无奈头几天晚上都被宫廷事务拖住，而白天又不好意思登门拜访，怕引起更多的流言蜚语。好在心心相印，上苍也为之感动，他们在一种歌德非常迷信的不可知的力量安排下相会了，歌德这样向爱克曼叙述相会的戏剧性场面：

“我还记得从前我住在耶拿这里头几年中的一段经历。我到这里不久又爱上一个女子。那时我远游回来已经有好几天，因为每夜都被宫廷事务拖住，抽不出时间去看我爱的那位女子。我和她相爱已引起人们注意，所以白天我不敢去看她，怕惹起更多的流言蜚语。等到第4天或第5天晚上，我再也忍不住了，就走上到她家的那条路，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她家门口。我轻步登上楼梯，正准备进她房子里，却听见里面人声嘈杂，显然她不是单独一个人在家。我就悄悄地下了楼，很快又回到黑暗的街头，当时街上还没有点灯。我心里既烦躁又苦痛，在这个城市里四面八方地乱冲乱闯，差不多有一个钟头，又闯回到她家门口，一直在想念着她。最后我终于准备回到我的孤独的房子去，又穿过她家门前，望见她房里灯已熄灭，就自言自语地说，她也许出门了，但是在这黑夜

里她到哪里去呢？我在哪里能碰见她呢？我又逛了好几条街，碰见了许多人，往往碰见的人模样和身材很像她，但是近看又不是她。我当时已深信强烈的交感力，单凭强烈的眷恋就可以把她吸引到我身边来。我还相信我周围有无形可见的较高的精灵，于是我向他们祷告，请求把她的脚步引向我，或是把我的脚步引向她。这时我又自己骂自己说，‘可是你真傻呀！你不想再尝试一次，回到她那里去，却在央求什么征兆和奇迹！’

“这时我已走到大街尽头的空地，到了席勒从前住过的那所小房子，心里忽然想要朝宫殿方向转回去，然后转到右边的小道。我朝这个方向还没有走上一百步，就看见一个女子向我走来，体形完全像我梦寐以求的那个人。偶尔有窗口射出微弱的灯光，照得街道还有点亮。当晚我已多次因体形类似受了骗，所以不敢冒昧地向她打招呼。我们两人走得很靠近，胳膊碰到了胳膊。我站住不动，巡视着周围；她也采取这种姿势。她开口道，‘是你？’我听出她的口音，就说，‘终于见到啦！’欢喜得流泪。我们的手紧握住了。我说，‘哈，我的愿望到底没有落空，我万分焦急地四处找你，我心里想，一定会把你找到。现在我可快活啦！多谢老天爷，我的预感成了现实啦！’她说，

‘你这人真坏，为什么不来？今天我听说你回来已经3天了，今天我哭了一个下午，以为你把我忘掉了。刚才，一个钟头以前，我突然又非常想你，说不出来多么焦躁。有两位女友来看我，老呆着不走。她们一走，我马上抓起帽子和大衣，有一股力量迫使我非出门在黑夜里走走不可，要走到哪里，我也没有个打算。你经常盘踞在我心坎里，我感觉到你一定会来看我。’她说的是真心话。我们紧握着手，紧紧地拥抱着，让对方了解到别离并不曾使我们的爱情冷下来。我陪她走到门口，走进她家里。楼梯黑暗，她走在前面，捉住我的手拉着我跟她走。我说不出地欢喜，不仅因为我终于再见到她，而且也因为我的信心和我对冥冥中无形影响的预感都没有落空。”

就在歌德失去朋友、退出政治漩涡，与施泰因夫人只能暗中约会的当口，一个叫克里斯蒂安娜·乌尔皮尤斯的姑娘不经意地闯进了他的生活。克里斯蒂安娜生于1765年6月1日，其时23岁。他的父亲原是文书科长，生活放荡、嗜酒成性，最终弄得家破人亡，已于两年前去世。她的母亲也早已亡故，她和妹妹只好寄居在叔父家中，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在一家假花作坊当女工。她的哥哥克里斯蒂安·奥古斯行·乌尔皮尤斯，曾在耶拿和埃尔兰根读法科，后

来在纽伦堡当私人秘书，没有正式职业。在歌德去意大利之前，就曾找过歌德，请求帮忙介绍合适的工作，听说歌德归国，又写了一封求助信，让他的妹妹代呈，信中也谈到他两个妹妹的情况，希望歌德给予同情和照顾。

1788年7月12日上午，歌德在居处花园别墅附近的魏玛公国散步，克里斯蒂安娜向他走来，叫了一声“顾问官先生”，随即说明来意，将她哥哥的信递了过去。姑娘的天真浪漫朴素自然霎那间攫住了歌德的心，在歌德眼中，克里斯蒂安娜犹如一朵含苞待放的鲜花，充满了健康的朝气，体态丰满有如鲁本斯油画中的女性。歌德看完信，连忙答应帮忙，同时没有掩饰自己对姑娘的好感，殷勤地指着远处邀请道：“那是我的花园别墅，有空请来玩，地方虽简陋，倒还凉快。”

背靠大树好乘凉。年轻的制花女工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得到一位宫廷大臣，名闻天下的大作家的垂青。不久，她的哥哥的请求得到满足，成了歌德研究植物的助手，后来以写强盗小说著称。她本人成了花园别墅的常客，并很快就和歌德同居了。用歌德自己的说法就是“我结婚了，只不过没有履行仪式而已。”巨大的生活反差使得克里斯蒂安娜以加倍的爱

来回报歌德，她给了歌德一件施泰因夫人永远给不了的至宝——家。一年后，歌德的第一个儿子奥古斯特出世，以后克里斯蒂安娜生的四个孩子都夭折了。

躺在小家庭的温馨里，歌德写了不少优美的爱情诗，著名的有《清晨的悲叹》、《探望》，在抒发感情体验的长诗《罗马哀歌》中，克里斯蒂安娜的形象与罗马少女浮士汀娜的形象交织在一起，成为歌德对克里斯蒂安娜爱情的佐证。《罗马哀歌》中的第 5 首最为人称道，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尽管我爱人夺去我白天的一些时间，
她却把夜晚的时刻交给我作为补偿。
可也不老亲吻，也说些有道理的话；
如果睡魔找上她，我就躺着作遐想。
我常常就在她的怀抱之中作诗，
在她的背上移动手指，悄悄地数着。
六音步诗律。她在可爱的睡乡中透气，
她的气息扇起我内心深处的情焰，
阿摩也挑亮灯火，他想起从前曾给
他的三位大诗人同样效劳的时代。

《1790 年威尼斯警句诗》第 3 首同样表达了对克

里斯蒂安娜的依恋：“——我渴望把我的恋人老是紧抱在怀里，我的心永远紧贴着她的胸，我的头永远搁在她膝上，让我仰望着她可爱的嘴和她的眼睛。”克里斯蒂安娜怀孕后，歌德按捺不住内心的欣喜，他告诉未来的儿子：“再等几天，时序女神就要来领你进入人生的路程，按命运指使，不管你遭际如何，日渐成长的爱儿，——是爱情造出你，也将有爱分给你。”

歌德与克里斯蒂安娜秘密同居，开始并不为人所知，直到第2年2月，才被施泰因夫人的儿子发现而传扬出去，施泰因夫人的震怒可想而知，前面已经提及。堂堂大臣与一个“下贱的”姑娘成亲，让魏玛上层社会的贵族们觉得不可思议，魏玛宫廷里和上流社会里有过多少贵妇淑女曾经对这位风度翩翩的诗人倾心，却没有得到他的青睐，这份荣幸竟然被一个“下贱的”平民姑娘夺去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时间，各种诽谤和责难向歌德倾泻过来，连一些歌德的崇拜者也一想到他俩的结合就感到痛苦，舍弗尔说：“国家永远不会原谅它的伟大的诗人做出这种破坏法律和习俗的行为。”只有卡尔·奥古斯德大公和赫尔德尔夫妇对这桩不相称的结合表示同情和理解。面对污言秽语，歌德表示出极大的蔑视，他骄傲

地宣称：“这姑娘，我追求她时，她很穷，没有衣裳；那时我喜爱她赤裸裸，现在还一样。”他理直气壮地回答那些善意或恶意的提问：“我要怎样的姑娘，你们问我。我已经如愿以偿，这句话言简而意长。我去海滨寻贝壳。在一只贝壳里找到一粒珍珠，现在保藏在心头。”

让人肃然起敬的是，这粒珍珠在 18 年后放出异彩，救了歌德一命。1806 年 10 月 4 日耶拿会战，普鲁士军队败退，拿破仑军队占领了魏玛。住在歌德家的两个法国兵得知自己所住的是仆人的房间大为恼怒，闯进歌德的卧室，拿着武器进行威胁，歌德手足无措，危急关头，被纠缠的克里斯蒂安娜显得机智勇敢，将家中的银烛台送给法国兵，好不容易才将他们打发走。歌德非常感激，决心要以礼仪完善的和法律的方式承认“我这可爱而年轻的女朋友为我的妻子，她为我做了那么多的事，她同我一起度过了眼前的考验。”10 月 19 日在雅各布教堂歌德同她举行了正式的宗教婚礼。

虽然和歌德成为正式夫妇，但出身贫贱的克里斯蒂安娜在宫廷社交中仍然受到冷落和抵制。后来由于叔本华夫人（著名哲学家叔本华的母亲）的携带，她才有机会进入上流社会，随歌德出入宫廷。克

里斯蒂安娜也很通达，并不为自己的社交处境而愁眉不展，相反，歌德将她和她的两个女友称为魏玛的快活女人。

克里斯蒂安娜对歌德越来越重要，她对歌德体贴入微，带给歌德心灵的慰藉，歌德感到须臾也离不开她。1790年3月，歌德再次前往威尼斯旅行，6月份即匆匆返回魏玛，为的就是尽快回到妻子身边。1795年7月15日，歌德在卡尔斯巴德给心爱的妻子写信，信中说：

“聚会很多，并且有意思，人们相互开玩笑和眉来眼去，此情此景使我越发深信：

从东到西，

还是家里最好。

漂亮的波纹绸会使我的宝贝高兴，这里的波纹绸是如此之美，真让人难以选择。还有些你会喜爱的东西。祝好，问候并吻小吉斯特（奥古斯特的爱称）。亲爱的，说到底，依我看，没有任何事物比对你的爱和同你的共同生活更幸福的了。”

歌德常常出门旅行，克里斯蒂安娜为之牵肠挂肚。1793年6月，她给远方的歌德写信，表达自己的思念，信写得很朴素，但深情流露：“在又冷又湿的风雨天气里，白天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你，我亲爱

的，这种天气您一定够受罪的，因此我十分担心，因为我们这儿冷得要命，非生火取暖不可。”在信的结尾，她告诉歌德：“我和小家伙一切都很好，孩子说起您就没完没了，并且总是问我：‘爸爸什么时候再回？’要是知道有你的来信，他总是说：‘爸爸在信里没有说给我一个吻吗？！’……亲爱的，我每时每刻都在想你。我始终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怎样才能把家收拾得井井有条，给你增添一点快乐，因为是你使我这样幸福的。祝好，亲爱的，孩子和我千遍地亲吻您。”可以看出，克里斯蒂安娜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在歌德的熏陶和调教下，信已经写得如此出色了。

1815年1月，克里斯蒂安娜患了一场重病，以后病情时好时坏，终成不治，于1816年6月6日去世，年仅51岁。歌德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的妻子已经接近停止呼吸，她同死神进行着最后的、令人觉得可怕的争斗。将近中午时分她去世了。我感到内心和世界都是一片空虚和死一样的寂静。……夜间12时，我妻子进灵堂，我整天躺在床上。”这天的白天，歌德怀着沉痛的心情眺望窗外，看到乌云遮盖了太阳，写下了一首简短而沉痛的悼亡诗：

哦，太阳啊，你徒然想

透过阴暗的乌云照耀！
我所能尽我余生一切的，
只是为她的死亡哭悼。

后来，迈耶尔在一篇《记歌德》的文中也描述了歌德当时的悲伤情绪：“歌德很珍视、很爱他的妻子……在她临终的病中，他显出最细腻的，不，最焦急的关心……他的丧妻之痛十分深沉，在他的生活中具有重大的影响，一直绵延到他的末日。”

十八、进入科学和艺术王国

歌德既已担任魏玛公国科学和艺术机构的最高行政长官，在其位便积极谋其政。不久他又兼任了魏玛美术院和耶拿大学的总监。1791年他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魏玛宫廷剧院的建设，从建筑式样到经费筹措，他都躬任其劳。建成后剧院的总监一职自然也是非他莫属，这所剧院在歌德的精心经营下短短几年就大放光彩，在整个德国都享有盛名，经常上演一些名剧作家比如席勒的最新作品。1825年3月22日，剧院被一场大火吞噬，爱克曼跑去安慰歌德，歌德向他回顾了剧院往昔的辉煌和自己在剧院里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那确实是个兴盛时期。当时有些重大的便利条件帮助了我们。试想一下，当时令人厌倦的法国文艺趣味风行时期才刚过去不久，德国观众还没有让过分的激情教坏，莎士比亚正以他的早晨的新鲜光辉

在德国发生影响，莫扎特的歌剧刚出世，席勒的一些剧本一年接着一年地创作出来，由他亲自指导，让这些剧本以旭日的光辉在魏玛的剧院上演。试想一下这一切，你就可以想象到当时老老少少所享受的就是这种盛筵，而当时听众是怀着感激的心情对待剧院的。”

爱克曼接着说，“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一辈，总是经常向我赞扬魏玛剧院当时的崇高地位。”

歌德回答说，“我不想否认，剧院当时的情况确实不坏。不过关键在于当时大公爵让我完全自由处理剧院的事，我爱怎样办就怎样办。我不要求布景堂皇，也不要求服装鲜艳，我只要求剧本一定要好。从悲剧到闹剧，不管哪个类型都行，不过一部剧本总要有使人喜见乐闻的东西。它必须宏伟妥贴，爽朗优美，至少是健康的、含有某种内核的。凡是病态的、萎靡的、哭哭啼啼的、卖弄感情的以及阴森恐怖的、伤风败俗的剧本，都一概排除。我担心这类东西毒害演员和观众。”

“我通过剧本来提高演员。因为研究和不断动用卓越的剧本必然会把一个人训练成材，只要他不是天生的废品。我还和演员们经常接触。我亲自指导初步排练，力求每个角色显出每个的意义。主要的排练

我也亲自到场，和演员们讨论如何改进。每次上演我都不缺席，下一次就把我认为不对的地方指出来。

用这种办法，我使演员们在表演艺术方面精益求精。但是我还设法提高整个演员阶层在社会评价中的地位，把最好的、最有希望的演员们纳入我的社交圈子，让世人看出我把他们看作配得上和我自己交朋友。结果其他魏玛上层人士也不甘落后，不久男女演员们就光荣地接纳到最好的社交圈子里去了。通过这一切，演员们在精神上和外表上的教养都大大提高了。”

剧院失火后，歌德很快拟定了重建计划，并建议剧院在星期天也照常演戏以增加收入。市民们忙碌了一周，在星期日的晚上与其挤在乡村小酒馆里跳舞、喝啤酒，倒不如到剧院去享受高尚的乐趣。农夫和小业主乃至附近小市镇的职员和殷实户，也觉得星期天是个到魏玛去看戏的很合适的日子。此外对于既不进宫廷，又不是高门大第或上层社团的成员的人们来说，星期天在魏玛一向是个最沉闷无聊的日子，一些孤零零的单身汉就不知道到哪里去才好。可是人们总是要求让他们每逢星期天夜晚有地方可去，开开心，忘掉一周来的烦恼。可见，星期日演戏有着广泛的观众基础。其实，星期天准许演戏是符合

魏玛以外其它德国城市的老习惯的，所以歌德的想法得到完全赞成并很快得到魏玛宫廷的批准。但大公对重建剧院计划花费巨大不满，认为一座剧院用不着建筑得堂皇壮丽，建剧院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赚钱。歌德认为大公言之有理：“这个看法乍听起来倒是有点唯利是图，可是好好地想一想，也决不是没有较高尚的一面。因为一座剧院不仅要应付开销，而且还要赚取余钱，以便把一切都办得顶好。它在最上层要有最好的领导，演员们要完全是第一流的，要经常上演最好的剧本，以便每晚都达到满座。不过这是用很少几句话来说出很多的内容，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就连莎士比亚和莫里哀也没有其它看法。他们也首先要用剧院来赚钱啊。为了达到这个主要目的，他们就必须力求一切都尽善尽美，除了一些很好的老剧本以外，还要偶尔演一些崭新的好剧本来吸引观众，使他们感到乐趣。禁止《伪君子》上演对莫里哀是个沉重的打击，这与其说是对作为诗人的莫里哀，倒不如说是对作为剧院老板的莫里哀。作为剧院老板，他得考虑一个重要剧团的福利，要使他自己和演员都有饭吃。也就是说，剧院既要注重社会效益，也不能忽视经济效益，应当二者并举。

为达到这一目的，在剧院的管理上歌德确实煞

费苦心，试图制订严格的奖惩制度，他解释说：“我们的剧院规章有各种各样的处罚条文，但是没有一条酬劳和奖励优异功勋的规程。这是一个大缺点，因为每犯一次错误，我就看到要扣薪，每次做了超过份内的事，我也就应该看得到酬劳，只有每个人都肯比份内事多做一点，剧院才会兴旺起来。”歌德这一套生意经显出商人的精明。

不唯如此，他还为剧院专门写作剧本。戏剧在西方文艺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先后出现过几次高峰，第四个高峰便是德国歌德时代，由此也可见歌德经营魏玛剧院的重大意义。

这一时期，歌德创作的剧本以五幕诗剧《托夸多·塔索》最为成功，这部诗剧是1780年开始写作、1789年完成的。剧中主人公塔索实有其人。托夸多·塔索（1544——1595）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诗人，当时意大利还处于分裂状态，他在一个叫费拉拉的公国宫廷中服务，后来因与封建宫廷冲突，以致神经失常，并被公爵囚禁多年。据传说，塔索精神失常是因为塔索爱上了公爵阿尔封索二世的妹妹列奥诺拉，求爱遭到了拒绝。歌德的这部剧本即取材于这一传说。全剧总共5个人，情节十分贫乏，更多的是用内心独白来表现各个人物的心灵活动。文学史对这

一剧本的批评也主要说它缺乏情节。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曾批评《塔索》不是戏剧，因为黑格尔认为戏剧的重点和要旨在于行动，而《塔索》却把重点放在人物的内心表述上。这个剧的剧情十分简单：塔索写完了他的名作——史诗《解放了的耶路撒冷》后，把它呈献给费拉拉的公爵阿尔封索，阿尔封索让他的妹妹列奥诺拉为塔索带上桂冠。这时公国的首相安东尼奥正从罗马成功地办了公务回来，安东尼奥是一个从事实际公务的人，因此他并不看重塔索的诗人的幻想和热情，不免对诗人所得的这一荣誉表示轻蔑，这导致了安东尼奥和塔索之间的冲突，最后由口角发展到拔剑决斗的境地。双方都受到了公爵的责难，但由于是塔索首先拔剑，因此公爵禁闭了塔索。在禁闭期间，安东尼奥奉公爵之命前来与塔索和解。于是塔索要求安东尼奥代他向公爵提出他要离开费拉拉公国的申请。公爵最后答应了他的要求。但是当塔索想到他将要和那些给了他荣誉并受他敬爱的人分离时，激动的情绪反而加剧，他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当他跑到列奥诺拉那里时，他不但不是去向她告别，反而向她表白了一直埋藏在心底的爱情。这爱情表白自然遭到了公主的拒绝，塔索也因此遭到众人的冷淡和非议。这时同情他的只有沉着稳重

的安东尼奥，也只有在这时，塔索才了解了这位与世无争的安东尼奥，并与他和解。

这个剧本清楚地表明歌德这一时期与现实的妥协倾向。歌德在这部作品中通过塔索与安东尼奥的和解肯定了与环境妥协、与世无争、为宫廷服务的人，也肯定了从事实际事务者的价值。塔索求爱的失败则表示一个人应该经常进行自然克制，不要去寻求得不到的东西——这一思想正是歌德这一时期内心世界的心声，即放弃狂飙突进时期诗人的幻想与热情！

歌德在和爱克曼谈话时，曾这样论述他的《塔索》：“我有塔索的生平，我有自己的生平，当我把这两个各有其特点的奇妙形象放在一起时，于是在我的面前就产生了塔索的形象……此外，宫廷生活和恋爱纠纷在魏玛也跟在费拉拉完全一样，关于我的描绘，我可以说句真话，这部剧本是我的骨头中的骨头，我的肉中的肉。”塔索的费拉拉就是歌德的魏玛，塔索便是歌德。这一段自白说明歌德的《塔索》确实反映了他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化。

尽管老朋友调整了与歌德的距离，但又有新朋友围绕到歌德身旁。迈耶尔于 1791 年来到魏玛并在歌德家中一直住到 1803 年。年轻的哲学家谢林前来

耶拿任教，他以其进步的自然哲学观点而受到歌德的赞赏，却为落后的教会所不容。

歌德对自然科学的热爱仅次于文学创作，他和魏玛自然科学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关注着自然科学的最新进展，他坦露自己的心迹说：“我的气质促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热衷于自然科学”，在他看来“艺术创作、自然科学研究乃至数学运算，一切都同根本真理有关，它的发展在思辨中不像在实践中那样容易看出来，因为实践乃是精神感受到的事物的试金石，是内在感觉认成是真实事物的试金石。坚信自己决心的价值的人，一旦转向外界，要求世界不仅只是应该同他的想象协调一致，而且要求世界必须服从他、顺从他的想象，进而实现他的想象；之后，他才得出一条重要经验：不是他的行动有误，就是他的时代未能认识到真理。”对于歌德来说，文艺创作和自然科学这两条不同的道路，都通向一个目标——根本真理。

从意大利返回魏玛后，歌德在自然科学方面比文艺创作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他对植物学、颜色学、人体解剖学兴趣最为浓厚。1790年4月，为迎接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母后从意大利回国，歌德前往威尼斯迎接，在威尼斯的海滩上，歌德偶然拾到

一个羊头骨。歌德仔细观察羊头骨，意外地发现它和人的头盖骨一样，都是从变化着的脊椎骨产生的，从而证明了头骨和脊椎骨之间的进化关系。

在此之后，歌德开始《植物的变形》一书的写作，他在先前关于“原始植物”的构想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所有植物发展过程的进化体系，即植物变形体系。歌德认为，植物的所有部分都是从一个唯一的基本器官发育而成的，即由茎上的结节生发出叶子。具有完善形态的植物都是经过逐步地演进才形成的。而植物种类的多样性则可以由植物形态变化过程中所产生不同的变种来加以说明。“不管植物是吐芽、开花或者结果，它一直具有同样的器官，这器官具有多样的规定性，并且常常发生形态上的变化，以适应大自然的要求。这器官从茎上延伸出去，就成为叶子，并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状态；这器官收敛，则成为花萼，它重新延伸开去，就成为花瓣，它最后一次收敛，成为生殖器官，最后长大就成为果实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歌德研究植物变形，运用了非常先进的观察和推演的科学方法，他对自己的研究方法很得意：

“我研究植物变形，是走自己特有的道路。我搞这门学问，就象海歇尔发明他的星宿。海歇尔太穷，

买不起望远镜，不得不自造了一架。但是他的幸运就在此。他自造的望远镜比以往的一切望远镜都好，他就用此作出他的许多重大发现。我走进植物学领域是凭实际经验的。现在我才认识清楚，这门科学在雌雄性别的形成过程上牵涉到的问题太广泛，我没有勇气掌握它了。这就迫使我用自己的方式来钻研这门科学，来寻求适用于一切植物的普遍规律，不管其中彼此之间的差别，这样我就发现了变形规律，植物学的个别部门不在我的研究范围之内，我把这些个别部门留给比我高明的人去研究。我的唯一任务就是把个别现象归纳到普遍规律里。”

1806年，歌德又撰写了《动物的变形》一书，与本书相呼应，阐述了相同的基本原理：一切形态都是运动着的、变化着的、消失着的，形态学就是变化学。

歌德对自然科学的迷恋持续了一辈子。他晚年谦逊但不无骄傲地评价了自己在这方面的工作：

“我对各门自然科学都试图研究过，我总是倾向于只注意身旁地理环境中一些可用感官接触的事物，因此我不曾从事天文学。因为在天文学方面单凭感官不够，还必须求助于仪器、计算和力学，这些都要花毕生精力来搞，不是我份内的事。

如果我在顺便研究过的一些学科中作出了一点

成绩，那就要归功于我出生的时代在自然界的重大发明上比任何其它时代都更丰富。在儿童时期我就接触到弗兰克林关于电的学说，他当时刚发现了电的规律。在我这一生中，一直到现在，重大的科学发明一个接着一个出现，所以我不仅在早年就投身到自然界，而且把对自然界的兴趣一直保持到现在。”

“就在我们指引的道路上现在也已有人迈出了前进的步子，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我好比一个人迎着晨曦前进，等到红日东升，它的灿烂光辉会使他不由自主地感到惊讶。”

有一件事足以说明歌德对自然科学的迷恋和崇奉程度。1830年8月2日，法国发生七月革命，波旁王朝被推翻的消息传到魏玛，人们为之轰动，爱克曼午后去看望年迈的歌德，一进门歌德就大声地问他：“你对这次伟大事件是怎么想的？火山终于爆发啦，一切都在燃烧，从此再不会有关着门谈判的情况啦！”爱克曼的有关这次革命的回答却不能令歌德满意，原来歌德所指的“伟大事件”，并非“七月革命”，而是当时法国两个著名的解剖学家有关分析法和综合法的争论在法国科学院公开化了。在歌德看来，这场学术争论远比政治重要，他对爱克曼说：“这件事是极重要的，我听到7月19日会议（指法国

科学院会议)的消息时心情多么激动,是你无法想到的。”

这并非不可思议,歌德对现实政治的冷漠,有着极为深刻的思想根源。对暴力革命的怀疑和否定正是歌德热衷自然科学的原因之一,歌德一方面对腐朽没落诸如法国波旁王朝的黑暗政治表示愤慨和不满,一方面又寄希望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通过进化来实现变革。就在歌德回到魏玛的第二年即1789年7月14日,法国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震撼法国,波及整个欧洲。德国也随之出现了一些革命行动,当时的进步文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大都热烈赞美,赫尔德尔即因为赞同法国革命而失宠于卡尔大公,但歌德冷眼旁观,很不以为然,他不合时宜地指出了这种革命存在的危险性,即解脱了对人的革命本能的约束,为此,在1791年至1794年他相继创作了《大科夫塔》、《市民将军》、《受鼓动的人》和《德意志流亡者谈话录》等剧本,尝试对这些历史事件作出自己的反应。难能可贵的是,歌德在剧本《受鼓动的人》中承认,维护人民的利益自不待言,下层阶级发动革命是权贵们多行不义的结果。这部剧本写于法国革命时期,歌德后来对爱克曼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它看成当时我的政治信仰

和自供”。爱克曼附和地提到《埃格蒙特》，认为没有哪部德国剧本讲人民自由比这部剧本讲得更多了，歌德就此进一步阐述了他对革命的看法。这段谈话非常出名，是歌德政治思想的总纲：

“人们有时不愿如实地看我，宁愿避开一切可以显示我的真相的那些光的角度。说句真心话，席勒比我更是一个贵族，但是说话比我远为慎重，却很幸运被人看作人民的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我衷心为他庆幸，我想到我以前许多人的遭遇也不比我好，就聊以自慰了。

“说我不能做法国革命的朋友，这倒是真话，因为它的恐怖行动离我太近，每日每时都引起我的震惊，而它的有益后果当时还看不出来。此外，当时德国人企图人为地把那些在法国出于必要而发生的场面搬到德国来，对此我也不能无动于衷。

“但是我也不是专制统治的朋友。我完全相信，任何一次大革命都不能归咎于人民，而只能归咎于政府。只要政府办事经常公正和保持警惕，及时采取改良措施来预防革命，不要苟且因循，拖延到非受制于下面来的压力不可。这样，革命就决不会发生。

“我既然厌恨革命，人家就把我叫做‘现存制度的朋友’。这是一个意义含糊的头衔，请恕我不接受。

现存制度如果贤明公正，我就没有什么可反对的。现存制度如果既有很多好处，又有很多坏处，还是不公平、不完善的，一个‘现存制度的朋友’就简直无异于‘陈旧腐朽制度的朋友’了。

“时代永远在前进，人世间事物每过 50 年就要换一个样子。在 1800 年还很完善的制度，到了 1850 年，也许就已变成有毛病的了。

“还有一点，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只有植根于本土、出自本国一般需要、而不是猴子式摹仿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对于某一国人民处在某一时代是有益的营养，对于另一国人民也许就是一种毒药。所以想把不植根于土、不适应本国需要的外国革新引进来，这种企图总是愚蠢的；而一切有这种意图的革命总是不成功的，因为这种革命没有上帝支持，上帝对这种胡作非为是要制止的。但是一国人民如果确有大改革的实际需要，上帝就会站在他们一边，这种改革就会成功。上帝显然曾站在基督和他的第一批门徒一边，因为新的博爱教义当时是人民的需要，上帝也显然曾站在路德一边，因为清洗被僧侣篡改过的教义也还是一种需要。以上这两种伟大力量却都不是现存制度的朋友，无宁说，都生动地渗透着一种信念：陈旧的酵母必须抛开，不能再让不真实、不公正

的邪恶事物这样流行和存在下去。”

身为一位书生，对法国革命有着自己独特的评断的歌德不久就卷入法国革命所引起的欧洲战争漩涡之中。1792年2月7日，奥地利、普鲁士两国与法国王朝流亡者联合，缔结反对法国的大同盟，准备推翻法国革命政权。4月20日，法国向奥地利宣战。奥普联军在和法国军队交火中一败涂地。当时卡尔·奥古斯特公爵正指挥一个普鲁士军团，歌德随军到了前线。歌德后来写了《进军法兰西》一书来记述这一段非比寻常的经历。1792年9月20日，奥普联军在瓦尔米城下被法国革命军击败，文学家的歌德以军事家的眼光、战败者以战胜者的口吻预言了神圣罗马帝国必将崩溃：“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法国人按兵不动……我们的人撤下了火线，甚至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十分惊慌失措的情绪在军队中蔓延，而早晨人们还考虑的只是要把所有人都消灭掉。当然我自己是出于对这位统帅即对冯·布伦瑞克公爵的无限信任，才来参加这一场危险的征讨的；但是现在每个人都不能自主自制，失去了自我，如果出了什么事，就只能引来诅咒或者谩骂。当夜幕降临时，我们很偶然地围成了一个圆圈，不允许像往常那样在圆圈中央燃起营火，人们大多都沉默着，只有几个人

在交谈，但每个人都不知道对战况该怎么思考，该怎么判断。终于有人喊我，问我是怎样想的。我通常总说些格言警句给这些人们提神。这一次我说：‘此时此地开始了世界历史的一个新时代，你们可以说你们是目击者。’”

1793年5月，美因茨城响应法国革命，成立了德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共和国，自然为普鲁联军所不容，歌德以观察员的身份随从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奔赴战场，在美因茨与法国占领军激战，这一回轮到法国人惨败了，7月22日法军缴械投降。歌德写了《围攻美因茨》一书来记述这次战斗的始末，并表现出胜利者的宽容大量，以及对于恢复良好秩序的向往。战败的法国军队撤离时，美因茨的居民乘机袭击一家在军队保护下逃离的雅各宾党人，歌德正好路过，马上出面干涉，他推开愤怒的人群，让落难的雅各宾党人一家逃之夭夭了。陪同歌德的一位朋友对此举颇为不解，歌德解释说：“难道你们不认为我把公路房前这块地方给你们搞得这么有秩序是件好事吗？如果到处一片混乱，人人怒发冲冠，个个火冒三丈，我看谁也无裨益，即使那个俱乐部党人可能不配占有他得意洋洋掠夺的财产。”然后又加重语气说：“我宁愿犯一桩不义之罪，也不愿忍受混乱，这就是

我的本性。”可以说，歌德的这一主张既超越了战争，也超越了民族，不过有点是非不分罢了。

说来有趣，即使身在战场，炮弹横飞，歌德还有闲情逸致观摩自然，探索科学，有一次，他在一个有水的弹坑里发现一些小鱼，鱼在阳光照耀下颜色发生变化，他不禁看着了迷。又有一次，大炮轰鸣，不少士兵因此得了“炮热症”，医生束手无策，歌德听说后，也亲自到前线体验，想弄清真相，为科学而把个人安全置之度外。

战争结束后，歌德重又回到科学和文学的生活氛围之中，打算在“安静的工作室里持之以恒，细心地照管好科学和艺术的神圣之火，哪怕它只剩下了几点火星和一堆灰烬；这样，在战争的黑夜过去、和平的日子来临的时候，就不至于缺乏必不可缺的普罗米修斯火种”。他为实现自己的宏愿而努力。1794年7月底，他完成了《平民将军》的写作。不久，又将德国古老的动物叙事诗《列那狐》改写成六步韵诗，通过各种拟人的动物对现实生活中官僚、骑士、僧侣等人的丑恶行径进行讽刺和揭露，对受压迫的农民、手工业者、小市民寄予深切的同情。当然，植物学、光学等自然科学研究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1794年7月，歌德应邀前往耶拿出席自然研究

会的会议。这次会议本身并无特别重要的意义，但却揭开了歌德一生中极为重大的一幕：他和席勒坐到了同一张桌边，开始了一段影响德国文学史的伟大友谊。

十九、和席勒建立伟大的友谊

伟大的诗人、剧作家席勒是德国文学史上和歌德并驾齐驱的人物。他 1759 年出生于内卡河畔的马尔巴赫，父亲是外科医生，后来到部队当军医。席勒幼年接受一名善良的牧师的耐心教育，后来进入拉丁语学校读书，名列前茅。年仅 13 岁进入军校，先学法律，后改医学，在管束极严、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地方度过了 8 年青春韶光，毕业后于 1780 年又承父业当上一名军医，同年写成一部反抗封建专制暴政，充满狂飙突进运动精神的剧本《强盗》，第一次显露出他的文学天才。1782 年他从斯图加特来到曼海姆，靠朋友资助生活，1 月 13 日，《强盗》一剧首次在曼海姆公演，获得巨大成功，使席勒信心倍增，很快又完成了另一部享誉世界的杰作《阴谋与爱情》。1785 年在莱比锡写就名诗《欢乐颂》。1787 年他首次到魏玛，拜访一些著名诗人，受益很大。1789 年由歌德介

绍到耶拿大学担任历史教授。

在 1794 年之前，虽然歌德和席勒多次会面，但两人由于社会地位悬殊，少有机会坦诚交流，所以关系很平常，甚至互相瞧不起。文人相轻，有时还相讥。席勒并不把年长位尊声名比自己显赫的歌德放在眼里，他不无骄矜地写道：“过于经常地同歌德来往，会使我感到不愉快。他与他的最亲密的朋友也从无心心相通之时，他令人难以捉摸，我认为，他实际上是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他有一种抓住人心的才能，他用略微的经意或者用热切的关注，能把人们牢牢地吸引在自己身边。而他自己却无拘无束、怡然自得。他宣称他的生存是对别人有益的，但只是像一位神灵那样，不把任何东西赐予他人。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有心计的处世方式，可算得上是一种完全的、最高水平的自私自利的享受。人们不应该让这样的人在自己身边存在。正因为此，我恨他，尽管我完全真心实意地喜爱他的精神，并想到他的伟大之处。我把他看作一位飘飘然故作姿态的女人，只有让她养个私生子，才能使她在世人面前感到羞耻。他在我身上唤起的是一种恨和爱相混杂的十分异样的感情，这种感情与布鲁图斯和卡西尤斯反对凯撒的感情没有什么两样。我也许能扼杀他的精神，而且

又能衷心地喜爱他的精神……他的头脑是成熟的，他对我所作的评价，与其说是对我的偏袒，不如说是对我的敌意。因为我只愿听对我所作的真实的评价，所以，在我所认识的人中间，他恰好能作到这一点。我喜欢在他周围细心倾听，因为我本人从不向他询问他对我的看法。”

而在歌德这一边，写出了《强盗》与《阴谋与爱情》的席勒，不过是一个有点才气的毛头小伙子罢了，似乎可以不值一提，不屑一顾，尤其席勒是康德哲学的门徒，更让歌德感到不快《康德虽比歌德年长，但歌德直到晚年才接受他的哲学思想》，但在两人内心深处，都渴望了解对方，毕竟，他们俩都同样经历过“狂飙突进”运动，志趣相通，终于共同的历史使命把他们的双手握到了一起——由于他们的合作，有意识地走由浪漫主义转到古典主义的道路，不但把各自的文艺创作推进到高度的成熟，而且也替德国建立了一种辉煌的民族文学。

正是在耶拿自然研究会的会议上，两人不期而遇，会后，歌德陪送席勒回家。由于一直相互隔膜，两人小心翼翼地互相接近，话题自然先从会议开始。歌德记录了谈话的情形：

“开始进入交谈，他（指席勒）好像对很多学术

报告都很有兴致，然而他很有见识地注意到，用这样一种把自然割裂得支离破碎的方法来研究自然，是决不会引起对研究自然有兴趣的常人的兴致的。我非常赞同他的意见。

我回答说：这种方法也许对行家里手来说是十分得心应手的，但是也有不把自然分割成一个个单一部分的另外一种办法，而是努力把它的有效性和生动性从整体到各个部分都加以描述。他希望我对这种方法加以解释，同时他也并不掩饰他对这一方法的怀疑。他并不相信如我所断言的那样，这种方法是从经验得出来的。

我和他走向他的住处，只好进屋把谈话继续下去；于是我兴致勃勃地向他讲述了我的植物变形学说，并用速写式的线条，给他勾勒出一种有象征性的植物的图形，他以极大的兴趣听我说、看我画，表现出很强的理解力。我讲完了，他却摇摇头说：‘这不是经验，这是一种观念。’我一下子愣住了，感到很尴尬，因为我看到使我们俩分道扬镳的界限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清楚。我又想起了《优美与庄严》中的论断，旧有的怨恨涌上心来，但我约束住了自己，并回答说：‘如果我有观念甚至亲眼看到了它而并不自知，这也挺有趣。’

席勒比我更有生活的智慧，也比我更善于待人接物。由于他当时正要出版《祈祷》，因而更想同我搞好关系而不是同我对抗，于是他便作为一个有教养的康德主义者对此作了回答；然而由于我固执的现实主义态度，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进行了很长时间，然后停止了，我们俩谁也不认为自己是胜利者，但都认为自己不可征服。他说：‘以一种观念为衡量尺度的经验怎么能算得上是经验呢？因为观念的特征就在于它并不能与经验完全相等。’这话使我十分不快。如果他把我所表述为经验的东西看作是一种观念的话，那么，我们俩人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中介的东西、相关的东西！我们之间的交往就这样迈出了第一步。席勒的吸引力是巨大的。他能把所有接近他的人都牢牢地吸引住。”

虽然这次谈话并不顺利，席勒仍摆出一副傲慢的姿态，但他觉察到歌德的态度是友好和真诚的，席勒已开始清醒地意识到了在心灵上他需要坚持康德的理念的哲学，在前进的道路上无疑更需要和歌德结成伙伴的关系。经过深思熟虑，他在8月23日给歌德写了一封长信，坦露了自己对歌德的全面见解，对歌德作了正确而深刻的分析评价：

“长期以来，尽管相距遥远，但我已经对您的思

想历程从旁观察了很久，而且怀着不断重新激发起来的钦佩心情注视着您所描绘的道路。您在寻求自然界的必然物，但却是在一条最困难的道路上寻求，面对这样一条路，每个比较软弱的人一定会望而却步。为了弄清楚个别事物，您把全部大自然作为研究对象；从大自然各种现象的总体上，您探索能以解释个体的原理。为了最终用整个自然大厦的材料创造性地把一切事物中最复杂的人建立起来，您从简单的组织向着更复杂的组织一步一步地攀登。您试图通过对大自然的模仿创造人，从而深入钻研隐藏在其中的技巧。这是一个伟大而真正富有英雄气概的思想，它充分表明，您的精神如何把它的全部丰富的想象集合在完美的统一之中。您也许从来不曾希望您的生活将会达到这样一个目标，但是，比起其它任何一条路，也只有选择这条路更加可取。您像《伊利亚特》中的阿喀琉斯一样，在英雄和庸人之间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如果您是个希腊人，哪怕生下来只是个意大利人，如果从婴儿时代起，秀美的大自然和理想化的艺术就已经把您包围起来，那末您的道路就会无限地便捷，也许这条路完全成了多余的……但由于您生来便是个德国人，而在这种北方作品中您的希腊精神已被抛弃，因此，您只能要末把自己变成一

个北方艺术家，要末通过思考力的帮助来补偿因现实条件而想象力有所不足的那一部分，而这就等于从内部，通过合理的途径创造出一个希腊。……我大概就是这样来考察您的思想路径的，我的判断是否正确，您自己知道得最清楚。”

在信的结尾，席勒邀请歌德为自己主持的新杂志《祈祷》撰写稿件。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席勒终于伸出了自己真诚的友谊之手。

几天后，歌德收到了席勒的长信，欣喜的心情不言而喻。他迅速回信，再次坦陈自己的心迹和席勒赋予他友谊的重大意义：

“我的生日就在这一星期，您的信是我收到的最使我感到高兴的礼物。在您的信中，您伸出了友谊的手，对我的生活进行了总结，您对我的关心，鼓舞着我勤奋地、更富有生气地去使用我的力量……我本身和我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我都将以欢乐的心情告诉您。因为我强烈地感觉到，我的事业远远地超越于人的力量之所及，超越于人在世间生存的有限时间，所以，我想把一些工作转交给您，从而，不但使它们得到继续，而且使它们获得生存。如果您今后进一步了解我，您就会发现，我身上存在着一种迷惘和踌躇，我虽然清醒地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但却不能主宰

他们。那时您将明白，您的关心对我有多么大的益处。当然，这种迷惘和踌躇的现象更多地是存在于我们的本性之中，只要它们不是太专横，我们倒也乐于受其控制。”

两个巨人就这样微笑着共同站到德国文学史的一条新的起跑线上。

为了使自己的心灵更贴近歌德，席勒从耶拿赶往魏玛，住在歌德家中，和歌德朝夕砥砺，共同切磋了14天，描绘繁荣德国民族文化的蓝图。之后两人频繁通信，探究有关文学主张和具体文学问题。歌德不久就践约在席勒主持的杂志《祈祷》上发表了《德意志流亡者谈话录》和《罗马哀歌》的部分章节，以示对席勒工作的支持。

当时的德国，充满了庸俗鄙陋的市民习气，要想建立德国的民族文学，真是难上加难。《祈祷》杂志和《罗马哀歌》不时受到各种恶毒攻击。席勒在1795年11月4日给歌德的信中分析了当时的德国文坛状况：“依我看来，我们的思想和冲动，我们的社会、政治、宗教和科学的现实情况都显然是散文气的，与诗对立的。在我们的全部生活中这种散文压倒诗的形势我看是巨大的，带有决定性的，以至诗的精神不但不能统治散文而且不可避免要传染得散文的病。因

此我看不出天才有什么脱险的办法，除非抛弃现实的领域，努力避免和现实建立危险的联系，和它完全断绝关系，因此我想诗的精神要建立它自己的世界，通过希腊神话来和辽远的不同性质的理想的时代维持一种姻缘，至于现实则只会用它的污泥来溅人。”

于是，席勒想学鸵鸟，把头埋进沙子去躲避猎人，可见改革的阻力是多么巨大，歌德在著名论文《文学上的无短裤主义》一文中，同时描述了当时德国文坛作家的酸辛窘迫，斥责过激派“无短裤主义者”对他的吹毛求疵。在这篇论文里，歌德分析了民族文学建立的必要条件：

“一个古典性的民族作家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生长起来的呢？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在他的民族历史中碰上了伟大事件及其后果的幸运的有意义的统一；他在他的同胞的思想中抓住了伟大处，在他们的情感中抓住了深刻处，在他们的行动中抓住了坚强和融贵一致处；他自己被民族精神完全渗透了，由于内在的天才、自觉对过去和现在都能同情共鸣；他正逢他的民族处在高度文化中，自己在教养中不会有什么困难；他搜集了丰富的材料，前人完成的和未完成的尝试都摆在他眼前，这许多外在的和内在的机缘都汇合在一起，使他无须付很高昂的学费，就可

以趁他生平最好的时光来思考和安排一部伟大的作品，而且一心一意地把它完成。只有具备这些条件，一个古典性的作家，特别是散文作家，才可能形成。”

这里歌德总结了西方从希腊以后各民族文学的历史经验。可注意的有这几点：第一，民族文学的建立不能只靠一些孤立的各走各路的个别作家，而要靠全民族，它必须反映全民族思想的伟大、情感的深刻以及行动的坚强和融贯一致；其次，民族文学的建立是要和一个民族的伟大历史时代联系起来的，这民族要处在高度文化中而且在进行着伟大的历史运动，所谓“伟大的事件及其后果的幸运的有意义的统一”就是指历史运动顺着规律进展，产生推动历史前进的效果；第三，民族文学要植根于本民族的过去文学传统和历史遗产，有前人的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可以作为教训，而且能更深刻地体现民族特点。有了这些条件，具有天才的作家才容易培养起来，不会在教养方面感到贫乏或困难，而且安定的物质生活也可以保证他们专心致志地进行创作。

在歌德和席勒的共同推动下，德国民族文学的巨轮缓缓起动了。这标志着德国古典主义进入繁荣昌盛时期。

在此之前，1786年9月，歌德离开魏玛，只身前

往意大利，是德国古典主义萌芽的征兆。他在意大利完成的《埃格蒙特》和《塔索》都是古典主义的力作，席勒的《强盗》也是古典主义的代表作。德国古典主义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有其自身特点：

第一，德国古典主义产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在政治动荡中，其作品表现对专制主义统治的痛恨与憎恶并不激烈。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方式，歌德是难以接受的。他主张人类社会应和自然界一样，随着时间的前进而变化。以他为首的德国古典主义力求在精神生活中创造资产阶级和谐的生活理想。这之中又留有贵族化的痕迹。德国古典主义的代表们主要反映的是完整、和谐的人的形象。他们认为，在个人与社会、个人与法理发生矛盾时不应严惩，而应宽容，其理由是人类历史愈向前发展，人文主义精神应愈充实完美。

第二，德国古典主义文学遵从温克尔曼的理论，特别是依据他的《古代造形艺术》，其中所述的希腊古典理想，即既有感情的激烈气氛又有心灵的节制。这是使人有高贵的灵魂和道德的理想。同时希腊古典主义富有民间文艺气息，生动自然，为德国古典主义文学的代表所欢迎。

第三，德国古典主义文学要求内容积极健康、语

言纯洁、形式完美，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他们对人的完美的刻画，使人对未来怀抱憧憬、理想，这既是对现实的专制主义的批判，也是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追求。

德国古典主义文学大约由 1789 年至 1830 年与浪漫主义相交错。歌德和德国古典主义相始终。

要指出的是，在推动巨轮沿着古典主义道路前行的途中，歌德和席勒两个巨人之间也并非没有分歧。不过，在共同目标的引导下，两人观点虽有不同，但能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1830 年 3 月 21 日，歌德怀着友好和怀念的心情，向爱克曼回顾在一个具体问题上他和席勒的不同观点：

“古典诗和浪漫诗的概念现在已传遍了全世界，引起了许多争执和纠纷。这个概念原来是由席勒和我两人传出去的。我主张诗要从客观世界出发的原则，认为只有这种诗才是好的。但是席勒却用完全主观的方式写作，认为他走的才是正路。为了针对我而辩护他自己，席勒写了一篇论文，叫做《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他要向我证明，我违反了自己的意愿，实在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说我的《伊菲格尼》由于感伤气味太重，并不是古典的或符合古代精神的，如某些人所想的那样。许莱格尔兄弟拾取了这个概念把

它加以发挥，以至它在全世界都传遍了，人人都在谈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是 50 年前根本没有人想到的问题。”

存小异而求大同，这一类的分歧从来没有影响这一对战友向着既定目标前进的步伐。说来有趣，在对写作环境的要求上，席勒还有一个迥异于歌德的习惯，歌德不明原委，吃了一次不大不小的亏。有一天，歌德去拜访已移居魏玛的席勒，适逢席勒外出，歌德坐在席勒的书桌旁边等他回来并顺手写点杂记。坐了不久，歌德感到身体不适，愈来愈厉害，几乎发晕。歌德不知道怎么会得这种怪病，最后发现身边一个抽屉里发出一种怪难闻的气味，歌德急忙把抽屉打开，发现里面装的全是烂苹果，不免大吃一惊。随即走到窗口，呼吸了一点新鲜的空气，才恢复过来。这时，席勒夫人进来了，告诉歌德那只抽屉里经常装着烂苹果，因为席勒觉得烂苹果的气味对他有益，离开它，席勒就简直不能生活，也不能工作。对朋友的这种怪癖，歌德只好敬而远之。

为了实现共同拟定的蓝图，两个人更加勤奋地写作，试图以实践的结果带动德国民族文学的发展。席勒不顾一切地把歌德从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拉回到诗歌创作的王国。歌德打算以警句诗的形式来展示

他们的文学倾向，促进德国的文化讨论，席勒拍手叫好，一锤定音。于是他们俩共同创作了近 1000 首警句诗，其中约有 500 首发表于 1791 年席勒主持的《诗歌年刊》。这组诗中有不少发泄了对持有不同文艺观的评论家和艺术家的愤慨不满，对社会上的世俗习气和文艺界鄙陋庸俗的现象进行批评，其中有些诗显得偏激，是有欠公允的，席勒本人也承认是野蛮的、读神的讽刺，但“它们一部分夹杂着个别诗意的及哲学式的思想火花”。被讽刺的对象自然于心不甘，不免起而反攻。这一年，被称为“讽刺诗短年。”警句诗中有不少或写景，或抒情，短小耐读，别具韵味。如歌德回忆 1787 年 3 月 4 日由那不勒斯渡海往西西里岛的航海印象的《海的寂静》就是其中之一：

水面寂静，
海波不兴，
舟子四顾，
波平如镜。
到处无风！
死寂凄凉！
浩浩无垠，
狂澜深藏。

还有更大的成就。对手的攻击，激起歌德更高的创作热情，他写信给席勒说：“在《警句诗》无所顾虑地冒险之后，我们必须致力于伟大的、有价值的创作，把我们千变万化的现实转化为高尚的、善良的形象，使所有的敌人感到羞愧。”从1796年开始，席勒开始了《华伦斯坦》三部曲的写作，而歌德着手重新创作《浮士德》，着手写《赫尔曼和窦绿苔》，完成了《威廉·迈斯特的学生时代》。歌德又一个创作高峰来到了。

《威廉·迈斯特的学生时代》的前身是《迈斯特的戏剧使命》，主要是通过一个商人儿子威廉·迈斯特加入一个巡回演出剧团，并通过剧团丰富多彩的演出活动反映18世纪末德国戏剧界的繁荣状况。《学习时代》在内容上却要广阔得多，意义也要深刻得多。这部著作属于德国文学中的所谓发展小说，其实也就是教育小说。青年威廉·迈斯特是一个富商的儿子，他热爱戏剧和文学，讨厌德国小市民狭隘庸俗的生活，因此他不愿继承父亲的衣钵去当商人。威廉想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进入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由于对戏剧的爱好，威廉年轻时接近一位名叫玛丽阿娜的女演员，与她共同生活了一个时期，生了一个孩子，后来因为发生误会，威廉疑心玛丽阿娜对

他不忠实而抛弃了玛丽阿娜。这一爱情的波折曾使威廉对生活十分失望，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他从此不想再接触戏剧和文学，而要专注于父亲的商务。后来父亲派他出差去催还债款，在旅途上他又遇到了演员与剧团，对于戏剧的爱好在他心中重新苏醒。他接触剧团的女演员，借钱给剧团购买布景、道具。不久他就决定加入剧团，与这个剧团同甘苦共患难了。在与剧团共同活动的过程中，威廉看到了一个被人从意大利拐骗到德国来的 12 岁姑娘迷娘，她在一个杂耍团里受虐待，威廉于是出钱把迷娘从杂耍团救了出来。自此，迷娘便生活在威廉身边形影不离。接着一位伯爵请剧团到府中去演戏，威廉在伯爵家中看到了贵族生活的空虚与腐朽。但是威廉通过伯爵的家却认识了不少社会上的人，其中有一个叫亚尔诺的少校指点威廉去读莎士比亚。威廉一接触到莎士比亚就着了迷，如痴如醉地沉迷其中。不多久，威廉和剧团离开了伯爵府。威廉随着这浪游的剧团上了路，半途中却遭到强盗的抢劫，威廉也因自卫而受了伤，后来被一个旅行路过的女子所救。伤愈后，威廉找到了他旧日相识的剧院经理赛洛，威廉把他们的剧团推荐给赛洛。赛洛和威廉决定演出《哈姆雷特》，并由威廉亲自扮演主角。这时威廉的父亲去世，

威廉得到了遗产，自此他再没有商务负担和父亲的阻拦，可以毫无顾虑地献身戏剧了。在与赛洛的接近中，威廉又和赛洛的妹妹奥莱丽成了好友。不久，奥莱丽不幸去世，垂死的奥莱丽交给威廉一封信，并托他将这封信交给她过去的情人洛他利奥。威廉遵照死者的遗嘱将信交给了洛他利奥。洛他利奥是一名贵族，威廉原本想对他进行一番指责，然而威廉在见到洛他利奥后发现他并不像原先想象的那样冷酷无情，而是一个注重实际与实践的人，这使威廉肃然起敬。原来洛他利奥也胸怀大志，想投身广阔的世界，他曾经到过美洲，在游历中开阔了他的眼界，这使他成了一个开明贵族。游历归来后他向他的农庄的农民分送财物，自愿放弃某些特权，威廉带着惊讶的心情了解到开明贵族洛他利奥的这些“义举”。在洛他利奥的家中，威廉还看到了一个名叫费立克斯的男孩。费立克斯自小被他收养。威廉最后得知，费立克斯正是他与女演员玛丽阿娜所生的儿子。威廉回顾自己过去的的生活，看见他周围的人和他自己经常过着方向不明的生活，自从结识洛他利奥后，他看见他们生活安定，意义明确。洛他利奥和他的朋友们还组织了一个叫“塔社”的秘密团体，这个团体的目的在于引导迷失方向而心地善良的人们走上正路。威廉

经过庄严的仪式加入了这一社团。后来威廉爱上了洛他利奥家的一个女子，并与她结婚，作者又安排迷娘怀着对威廉无法实现的爱死去。

在这部小说中，歌德贯彻了他的务实的人生哲学，即人们应在社会实践中追求理想，威廉便是在实践中追求人生的意义，而不是在书本或冥想中追求的一个典型。威廉之所以从事戏剧，也是为了建立民族的戏剧以教育启发人民，把戏剧当做教育工具。歌德一生提倡实践，反对懒散与脱离实际，反对只作抽象思考，所以到了第二部《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中，威廉终于当了医生，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把人生的意义和理想的追求结合了起来。

这部小说的主题是威廉·迈斯特为了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摆脱实用的营利的商人地位而不断求索。威廉成为古典现实主义发展小说新创造的典型中一个伟大人道主义的象征人物。这部小说中间穿插了不少诗歌，其中以迷娘和弹竖琴老人所唱的歌最为著名，这一对被命运播弄不幸的父女所唱的诗，是歌德抒情诗中的绝唱。迷娘怀念故国意大利的吟唱，曾由贝多芬、舒伯特、舒曼、李斯特、柴可夫斯基等许多大音乐家作曲达百次以上，诗的第一段最为优美：

你知道那地方，柠檬花儿开放，
香橙在绿荫深处闪着金光，
从蓝天里吹来温和的微风，
桃金娘悄然无话，月桂高耸，
你可知道？
前去，前去，
亲爱的人，我要和你同去。

遗憾的是，这篇小说发表后，反响平淡，尽管好心的席勒宣称“我不会同不懂得欣赏这部小说的人成为好朋友”，但当年《少年维特之烦恼》面世时洛阳纸贵的情形不复存在了。一年之后，长篇叙事诗《赫尔曼和窦绿苔》脱稿。这部作品终于使歌德再次赢得读者的青睐。这是一首以爱情为线索的叙事诗，《赫尔曼与窦绿苔》取材于一部叫《萨尔茨堡教区被逐新教徒的流亡全史》。歌德从《全史》中改编了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原来讲的是一个新教女信徒被驱逐出萨尔茨堡后，逃亡到外地一家旅馆投宿，后来与一个男子结识成亲的事。歌德把故事发生的时间改到 1794 年，即奥普联军干涉法国革命被法军打败后法军进驻莱茵河地区的时代，地点则移到莱茵河东的一座小城。故事说莱茵河西岸有人流亡到东岸，

东岸某小城一个开金狮旅店的店主和妻子救济了这些流亡者，旅店主人的儿子赫尔曼爱上了流浪者中的一个美丽的女子，她就是窦绿苔。窦绿苔本已与一个男子订婚，但未婚夫却去法国参加革命并在那里阵亡。当赫尔曼向父亲表示要娶她为妻时，却遭到金狮旅店老板的反对，理由是流浪女子贫穷，而老板希望未来的儿媳会带来许多陪嫁。本地牧师则说，还是看一看这个女子如何再作决定吧。于是赫尔曼便去找窦绿苔，但他并不说前来向她求婚，而是说希望她能到他家服侍老母，窦绿苔便欣然前往以便结束流浪生涯。等赫尔曼和窦绿苔到家里，店主夫妇看见窦绿苔既稳重端庄又美丽多姿，暗中欢喜，完全同意儿子娶她，窦绿苔一听十分生气，因为赫尔曼叫她前来是作女佣而不是提亲相亲的。赫尔曼深爱窦绿苔，而窦绿苔其实也早已爱上了这个英俊少年，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这部田园风味的爱情史诗便在皆大欢喜中结束。

这部从形式到内容都渗透了宁静的田园牧歌风味的作品，充分体现出这一时期歌德的保守思想和对法国革命的冷淡态度。作者在书中把法国革命所带来的生活动荡和小市民的庸俗平静生活作了对比，歌德肯定并赞美后者，诗化了实质上庸俗的小市

民生活，对革命带来的动荡则表示厌恶。因此，正像恩格斯评论的那样，这部作品乃是一部“资产阶级的牧歌”。这部作品虽有这种保守倾向，但还是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象，具有一定的反封建倾向，如主张男女婚姻自主，歌颂男女间真挚的、不以金钱为转移爱情等，这也正是这部作品至今为人喜爱的原因。作品所刻画的人物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如店主是一个平庸的小市民典型，他不关心时代的变化，只求自己发财致富，在家里他又是一个具有封建色彩的威严的家长，要干涉儿子的婚姻。赫尔曼是当时具有典型意义的年轻一代，他不安于现状，要争取婚姻自主，找对象不看门第。他在政治上并不理解法国革命，不过他说，一旦外敌入侵他就会誓死保卫自己的国家，这说明他具有鲜明的爱国思想。这些特点在当时的德国青年中也有相当的代表性。

晚年歌德还很得意地向爱克曼提到：“《赫尔曼与窦绿苔》在我的长诗之中是我至今还感到满意的唯一的一部，每次读它都不能不引起亲切的同情共鸣。我特别喜爱这部诗的拉丁文译本，我觉得它显得更高尚，仿佛回到了这种诗的原始形式。”

这几部作品都得到了席勒的帮助，席勒听了歌德的构思，有时给以积极的建议，看了歌德的原稿，

有时给以热情的评论，当然，有时也不免批评几句。虽然都有各自的创作计划，但在 1797 年，歌德和席勒两个好朋友仍然联手写作，相互竞赛似的，发表了一系列出色的叙事谣曲，著名的有《掘宝者》、《神和舞女》、《科林斯的新娘》、《魔术师的徒弟》等。《掘宝者》是歌德的一首佳作，描述穷苦者为了脱离贫穷，不惜将灵魂出卖给魔鬼，第一段这样写道：

钱袋空空，忧心忡忡，
我将漫长的时日消磨。
贫穷乃是最大的灾祸，
财富乃是最高的幸福！
为了结束我的苦痛，
我去发掘一处宝藏。
“我愿将灵魂向你出让！”
我用鲜血写下了血书。

由于共同创作，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有些诗后来既在席勒的诗集里，又出现在歌德的诗集里，不少读者为此争论不休，歌德晚年把这种划分看成是“德国人摆脱不掉庸俗市民习气”的表现：“像席勒和我这样两个朋友，多年结合在一起，兴趣

相同，朝夕晤谈，互相切磋，互相影响，两人如同一人，所以关于某些个别思想，很难说其中哪些是他的，哪些是我的。有许多诗句是我们俩在一起合作的，有时意思是我想出的，而诗是他的，有时情况正相反，有时他作头一句，我作第二句，这里怎么能有你我之分呢？一个人如果把解决这种疑问当作大事，他准是在庸俗市民习气中还陷得很深。”

1797年8月，歌德在瑞士旅游时，曾造访瑞士传奇人物威廉·退尔的故乡，寻访这位瑞士传奇人物的遗迹，听到很多关于这位领导瑞士人民起义、摆脱外国残暴统治的民族英雄的传说。面对瑞士的美景，他设想以瑞士为背景，以退尔为主角，创作一部英雄史诗。

歌德把这部宏伟的英雄史诗的人物、景色、情节都设想好了，但是后来因为有旁的工作，他没有完成这个计划，而是把这个题材完全让给了席勒。他向席勒详细描绘退尔这个人物，退尔故乡的自然景色，以及有关的史料，让席勒写成剧本，还在情节的构思上帮席勒出主意。席勒取来这个出色的题材，精心写出了他最重要的剧本之一《威廉·退尔》。歌德向席勒转让退尔的题材，成为德国文坛的佳话，也是他们合作的又一个形式。

作为剧作家，席勒应歌德之邀还参与了魏玛宫廷剧院的领导工作，戏剧是他和歌德的共同爱好。他们一起改造剧院，选定剧本，当然，席勒的剧作总是优先安排上演。这块神圣的舞台成了歌德和他展示古典文学艺术风格的重要阵地。

为了促进民族文学的发展繁荣，歌德和席勒还计划成立一个民族的文学中心，创建一所作家学院。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7年时光里，歌德和席勒这两个文学巨人为德国文学的辉煌殚精竭虑，小城魏玛的天空在这10年时光里，也因这两颗文学巨星的照耀而变得异常灿烂。

不幸的是，1805年5月9日，与歌德并肩战斗了10年的席勒撒手人寰。漫长征程只剩下歌德一人冲锋陷阵了。这是歌德一生中遇到的最为沉重的打击之一。一个伟大的朋友逝去了，伟大的德国古典文学时代结束了。

早在1805年年初，歌德和席勒两人都身体欠佳，歌德得了剧烈的肾绞痛，席勒饱受慢性病的折磨。屋漏偏遭连阴雨，歌德后来回忆说：“在此期间我经历了两次可怕的意外事件：两次大火灾。它们是在几个夜晚之内接连着发生的。我在这两次火灾中每一次都受到人身生命的威胁。这两次火灾使我心

情颓丧，但我极力想使自己从这种精神困境中摆脱出来。席勒被同样颓丧的苦痛纠缠着。我们不再会面了，只继续进行着频繁的书信来往。他在2月和3月间写来的几封信表白了他的痛苦、对疾病的抗争、听天由命和日益消失的希望。5月初，我可以出门活动了，我看到他正要去剧院看戏，我不想阻拦他。由于我感到身体不适，无法陪他，便在他家门前与他分手，这竟成了我们之间的永别。在我的体力和精神都迫切需要尽快恢复健康的情况下，没有人敢把他辞世的消息告诉已经成为孤独之人的我。他是在9日那天离去的，我现在整个心情极为恶劣。”

9日晚上，病中的歌德似乎已预感到有什么不幸的事情要发生，他对妻子说：“我感到，席勒一定病得很厉害。”克里斯蒂安娜把话岔开支吾了过去。第二天早上，歌德又问：“席勒昨天一定病得很重，是吗？”克里斯蒂安娜闻听此言，再也控制不住地大哭起来。歌德明白了。他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声：“他死了。”说完转过身子，双手蒙住眼睛，哭了起来。

肾绞痛反复发作威胁着歌德的肉体生命，失去朋友的悲伤威胁着歌德的心灵健康。歌德又一次面临生活和创作的危机，他心灰意懒，在6月4日给朋友的信中感叹道：“在这段我没有给你写信的时间

里，我很少有好日子过。我觉得失去了我自己，因为我失去了一位朋友，他是我的一半生命。我本应该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但是在这样的年纪这已不再可能。我现在只是过一天算一天，做做手头的事，而并不去想今后怎么办。”他甚至提醒朋友尽快回信，“否则，有朝一日生命会突然中止，列名鬼簿之中。”可见他对自己的生命也非常担心。这一年，他已 56 岁。

在席勒死后，歌德的肾脏绞痛继续加剧，经过在哈雷附近的劳赫施泰特温泉的一段疗养，才逐渐痊愈。8 月份，疗养地的夏日剧场为纪念席勒，准备举办《大钟之歌》的演出，歌德为这部诗剧写了一首“终曲”，特别深情地重复这样一句话：“他是我们的啊！”因为席勒的遗体在 1805 年 5 月 11 日深夜安葬，所以终曲从可怕的夜半钟声写起：

我听到那可怕的夜半钟声，
抑郁，沉闷，充溢着哀音。
这可能吗？是意味着我们的友人？
在他的身上寄托着所有的期望，
死神竟然会夺去他宝贵的生命？
唉，这样的损失使世界多么惆怅，

唉，这样的死别使亲人们悲痛欲绝，
全世界都哭，我们要不哭怎么可能？

他的我们的！在那好日子里，
这高贵的人是多么可敬可亲，
他乐于愉快地和人促膝谈心，
有时十分随和，有时严肃认真，
有时敏慧机智，有时充满信心。
把我们的生活准则深刻地阐明，
言论和行动总显得多姿多彩，
我们都有这种感受，这种体验。

他是我们的！愿这骄傲的字句，
强有力地盖没那悲痛的响声，
他本想在那猛烈的狂飙以后。
在我们安全的港口永远安身，
使他的精神有力地向前迈进，
一直走向真善美的永恒之境，
让束缚我们大家的平凡庸俗，
抛在他身后，成为空虚的幻影。

后来，歌德曾想举办一次纪念席勒逝世的戏剧

演出活动，但由于当时一些杂务的影响未能办成。他也曾想写完席勒遗留下的《德美特里乌斯》剧本片断，也未能实现。

德国文学星空双子星座的奇观消失了。

二十、会见拿破仑

1806 年，是歌德更为难熬的一年。身体状况未见好转，《浮士德》第一卷的写作消耗着他的大量精力。更为可怕的，是战争的阴影笼罩在歌德的心头。

歌德本来对战争还怀有侥幸的心理：“我们怀着暂时的希望，碌碌无为地度过了许多岁月，这暂时的希望再次出现。世界到处在燃烧，欧洲也已面目全非。陆地上的城市，海上的船队均已化为灰烬，但是，德国的中部和北部却依然享有某种繁盛的和平，我们大家就都沉湎于这种捉摸不定的太平之中。”鉴于对形势的这种判断，歌德泰然地住在魏玛城中，对战争不作任何准备，珍贵的手稿也不加转移。但 10 月 14 日拿破仑军队的炮声击碎了歌德的幻想。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录道：“傍晚 5 点，炮弹从房顶飞过。5 时半，轻骑兵进城；7 点，城中大火，抢劫，可怕的夜。我们的房屋由于坚固与幸运而免遭横祸。”接下

来发生的一幕便是歌德在家中遇险，克里斯蒂安娜勇敢巧妙地加以解围。惊魂甫定，歌德就和妻子举行了宗教婚礼。

战争是残酷的，魏玛城在大火和抢掠的双重摧残下，不几天就面目全非，体无完肤了。歌德感到深深地痛心。

歌德对战争持超然的态度，对拿破仑抱有很大的好感。拿破仑作为军事天才，和文学天才的歌德自有不少相通之处。客观地说，拿破仑入侵德国，在破坏的同时，也给德国带来法国革命后开明的思想和制度，对落后的德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所以在举国上下声讨拿破仑入侵德国的浪潮中，文坛领袖令人惊奇地保持着自己的沉默。歌德晚年，读布里安的《拿破仑征埃及记》时，曾向爱克曼表达了他对拿破仑的由衷的赞叹：“拿破仑摆布世界，就像洪默尔摆布他的钢琴一样。这两人的成就都使我们惊奇，我们不懂其中奥妙，可是事实摆在眼前，确实如此。拿破仑尤其伟大，因为他任何时候都是一样。无论在战役前还是在战役中，也无论是战胜还是战败，他都一样坚定的站着，对于他要做的事既能看得很清楚，又能当机立断。在任何时候他都胸有成竹，应付裕如，就像洪默尔那样，无论演奏的是慢板还是快板，是低

调还是高调。凡是真正的才能都显出这种伶俐，无论在和平时期的艺术中还是在军事艺术中，无论是面对钢琴还是站在大炮后面。”

歌德第一次见到拿破仑是1808年10月2日，地点在埃尔富特。对会面的情形，歌德有详细的记载：

“兰内斯元帅和马雷大臣想替我美言几句。前者从1806年起认识我。宫廷一位胖侍从（波兰人）嘱我稍候。众人退去。会见萨瓦里和塔里兰。我被召请入内，此刻达鲁报进，即刻获准入内。我为此进退两难。再次被召请。我入内。

皇帝正坐在大圆桌旁进早餐；在皇帝右侧，离圆桌不远的地方站着塔里兰，皇帝的左侧，离圆桌很近的是达鲁，皇帝正同他谈论在占领区征收军税事宜。

皇帝示意我走近。

我停在离皇帝适当距离的地方。

他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说：‘*Vous êtes un homme.*’（您真是一位人物）我鞠了一躬。

他问道：‘您多大年纪了？’

‘60了。’

‘您气色真好——

您写过悲剧。’

我作了最必要的回答。

达鲁为了向肯定被他弄得苦不堪言的德国人表示几分好感，在这里搭了腔，他提到了德国文学以及他对拉丁文学又如何精通，甚至还编辑出版过贺拉斯的作品。

他谈起我，跟我在柏林的那些宠儿们说过的话有些相似，从他的话里至少我了解到他们的思想方式和看法。

他接着补充说，我也翻译过法文的东西，就是伏尔泰的《穆罕默德》。

皇帝搭话说：‘这不是本好书’，认为对一个世界的征服者作出了如此不适当的描述，是很不妥当的。随后，他把话题转向《维特》，他大概仔细地研究过《维特》。在谈了各种十分正确的意见之后，他提出一个地方，说：‘您为什么要这样处理？这样做不自然，’对此，他作了详尽而又十分正确的阐述。

我带着高兴的神情听他讲话，并满意地微笑着回答说，我虽然不知道是否有人对我进行过同样的谴责，但是，我认为他说得完全对，并且承认，在这个地方可能有不真实的东西。然而，我要补充的是，诗人也许应该得到宽恕，如果他为了发挥某种通过简单自然的途径似乎不可能获得的影响而利用了不易看出的艺术手法的话。

皇帝对此似乎是满意的，他又回到了戏剧的话题，并且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意见，有如一个人像刑事审判官那样全神贯注地观看一出悲剧，同时深深感到法国的戏剧既不自然，又不真实。

接着，皇帝也谈到了他所反对的命运剧。这种命运剧本应属于比较黑暗的时代，他说，‘如今，人们的命运又怎样呢，政治就是命运。’

然后，他又转向达鲁，同他议论起征收军税的大事来了；我稍稍后退，刚好站到凸窗的旁边。30多年前，我也曾在这窗旁经历了若干又悲又喜的时刻，而这时我发现，在我的右手，朝着门口站着贝尔梯耶、萨瓦里和其他什么人。塔里兰已离去。

苏尔塔元帅报进。

头发浓密的这个大个子走进门来。皇帝诙谐地问起波兰的几起令人不快的事，而我却得空在室内环顾四周、回忆往事。

这里还是过去的旧壁毯。

但是，墙上的画像已经不见。

这里曾挂过公爵夫人阿玛丽亚的像，她身穿假面舞会服，手拿黑色眼罩；公爵和家属的其它肖像荡然无存。

皇帝站起来，向我走来，一下子便把站在行列里

的我同其他人隔开了。

皇帝背向众人，用温和的声调同我讲话，问我有没有结婚，是否有儿女，有何爱好。还谈到我同宫廷的关系，问及公爵夫人阿玛丽亚、侯爵、侯爵夫人以及其它诸事；我很从容地回答了他。他表示满意，并且把这一席话翻译成他自己的话，只是比我所能表达的更肯定些罢了。

这里我必须提到的是，在整个对话中，我不得不对皇帝表示同意的多种方式表示赞赏；因为他是很少不动声色地听人讲话的，他要么深思地点头，要么说上一句‘是’或‘对’之类的话；同样不该忘记提一句的是，每当他讲完了话，通常总要补充一句：歌德先生的意见怎样？最后，我抓住了一个机会用一个手势询问宫廷侍从，我是否可以告退？他回答之后我随即告辞了。”

这次会见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歌德走出房间时，还听见拿破仑对身边人说：“这真是个大人物！”

几天以后，拿破仑来到魏玛城，为了向他表示敬意，魏玛宫廷举行了盛大舞会，剧院里还演出《恺撒之死》，歌德被邀出席。在舞会上，拿破仑提到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在谈到当时悲剧写作的华而不实时，拿破仑建议歌德也写一部《恺撒之死》。谈话结束前，

拿破仑邀请歌德访问巴黎，对于这个邀请，歌德很感兴趣，一再和友人谈起这项旅行可能需要的费用，但是由于当时交通不便，路途较远，再加上年纪已大，没有成行。10月14日，他和另一个德国诗人维兰德一起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这是拿破仑送给他们的临别礼物。

拿破仑如此看重歌德，让歌德分外惊喜。当然，歌德心里明白，坐在拿破仑对面的歌德，是文学家的歌德，而不仅仅是魏玛公国的有职无权的大臣。

歌德对占领军及占领军统帅的态度遭到了舆论界的指责，人们抱怨他在关键时刻既没有拿起武器，也没有发挥一个知名诗人呐喊的作用。而德国人民一直进行反法斗争，1831年10月最终将拿破仑打败，歌德认为这些指责是对他的误解。十几年后，爱克曼旧话重提，歌德替自己作了充分的辩解，振振有辞：

“我的好朋友，让我们别谈这事吧！人世是荒谬的，人们不知道他们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只好随他们去吧！——我心中无仇无恨，怎么会拿起武器呢？我当时已过青春激情之年，怎么能恨得起来呢？如果我是在20岁时遇上这件事，我真的会不甘落后，可我当

时已年过 60 了……

写些战歌，在房子里呆着！——这就是我那时的生活方式！人们夜里在宿营地就能听见敌人前哨的马匹的嘶鸣声，要冲出宿营地，我可以置之不理！但这不是我的生活，不是我的事情，而是泰奥多尔·科尔纳的事。他的战歌也完全符合于他的性格。可我的本性并不尚武，也没有打仗的欲望，因此，战争歌曲只算得上是一个假面具，它很糟糕地遮住了我的真面目。

我写诗从不装腔作势。凡是我没经历过的事，凡是并未使我觉得有燃眉之急必须去写的事，我从不把它们写成诗，从不去表现它们。只有我在恋爱时，我才写情诗。我当时没有仇恨，我怎能写出仇恨之歌呢？而且，向您说句真心话，虽然当德国摆脱了法国人的统治时我曾感谢上帝，但我并不恨法国人。对我来说，只有文明和野蛮这两个概念才有意义。我怎么能仇恨一个最有文明教养的民族呢？我怎么能去仇恨一个我的文明教养大部分应归功于它的民族呢？

民族仇恨一般说来是件奇特的事。你会发现，在文明发展的那些最低阶段上，民族仇恨总是最强大的、最激烈的。但是也存在着文明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到那时民族仇恨会完全消失，人们在某种程度上

超越了民族，与相邻的民族同欢乐、共苦痛。文明发展的这个阶段正好符合我的本性。我在 60 岁之前的很长时期中就一直持这种观点。”

对优秀的法兰西文化的热爱，战胜了对入侵的法兰西军人的仇恨，这是多么不可思议！文明与野蛮代替了民族的界限。应该说，歌德对入侵者的这种态度，是非常消极的，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很多进步的分子和德国人民的谴责，这是歌德一生中不小的败笔。歌德大约也觉得有愧于魏玛公国，于是决定再次退回到他的文化堡垒，命中注定，他是属于文学和科学王国的臣民。

有意思的是，1815 年拿破仑战败后，魏玛举国欢庆，虽然歌德在战争中态度不积极，容忍侵略，但卡尔公爵并没有忘记老朋友，觉得歌德和拿破仑会见也是替魏玛宫廷周旋，所以照样授予他勋章，并把他的年俸增加到三千塔勒这样少有的高薪。

歌德希望远离政治，却又生活在现实生活的政治之中，对政治动态不能不关心。他心中矛盾，更加采取了非常保守的政治态度，认为政治家身份会吞噬讨人的品质，主张把文艺和政治割裂开来。他这样做，又更加激起进步人士的冷落和抨击。歌德为此耿耿于怀，在生前和爱克曼最后一次谈话中还竭力反

对诗人过问政治，为自己辩护：

“我们现在最好赞成拿破仑的话：‘政治就是命运’，但是不应赞同最近某些文人所说的政治就是诗，认为政治是诗人的恰当题材。英国诗人汤姆用一年四季为题写过一篇好诗，但是他写的《自由》却是一篇坏诗，这并不是因为诗人没有诗才，而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诗意。”

“一个诗人如果想要搞政治活动，他就必须加入一个政党；一旦加入政党，他就失其为诗人了，就必须同他的自由精神和公正见解告别，把偏狭和盲目仇恨这顶帽子拉下来蒙住耳朵了。”

“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公民，诗人会爱他的祖国；但他在其中发挥诗的才能和效用的祖国，却是限于某个特殊地区或国度的那种善、高尚和美。无论在哪里遇到这种品质，他都要把它们先掌握住，然后描绘出来。他像一只凌空巡视全境的老鹰，见野兔就抓，不管野兔奔跑的地方是普鲁士还是萨克森。”

“还有一点什么叫做爱国，什么才是爱国行动呢？一个诗人只要能毕生和有害的偏见进行斗争，排斥狭隘观点，启发人民的心智，使他们有纯洁的鉴赏力和高尚的思想情感，此外他还能做出什么更好的事吗？还有比这更好的爱国行动吗？向一位诗人提出

这样白费力的不恰当的要求，正像要求一个军团的统帅为着真正爱，就是放弃他的专门职责，去卷入政治纠纷。一个统帅的祖国就是他所统率的那个军团。他只要管直接与他那个军团有关的政治，此外一切都不管，专心致志地去领导他那个军团，训练士兵养成良好的秩序和纪律，以便在祖国处于危险时成为英勇的战士，那么，他就是一个卓越的爱国者了。”

“我把一切马虎敷衍的作风，特别是政治方面的，当作罪孽来痛恨，因为政治方面的马虎敷衍会造成千百万人的灾难。”

“你知道我从来不大关心旁人写了什么关于我的话，不过有些话毕竟传到我耳里来，使我清楚地认识到，尽管我辛辛苦苦地工作了一生，某些人还是把我的全部劳动成果看得一文不值，就因为我不屑和政党纠缠在一起。如果我要讨好这批人，我就得参加一个雅各宾俱乐部，宣传屠杀和流血。且不谈这个讨厌的问题吧，免得在对无理性的东西作斗争中我自己也变成无理性的。”

对文艺和政治的关系这个歌德毕生关心、至死不忘的大问题，歌德毕生也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

二十一、贝蒂娜和明娜

1807 年，生活发生了转折。歌德的身体基本康复，创作的欲望渐渐高涨。这一年，在耶拿掀起十四行诗热，歌德也很热衷。他写了一组以爱情为主题的十四行诗，是两位年轻美丽的少女给歌德快要干涸的诗的心田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流水。

贝蒂娜来自歌德的故乡法兰克福，是歌德旧日情人玛克西米莉阿涅的女儿，她的哥哥是一名浪漫派诗人。她 8 岁时，母亲即已去世，1806 年，她在外祖母家偶然读到歌德年轻时写给她母亲的 8 封情书，其时她刚满 18 岁，正憧憬着爱情，不禁大为感动。这年 6 月，她到歌德的母亲家串门，一个劲地打听从前歌德和她母亲相爱的往事。老夫人附带介绍了许多歌德年轻时的情形，因此她对歌德家中的事非常熟悉，以致于后来歌德写自传《诗与真》时，有些往事记不清晰，还向她咨询证实。

对歌德了解愈多，加上阅读歌德给她母亲的情书所受的蛊惑，贝蒂娜在内心燃起对歌德的爱。一时冲动之下，她不顾战争时期的动乱，女扮男装，前往魏玛，手持歌德一位老友的介绍信，于1807年4月闯入歌德家中拜谒这位心慕已久的大人物，年届花甲的歌德，在天真浪漫、对自己内心热情不加掩饰的少女面前，表现得理智而冷静，贝蒂娜只好姗姗而去。

11月，贝蒂娜随她哥哥再一次到魏玛，她三天两头跑去看望歌德，有时亲昵地挽着歌德的胳膊一同散步，歌德渐渐喜欢上了她，在分别时，经意不经意地吻了姑娘一下，让贝蒂娜兴奋不已，感到莫大的幸福。

回家后，贝蒂娜不时地给歌德写信。一开始歌德将这些信件束之高阁，保持着少有的沉默。但两个月后，他忍不住地给贝蒂娜回了信，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尤其是创作十四行诗时，贝蒂娜信中表达感情的文字，成为最好的诗材。《爱人的第二次来信》即是歌德根据贝蒂娜信中的词句改作而成：

我为什么又要来乞援于信纸？
亲爱的，请别这样苦苦地追问：

因为，我本来没有什么要说明，
可是，它到底还是寄到你手里。

因我不能来，所以寄封信给你，
交上了我的不可分割的心，
连同欢喜和希望，快乐和愁闷：
这些都没有起始，也没有尽期。

从今天以后，我再也不对你讲，
我忠实的心是怎样怀着思念、
盼望、幻想和志愿飞到你那里。

我曾经站在你面前，对你凝望，
一句话不说。还有什么要明言？
我的全部存在已自臻于完美。

歌德很快拜倒在贝蒂娜的石榴裙下。贝蒂娜一封留存下来的信件叙述了1810年8月在特普利策温泉两人卿卿我我的情形：“八月的黄昏……他坐在窗沿上，我站在他面前，两臂抱着他的脖子……他问我热不热……说：敞开你的胸膛吧，让黄昏的空气润润它！……我没有反对，虽然脸已发红，他解开我的衣

裳，说：黄昏的红晕染到你的面颊上了。他吻我的胸膛，并把额头搁在我胸膛上面……于是他吻遍我的脖子……”曾有人指出贝蒂娜信中透露的情景是事后凭空捏造，攀龙附贵，借名人以自重，但据考证这一切也并非都是空穴来风。贝蒂娜在歌德死后，出版了一部《歌德跟一个女孩的通信》，这些信确实有真有假，但文情并茂，很受后人的赞誉和重视。

锣鼓敲得响，好戏并没有最终唱成。1811年贝蒂娜怅怅地与一名年轻的诗人结婚，婚后偕丈夫到魏玛看望歌德，和克里斯蒂安娜发生冲突，恶语中伤，歌德一怒之下，不许贝蒂娜再进他的家门。这场爱情小剧就这样草草收场了。后来两人交往并没有中断，如前所述，她为歌德回忆录提供旁证材料。后来，为歌德建纪念碑时，她亲自设计蓝图。她一生都以歌德的“迷娘”自居，可见她一生都保持着对歌德的爱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因贝蒂娜的介绍，歌德和德国文化史上另一个顶天立地巨人贝多芬有过一次短暂的会见。

1808年，贝蒂娜偶然和贝多芬结识，后者的绝世才华让她为之慑服，认为“没有一个皇帝对于自己的力量有他这样坚强的意识”因她当时正爱着歌德，所以赶紧给歌德写信报告自己的见闻和看法：“当我首

次看见他时，整个世界在我面前消失了。贝多芬使我忘记了世界，甚至忘记了你，噢，歌德！……我敢断言这个人物远远地走在现代文明之前，而我相信我这句话是不错的。”

其时，贝多芬早已名声遐迩，贝蒂娜的信更激起了歌德和贝多芬结识的愿望，而比歌德年轻 20 岁出头的贝多芬，一向也很推崇歌德，他曾向友人说：“歌德与席勒，是我在奥雪安和荷马之外最心爱的诗人。”他热心地为歌德的诗歌谱曲，曲和词相得益彰，广为传唱。

1812 年夏天，在波希米亚的游览胜地特普利策，这两位伟人相见了，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三、四个下午和晚上，一起驾车出游，一起散步。在会见的第一天晚上，在暖洋洋的气氛下，在烛光的闪烁中，贝多芬坐在钢琴前，专注地按动着琴键，歌德静静地倾听着，贝多芬的杰出才能给歌德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晚，他写信告诉克里斯蒂安娜：“他弹得好极了……我从来没有看到有哪一位艺术家像他那样专注，那样有力，那样热烈”，歌德一生中从来没有用这样的字句赞美过其他的音乐家。

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位伟人虽都对对方的才华十分称许，却没有建立真正长久的友谊，没有像歌德

和席勒那样留下佳话，相反，歌德的柔和谦恭和贝多芬的奔放不拘礼节难以融和，以致发生了一件让两人都并不愉快的事件。事后，贝多芬给贝蒂娜写信，追述了事情的原委：

“君王与公卿尽可造成教授与机要参赞，尽可赏赐他们头衔与勋章；但他们不能造成伟大的人物，不能造成超临庸俗社会的心灵……而当像我和歌德这样两个人在一起时，这些君候贵胄应当感到我们的伟大。——昨天，我们在归路上遇见全体的皇族。我们远远里就已看见。歌德挣脱了我的手臂，站在大路旁，我徒然对他说尽我所有的话，不能使他再走一步。于是我按了一按帽子，扣上外衣钮子，背着手，往最密的人丛撞去。亲王与近臣密密层层；太子洛道夫对我脱帽；皇后先对我招呼。——那些大人先生是认得我的。——为了好玩起计，我看着这队人马在歌德面前经过。他站在路边上，深深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我大大地教训了他一顿，毫不同他客气。……”

贝多芬天生铮铮铁骨，以傲然挺立姿态面对皇室成员，确实令人尊敬，但歌德作为魏玛公国的廷臣，对皇室成员脱帽行礼，其实也无可厚非，所以，歌德对贝多芬的指责耿耿于怀，两人互存芥蒂，各奔

东西了，以后再没有见过面。

另一位德国音乐家策尔特，早年谩骂贝多芬，后来为贝多芬的人格感动，转而热烈地颂扬，他是歌德的好友，所以歌德给他写信给了贝多芬这样的评价：“贝多芬不幸是一个倔强之极的人，他认为世界可憎，无疑是对的；但这并不能使世界对他和对旁人变得愉快些。我们应当原谅他，替他惋惜，因为他是聋子。”歌德一生不曾做什么事反对贝多芬，但也不曾做什么事拥护贝多芬，对他的作品，甚至对他的姓氏，保持着绝对的缄默。¹¹年后，贝多芬为发表他的《弥撒曲》，向德国的各个宫廷和富裕的艺术赞助人征求赞助，也向歌德写了一封信，但始终没有收到回信。他感到不满，以为歌德已经把他忘了。其实，这时，74岁的歌德正卧病在床，病势严重，医生认为已经没法救治了，在这种情况下，贝多芬没有收到回信，也就不足为奇了。

尽管如此，贝多芬的音乐仍对歌德的生活，尤其对他的心灵产生重大影响，歌德甚至害怕听到贝多芬的音乐，怕其中蕴含的巨大的震撼力会破坏他经历无数痛苦煎熬换来的心灵的平静，他不愿自己的心灵再发生骚动，这与他的创作很不相宜。

歌德不愿听人提及贝多芬，却又无可避免。1830

年，年迈的歌德召唤策尔特到他的身边，替他弹奏音乐史上的大作品。在听了贝多芬《第五交响乐》第一章后，歌德开始坐立不安，但竭力装着镇静，他对策尔特说：“这毫不动人，不过令人惊异而已。”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道：“这是巨大的，狂妄的，竟可说屋宇为之震动。”晚饭时，歌德神思恍惚，若有所思，直到策尔特再度提起贝多芬，歌德才醒过神来，向策尔特询问有关贝多芬的一切。毕竟，伟大的诗歌和伟大的音乐之间存在某种神圣的共有的东西。

歌德十四行诗涉及的另一个可爱的女子叫明娜·赫尔茨利普，她也是歌德的同乡，生于1789年5月，父母早逝后，投亲到耶拿的书商弗罗曼家中，过着养女的生活。

书商弗罗曼联系广泛，颇富教养，家中常常高朋满座，耶拿流行十四行诗热，与他出版了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集的译本大有关系。在他家的聚会上，常有雅士即兴作十四行诗，赞美明娜照例成为保留节目。

1807年11月至12月，歌德为魏玛的烦嚣所恼，到耶拿小住了一个多月，养养身子散散心。弗罗曼闻讯请歌德前去作客。明娜童年时，歌德即见过，当时并未在意，这次相见，明娜已出落成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了，如花似玉，黑色的长发，白皙的皮肤，眼睛

如一汪清水，说话温柔动听，歌德不禁惊叹明娜的冷艳，在晚会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明娜，陶醉于明娜的琴声和歌声中。同时情不自禁地加入了用十四行诗赞美明娜的行列：

当你是可爱的孩子时，跟我一起
在春天早晨，跳向原野和牧场。
“我要为此女建造幸福的住房，
作为她父亲，照顾得无微不至！”

当你开始面对现实的世界时，
你的乐趣转向家务的繁忙。
“有这个姐妹！我会感到舒畅：
我对她，她对我，会怎样信任不疑！”

如今，限制不了你美丽的成长；
我心里感到热烈的疯狂的爱情。
我去拥抱她、来消除我的苦恼？

可是唉！我却必须当你是女王：
你玉立在我面前，如此生硬；
对你的匆匆的一瞥，我只好哈腰。

在年龄上歌德可以当明娜的父亲，可歌德逐步降落，称明娜为姐妹、为女王。与贝蒂娜不同的是，明娜始终把歌德的爱当作慈父的爱，这回轮到歌德怀着怅惘的心情独自返回魏玛了。

歌德得了单相思病，明娜的形象始终萦绕在心头无法排去。一年后，他以明娜为原型，创作了戏剧《潘多拉》。1809年，歌德写就长篇小说《亲和力》，书中女主人公奥蒂莉身上也不乏明娜的影子。

《亲和力》是歌德的一部非常奇特的反映婚姻和爱情的小说，出版后争论激烈，对小说的主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小说中把人类的性爱神秘化和庸俗化的倾向受到一些评论家和读者的猛烈抨击。一位女士读完小说后，很为书中比比皆是的对人与人之间固陋和庸俗的关系的无言讽刺而困扰，她向歌德抗议道：“我对这本书从头至尾都不赞同，歌德先生；它实在不道德，我不会把它推荐给任何女性。”歌德听后认真地沉默了一会儿，最后若有所思地说：“这让我遗憾，可这是我最好的一部书。”

“亲和力”是一个化学名词，歌德试图用自然科学中的这一现象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关系。伯爵爱德华和妻子夏洛蒂在自己的庄园里平静地生活着，爱德华要请他的老友，一名上尉，来田庄居住，

一起来美化自己的花园。爱德华与上尉经常在一起研究花园的设计，夏洛蒂感到十分寂寞，于是要把在校寄宿的侄女奥狄丽也请到田庄来帮做家务并解除寂寞。美丽的奥狄丽和上尉的到来破坏了伯爵夫妇在乡间的平静。像化合物一样，另外的元素或另外的化合物的投入，引起了原有化合物的新的分解与结合，即彼此产生了新的亲和力。爱德华竟深深地爱上了美丽单纯的奥狄丽，奥狄丽也对爱德华产生了无法抗拒的爱。与此同时，夏洛蒂与上尉之间也产生了相互的吸引和爱情。但是夏洛蒂和上尉有克制自己感情的力量，而爱德华和奥狄丽却任凭感情的驱使。理智与传统的道德规范在他们身上失去了力量。爱德华于是向妻子提出离婚，以便和奥狄丽结婚，夏洛蒂则打算让奥狄丽返回学校，以便中断他们的关系。这样，爱德华不得不屈从于妻子，以不接近奥狄丽为条件，求妻子不要让奥狄丽回去。不久夏洛蒂生了一个孩子，她期望孩子的出世能恢复他们过去的幸福，奥狄丽却仍希望爱德华能离婚跟自己结合，爱德华也一直没有放弃与奥狄丽结婚的愿望，夏洛蒂把照管儿子的工作托给了奥狄丽。一天，奥狄丽在听完爱德华的爱的表白后，心神迷乱，在船上不幸让小孩落水，救护上岸时，小孩已经死亡。夏洛蒂把小孩的死

理解为上帝的声音（两人不再相爱了，不该有儿子），因此同意离婚，而奥狄丽则把爱德华孩子的死看作是上帝对爱德华的惩罚（他不爱夏洛蒂，也就不该有她生的孩子），也是上帝对自己所犯过失的惩处（奥狄丽成了杀害孩子的凶手），于是她决定放弃对爱德华的爱，以便使爱德华忠于其妻。可是爱德华依旧一片痴情，奥狄丽没法，只得慢性绝食而死。奥狄丽死后，爱德华因为失去了所爱的人，长年忧郁，不久也死了。他们的过失造成了他们的不幸。夏洛蒂为了成全他们，决定让丈夫与奥狄丽以及溺毙的儿子同葬于小教堂。

这部小说表明：男女之间的爱情关系如同化学元素一样，“亲和力”会因为吸引力的变化而变化，似乎这是一种自然规律。但小说的结局表明，这种破坏了传统习俗的亲和力只会给人带来不幸，似乎只有死亡才能原谅这种关系的破坏。

1821年，歌德给一位神学家写信，十分清楚地表露了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这本流传广泛的小书非常单纯的构想是基督的那句话：‘有谁若是淫邪地看一个女人’……等等。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在这篇诠释中看出这一点。”歌德提到的基督的话出自《新约·马太福音》，全句是：“有谁若是淫邪地看一个女

人，那他就已经在心里同她犯了奸淫了。”而基督的这句话又是对《旧约》摩西十诫中第六条“你不许通奸”的诠释。从这封信我们可以推测歌德创作的本意在于道德说教。在小说中，歌德借人物之口对婚姻发表了这样一段宏论：

不管是谁妨害了一桩现成的婚姻，他大嚷大叫道，不管是通过言论还是通过行为，谁就是动摇了所有道德社会的基础，那也就干了我的事了；或者倘若我管不了，我就根本不要理那人。婚姻是一切文化的起始和高峰，它使粗野的人温和，而有教养的人没有比婚姻更好的机会来显示他的温和了。它必须是不能解散的：因为它带来那么多好处，以至于某些个别的不利根本不可与之较量。谈什么不利？其实不过是人们时而不免有的不耐烦罢了，于是人就以为自己不幸了。让那人撇开一下眼前的，那他就会庆幸自己是个有福的人了。因为这种延续了这么久的关系还能一直存在下去。离异是没有任何长远的理由的。人的状况深深地置于激情与欢乐中，以致于一对夫妇根本算不清谁欠谁的。那是一种无尽的债，只有通过永恒才能脱得开。

与这段宣言相对应的，是女主人公奥蒂丽的形象，她反抗市民社会的种种不道德行为，宁死也不肯

放弃她那自由的、同时对社会负责的爱情决定的理想。这部小说与其说是描述婚姻，不如说是在寻找婚姻的道德力量——主宰人们命运的冥冥之中的神秘力量。这是由歌德所信奉的精灵论所决定的。

虽然用心良苦，但《亲和力》并未为歌德赢得更多的读者，读过的人也臧否不一，这让踌躇满志的歌德感到非常的遗憾。

二十二、《诗与真》

这一时期，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歌德未尝一刻放弃刻苦的钻研。在《亲和力》完成之后，他立即把主要精力放在《颜色学》的写作上，在 1810 年写完这本书。这本书是歌德 20 年间长期研究、实验和思考的结果，不仅替这门科学打开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也替科学处理方法树立了榜样，让后来者用同样方法处理类似的科目，其实，这一方法在《植物变形学》中已运用过。歌德从一些普遍的总规律中推演出颜色学，遇到个别现象总是把它推原到这些总规律，从而使这种现象可以理解，成为精神的一项大收获。在这一领域，歌德还异想天开地想钻研虹的形成，真是不脱诗人的气质。在《颜色学》之后，歌德仍然在自然科学领域漫游，但不再撰写专著。

让人敬服的是，歌德能高屋建瓴打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界限，把自然规律引进到文学评论当

中。在《颜色学》一书中，歌德指出眼睛需要变化，从来不愿只老看某一种颜色，经常要求换另一种颜色，甚至活跃到看不到所要求的颜色时，自己就把它造出来。他为此和爱克曼谈到一個适用于整个自然界而为整个人生和人生乐趣所凭依的重大规律。歌德说，“这种情况不仅其它各种感官都有，就连在我們的高级精神生活中也有。由于眼睛是最重要的感官，所以要求变化的规律在颜色中显得特别突出，所以我們都可以清楚地意识到。例如舞蹈，大音阶和小音阶交替变化，就令人感到很愉快，如果老是用大音阶或小音阶，就马上令人厌倦了。”

爱克曼说：“一种好的艺术风格看来也是根据这条规律的，在这方面我們也是讨厌听单一的调子。就连在戏剧里这条规律也大大可应用，只要用得恰当。剧本，特别是悲剧，如果始终用一个调子，没有变化，总有些令人生厌。演悲剧时如果在上一幕与下一幕之间休息时，乐队还是演奏悲伤阴郁的乐调，就会令人感到简直不能容忍，想尽方法要避开了。”

歌德说：“莎士比亚放到他的悲剧里的一些生动活泼的场面，也许就是依据这条要求变化的规律。但是对希腊人的高级悲剧来说，这条规律似乎并不适用，无宁说，希腊悲剧总是自始至终都用一个基本的

调子。”

爱克曼说：“希腊悲剧都不太长，所以始终一律的调子并不能使人厌倦，而且希腊悲剧中合唱队的歌唱和演员的对话总是交替轮换的。此外，希腊悲剧有一种崇高感，不易令人厌倦，因为它总有一种纯真的现实做基础，而这一般是爽朗愉快的。”

歌德说：“你也许说得对，不过这条要求变化的普遍规律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希腊悲剧，还是值得研究一下。你可以看出，一切事物都是互相依存的，就连一条颜色规律也可以用来研究希腊悲剧。要当心的只是不能把这样一条规律勉强推得太广，把它看成许多其它事物的基础。比较稳妥的办法也许是只用它作为一种类比或例证。”

从这一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出歌德见识的博大及洞察力的深刻，真正是一名通才。

歌德似乎已经功德圆满了，从 1806 年起，《歌德著作集》陆续出版，到 1808 年，12 卷都已出齐。年届 60 的歌德感觉到了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了。

他起了写自传的念头，是缘于为自己的好友、画家哈克特撰写传记。

“我与哈克特在一起时或在他跟前时所经历过的那些事都在我的想象中变得栩栩如生；我有理由

问自己：我为什么不能为我自己写一部像为他人写的那样的东西呢？于是在那部作品还未结束的时候，我就开始回顾自己早年的生活经历。当然现在我才觉得，我对这件事犹豫的时间太长了。我本应在我母亲在世时就干这件事，那时候，我也许会对孩提时代的事情感到更亲切一些，也许会由于母亲的回忆的巨大的吸引力使我会重新回到童年。而现在，我必须去呼唤我身上已经失去的灵感，得像用那些必需的魔法道具那样，吃力地、巧妙地运用某些回忆方法。我不得不去叙述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是如何发生的，虽然这个孩子后来成了名人，但我也必须叙述他的成长在总的方面是怎样同人性的判断和理解相吻合的。

在这种意义上，我把我为真诚地写出来的这部作品起名为《真与诗》，而且我深信，在现实中，尤其在回忆中，人总是按照他自己的特性来塑造外部世界的。

为了熟悉历史、回忆当时的地方风光和昔日故旧亲朋的情况，我花费了不少时间，无论行、走、坐、卧，也无论是居家还是外出，我都在忙于写自传的工作，以致使我把现实生活看成次要的琐碎杂事。”

在 1811 年初，歌德开始动笔写《真与诗》，为了

读起来顺口，又将书名更改为《诗与真》。

在《诗与真》的自序里，歌德首先杜撰了一位朋友的来信，在信中，“这位朋友”表示通读了歌德的所有诗作，希望对歌德有一个更清楚的了解：“那末，我们请求您的第一桩事就是：请您把您的新版的、照着内部关系编排的作品按照年代的顺序作个说明，即谈谈提供它们的素材的生活情况和心境，也谈谈影响您的前人的榜样，以至您所信奉的理论原则，以使我们了解它们相互间的关系。如果您不辞烦劳，为您所亲爱的少数人作这样的说明，其结果也许会使得多数人感到兴趣和受益。本来，著作家到了高年，仍不应当放弃与倾慕自己的人也从远处交谈的权利；即便不是任何作家上了岁数之后都能继续撰写出人意表、风靡一时的杰作，那么在他知识更加丰富，意识更加明澄的时候，如果将已经发表的创作再度当作素材来处理，当作‘压轴戏’来加工，这也会是一桩非常有意思和鼓舞人的事，那些从前受过这位艺术家直接间接陶冶的人，便因此会再受到他的陶冶了。”

于是，歌德决定顺从“这位朋友”的愿望：

“我因此马上开始了眼下这件工作，把全集 12 卷所收的大小作品挑选出来，按着年月的顺序重新

排列。我极力回忆我撰写它们的时日和景况。不过，我不久就觉得这工作困难起来了，因为已发表的著作之间有许多空白，如要填补，便非详细加以注释不可。首先，我最初习作的东西现已荡然无存，许多已经动笔而没有完成的东西也没有留下来；甚至有许多完成了的作品初时所具的外形也完全找不到了，这因为后来完全改写，另起炉灶之故。此外，我怎样致力于科学和文学以外的艺术，我怎样在这些像是陌生的专门学术中独自或与友人合作，或是不声不响地钻研，或是将研究的成果公开发表，我也要回想一下。

为了使对我有厚望的人们得到满足，我决心将这一切逐渐放进书里去；可是，这种努力和考察却把我引到更广更远的方面去。因为当我为了适应读者经过深思熟虑的请求，想将内心的激动，外来的影响以及自己在理论上和实际上所迈出的脚步顺序加以叙述时，我便从自己狭小的私生活进入广大的世界中；直接或间接影响我的许许多多的非凡人物的形象便呈现出来。甚至那对我以及一切同时代的人有巨大影响的整个政治局势的重大变动，也不得不加以特殊的注意。因为，把人与其时代关系说明，指出整个情势阻挠他到什么程度，掖助他又到什么地步，

他怎样从其中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作为艺术家、诗人或著作家又怎样再把它们反映出来，似乎就是传记的主要任务。可是，这种要求差不多无法达到，要达到它，个人就得认识自己和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知道他自己在一切情况之下还是依然故我到什么程度，以及知道把人拉着一道走而不管他愿意与否、决定其倾向和予以教养的时代是怎么样。事实上，时代给予当时的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真可以说，一个人只要早生 10 年或晚生 10 年，从他自己的教养和他对外界的影响看来，便变成完全另一个人了。”

这本自传就是按照这个方法，基于这样的观察和尝试，从这样的回忆和考虑中产生出来的。也只有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来理解这书的缘起，方能最好地欣赏和利用它，最公正地评价它。

《诗与真》共分 4 部，前 3 卷于 1813 年写成，第 4 卷拖到 1831 年才在爱克曼帮助下编辑完毕。美中不足的是，自传只叙述到歌德 26 岁，即到魏玛之前。但 26 岁以前的歌德，正是世人所缺乏了解的，因为在此以后，他始终处在大庭广众之中，为世人所瞩目。我们通过《诗与真》，可以看到一代天才的成长轨迹，心路历程。诚如歌德自己所说：“一个人最有

意义的时期就是他的发展时期”。歌德为后人留下了一份最为宝贵的有关他自己的发展时期最为可信、最为珍贵的研究资料，这是这本自传的最大特色。当然，自传要力求真实，不能文过饰非，他自己所说：“无论在宗教方面、科学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我一般力求不撒谎，有勇气把心里所感到的一切照实说出来。”深刻的自我解剖精神，可以和卢梭的《忏悔录》相媲美。

唯其如此，这部旨在向世人展示自己经历和心灵的传记也成为歌德的传世名作之一，是歌德用散文写就的优美的长篇叙事诗。在书中，歌德写实主义的观察方法和高超的描写手段充分地表现出来，文笔变化多姿，有时议论风生，有时娓娓如儿女细语，有时插入戏剧性的场面，关于他的恋爱故事的记叙，又饶有牧歌的意味，引人入胜。书中第7卷全面地论述了德国18世纪中叶的文学，被认为是德国文学史著作中最早的一篇。

在第7卷首，歌德首先阐述了当时德国文坛现状：

“我生当的文学时代，通过矛盾对抗而从过去的时代发展出来。德国既长期为外来民族所充斥，为外国所渗透，在学术上和外交事务上都以外国文字为

依归，不能够发展和提高它自己的文字。无数的外来语必要也好，不必要也好，强挤进德国文字里，以表达许多新的概念，就连已知的事物，人们也跟着采用外国的词句、成语加以表示。差不多两个世纪以来，德意志人在不幸骚乱的状态中粗野化了，因向法国人学习以求娴雅有礼，向罗马人学习以求庄重地表现自己。可是，在本国文字上也这样做；那两种外国熟语的直接使用和它的半德语化，便把社交和日常事务用的文体弄成很可笑。此外，人们对于南德的形象化的词汇的理解过了头，并且滥用无度。同样，人们把跻于王侯之列的罗马市民的高贵的礼节灌输到小城市的知识界中去，因此弄到四不象，至少也与本国人不相称。

可是，在这个时代，天才的作品已产生出来，同时德国固有的自由乐观的精神也已活跃起来。这种精神伴着一种磊落的真诚，力求写作要纯粹而自然，不掺杂外国语，用词平凡易解。不过，由于这种可称道的努力，对本国的浅薄之风也就门户洞开，使堤防被冲决，让洪流也涌了进来。同时，固陋的学究习气在大学的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部门中已根深蒂固，经过一段时间，最后还由一部门逃入别部门中。

因此，头脑清晰、天性纯朴的人们便有两种对象

可以供其议论、非难以至——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很大的重要性——肆行攻击：这两个对象中的一种就是给外国语、外国语的构造和语法败坏、丑化了的国语，另一种就是小心翼翼想避免这种错误的平庸的作品。在这里头，没有人想到，当与一种谬误倾向斗争时，另一种却应召而来予以支援了。”

歌德的分析非常精辟，既有切身的感受，又有对德国文学现状通盘的考察。在这一卷里，歌德还设专门章节，评述了他同时代的杰出的诗人君特、维兰德、格莱姆和兰姆勒以及讽刺作家李斯特、拉宾纳等，使读者对当时的德国文坛有一层感性的认识，对产生了他和席勒这样的天才的那个时代的文学背景，有一个初步的明晰的印象。

《诗与真》是歌德晚年断断续续写就的，因是回顾青少年时期的往事，所以取一种俯视的态度，至于26岁以后的人生旅程，歌德在1824年1月27日和爱克曼谈话时作过一番简要的概括。话题从自传续篇谈起，歌德提到，他叙述部分晚年时期还能像在《诗与真》里谈少年时期那样详细。他说：

“对于这晚年时期，我要做的无宁是一种年表：其中出现的与其说是我的生活，无宁说是我的活动。一般说来，一个人最有意义的时期是他的发展时期，

而对于我来说，这个时期已随着那几卷详细记述的《诗与真》的完成而结束了。此后我和世界的冲突就开始了，这种冲突只有在所产生的结果方面才能引起兴趣。

“还有一层，一个德国学者的生平算得什么呢？就我的情况来说，生平有些或许算是好的东西是不可言传的，而可言传的东西又不值得费力去传。此外，哪里有听众可以让我怀着乐趣向他们来叙述自己的生平呢？

“当我现在回顾我早年和中年时，我已到了老年，想起当年和我一样年轻的人们之中没有剩下几个了，我总联想到一个靠近游泳场的避暑旅馆。初住进这种旅馆，你很快就结识一些人，和他们成了朋友，这些人已早来了一些时候，再过几个星期就要回去了。别离的心情是沉重的。接着你又碰上第二代人，你和他们在一起生活过一些时候，彼此很亲密。可是这批人也离开了，留下你孤单单一个人和第三代人同住。他们刚来，你却正要离开，和他们打不上什么交道。

“人们通常把我看成一个最幸运的人，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对我这一生所经历的途程也并不挑剔。我这一生基本上只是辛苦工作。我可以说，

我活了 75 岁，没有哪一个月过的是真正的舒服生活。就好像推一块石头上山，石头不停地滚下来又推上去。我的年表将是这番话的很清楚的说明。要我积极活动的要求内外交加，真是太多了。

“我真正的幸运在于我的诗的欣赏和创作，但是在这方面，我的外界地位给了我几多干扰、限制和妨碍！假如我能多避开一些社会活动和公共事务，多过一点幽静生活，我会更幸福些，作为诗人，我的成就也会大得多。但是在发表《葛茨》和《维特》之后不久，从前一位哲人的一句话在我身上应验了：‘如果你做点什么事来讨好世人，世人就会当心不让你做第二次。’

“四海驰名，高官厚禄，这些本来是好遭遇。但是我尽管有了名誉和地位，我还是怕得罪人，对旁人的议论不得不保持缄默。这样办，我倒占了便宜，使我知道旁人怎样想而旁人却不知道我怎样想；否则，那就是开不高明的玩笑了。”

歌德的这番话体现了他谦逊豁达的人生态度。他把自己一生的辛劳工作，比作推石头上山，体现了他在追求真理的途中坚韧不拔的人生意志。他所推的每块石头，都在文学史上闪闪发光。从这个意义上

可以说，歌德的每一部作品都是这位伟人的传记的组成部分，都是《诗与真》的延伸。

二十三、苏莱卡之歌

1814 年 7 月，感觉自己生命之花行将枯萎的歌德渴望再一次旅行，他的身体硬朗结实，还承受得了长途跋涉马车的颠簸，便决定到所熟悉的美因河和莱茵河地区观光度假。

7 月 28 日，马车顺道进入他的故乡法兰克福。他已多年没有回到这里了，但令人惊异的是，他并不决定在法兰克福逗留，连装载了他童年和少年时代那么多快乐和幻想的旧居也几乎没有看一眼。他也许不想回顾过去的事情以免伤感，因为旧居里早已住进了他不相识的人们，他的双亲和他的心爱的妹妹都早已远离人世了。

8 月 16 日，歌德在宾根赶上过圣·洛胡斯节。圣·洛胡斯是民间传说中的保护人们免于鼠疫的圣徒。人们在这一天载歌载舞地祭祀他，节日的热烈气氛感染了歌德，让他仿佛又回到了年轻的时代。

到达海德尔堡后，年轻的天主教徒苏尔皮茨·布瓦斯莱和麦尔歇尔·布瓦斯莱兄弟盛情接待了歌德，他们都是歌德的崇拜者，拿出精心准备的礼物一下子让歌德睁大了自己的眼睛，那是兄弟俩人十几年来处心积虑收集到的莱茵河地区的教堂中德国中世纪的木版画。虽然歌德对古代艺术品并无特别的爱好，古代艺术所体现的审美意向也和歌德很不一致，但歌德的心灵还是被震撼了。当他看到罗吉尔·万·魏顿的《三圣神龛图》时，他是那么的激动：“为了我的生存，我在这垂暮之年尽力远远躲开那使老人折寿的青春勃勃之气，并且，为了保持心理平衡，我尽量避免产生任何新鲜的印象和打乱这种平衡的各种方式。但是，这一次，在我面前一下子就展现出了一个完全新奇的、我从未见过的色彩和形象的世界，它使我偏离了我的观念和感觉的旧轨道——这幅画是一个崭新的、青春永驻的世界！”

可以说，布瓦斯莱兄弟和他们的木版画，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歌德对一切非古典主义的事物的不赞成态度，令歌德的艺术主张更加精当。

《三圣神龛图》让歌德为之惊叹，而一个叫玛丽安妮·冯·维勒莫尔的女子则以更大的魅力，吸引住了歌德的眼光，让歌德的心弦摇荡，再一次涌起爱

的激情。

在到达海得尔堡之前，歌德由法兰克福前往威斯巴登温泉疗养地，第一次见到了玛丽安妮。玛丽安妮 1784 年生于奥地利多瑙河畔的林茨，1798 年随一个芭蕾舞团到法兰克福当舞台歌手献艺，她母亲是剧团里的普通职员。法兰克福银行家、市参议员维勒莫尔当时兼任法兰克福剧场董事，他看出玛丽安妮的艺术天份，便在 1800 年花了 200 个古尔盾从她母亲手里把她买下，收为养女，对她着意培养，请家庭教师教她弹钢琴，还带他到意大利旅行以见世面。当了 14 年养女之后，维勒莫尔的妻子去世，有意将她升为自己的夫人，玛丽安妮不情愿地和自己的养父结合了。歌德在温泉住下后，维勒莫尔带玛丽安妮前往看望，歌德对年轻貌美的女士照例小献了一番殷勤，维勒莫尔对歌德感情丰富早有耳闻，于是起了戒心，半个月后就和 30 岁的玛丽安妮正式结婚，以免发生意外。歌德到海得尔堡转了一圈，到美因河畔的盖尔贝尔缪勒的维勒莫尔的别墅中作客时，维勒莫尔父女已变成一对新婚夫妇了，当然他们对歌德的接待一如既往地热情周到。晚会上，玛丽安妮弹琴高唱，歌德也即兴朗诵自己的新作，丰姿绰约的少妇像磁石一样吸住了歌德的心。尽管维勒莫尔下了一步

先手棋，还是未能挡住歌德爱情的小卒不管不顾地跨过了界河。

这年 10 月，歌德返回魏玛，他非常思念玛丽安妮，并把相思化成了美丽的诗句。爱情的泉水再一次滋润了歌德抒情的心田。其时，歌德受波斯诗人哈菲斯的启发，决心也创作一大组以自然与爱情为主题的抒情诗，并把组诗冠名为《底瓦恩》，即波斯语“诗集”之意，因此玛丽安妮不期而遇地走到歌德的笔下，成为一位波斯美女的化身，诗中名字叫苏莱卡，而歌德自己，在诗中的波斯名字叫哈台木。这本诗集正式命为《西方诗和东方诗诗集》，是歌德晚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1815 年 3 月，歌德抑制不住内心的思念，为远方的玛丽安妮写了一首赞美诗《尽管你隐身藏形》：

尽管你隐身藏形，千变万化，
可是，最亲爱的人，我立刻识出你，
尽管你脸上蒙住魔术的面纱，
无所不在的人，我立刻认出你。

从柏树的最纯洁、蓬勃的朝气，
生长得最美的人，我立刻认出你，

在水道的澄澈、流动的清波里，
最讨人喜欢的人，我一定认出你。

看到高高喷射的喷泉的水线，
最好耍的人，我多高兴认出你，
当白云忽而成形，忽而改变，
最多变的人，我从那儿认出你。

看到像花巾似的牧野的绿茵，
灿如繁星的人，我容易认出你，
看到四面攀缘的千臂常春藤，
哦！最会缠人的人，我就此认出你。
每逢山头映照晨曦的红光，
最使人开心的人，我立刻欢呼你，
等到上空现出清澄的穹苍，
最使人开怀的人，我就呼唤你。

我由内外感官获得的认识，
教化一切者，认识全都是靠你，
每逢我称道安拉的一百个名字，
每个圣名的应声都是应着你。

玛丽安妮被笼罩在歌德的视野里，成为歌德心目中的圣女。1815年5月底，歌德急不可待地开始了又一次的莱茵河和美因河地区的旅行，8月12日赶到盖尔贝尔缪勒的维勒莫尔家中作客，和朝思暮想的心上人再次见面了。8月28日，他在玛丽安妮身边度过了66岁的生日。他给玛丽安妮写情诗，玛丽安妮也作诗和答，两个人心心相印，共浴在爱河之中。

9月15日，歌德将海得尔堡古城花园中的一枚银杏树叶送给玛丽安妮。银杏树叶形状像一把扇子，中间有缺口，好像是两片叶子连生，歌德将它看成是男女相爱的象征，他在《二裂叶银叶》这首诗中告诉玛丽安妮：“从东方移到我园中的这棵树木上的叶子，含有一种神秘的意义，它使识者感到欣喜。”银杏原产中国，所以歌德称它是从东方移来。

9月18日，歌德到海得尔堡去看望布瓦斯莱兄弟，临行前和维勒莫尔夫妇约好，一星期后在海得尔堡碰头。对陷入爱情漩涡的玛丽安妮来说，一星期的时间也显得漫长难捱，她在24日就催促丈夫赶往那座古城。当玛丽安妮提前一天出其不意地站到歌德面前时，歌德惊喜不已，诗兴大发，立刻写下了《重逢》这首绝唱：

我竟然可能！星中的明星，
我又把你紧抱在怀中！
唉！远离之夜，那是何等
无底的深渊，无限的苦痛！
是的，就是你！对我的欢情，
你是甜蜜可爱的佳偶！
我不由要为眼前而震惊，
如果想起过去的悲愁。

当世界还在深渊底层，
偎着上帝的永恒的胸怀，
上帝就安排最初的时辰，
怀着崇高的创造的愉快，
他开口说了一句：“要有！”
就听到一声痛苦的呻吟，
投入现实界中的万有，
气势磅礴，雷霆万钧。

光出现了，黑暗就此
战战兢兢地跟它离开，
各种元素也在同时
分道扬镳而各自散开。

在混乱的狂梦之中，
各自匆匆奔向远方，
凝固于无限空间之中，
没有憧憬，没有声响。

一切都沉默、寂寥、凄怆，
上帝第一次陷于孤独！
他于是就创造出曙光，
曙光怜悯万有的痛苦；
她从“昏暗”之中显示出
一场有声的色彩变幻，
以前互相背离的万物，
现在又能再相爱相恋。

他们怀着急切的愿望，
各自把情投意合者追寻，
而他们的感情和眼光
又转向着无限的生命。
不管是抓住还是夺取，
只要永远结合在一块！
安拉更无创造的必需，
由我们创造他的世界。

就这样，驾着曙光的翅膀，
我被带到你的嘴唇边，
繁星之夜用无数印章
巩固我们的美满良缘。
我们二人在地球上，
是欢喜和苦痛的典型，
即使“要有！”说第二遍，
也不会再使我们离分。

这首诗从宇宙生成的道理观察男女相爱的奥秘，显示出歌德晚年的恋爱观，是《西方诗和东方诗诗集》中的代表作，黑格尔曾将本诗和歌德以前的《欢会和别离》相比较，说明歌德《西方诗和东方诗诗集》中的诗“和他以前的诗特别显出本质的不同”，在本诗中“爱情完全是在想象中进行的，通过想象的活动、幸福和极乐而表现出来的”。

歌德和玛丽安妮在一起度过了销魂蚀骨的三天，歌德青春焕发，喜气洋洋，爱情诗写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玛丽安妮也受到感染，她献给歌德一首《东风之歌》，歌德为玛丽安妮的诗才惊叹，更对她刮目相看了。后来，歌德对这首诗略加改动，收入到《西方诗和东方诗诗集》中了。

9月26日，维勒莫尔夫妇决定打道回府。歌德显得无可奈何，临别时，玛丽安妮又为歌德写了一首美丽的诗《西风之歌》：

啊！由于你润湿的羽翼，
西风，我对你多么羡慕；
你能替我捎给他信息，
倾吐我和他离别的苦楚。

你的翅膀动个不停，
把我胸中的幽思唤醒；
花卉，眼睛，山丘，森林，
被你的气息吹出眼泪。
然而你那温柔的吹拂，
清凉了我伤心的眼睑；
我们要是没有希望再见，
我只有抱恨离开人间。

去到我那恋人的身边，
温柔地说动他的心坎；
别向他提起我的悲痛，
免得引起他心中不快。

告诉他，婉转地告诉他：
他的爱就是我的生命；
这两者欢快的感觉，
在他的身边才能体会。

这首诗曾由舒伯特和门德尔松作曲，歌德也将它收入了自己的诗集。要和心上人分别了，歌德非常伤心，他在诗中悲叹道：“只要真主一日不愿意再让我们重新聚会，太阳、月亮以及人世只有给我哭泣的机会。”

分别时歌德和玛丽安妮互相起誓，今后每逢月圆之夜要互相思念。10月18日，第一个月圆之夜的前夕，玛丽安妮给歌德寄去一封信，特别引用了波斯诗人哈菲斯的一行诗句：“我要接吻，我要接吻，我说。”歌德十分感动，写诗回赠：

你的爱人，他在远处，
也同样地尝遍酸甜，
感到一种不幸的幸福。
你们立过神圣的誓言，
要在月圆时互相问好，
现在这个时刻已到。

“我要接吻！接吻！我说。”

13 年之后的 1828 年的 8 月 25 日，又一个月圆之夜，年近 80 的歌德犹不能忘怀和玛丽安妮的誓约，他给从此再没有见过面的旧情人寄去了一首《给上升的满月》：

你要突然抛弃了我？
刚才你还这样靠近！
一团乌云将你包裹，
现在你已无踪无影。

可是你知道，我多么难过，
请露出你的星体的边，
证明我是被人爱着，
即使爱人离我很远。

升上来吧！更亮地照耀，
放出纯洁壮丽的光华！
尽管我的心痛苦地乱跳，
今夜可真是幸福无涯。

歌德和玛丽安妮的缠绵悱恻的恋爱完全是柏拉图式的，诗中所写，以想象的成份居多，也许，他真的把玛丽安妮当作古代波斯的苏莱卡了。作为魏玛公国的名臣，诗坛祭酒，他怎么能轻易地拐逃朋友的妻子，何况病得不轻的克里斯蒂安娜正在苦痛中等着他的归来。而玛丽安妮，自幼被维勒莫尔抚养，维勒莫尔对她有莫大的恩情，她又何至于忘恩负义和歌德私奔，所以她对歌德的爱，也做到了发乎情，止乎礼。

这是一场纯洁的恋爱，因这场恋爱，歌德的《西方诗和东方诗诗集》闪耀出更加迷人的光彩。诗集中的《苏莱卡》卷成了世界文学的爱情诗中最美丽的结集之一。它再一次向世人宣告，歌德是那个时代最为出色的抒情诗人。

当然，《西方诗和东方诗诗集》并不单纯是一部爱情诗集，它共计 12 卷，有歌人卷、爱情卷、观察卷、苦恼卷、格言卷、天堂卷等。主题包括东、西方的宗教、诗人的责任和自然知识、人类的愚智、对生灭之物的洞见以及世俗的快乐等等，歌德成熟的世界观在这组诗中显现出来。歌德并没有到过东方，但在诗歌中却在东方尽情徜徉。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旅行者和商人，“这些诗篇的作者最希望自己被看成

是一个旅行者，而当他愿意顺从外国的风俗，力图掌握外国的语言习惯，懂得同意他们的思想，接受他们的习惯时，那他是感到光荣的。但是为了使旅行者带回来的一切较快地使他的国人感到满意，他扮演了一个商人的角色，这个商人引人好感地把他的商品陈列出来，并且设法以多种形式使这些商品招人喜爱；人们对他的广告式的、描述的，还有赞美的措词是不会有恶感的。”基于对东、西方文化的精刻客观认识，歌德通过诗句告诉读者：

了解自己的和别的人，
也会在这里认识到：
东方和西方
不再相互分开。

我承认，我深思地
摇摆在两个世界之间；
因此在东方和西方之间
就向最好的方面转移。

歌德试图打通东方和西方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方面的界限，显示出歌德大胆的求索精神和海纳百川的博大气概。

二十四、《玛丽恩巴德悲歌》

两次莱茵河和美因河流域的旅行，让歌德获得了“再一次新生”，美丽的大自然风光和幸福的爱情力量让歌德仿佛回到了在意大利旅行时的心理状态。于是，他打算用当年在意大利写的准备给施泰因夫人看的日记、信件以及有关报道作素材，整理成一部游记。第一卷于1816年出版，书名是《我的自传，第二部的第一、第二部分》，这是相对于第一部自传《诗与真》而言的，第二卷1817年出版，第三部直拖到1819年才在朋友督促下出版，并正式改名为《意大利游记》，第一、二卷是去程日记，第三卷是回程日记和书信。第一卷多写旅行的心情和感受，情调轻松愉快，第二卷多写风景，笔调轻灵飞动，第三卷是书信与报道交替编排。这部游记运用的都是第一手材料，对我们了解歌德在意大利旅行时的情况以及写这部著作时的心态都有很大帮助。

1815 年年初，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议，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成为大公国。当时的德国共分为 36 个邦，各邦相对独立。歌德毕生都认为德国应当统一，也能够统一，他在 1828 年 10 月 23 日对爱克曼说“我倒不怕德国不能统一，我们的很好的公路和将建筑的铁路对此都会起作用。但是首先德国应统一而彼此友爱，永远应统一以抵御外敌。它应统一，使得德国货币的价值在全国都一律，使得我的旅行箱在全境 36 邦都通行无阻，用不着打开检查，而一张魏玛公民的通行证就像外国人的通行证一样，在德境内邻邦边界上不被关吏认为不适用。德国境内各邦之间不应再说什么内地和外地。此外，德国在度量衡、买卖和贸易以及许多其它不用提的细节方面也都统一。”作为一代文化巨匠，歌德又强调了在什么意义上统一才是可能的和可取的。他希望统一后的德国文化中心要多元化，不应限于国都，这是极有远见的。

这年年底，歌德职务再次得到提升，担任内阁首相，不过，他一如既往，并不过问全部政务，实职工作是出任魏玛和耶拿的直属科学艺术机构总监，领导大公国的全部文化部门。在卡尔大公看来，歌德在宫廷中的位置是谁也替代不了的，是魏玛的一面文

艺大旗。不过，卡尔大公并非对歌德言听计从。1817年4月，在魏玛剧院辉煌地上演了600出戏之后，因一个小小的分歧，卡尔大公就毫不留情面地解除了歌德魏玛剧院的领导职务。当时歌德拒绝在一个滑稽剧本中叫一个受过训练的狮子狗作为主要演员登场，而大公的情妇、女演员雅各曼硬要这个戏上演。大公一纸令下，歌德只得让步，并闷闷不乐地离开了他指导了40多年的心爱的魏玛剧院。这是歌德到魏玛后受到的最为沉重的打击，此后，很长时间内他对公爵都很恼火。

担任魏玛和耶拿的科学文化总监后，歌德着手创办了两份差不多独自承担费用的杂志《艺术和古代》及《自然科学论丛》。在某种程度上暂时失去了戏剧阵地，但同时，歌德扩大了文艺和科学的领地，他借助这两本杂志，和文艺界和科学界的代表人物保持经常的接触，向世人宣扬他们的文艺观和科学观。1817年，歌德写了《我研究植物学的经过》，介绍了自己作为一名科学家所走过的道路。

歌德开始愈来愈多地回顾往昔，总结过去。在《艺术和古代》杂志上，他写了不少论文，阐述他对文艺的最新最透彻的看法。他从对立派的文章中，看到自己在古典主义的见解方面别人对他有许多误

解，于是写了《古典与现代》一文。作为创造出一种伟大的现代艺术的大作家歌德，他的作品早已经不是对于古典风格的摹仿，是历尽千辛万苦才取得了天才的成就。世人公认歌德是德国古典主义的领袖，但到了歌德晚年，已能突破古典主义的框架，心胸更加宽阔，他曾对爱克曼说：“过去时代那一整套陈规旧律有什么用处？为什么在古典的和浪漫的这个问题上大叫大嚷！关键在于一部作品应该通体完美，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它也就会是古典的。”这种辩证的文艺思想，为他以后的巨著《浮士德》的写作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自然科学论丛》出到 1824 年，而《艺术和古代》一直出刊到歌德离世以前。这是两扇向外界打开的窗门，科学的和艺术的风光尽收其中。

这一时期，歌德的家庭生活也发生一些重大变化。他的妻子克里斯蒂安娜于 1816 年 6 月去世，他的儿子奥克斯特于 1819 年 6 月同一个叫奥蒂丽亚·冯·勃克维什的姑娘结婚。这位姑娘的父亲是一位普鲁士军官，母亲是魏玛的一名女官。歌德对儿媳很是娇惯，而儿子和儿媳之间却不时发生齟齬。所以在家中除增添了一位年轻任性的女性的欢笑声之外，还多了一对小冤家不时发出的争吵声。1828 年 4 月，

歌德的长孙瓦尔特尔出生了，孩子如一朵柔嫩芬芳的小花，开放在歌德的心头，让歌德在寂寞的煮字生涯和喧嚣的社交活动中得到莫大的安慰，歌德的生命又向前延伸了一步。几年后，第二个孙子沃尔夫冈和小孙女阿尔玛也相继来到人间。在孩子们面前，歌德是慈祥的。他写作的时候，孩子在他身边快乐地玩耍。他有时也参加孩子的游戏，70多岁的歌德童心未泯。

更为令人吃惊的是，1823年，74岁的歌德爱心长在，又一次陷入情网之中。前面已经提到，歌德为了健康关系，近20年来几乎每年都到波希米亚的温泉疗养地玛丽恩巴德旅行和疗养。他在玛丽恩巴德时，通常都寄居在列维卓夫人家。1806年，在卡尔斯巴德，他就和这位妇人有过亲密的交往，列维卓夫人算是他的旧情人之一。她有过很不幸的经历，与第一任丈夫离异，嫁给丈夫的堂弟，而第二任丈夫死在了战场上，成为寡妇之后，做了奥地利一位伯爵的情妇。伯爵是天主教徒，不能和她结婚，便在玛丽恩巴德造了一幢别墅，让她全家住并向旅客出租以赚钱维持家用。

列维卓夫人有三个女儿，最大的叫乌尔丽克，1804年出生，1821年8月歌德见到她时，她正值妙

龄少女青春焕发的年华。在歌德的眼中，乌尔丽克棕色的鬈发有点像玛丽安妮和克里斯蒂安娜，深蓝色的眼睛格外迷人。乌尔丽克为歌德住在自己家中而兴奋，她经常陪歌德散步，像一个女儿对待父亲那样搀扶他，天真地向他谈论自己即兴想到的一切。歌德也把她看成是“亲爱爸爸的忠实而漂亮的女儿”，抽空给她读司各特作品，送给她一部新出版的《威廉·迈斯特的游历时代》，令她满心喜悦。她接着向他要一本上集，歌德手头没有，便坐在花园里，把《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里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因为在那时，家人还不许她读那部小说。乌尔丽克小鸟依人般地坐在歌德身旁，凝视静听歌德苍老沙哑的声音，歌德不觉起了一股怜爱之心。但这是一个忠厚长者对儿女式的爱。8月底，歌德和她告别，回到耶拿。

1822年6月，歌德又来到玛丽恩巴德，照例还住在列维卓夫人家。在这一个月中，歌德对乌尔丽克的感情逐步升级，乌尔丽克优雅的身体迷人的青春气息唤醒了歌德沉睡多年的爱欲，他把乌尔丽克当作自己的恋爱对像，7月24日，他返回魏玛和乌尔丽克分别时显得忧心忡忡，在路途中写下《风鸣琴》一诗，把乌尔丽克比作彩虹，“温柔辉煌，色彩和谐，永远

常新，永远没有更改”。他深情地表白：

我虽然并不感到悲恸，
可是也不会感到欣喜：
每棵树上成熟的果子
由别人去采，有什么用！
白天使我觉得很发愁，
夜晚亮起星光，也无聊；
我只剩有唯一的享受，
永远重想起你的玉貌。
如果你也想共享这种幸福，
请在半路上赶来跟我会晤。

1823年2月，歌德患了一次心包炎，病得很厉害，医生和家人都为老人感到担忧，但歌德奇迹般地很快康复，是对乌尔丽克爱的力量拯救了歌德的生命。6月他赶往玛丽恩巴德与乌尔丽克相会，爱的激情在年迈的歌德心中荡漾，终于到了不可遏止的程度，他决意要使乌尔丽克成为自己的妻子。

在乌尔丽克家住下后，由于三姐妹老是形影不离，歌德没有机会和心上人单独谈话。他看着姑娘们在一起跳舞，直至深夜才踽踽而去。有时，74岁的歌

德简直像一个情窦初开的男孩：刚一听到林荫道上的笑声，他就放下工作，不戴帽子也不拿手杖，就急匆匆跑下台阶去迎接那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子，像一个年轻人那样向她献殷勤。

7月，卡尔·奥古斯特公爵也抵达玛丽恩巴德，歌德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了公爵，并请他代自己去提亲，公爵在年轻时和歌德一起寻欢作乐，几十年来两人虽时有抵牾，但彼此相互了解，坦诚相见，所以慨然允诺，穿戴整齐地去为自己的大臣说亲，列维卓夫人碍于公爵的面子，或许也不想过于伤害老歌德的心，所以表面上没有断然拒绝，委婉地敷衍了一番，让公爵和歌德都不得要领。

8月，乌尔丽克一家从玛丽恩巴德去卡尔斯巴德，歌德闻讯随后赶到，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74岁生日。生日那天，他收到一份礼物，上面有乌尔丽克三姐妹的签名。大家对他求婚一事都一字不提，仿佛不曾发生过。列维卓夫人考虑成熟之后也希望大公无论如何要慢一点把拒婚的事告诉他的大臣。于是歌德在9月5日带着不明确的答复离开了卡尔斯巴德，其实歌德心中明镜一般，他很清楚有意回避的态度的真实含义。这时大家都嘲笑他以74岁的高龄要娶一个年方19的少女是荒唐的举动，他的儿子和

儿媳也很不赞成他的作法，这些消息传到了他的耳朵里，歌德感觉到，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

马车在乡间公路上缓缓而行，秋风萧瑟，凉意袭人，歌德端坐在车中一言不发，悲不自胜，乌尔丽克向他告别时的最后一吻，她的可爱倩影不时浮现，于是，他开始构思他晚年最著名的爱情诗篇《玛丽恩巴德悲歌》，像以前一样，他只能从痛苦的现实世界逃遁到诗歌的世界中去寻求安慰。

“别人在痛苦之中沉默不言，
上帝让我倾诉我的烦恼。”

40年前他为塔索写过的这两行诗，冠在了他这首新作的前面。

他在车中悬思冥想，到达驿站或歇宿地时，就把想好的诗句记录下来，车抵目的地魏玛时，长诗已经写成了。

如今，花儿还无意绽开，
再相逢，又有何可以期待？
在你面前是天堂，也是地狱，
我的心呵，竟这样踌躇反复——

全诗就在这种充满幽怨的氛围之中展开，但诗

句却如水晶般明净，极具艺术魅力。在歌德心中起伏不平的时刻，车窗外波希米亚早晨的风光一片恬静。

世界不是依然存在？悬崖峭壁
不是在晨光中黑魆魆地巍然挺立在那边？
庄稼不是已成熟？
河畔的丛林和牧场
不是一片碧绿的原野？
笼罩大地的无涯天穹
不是过眼云烟，无穷变幻？

看来，不管歌德心中起了怎样的波澜，这世界并没有相应的改变，乌尔丽克的形象只能在梦中出现：

一个苗条的身形在碧空的薄雾里飘荡，
多么轻盈和优美，多么温柔和明净，
仿佛撒拉弗天使拨牙浓云，
露出她的仙姿；
你看她——这丽人中的佼佼者
婆婆曼舞，多么欢快。

可是你感觉到这代替真人的幻影

仅仅是短暂的瞬间；
回到内心深处吧！那里你会得到更多的发现，
她会在你心里幻出变化无穷的姿影：
一个身体会变成许多形象，
千姿百态，越来越可爱。

于是歌德深情地回忆起和恋人相聚的各种感受，认为是乌尔丽克让他振奋，身心获益巨大。歌德陶醉在快乐的回忆之中，用最高尚的形式，向乌尔丽克表示自己的虔敬：

我们纯洁的胸中有一股热情的冲动，
出于感激，心甘情愿把自己献给
一个更高贵、更纯洁、不熟悉的人，
向那永远难以称呼的人揭开自己的秘密；
我们把它称为：虔诚！——当我站在她面前，
我觉得自己享受到了这种极乐的顶点。

这一段诗后来被誉为“在当年德语和任何一种语言中都属于最纯洁的诗篇。”

愈是真切的爱，分离愈是痛苦。年暮的歌德几乎承受不了，不得不将痛苦一泻无余，以求减轻内心的巨大压力，这种悲诉几乎破坏了这首杰作的悲歌诗体的崇高情调：

如今我已经远离！眼前的时刻
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排？
她给了我某些享受美的财产
但只能成为我的负担，我必须将它抛开。
无法克制的热望使我坐立不安，
没有别的办法，除了流不尽的眼泪。

诗的最后两节，是诗圣伤心到极点的叫喊和悲叹，激昂高亢，读来让人荡气回肠：

忠实的旅伴，让我留在这地方吧，
让我一个人留在这岩石边、沼泽里、青苔
上！

你们去吧！世界已为你们开放，
大地辽阔，天空恢然而又崇高，
去观察、去研究、去归纳，
自然的秘密就会步步揭开。

我已经失去一切，也失去了我自己，
不久前我还是众神的宠儿；
他们考验我，赐予我潘多拉；
她身上有无数珍宝，但也有更多的危险；
他们逼我去吻她的令人羡慕的嘴唇，
然后将我拉开——把我抛进深渊。

歌德一生中最充满激情的短暂的一瞬就在这一声悲叹中逝去了。这是一次不期而遇的爱情，同样，这也是一首不期而遇的长诗。

歌德自己也觉得这首诗的产生十分神秘，仿佛是命运的一种珍贵恩赐。他刚一回到魏玛家中，在着手做其他工作或处理家庭事务之前，第一件事情就是亲手誊清这一艺术杰作——《悲歌》的草稿。他用了三天的时间，像修道士似的深居在自己的净修室里，用端正的大字体在精选的纸上把它抄写完毕，并且把它作为一件秘密收藏起来，不让家中至亲的人和最信赖的人知道。为了不让容易引起非议的消息匆匆传开，他亲自把诗稿装订成册，配上红色的羊皮封面，用一根丝带捆好（后来他又改用精致的蓝色亚麻布封面）放在一只刻有恋人及其家族姓名的纪念杯里，珍藏着，不离左右。他的儿子和儿媳本来就对

他的结婚打算不满，所以怀着高兴的心情看到父亲独自忧伤归来。所幸的是这时波兰女钢琴家玛丽·施玛诺夫斯卡来魏玛演出，她经常来看望歌德并为老诗人演奏，悠扬动听的琴声让歌德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

10月27日，在经过一番慎重考虑之后，他把爱克曼叫到身边，用一种不同寻常的庄重语调向他朗读了这首诗的开头，这说明他对这首诗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偏爱。仆人不得不在书桌上放两盏烛台，然后才请爱克曼在两支蜡烛前坐下来，阅读这首悲歌。此后，其他人也逐渐地听到这首歌，当然，只限于那些最信赖的人，因为正如爱克曼所说，歌德像守护“圣物”那样守护着它。随后几个月的时间表明，这悲歌对他一生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个重返青春的老人健康状况一日好似一日以后不久，出现了衰竭现象。看上去，他又要濒临死亡的边缘了。他一会儿从床上挪步到扶手椅上，一会儿又从扶手椅上挪步到床上，没有一刻安静过。儿媳妇出门旅行去了，儿子怒气冲冲，因而没有人照顾他，也没有人替这个孤独的年迈老人出主意想办法。

大家焦急不已，只好把歌德知心密友、因给歌德短歌谱曲而大受歌德赞赏的策尔特从柏林召来救

驾。策尔特见到病中的歌德，觉察到歌德的内心正在燃烧，他惊讶地这样写道：“我觉得，他看上去完全像是一个正在热恋中的人，而这热恋使他内心备尝青春的一切痛苦。”为了医治歌德心灵的创伤，策尔特怀着深切的同情一遍又一遍地为他朗诵这首不寻常的诗。歌德听这首诗的时候，从不觉得疲倦。歌德在病愈后写信给策尔特叙述自己的感受：“这也真是奇怪，你那充满感情、柔和的嗓音，使我多次领悟到我心中爱得多么深沉，尽管我自己不愿承认这一点。”他接着又写道：“我对这首诗真是爱不释手，而我们恰好又在一起，所以你就得不停地念给我听，唱给我听，直到你能背诵为止。”

所以，事情就像策尔特说的那样，“是这支刺伤他的矛本身治愈了他”。人们大概可以这样说，歌德正是通过这首诗拯救了自己，他终于战胜了痛苦，抛弃了那最后的一线无望的希冀。和心爱的“小女儿”过夫妻生活的梦想从此结束了。他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去玛丽恩巴德，再也不会去卡尔斯巴德，永远不会去那个逍遥者们的轻松愉快的游乐世界。

《玛丽恩巴德悲歌》表明了歌德对一切热情的放弃，经过悲痛欲绝的哀诉而进入永远宁静的境界。斯蒂芬·茨威格把9月5日歌德告别卡尔斯巴德、告别

爱情的这一天称为纪念日。“因为从此以后在德国的诗歌中，再也没有把情欲冲动的时刻描写得如此出色，如同歌德那样把最亢奋的感情倾注进这样强有力的长诗。”

歌德剩下的生命不再属于爱情，只属于诗歌了。

二十五、《歌德谈话录》

歌德在弗劳恩普兰的寓所，室内陈设高雅而简朴。歌德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差不多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1823年6月10日，一个叫爱克曼的年轻人诚惶诚恐在跨进了歌德的客厅，客厅的门槛上嵌着拉丁文“敬礼”的字样，地板上铺着地毯，房间里陈设着一张深红色长沙发和几张深红色椅子，摆有一架钢琴，壁上挂着各式各样的绘画和素描。歌德在仆人的引导下进入客厅，他神情庄严，穿着整洁，让爱克曼肃然起敬，惊喜得说不出话来，不过歌德和蔼的态度很快消除了爱克曼的局促不安，爱克曼这样描述自己第一次见到歌德的情景：

“我们在安静而亲热的心情中在一起坐了很久。我触到他的膝盖，依依不舍地看着他，忘记了说话。他的褐色面孔沉着有力，满面皱纹，每一条皱纹都有

丰富的表情！他的面孔显得高尚而坚定，宁静而伟大！他说话很慢，很镇静，令我感到面前仿佛就是一位老国王。可以看出他有自信心，超然于世间毁誉之上。接近他，我感到说不出的幸福，仿佛满身涂了安神油膏，又像一个备尝艰苦、许多长期的希望都落了空的人，终于看到自己最大的心愿获得了满足。”

说来真是缘份，歌德一见面也喜欢上了这名年轻人，把他视为自己的家人一般。

爱克曼来拜访歌德，是因为自己读了歌德的作品，十分倾倒，也尝试作诗和写诗评，在来魏玛之前，他曾把一本诗稿和一部叫《论诗，特别引歌德为证》的论文寄给歌德，想要德高望重的歌德替他写信介绍给出版商。歌德奖掖后进，很快给耶拿的书商弗罗曼写信。出乎爱克曼预料的是在随后几次的晤谈中，歌德希望爱克曼在魏玛长住下来，替他搜编早年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评论文字，爱克曼喜出望外，一口答应，从此就成了歌德的文艺学徒，同时也担任他的私人秘书，帮助他编辑有关著作，从1823年6月到1832年3月这九年里，除了陪歌德的长子到意大利作短期旅游以外，爱克曼几乎天天到歌德家去请教，帮歌德处理一些日常事务。每逢听到值得注意的歌德谈话，他就用心地记录下来。歌德去世后，他根据

这些笔记整理成《歌德谈话录》一书。（歌德很信任爱克曼，死前曾立遗嘱请爱克曼编辑他的遗著。）爱克曼在德国和全世界闻名，全靠《歌德谈话录》这一部书，他的诗和论文虽已出版，却没有引人注目。

《歌德谈话录》忠实地记录了歌德晚年有关文艺、美学、哲学、自然科学、政治、宗教以及一般文化的言论和活动。片言只语，往往是歌德一生创作实践得到的宝贵经验，体现了歌德晚年最为成熟的思想。爱克曼在序言里，简略地谈到了编辑这部书的背景：

“自从我初次和这位非凡人物会见，以后又和他在一起生活过几年，我一直都想从他那里得到教益，所以乐意把他的谈话内容掌握住，记下来，以备将来终生受用。

可是想到歌德的谈话多么丰富多彩，在和他相处的 9 年之中我感到多么幸福，而我所记录下来的却只是一鳞半爪，就自觉仿佛一个小孩，伸着两个巴掌去接使人神怡气爽的春雨，雨水却多半从手指缝中漏掉了。

.....

我认为这些谈话不仅就生活、艺术和科学作了大量阐明，而且这种根据实际生活的直接素描，特别

有助于使人们从阅读歌德的许多作品中所形成的歌德其人的形象更为完备。

不过我也远不认为这些谈话已描绘出歌德的全部内心生活。这位非凡人物及其精神可以比作一个多棱形的金刚石，每转一个方面就现出一种不同的色彩，歌德在不同的情境对不同的人所显现的形象也是不同的，所以就我这方面来说，我只能谦逊地说，这里所显现的是我的歌德。”

要想了解歌德晚年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就应当读《歌德谈话录》，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本别具一格的歌德传记。

爱克曼留在歌德身边后，急于创作大部头的作品，以显示自己的才华，歌德给了他多次恳切的忠告，劝他不要学席勒那样从抽象概念出发，而要先抓住亲身经历的·具体个别的客观现实事物的特征，他说：

“世界是那样广阔丰富，生活是那样丰富多彩，你不会缺乏做诗的动因。但是写出来的必须全是应景即兴的诗，也就是说，现实生活必须既提供诗的机缘，又提供诗的材料。一个特殊个体的情境通过诗人的处理，应变成带有普遍性和诗意的东西。我的全部诗都是应景即兴的诗，来自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

获得坚实的基础。我一向瞧不起空中楼阁的诗。

“不要说现实生活没有诗意。诗人的本领，正在于他有足够的智慧，能从惯见的平凡事物中见出引人入胜的一侧面。必须由现实生活提供做诗的动机，这就是要表现的要点，也就是诗的真正核心；但是据此来熔铸成一个优美的、生气灌注的整体，这却是诗人的事了。”

这一番话，歌德不是泛泛而谈，有很大的针对性，是他自己创作经验的总结，包括了歌德文艺观中的最基本的原则，那就是文艺须从客观现实出发。

在创作过程中，歌德特别强调特殊和一般的辩证统一。一个特殊具体事物经过诗人的处理就带有普遍性，普遍性就是事物的特征或本质。歌德经常强调“特征”这个概念。他在编辑他和席勒的通信集时曾写出一段感想：“诗人究竟为一般而找特殊，还是在特殊中出一般，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分别。”他还指出这就是席勒和他自己的分别所在，席勒从“一般”出发，创作出来的是寓意诗，其中“特殊”只是用来作为“一般”的一种例证；而他自己的诗则是从“特殊”入手，在“特殊”中显出“一般”，他认为这程序才“符合诗的本质”。1825年6月11日他对爱克曼也说，“诗人应该抓住特殊，如果其中有些健康的

因素，他就会从这特殊中表现出一一般。”这“一般”就是普遍性，也就是“特征”或本质。

歌德又特别重视文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歌德认为诗人的任务是根据自然“来熔铸成一个优美的、生气灌注的整体”（即艺术作品），所以文艺对自然不应无所剪裁和熔铸，流于自然主义。歌德在1827年4月18日谈话里说得最透辟。他根据对吕邦斯一幅貌似违反自然的风景画的分析，得出如下的结论：

“艺术家对于自然有着双重关系：他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他是自然的奴隶，因为他必须用人世间的材料来进行工作，才能使人理解；同时他又是自然的主宰，因为他使这种人世间的材料服从他的较高的意旨，并且为这较高的意旨服务。”

关于诗人要有“较高的旨趣”，歌德和爱克曼谈话时不时地指出，他经常强调诗人和艺术家应具有伟大的健全的人格和魄力，认为艺术家凭着自己的伟大人格可胜过自然：“关键在于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出什么样的作品。但丁在我们看来是伟大的，但是他以前有几个世纪的文化教养……我们的守旧派艺术家们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凭着人格的软弱和艺术上的无能去摹仿自然，自以为做出了成绩。其实他们比自然还低下。谁要想作出伟大的作品，他就必

须提高自己的文化教养，才可以像希腊人一样，把猥琐的实际自然提到他自己的精神的高度，把自然现象中由于内在弱点或外力阻碍而仅有某种趋向的东西实现出来。”

歌德日常谈话中表露出的这些文艺观点，既朴素，又精辟，是歌德对自己文艺创作的最好的注解。

正因为是日常谈话，所以有很大的随意性，《歌德谈话录》中记录的歌德思想不免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唯其如此，歌德的思想面貌显得更为真实、全面。比如天才论，歌德在谈话录中多次肯定了天才的存在，特别在 1828 年 3 月 11 日谈话里，他把天才看作超自然的天生的才能，举拿破仑和一些著名的诗人和艺术家为例来论证这个观点说：

“每种最高级的创造、每种重要的发明、每种产生后果的伟大思想，都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都是超越一切尘世力量之上的。人应该把它看作来自上界、出乎望外的礼物，看作纯是上帝的婴儿……它接近精灵或护神，能任意操纵人，使人不自觉地听它指使，而同时却自以为在凭自己的动机行事。”

4 年之后的 1832 年 2 月 17 日，他又否定了自己坚持的天才论，举法国革命中著名的政治家米拉波和他自己为例，说明凭个人的天才不能成就大事业，

要成就大事业，必须靠集体，靠虚心向群众学习。他说：

“事实上我们全都是些集体性人物，不管我们愿意把自己摆在什么地位。严格地说，可以看成我们自己所特有的东西是微乎其微的，就像我们个人是微乎其微的一样。我们全都要从前辈学习到一些东西。就连最大的天才，如果想单凭他所特有的内在自我去对付一切，他也决不会有多大成就。……说句老实话，我有什么真正要归功于我自己的呢？……我不应把我的作品归功于自己的智慧，还应归功于我以外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成万的事情和人物。我所接触的人之中有蠢人也有聪明人，有胸怀开朗的人也有心地狭隘的人，有儿童、有青年，也有成年人，他们都把他们的情感和思想、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以及所积累的经验告诉了我。我要做的事，不过是伸手去收割旁人替我播种的庄稼而已。”

也就是说，歌德离世前，对天才论有了更清醒的认识，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一个人要想取得成就，“关键在于要有坚强的意志、卓越的能力以及坚持要达到的目的恒心，此外都是细节。”

从天才论的这些自相矛盾之处，我们可以看到晚年的歌德思想一直处于活跃之中，并勇于不断地

修正自己。歌德之所以保持不衰的创作力，关键就在于思想的机器一刻也没有停止运转。

总之，歌德的伟大思想和伟大人格特征在《歌德谈话录》中得到完整的体现。读这本书，每一个读者都会有和爱克曼在编辑这本书时相同的感受：

“活的歌德又显现在目前，他所特有的无与伦比的可爱的声音又在我耳里震响了。我又在晚间在他的明亮的书房里看到他，穿着佩上勋章的黑色服装，杂在座客之中谈笑风生。在其它的风和景明的日子里，我陪他乘马车出游，他穿着棕色上衣，戴着蓝布帽，把浅灰大衣铺在膝盖上。他的面孔晒成棕色，显得健康，蔼如清风。他的隽妙语言的声音流播原野，比车轮滚滚声还更洪亮。有时我又回想起他坐在书斋的书桌旁，在烛光下看到他穿着白法兰绒外衣，过了一天好日子，心情显得和蔼。我们谈着一些伟大的和美好的事物。他向我展示出他性格中最高贵的品质，他的精神点燃了我的精神。两人心心相印，他伸手到桌子这边来给我握。我就举起放在身旁的满满一杯酒向他祝福，默然无语，只是我的眼光透过酒杯盯住他的眼睛。

这样我就完全回到他还在世时那种生活，他的话音也和过去一样在我耳里震响起来了。”

二十六、《浮士德》

爱克曼在歌德身边的日子，正是在歌德潜心创作不朽巨著《浮士德》第二部的时期。所有的读者都应该感谢爱克曼，因为如果没有爱克曼的三番两次的催促，我们也许根本就读不到完整的《浮士德》了。

前面已经提到，早在 1773 年至 1775 年之间，歌德还在法兰克福时就对浮士德这一题材感兴趣，写了诗剧的几个片断，即《原浮士德》，这些片断以魏玛宫廷女官路易丝·冯·葛希豪森的手抄本行世，显露出青年时代歌德横溢的诗才。在意大利旅行期间，歌德写出了《魔女的厨房》和浮士德在《森林和洞穴》中的独白。此后，他便将这一题材束之高阁，似乎无意也无力去染指它。

席勒到达耶拿后，请求歌德把《浮士德》未发表的部分拿给他看，席勒说：“我向你承认，我从这个剧本中看到了一个还未完全成型的海格立斯的形

象。在这几场戏里一种力量和一个丰满的天才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不可否认地显示了剧作者的纯熟的巨匠水平。我希望能够尽可能地继续追随着在这个剧中活跃着的伟大而勇敢的人物走下去。”歌德听到好友的催促后无动于衷。他似乎缺乏热情和勇气。1879年，歌德决定重新整理这部作品，因为席勒曾经给以鼓励，他便主动给席勒写信征询意见：

“由于我迫切地需要在这不安宁的形势下给我自己找点儿事干，于是我决定去写我的浮士德，即使不能把他写完，也至少可以把他向前推进一大部分，我打算把已经出版的那些情节重新打乱，把它们同现在又写出来的和想出来的情节安排到一个大的结构中去，这样一来，对原来基本上只是一个想法的计划的执行就作了更为详尽的准备。现在我正在重新考虑这个想法并考虑把它具体地构划出来，而且我大体上已经拿定了主意。但是现在我想麻烦您能在无眠之夜通盘考虑一下这件事，把您对整个作品的要求告知我，这样，您作为一位真正的预言家，就为我讲述并解释了我自己的梦。

从格调上来说，这部诗的不同部分，可以作不同的处理，如果这些不同部分并不偏离整体的精神和基调的话。不但因为这种情况，而且因为整个作品都

是主体性的，所以，我能写作个别的片断，同时，我现在也就能有点事儿可干。”

席勒回信谈了对这部著作的一些具体想法：“现在我又把《浮士德》读了一遍，对于你要我回答的问题，我真感到不知从何处说起。然而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因为作品是建立在一种观点上，而且只要人们不具备这个观点，则即使一个并不是如此丰富的题材也必然会使一个人的理智陷于不知所措的地步。使我感到不安的是：如果在结尾处应当把主题思想点出来的话，那么我认为《浮士德》就其布局而言，看来也要求材料的完整性，而且对于如此大量膨胀的素材来说，我也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把它们贯穿到一起的诗歌的环子。也许您自己已经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比如说，据我看，应当把浮士德引入实际行动的生活，并且他的戏您也应当从这些材料里选，因此我以为由于他的本性而不断要求一种极大的详尽与广泛……一般说来，我恳切期待看到民间传说如何同全书的哲学部分衔接起来。”

席勒的鼓励和意见充实了歌德拟定的写作计划，歌德投入到《浮士德》第一部的创作当中，遗憾的是，《浮士德》第一部于1806年完成时，伟大的席勒已于头年长眠地下了。

让人惊讶的是，在其后长达 20 年的时间里，歌德没有为《浮士德》第一部续上一个字。直到爱克曼来到他身边，像当年席勒一样频繁地催请他，心如止水的歌德才重新拿起旧日的手稿。1825 年 2 月，《浮士德》第二部这项伟大的工程破土动工了。

其实，这 20 年间歌德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里浮士德的形象一直不停地浮现。在为爱克曼朗诵第二部第二幕第一景时，他披露了自己的心迹：“这里的构思很早，50 年来我一直在心里想着这部作品。材料积累得很多，现在的困难工作在于剪裁。这第二卷的意匠经营已很久了，像我已经说过的。我把它留到现在，对世间事物认识得比过去清楚，才提笔把它写下来，结果也许会好些，我在这一点上就像一个人在年轻时积蓄了许多银币和铜币，年岁愈大，这些钱币的价值也愈提高，到最后，他青年时代的财产在他面前块块都变成纯金了。”可见《浮士德》第二卷的写作是处心积虑的，歌德要用一种神圣纯洁的心态来创作这部对他本人的生命有着非凡意义的巨著。

浮士德这一人物源于 16 世纪德国的一个民间传说，他不到 30 岁时，就已经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天文学家，还是一个人人皆知的庸医，他喜欢说大话，所以故事特别多，且广为流传，深受各界读者欢迎。

1587年，一本名叫《著名魔术大师、江湖术士约翰·浮士德博士的故事》的书第一次问世，把各种浮士德故事汇编到一起。这一故事漂洋过海传到英国后，莎士比亚的好友、著名剧作家马尔罗夫据此写成《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挖掘了浮士德具有叛逆精神这一进步特点。戏中的浮士德返回到德国本土，更加引起观众的浓厚兴趣，很多知名作家试图创作相关作品，莱辛就曾动笔，可惜不曾完成。历史老人相中了天才的歌德，把这一绝妙题材郑重交给歌德，并耐心地等待着歌德长达60年的创作。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他为什么会成为世界文学史中不朽的形象？

《浮士德》第一部故事从“天上序幕”开始。上帝和魔鬼靡菲斯特争论人的善恶。魔鬼认为人是情欲的奴隶，只能困惑终生，永远受苦；但上帝却坚信人无论陷入怎样的迷津，犯有怎样的过失，最终能寻求到真理，走上正路。于是双方以下界正处于彷徨、绝望之中的浮士德打赌。魔鬼要把他引入邪路，而上帝坚信，“一个善人，在他摸索中不会迷途”。

年近半百的浮士德是个饱学之士。他虽然知识渊博，受人尊敬，但此刻却面临精神危机。他感到知识的无用和书斋生活的可厌。他要挣脱一切知识的

枷锁，沐浴在健全的清露之中，鼓舞起入世的胆量，去品尝世上的苦乐。于是他求助于魔术，用符咒召来地祇。但地祇天能为力。他愤而想以自杀求得解脱，此时复活节钟声大作，唤起了他对生活的依恋。但这并不能使他摆脱精神上的痛苦。这时魔鬼靡菲斯特乘虚而入，与浮士德订立契约：靡菲斯特为浮士德服务，满足他提出的任何要求；浮士德一旦感到满足，说出：“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那他就算输了，不但生活终止，灵魂也为魔鬼所有。诗中浮士德对魔鬼唱到：

假如有一天我心安理得懒睡在床，
那我的一生便算收场！
你若能用奴颜媚骨将我欺诳，
使我自己得意洋洋，
你若能用享乐使我迷惘，
那就算末日临我头上！
我愿打赌一比高强！

于是浮士德在魔鬼的陪伴下，走出了与世隔绝的书斋，决心去体验世间的痛苦和欢乐。在靡菲斯特带领浮士德腾云驾雾地出发追求享乐之前，出现了

一个学生前来向浮士德求教的插曲。靡菲斯特化装成浮士德，戏弄了这个天真的学生。“尊贵的朋友，一切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树郁郁葱葱。”这句列宁十分喜欢引用的名言，即出自靡菲斯特对这个学生的规劝。他结束了探索人生的第一个阶段：知识的悲剧。

浮士德喝了女巫的药汤，恢复了青春，心中充满对情欲的渴求。他在魔境里看见了一位美丽绝伦的少女形象，她使浮士德顿时像着了魔一般，第一次向靡菲斯特提出一个愿望：他要立即占有这个姑娘。这是靡菲斯特为了引诱浮士德堕入爱情和感官享乐而布设的一个圈套，在魔鬼的导演下，变年轻了的浮士德来到一个偏僻小城，在街头遇见了魔镜中的姑娘——市民女子甘泪卿。甘泪卿是欧洲文学走廊里最动人的妇女形象之一。“甘泪卿悲剧”也是欧洲古典文学画廊里最出色的悲剧之一。甘泪卿出身于守旧的小市民家庭，思想上受着严格的封建礼教的束缚，她天真无邪，纯朴可爱。她像花朵一样可爱，像水一样清澈，只是带着一点傻气。这位纯洁的姑娘在遇见浮士德后，终于大胆地越出了严格的封建礼教的门槛，带着半是惊怯半是欣喜的心情与浮士德恋爱。可是她刚迈出这一门槛，开始自由地呼吸，就立即遭到

了毁灭。与浮士德的爱情是甘泪卿短暂一生中最甜蜜而又最痛苦的经历。甘泪卿不顾当时教会的清规和世俗的偏见，怀着真诚热烈的感情自由恋爱了。与浮士德的恋爱给她带来了爱的欣喜，同时也给她带来了一连串的灾难：为了与浮士德幽会而不让母亲知道，她给母亲服下了过多的安眠药，以致母亲中毒身亡；哥哥华伦亨又在与浮士德的决斗中丧生。华伦亨在奄奄一息时对甘泪卿加以指责，甘泪卿不得已而杀死了自己与浮士德的私生子。这一连串的事件都触犯了当时的礼教，于是甘泪卿被投进了监狱，成为封建宗法制度的牺牲品，成了无罪的罪人。这时魔鬼为了诱使浮士德堕落，把他领入布罗肯山参加一年一度的瓦普几司之夜魔鬼的狂欢。浮士德没有在这荒唐淫荡的场面中迷失本性。他要靡菲斯特从狱中救出甘泪卿。但笃信上帝、忏悔自己罪恶的甘泪卿却拒绝逃走。最后她的罪愆得到上天赦免。浮士德享受官能的快乐，体验到爱情的幸福，但随着激情的消逝，剩下的只是甘泪卿的悲惨遭遇和自己良心上的痛苦。爱欲带给他的不是满足，而是悔恨。

《浮士德》第二部开始时，浮士德僵卧在百花烂漫的草地，疲惫不堪。这时无数精灵围绕他唱歌跳舞，给他浴以忘川之水，好使他忘却痛苦的往事。浮

士德又恢复了活力。

靡菲斯特把浮士德引到皇帝的宫廷。在这里，非法的行径全都披上合法的伪装，一切邪恶都冠冕堂皇。国家财政濒临崩溃。浮士德为皇帝发行纸币，解决了燃眉之急；又应皇帝的请求，在魔鬼的帮助下，从古希腊召来了美女海伦，并演出了海伦与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之恋。浮士德惊叹海伦的绝世姿容，他嫉妒在舞台上出现的美男子帕里斯，于是把手中的魔钥匙掷去。一声轰响，一切都化为烟雾。浮士德晕倒在地，他又经历了探索人生的一个阶段：用自己的才能为统治者服务的悲剧。

靡菲斯特背着浮士德返回书斋。浮士德的弟子瓦格纳正在实验室里创造“人造人”。魔鬼帮他造成了小人何蒙古鲁士。浮士德一醒来便探问海伦的去向。于是何蒙古鲁士领着靡菲斯特和浮士德溯时间而上，去远古寻找海伦。他们到达了古希腊的斯巴达。绵延 10 年的特洛伊战争刚刚结束，海伦已被她的丈夫——斯巴达国王梅纳劳斯夺回。因为海伦在特洛伊已经失贞 10 年，靡菲斯特以此恐吓海伦，说国王将要把她杀死，唯一解救的办法是逃到浮士德的宫中去避难。原来当特洛伊战争时，斯巴达的一部分荒地被北方来的日耳曼人侵占，并在这块土地上

建起了宫堡，日耳曼人的首领便是浮士德。这样，靡菲斯特终于成功地把海伦引诱到浮士德的宫中，梅纳劳斯得悉皇后又遭劫，便率兵前来攻打浮士德城堡，却被靡菲斯特用音乐击退，使浮士德完成了与海伦的结合，经过林窟的一段幽居后，海伦生下了儿子欧福良——古典美与浪漫精神的结晶。欧福良和何蒙古鲁士有相近的特点，不但聪明，而且有着无限的追求，他与浮士德也有近似之处，即永不满足。他想学飞，但他却无自制的能力，在学飞的过程中坠崖而死。海伦见儿子已死，她的躯体也立即消失，化成一缕轻烟飘去。她的衣服和面纱化为白云，把浮士德裹入高空，带回现实。浮士德又经历了探索人生的一个阶段：在古典美的世界里生活，最后只是一场虚空。

浮士德随着一朵浮云降落在高山上。他面对咆哮肆虐的大海，内心渴望做一番事业，就是制服大海。当时国内发生内战，浮士德借助靡菲斯特的魔法，平定了叛乱，从皇帝那里得到了这片海滨封地。浮士德成了统治者。他率领人民同大海搏斗，向海水索取陆地，去实现改造自然、造福人类的伟大理想。但海滨一对老年夫妇，妨碍了浮士德的事业。靡菲斯特看到浮士德末日已到，派鬼怪为浮士德挖掘坟墓。这时已经双目失明的浮士德听到铁锹的撞击声，以

为这是他的人民在向海洋进行战斗，他陶醉在这壮丽的景象之中，得出了人生的最高真谛：为几百万人开拓疆土，使人们在新的土地上得到安居，每天为生活的自由开拓，然后才能自由地享受生活。浮士德在这最美好的时刻喊出了：“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

依据契约，浮士德的灵魂应为魔鬼所有。但这时天门大开，天使从靡菲斯特的手中把浮士德的灵魂救出，送进了天堂。

天使们抬着浮士德的尸体上天时，齐声唱道：

精神界这个精灵，
已从孽海中超生。
谁肯不倦地奋斗，
我们就使他得救。
上界的爱也向他照临，
翩翩飞舞的仙童，
结队对他热烈欢迎。

可以说，浮士德的形象，经过歌德点铁成金的妙笔，化腐朽为神奇了，比起民间传说，人物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光彩照人的文学形象。歌德赋予他一种哲学上的意义，使他成为如海涅所说的，是德

国人民的化身。

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是文艺复兴时代一个巨人的形象，他厌恶宗教和传统加于他身上的束缚，渴求生活，不断进取，为实现人的价值、生活的真谛而不停地追求。他说：

我要纵身跳进时代的奔波，
我要纵身跳上时代的车轮；
苦痛、欢乐、失败、成功，我都不问。
男儿的事业原本要昼夜不停。

就在对“最高存在”的意义的探索中，他把全人类的苦乐集于一身，要在个人的内心中领略人类的全部感情。他冲破了知识的牢笼，摆脱了官能的享受和爱情的羁绊，走出了“小世界”，而进入“大世界”。在这个“大世界”中，他曾为帝王服务，曾同古代的美结合，但这给他留下的是一片空虚和一场幻景最后他在为人类造福、征服大自然的宏伟斗争中，感到了最大的满足，得出了智慧的最后答案。

在浮士德身上有着一种活力，使他日益高尚和纯洁，这种活力就是对人的存在的意义进行锲而不舍的探求，就是在不断克服错误和过失中去追求真

理，最后走上正途。正因为如此，浮士德的生活道路所体现的不是某一个单一的人，而是具有一个种族类的意义。

魔鬼靡菲斯特是文学史上一个罕见的文学形象。他是浮士德的对立面，是浮士德发展道路上的阻力。他是“一切障碍之父”。在他身上体现了恶，体现了否定的力量。然而也正因为有了这种恶和否定，才从反面促进了浮士德的行动和发展浮士德对恶和否定的每一次征服都是一种前进，一种上升，一种净化。

但靡菲斯特不只是恶的精神的一个象征、一种概念，这是一个具有独立性格的完整的形象。他机智聪明，目光犀利，洞悉世故，玩世不恭，寡廉鲜耻。歌德也正是通过他描绘了统治者、僧侣、朝臣、腐儒、市侩的各种阴险丑恶行径，对当时德国现实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嘲弄。

《浮士德》这部作品有着独特的艺术特色。歌德并不赞成当时兴起的浪漫主义，因为赞美死亡、追求梦境的浪漫主义与他热爱生活、积极进取的精神是不相容的。但是他并不排斥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浪漫主义。在《浮士德》中，特别是在第二部，他更突出地运用了浪漫主义方法，证明了古典主义与浪漫

主义结合的可能性，显示了如席勒所期待的“一种特殊的美感”。

《浮士德》是对人类的一首颂歌。它充分地肯定了人生的积极意义，赞扬了人的进取和追求精神，对人的认识力量和创造力量作了高度的评价。它是展示人类从中世纪到 19 世纪初期精神生活发展史的宏伟画图。它的丰富内涵和哲理深度以及独具的艺术特色，使它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熠熠生辉的宝石。

1831 年 7 月 22 日，歌德在日记中平静地记述道：“主要工作已经完成。最后的收尾。所有抄清了的稿件被装订成册。”至此，歌德一生最为辉煌的业绩完成。像写完《玛丽恩巴德悲歌》一样，歌德郑重其事地将《浮士德》手稿包封起来并加盖印章，对世界秘而不宣，显示出对自己作品的虔敬，并决定，这部书只能在他去世后出版。

歌德要把《浮士德》献给他身后的读者看，是因为他对当时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感到失望。他在临去世前一星期给好友威廉·洪堡写信，谈了自己创作的经过和藏金守玉的缘由：

“从我计划写作《浮士德》的时候起，到今天已经有 60 多年了。我在青年时代就很清楚地知道整个

故事结构的顺序远远不够详细。于是，我把这个写作意图一直谨慎地藏在心头，只把那些我最感兴趣的片断分别地写了出来，以致于在第二部中出现了一些疏漏，这些疏漏之处必须用与全书的情节相称的有趣故事来加以填补，以使全书一气贯通。但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要用主观的决心和意志去补充那些本来不受任何拘束的自然而然的東西，是很费劲的。如果我在生活中经过了如此漫长的积极思考之后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太不应该了。我不怕人们能够区分出这部书中哪些是老材料，哪些是新材料；哪些是原先写就的，哪些是后来补充的。我们把这一切都交给未来的读者，但愿他们能喜欢。

我想在有生之年把部严肃的戏谑之作奉献给我的那些尊贵的、我衷心感谢的远近朋友们，同他们共享这部作品，并听到他们的评论。如果真能这样的话，将毫无疑问地使我感到无限快乐。但是实际上，当今的时势如此之荒唐而令人迷惑不解，以致我不得不相信，我为了创作这部罕有的巨著所付出的真诚而连续多年的努力将得不到好报。这部作品将像一只散了架的破船那样躺在海滩上，最后被逐日积沉下的沙土所掩埋。导致混乱行动的混乱学说统治着这个世界。我迫切要做的事不是别的，只是要使仍

然留在我手头的作品尽可能地提高质量，并且陶冶我的个性，正如您——我尊敬的朋友——在您的城堡中所做的那样。

因此，也请您把您的工作的一些情况告诉我；您可能知道，里默尔也埋头于同样的和类似的研究，我们在晚间经常谈论这个专业的话题。

请原谅我的复信写晚了！尽管我过着隐居生活，却很少有时间能像世人那样去想象生命的这种奥秘。”

确实，封存的《浮士德》并不能让歌德安心，为了这部伟大的作品尽善尽美，在 1823 年 1 月歌德亲自启封，加以修改。

《浮士德》第二部直到 1833 年才作为歌德的遗著的第一卷出版，读者互相传阅，无数的心灵为之震撼。“我眼前有的，霎时消逝得远远；那消逝了的，重新矗现在眼前。”《浮士德》献词中最后两句，不日就飞遍了大街小巷。这部伟大的诗剧很快风靡欧洲大陆，进而流布全世界，成为世界最优秀的文化中的一部分，和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并称为欧洲文学的四大名著。

二十七、世界文学的呐喊者

歌德晚年，声誉日隆。作为德国诗坛祭酒，不仅赢得了德国国内读者的广泛尊崇，还吸引了欧洲大陆及世界各地读者的热情关注。在某种意义上说，歌德已成为一名世界公民。

同时，歌德也以自己博大的胸怀和犀利的目光关注着各国文学的发展，并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在他看来，文学艺术是人类共同财富，是世界各地、各个时代成千上万的人们共同创造出来的，并且各个民族的文学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总是要互相影响。

高屋建瓴地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致力于这一口号的实现，是歌德晚年从事的和写作《浮士德》一样重大的工作。1830年3月，歌德经过深思熟虑，写出了一个提纲，把自己的想法公之于世，很理智地指出世界文学的建立不会一蹴而就：

“在人类交往日益频繁的趋势谁也不可改变的情况下，这样一种世界文学在不久即将形成，只是我们不应该期待它会做更多的事和不属于它应做之事，它只能做它自己能做的并正在做着的事。

广阔的世界似乎是无限辽远的，但它永远只是祖国的扩展，而且仔细想来，它给予我们的东西，并不比故乡的土地给予我们的东西更多；合于大众心意的东西，就会广为流传，就像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那样，它在一切地带和地区受到了人们的欢迎。然而，最认真的、真正出色的作品却极少能取得这样的成功。但是，那些献身于崇高事业并为高水平的成就作出了努力的人们，将会更快地、更方便地结识。世界上到处都有这样的人，他们进行基础性的工作，并从这个基础出发，为人类的真正进步而辛劳。然而这些人所走的道路、他们迈出的步子，并非与世上的一切事情都合拍；世人们想更快地前进，但是他们却拒绝并阻挠能够促进他们前进的事物。于是，那些极认真的人们就必然去建立一个宁静的、几乎是消极的教会，因为想要顶住世俗潮流是枉然徒劳的；但是，必须站稳自己的立场，直到那潮流过去为止。

使这些人物得到欣慰的、或者说受到极大鼓舞的是这样一条真理：真实的东西同时也就是有用的。

如果他们自己能够发现真实和有用二者之间的联系，能够形象地展现并证实它们的因果性，那末，他们就不愁不会在多年之内发挥强有力的影响。”

歌德热心建立世界文学，是与他青少年时期的广泛阅读分不开的，那时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德国优秀的传统的作品，同时孜孜矻矻地研读希腊、罗马、英国、法国等传世的经典之作。可贵的是，他终生都保持着阅读其他民族优秀文学作品的浓厚兴趣，并吸收消化，融进自己的创作当中，《西方诗和东方诗诗集》就是歌德一次成功的尝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世界文学”概念提出，还和歌德第一次接触古老的中国文化密不可分。歌德生活的年代，中国还处在闭关锁国的状态，当时知道歌德的中国人大概绝无仅有，然而歌德却在有限的接触之中试图破释古老的中国诗歌和戏剧的神秘。

他从图书馆借来十余种有关中国的书籍，包括马可波罗以及各种中国游记和中国哲学方面的著作。当时，中国虽然已经出现了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等堪称世界一流的作家，但遗憾的是他们的作品尚未被介绍到欧洲。尽管如此，歌德还是尽可能地阅读了已经翻译成英、法文的《好逑传》、《玉姣梨》等作品，而且还一直想把《好逑传》写成一部类

似《赫尔曼与窦绿苔》的长诗，在读过《赵氏孤儿》之后，诗人曾计划写一部叫作《埃平诺》的戏剧，并且付诸实行，为后人留下了部分片断。

1827 年，歌德偶然读到流行于我国广东一带的木鱼词唱本《花笺记》的英译本。《花笺记》叙述的是才子佳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算不上出色，但歌德的灵感之弦因之触动，按照中国诗的意境，陆续写成《中德四季晨昏吟咏》¹⁴ 首，成功地运用了中国文学的主题和托物抒情的艺术手段，表现了很高的艺术修养。其中第 8 首咏湖畔月夜，最为优美动人。

昏暗的暮色从上空垂降，
近处的一切已远远隔开；
可是金星却放出清光，
首先在空中上升起来！
万物摇摇地坠入朦胧，
雾气悄悄地向上弥漫；
在休憩着的湖水之中，
映着一片沉沉的黑暗。

这时在东方的天际，
我预感到如火的月光，

鬢丝似的袅袅的柳枝，
嬉戏在近旁的水面之上。
由于柳影的摇曳晃荡，
迷人的月光随之颤动，
一阵沁人心脾的清凉，
从我眼里钻进了心中。

《花笺记》英译本中还附有几十首英译中国古诗。这些诗是从《百美图新咏》中抄译的，与《花笺记》本身故事无涉。歌德觉得非常新鲜有趣，便拟作了6首。《百美图新咏》中有一首唐玄宗曾宠爱过的梅妃所作的诗：“桂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湿红绡，长门尽日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梅妃写这首诗的起因是，唐玄宗宠幸杨贵妃后，对梅妃犹念念不忘，赏赐珍珠派人送去安慰，梅妃不领情，写诗谢却。英译大约没有这么多注释，所以歌德只能从字面上加以理解，他很同情不流不洗的梅妃，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你送珠宝来给我做装饰！
我已有很久不复照镜子：
自我从你的视野里远离，

我不再知道打扮和装饰。

歌德很清楚《花笺记》不会是中国最好的作品，但这部传奇所反映出的中国人亲近自然、遵守道德的品性让歌德为之叹服，他非常愉快地以欣赏的口吻向爱克曼介绍了自己的读后感，歌德说这本书“并不像人们所猜想的那样奇怪。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因此和我写的《赫尔曼与窦绿苔》以及英国理查生写的小说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们还有一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你经常听到金鱼在池子里跳跃，鸟儿在枝头歌唱不停，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也总是月白风清。月亮是经常谈到的，只是月亮不改变自然风景，它和太阳一样明亮。房屋内部和中国画一样整洁雅致。例如‘我听到美妙的姑娘们在笑，等我见到她们时，她们正躺在藤椅上’，这就是一个顶美妙的情景。藤椅令人想到极轻雅。故事里穿插着无数的典故，用起来很像格言，例如说有一个姑娘脚步轻盈，站在一朵花上，花也没有

损伤；又说有一个德才兼备的年轻人 30 岁就荣幸地和皇帝谈话，又说有一对钟情的男女在长期相识中很贞洁自持，有一次他俩不得不同在一间房里过夜，就谈了一夜的话，谁也不惹谁。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正是在这次谈话中，歌德预言了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第一次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比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这个名词早 20 年：

“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诗随时随地由成百上千的人创作出来。这个诗人比那个诗人写得好一点，在水面上浮游得久一点，不过如此罢了。马提森先生（德国诗人）不能自视为唯一的诗人，我也不能自视为唯一的诗人。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说，诗的才能并不那样稀罕，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自己写过一首好诗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不过说句实在话，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我们就要会陷入上面说的那种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不过我们一方面这样

重视外国文学，另一方面也不应拘守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模范。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人或塞尔维亚人、卡尔德隆或尼伯龙根就可以作为模范。如果需要模范，我们就经常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他们的作品描绘的总是美好的人。对其它一切文学我们都应只用历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

歌德身体力行，为世界文学时代的早点到来而呐喊，同时，他和世界各国文学家们的交往也愈加频繁，更广泛地研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吸收别人的长处来不断地丰富自己。

他敏锐地意识到，眼光局限于魏玛和德国，无异于井底之蛙，他深有感触地将德国的情形和法国做了比较：

“我们全都过着一种基本上是孤陋寡闻的生活！我们很少接触真正的民族文化，一些有才能、有头脑的人物都分散在德国各地，东一批，西一批，彼此相距好几百里，所以个人间的交往以及思想上的交流都很少有。……但是试想一下巴黎那样一个城市。一个大国的优秀人物都聚会在那里，每天互相来往，互相斗争，互相竞赛，互相学习和促进。那里全世界各国最好的作品，无论是关于自然还是关于艺术的，每

天都摆出来供人阅览；还试想一想在这样一个世界首都里，每走过一座桥或一个广场，就令人回想起过去的伟大事件，甚至每一条街的拐角都与某一历史事件有联系。此外，还须设想这并不是死气沉沉时代的巴黎，而是 19 世纪的巴黎，当时莫里哀、伏尔泰、狄德罗之类人物已经在三代人之中掀起的那种丰富的精神文化潮流，是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点都不能再看到的。”

法国文化让歌德羡慕，莎士比亚故乡英国也在歌德关注之列。1827 年 1 月 12 日，歌德给英国大作家瓦尔特·司各特写信致意，7 月 9 日，司各特热情地给歌德回了一封长信：

“我感到很荣幸，我的某些作品竟有幸受到歌德（用第一人称的示尊敬）的注意，我从 1798 年以来就是歌德的赞赏者之一。当时我对德文虽然懂得很肤浅，却够大胆地把《葛茨·冯·伯利欣根》译成英文了。在这种幼稚的尝试中，我忘记了只感觉到一部天才作品的美并不够，还要精通作品所用的语文才能把作品的美显示给旁人看。不过我还是认为我的幼稚尝试有点价值，它至少可以显示出我能选择一部值得惊赞的作品来翻译。

“我曾从我的女婿洛克哈特那里听到关于您的

情况。这位年轻的人有些文学才能，他在和我家结成亲属关系之前几年，就已荣幸地拜访过德国文学之父了。您不可能记得那么多向您致敬者之中的某一个人，但是我相信，我的家庭中这个年轻成员比任何人都更敬仰您。

“我的朋友品克的霍浦爵士不久以前本来有访问您的荣幸，我原想通过他写信给您，我后来又想通过预定要到德国去旅行的他的两位亲戚带信给您，可是他们因病未能成行，以致过了两三个月才把信退还给我。所以老早以前，还在歌德那样友好地向我致意以前，我就已冒昧地设法结识他了。

“凡是赞赏天才的人们知道一位最大的欧洲天才典范在高龄受到高度崇敬，在享受幸福而光荣的退隐生活，都会感到非常欣慰。可怜的拜伦勋爵的命运却没有让他获得这样的幸运，而是在盛年就剥夺了他的生命，使一切对他的希望和期待都落了空。他生前对您给他的荣誉曾感到荣幸，对一位诗人深怀感激，而对这位诗人，现代一切诗人都深怀感激，感到自己不得不用婴儿的崇敬心情来仰望着他。

“我已冒昧的托特劳伊特尔和伍尔茨图书公司把我为一位值得注意的人物所试写的传记（指《拿破仑传》）寄给你，这位人物多年来对他统治过的世界

起过大得可怕的影响。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应当感谢他的地方，因为他使得我拿起武器打了 12 年的仗，当时我在一个英国民兵团服役，尽管长期跛腿，我还是变成了一个骑马、打猎和射击的能手。这些好手艺近来有些离开我了，而风湿病这种北方天气的祸害已侵袭到我的肢腿了。不过我并不抱怨，因为我虽放弃了骑射，却看到儿子们正在从骑射中找得乐趣。

“我的长子现在掌管着一个轻骑兵连，这对于一个 25 岁的青年人总是够高的地位了。我的次子最近在牛津大学得了文学学士的学位，在他走进世界以前，先在家里呆几个月。由于老天爷乐意要他们的母亲抛开人世，我最小的女儿在管理家务。最大的女儿结了婚，已有她自己的家庭了。

“承垂询到我，我的家庭情况就是如此。此外，尽管曾遭受过巨大损失，我还有足够的家资使我生活得很称意。我继承了一座宏大的老邸宅，歌德的任何朋友来这里会随时受到欢迎。大厅里摆满了武器，这甚至配得上雅克斯特豪生（葛茨·冯·伯利欣根的堡垒），还有一只猎犬守着大门。

“不过我忘记了在世时曾多方努力使人们不要忘记他的那一位（指拿破仑）。我希望您能原谅这部

作品中的一些毛病，考虑到作者本意是想在他的岛国成见所能容许的范围内尽量忠诚地描述这位非凡人物。

“这次一位游客提供我写信给你的机会来得很突然，也很偶然，他不能等，我没有时间再写下去了。我只能祝愿您保持健康和休养，向您表示最诚恳、最深厚的敬意！

瓦尔特·司各特

1827年7月9日，爱丁堡”

这封信，既是歌德和司各特之间友谊的见证，也是歌德所谓世界文学时代的一个很好的注脚。歌德看到这封回信非常高兴，司各特在信中亲切地谈他的家庭情况，显示出兄弟般的信任，让歌德为之感动，不过，他认为司各特对他表示那样高度崇敬，是由于作者的爵位和高度文化教养使然。

此外，世界各国作家都不远千里万里，慕名前来拜访歌德，交流创作感受。这些人中有英国的萨克雷、波兰的密茨凯维奇、美国的爱默生。英国大诗人拜伦和歌德通信，并向歌德献上自己的作品，自称像一个藩臣向他的君王进贡一样，献给一位“创造了自己国家的文学并且光耀了欧洲文学的当代文学的泰斗”，小小的魏玛城，俨然成为文学家们朝圣之地。

歌德晚年很爱阅读法国的一本杂志《环球》，常拿这个刊物做谈话资料，对上面刊载的评论法国文学界最新作品的文字很感兴趣，尤其称道这本杂志对法国和德国文化所做的沟通工作，特意指出：“这批人在努力开辟沟通法国和德国的渠道，他们铸造了一种完全适合于交流两国思想的语言。”《法兰西评论》等也让歌德爱不释手，在他逝世前两个月还得到法国《两个世界的评论》即将出版的通知。这些新型的杂志，扩大了歌德的视野，让歌德更坚信一种世界文学将要形成，他兴奋地指出，这些杂志的读者面逐渐扩大，它们将最有效地“促成一种我们所希望的普遍的世界文学”。

歌德一方面欢迎世界文学的到来，另一方面又强调各民族文学须保存它的特点。懂得这种辩证观点，我们就可以理解歌德在这问题上一些貌似自相矛盾的言论，例如他一方面说，“我爱用旁的民族的镜子来照自己，我劝旁人也都这样办”。“每一国文学如果让自己孤立，就会终于枯萎，除非它从参预外国文学来吸取新生力量”；另一方面他又说当时德国“上层阶级从异方习俗和外国文学所受到的教养固然也替我们带来了很多好处，却也妨碍了德国文学作为德国文学，得到较早的发展”；一方面说，“一种

普遍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其中替我们德国人保留着一个光荣的角色”；另一方面又说，“现在一种世界文学正在形成，德国人会蒙受最大的损失，德国人考虑一下这个警告会是有益的”。实际上这些话里并没有矛盾，世界文学愈能吸收各民族文学的特点，它也就愈丰富，不应为一般而牺牲特殊。歌德在另一个场合说得很明白，“我们重复一句：问题并不在于各民族都应按照一个方式去思想，而在他们应该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假如他们不肯互相喜爱，至少也要学会互相宽容”。世界文学的产生，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指出的，是资本主义时代交通贸易发展的必然结果。歌德值得钦佩处在嗅觉灵敏，在世界文学刚露头角时，就已嗅得出它将要到来，并且提出正确的方针，有意识地指导它走上正常发展的路径。

这就是作为世界公民的歌德，比他同时代任何作家都更为杰出的地方。

二十八、拉上生命的大幕

好像一条大河，愈流愈阔，水势渐缓。歌德生命的暮途是舒缓而境界阔大的。他生活极有规律，争分夺秒地工作。

差不多每天凌晨他就起床，然后走到窗前吸几口新鲜空气，构思一下当天的写作内容。书记员总是准时来到工作室，记录歌德口授的文章，歌德慢慢地在室内踱来踱去，语气安详而肯定。早饭后，他通常到花园去散散步，观赏园中自己喜爱的花草植物。

后半上午，歌德在客厅里接待来访的客人，客人中有老朋友，也有很多是慕名第一次前来。还有一些画家、雕刻家来给歌德画像。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听歌德说话，歌德也喜欢向客人们提问，了解别人的生活和思想。他还喜欢把自己的收藏品拿出来和大家一起欣赏，介绍每一件藏品的来历和意义。自然科学家卡鲁斯回忆歌德接见他的情形，作过详细的描述：

“终于邻室内响起了矫健的脚步声。它预示这位可尊敬的人物自己要出现了。他穿着朴素的蓝色布料上衣，长统靴，短短的头发上面略施发粉，一副大家熟悉的布满了烟气的面容，他以挺拔有力的姿态走向我，引我到沙发那里坐下。72年的光阴在歌德身上留下的痕迹不多，两眼角膜上的老年弓已开始形成，但是却无碍于双眼的神采。一般说来，他的眼睛特别传神，而我认为在他眼里大部分是诗人的全部温和气质，这种气质看来好不容易才抑制了他那其余的否定的犹豫态度并且保护它不受外界的侵犯和烦扰；然而在随后热烈起来的谈话的个别时候，天才先知的全部火光仍然以几乎是神奇的威力从他迅速睁开的眼睛里照射出来。

我就这样地坐在他的对面了！一个人物的形象——我自己必须承认这个人对我一生的进程曾发生十分巨大的影响——突然出现在我的跟前，因此我也就更加努力想准确地注视和掌握这值得纪念的当前时刻。谈话开头的一般寒暄很快就过去了，我向他叙述了我的有关骨架原始部分的新的研究工作并且告诉他，他先前关于有六个头椎骨的推测已得到证实。为了尽快把全部情况说清楚，我请他给我铅笔和纸；于是我们走进另一个房间，而正当我把鱼头的类

型按照其规律性用图加以说明的时候，他用表示同意的喊叫和欢乐的点头来打断我的话。他说：“是的，是的，事情干得出色啊。是啊，司皮克斯和玻雅努斯有点把我们弄糊涂了！是啊，是啊！对，对！’通过这种用特殊亲切的方式加以强调的语言，他一般总是给谈话中的一切停顿带来活跃的气氛。

仆人这时送进来一点小吃。看到歌德怎样为我斟酒以及怎样和我分享一块面包，自己吃一半而把另一半递给我，那对我来说真是一种令人感动的关系！——这时他谈到一年前我通过弗罗曼送给他的、我的两幅画，并且告诉我他怎样在较长的时期内对其中的一幅（布罗肯峰上的房屋）始终不理解其含意，而直到后来，才有一个第三者（弗罗曼告诉我说就是大公）对此作出了解释，并且他一般又怎样对这些作品抱尊重态度。随后他又叫人把他的比较解剖学的资料夹拿来，并且把他先前在这方面的工作指给我看。后来，为了确定岩石的种类，也为了弄清地球表面的全部结构，我们又谈到了在岩石和山脉的形式方面十分重要的东西；而且在这个想法上面，他也是完全内行的，并且为此进行了搜集工作，而第二个满装着哈尔茨山和其他地方的岩石图的资料夹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当我在短短的时间里一个人呆在房间里的时候，房间的陈设和装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一个高大的书架上按照历史顺序摆满了铜版雕刻的巨大画册之外，引起我的兴趣的还有一个带有收藏货币用抽屉的大柜子。柜子的摆设则有玻璃罩下面的很多古典的小神像、家神像、羊人像等等，在这下面则有一个很小的黄金拿破仑像显得十分突出，它被放入气压计外罩被封死的钟形的一端。此外，还有许多东西可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个古老的奇特的锁吸引了我，它是和它的钥匙一起挂在有窗子的那面墙上的，这里还有一些铜版画也引起人们的注视。而且即使房门的安装也是有特色的，因为它没有开关的合页，而是必须从墙里推出推进。最后我们还要谈一下屋内的颜色，这使他叫人把带有黄色透明画的卡尔斯巴德玻璃杯拿来，用这些玻璃杯，经过某种方式的照明，他使我看到几乎是奇妙的变化，即黄色变成蓝色而红色变成绿色。——这时他还不能完全不提到，他的若干科学著作并不受欢迎——到一点钟，我终于在各方面都感到高兴和温暖的情况下告辞了。”

当然，歌德很是珍惜不多的时光，对来客们并非都是笑脸相迎，畅叙深谈，他对陈辞滥调的赞美更是

非常厌恶。大约 1827 年前后，歌德在同俄国外交官斯特卡诺夫伯爵的一次谈话中，表现出他想摆脱那些纠缠着他的读者的心情。歌德说：

“我的伯爵先生，荣誉是一个具有灵魂价值的妙不可言的东西：它使精神强化并得到升华，使心灵清新振奋；因而，人的娇弱的心脏喜欢借荣誉来恢复活力。但是时过不久，在显赫扬名的过程中便达到了对这些东西并不看重的地步。公众舆论神化人却亵渎神灵。人们常常把那些使我们本身觉得应该面红耳赤的缺点加以称颂，却嘲笑那些我们引以自豪的德行。请您相信我说的话，荣誉就这样被侮辱，被弄得几乎声名狼藉。从我 30 岁以后，我就一直同这让人腻烦的事作斗争，你可能很理解这种让人腻烦的事，如果说你只是在很少的几个星期中才碰到这种事的话，那么，我则是每天都被我不认识的人们所赞扬，其中有许多人根本没有读过我的作品，——几乎像所有法国人和英国人那样——他们并不理解我。我的著作和我的生活所包含的思想和意义，就是纯洁人性的胜利，因此，我从不放弃它，并且使我得到了享受荣誉的幸福，然而，这个甜蜜的果实就是我对健全人性的理解。因此，我甚至高度地评价那些把握艺术的纯洁人性意义的人对我的反对，我认为这种反

对要比我们民族的那些热情奔放的诗人们的病态热情可贵得多，这些诗人们只会用空话来扼杀我。我也因此乐于在一定的条件下承认他们关于‘德国并不理解我’这一断言的正确性。在德意志这个民族中，一种精神占据统治地位，这种精神的情感过份兴奋，它的侵袭使我感到陌生：艺术和哲学由于其抽象的特性而与生活相脱离，也远离给予它们营养的自然泉源。我喜爱德意志土地上的那种真正的、民族固有的精神生活，并乐意在它那令人迷乱的道路上游，但要一直在活生生的自然物的陪伴之下。我把生活看得高于艺术，艺术只不过美化生活。”

歌德这番话是生命晚年心灵的自我写照，可以看出，在鲜花和赞美声中，这位伟大的天才仍备感孤独，渴望世人的真正理解。歌德取得巨大成就，与他终身珍惜时间是分不开的，他对浪费时间的事深恶痛绝，他认为时间是一个人的财富，希望所有的人都能珍惜时间：“时间是无限长的，每天都是一个容器，如果人们真正的想把它注满，那就可以注非常多的东西于其中。”在一首诗中，他深有体会地写道。

我的产业多么美，
多么广，多么宽！

时间是我的财产，
我的目的是时间。

要不是全力以赴，要不是分秒必争，歌德也许就写不完伟大的《浮士德》了。

在创作《浮士德》的空隙，歌德还以坚强的毅力、深刻的思考完成了《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写完《诗与真》的最后部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的完成，距离《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有30年之久，在这30年内，欧洲先进国家如英国、法国的社会起着急剧的变化，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情况下贫富悬殊更为加剧，一些好心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各自设计改革社会的方案。歌德在晚年也注意到这些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考虑新时代提出的新问题。歌德在《漫游年代》里探索的问题是如何教育青年，未来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从书名上看，《漫游时代》是《学习时代》的继续，但是在结构形式和思想内容它是一部与《学习时代》连续性不大、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作品。《漫游时代》里包含着一些与全书内容有联系或者联系不大的短篇小说、格言语录，还穿插了日记、信札和诗歌，这是浪漫主义小说家惯用的形式。小说依然是一部“教育

小说”。

似乎该做的事情都做到了。歌德到了人生的一个顶点。使得他的晚年，尤其是 1824 年以后的 8 年，与狂飙突进时期、与席勒合作时期交相辉映，共同谱就他生命中辉煌无比的三部曲。

1825 年 11 月，是歌德到达魏玛 50 周年，也是他任职 50 周年的黄金纪念日，各界隆重庆祝《浮士德》第一部公开上演。在一片真诚的祝福声中，歌德想起有资格和他一起享受众人顶礼膜拜的好友席勒，于是托人找一处墓地，以便将来把他和席勒的遗体葬在一起。歌德已经开始考虑自己的后事了。

席勒去世后，遗骨保存在圣·耶拿教堂的地下室中，无人过问。1826 年，在歌德的参与下，魏玛市长令人从许多颅骨中鉴定出席勒的遗骨，9 月 17 日，席勒的颅骨被移到魏玛图书馆内席勒胸像的台座上暂放，9 月 24 日，歌德动情地把这副颅骨带回自己的家中保存了一个时期，其时，歌德正在拜读但丁的《神曲》，于是仿照但丁的三联韵体诗写了《席勒的遗骨》，再次表达对好友的无穷思念：

这是森严的骨室，我来观看，
一副一副的颅骨排得多整齐；

我想起往昔，如今已变得灰暗。

过去的冤家，如今贴紧在一起，
那些曾拚命交锋过的硬骨头，
交叉地放着，在此温驯地休憩。

扭开的肩骨！曾载过何人的头，
已无人过问，灵活的四肢残骸
手和足，都已拆下生命的榫头。

疲于奔命者，你们徒然躺下来，
并不让你们在墓中安身，你们
又被赶回到光天化日中来。

枯干的骨壳，哪还有爱护的人，
即使它曾容纳过高贵的核心。
可是记录的文字，虽不向人人

启示其奥义，却对我内行说明，
我在这一批僵硬的骨殖当中
认出一个壮丽无比的造型，

在这冷湿发霉、狭隘的室中，
使我感到自由、温暖而爽快，
好像死气沉沉中有活泉喷涌。

这形姿多么奇妙地使我喜爱！
上帝灵思的痕迹还保持原样！
看到它，就像面向一片大海：

波涛壮阔，涌现出雄姿万状。
这件宣示神谕的、玄秘的圣器！
多么值得我把你捧在手上，

把你这至宝移出霉湿之地，
恭恭敬敬地走向白日的光明，
自由的空气，恢复自由的沉思。

人在一生中最大的收获，是他们
得到上帝——自然给与的启示：
她能把坚定不移者化为精神，
把精神产物保存得坚定不移。

诗中所描述的藏骨室的情景，是歌德虚构的想

象。1827年12月16日，席勒的遗骨终于入土为安，被安葬在王家公墓。

不幸的消息接踵而来，歌德亲近过的人物相继离世。施泰因夫人死于1827年，卡尔·奥古斯特大公死于1828年，大公夫人路易丝死于1830年，年轻时的好友克林格尔1831年去世。死神在歌德的身边嬉戏，歌德坦然而感伤地等待着死神召唤他的那一天的到来。

最让歌德伤心的是，1830年11月10日他的儿子在意大利旅行时突发高烧去世，半个月后歌德得到噩耗，他端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老泪纵横。歌德对独子奥古斯特一直很疼爱。奥古斯特像他一样在大学学完法律后进入魏玛政界，成为歌德担任公国直属科学和艺术机构的总监时最亲密的助手。但奥古斯特对父亲一直过多地干预自己的生活表示不满。在拿破仑军队占领时期，奥古斯特还在海德尔堡读书，他热衷于参加想手持武器以解放祖国的青年德意志组织，歌德知道后坚决加以阻止，怕儿子在战场上送命。奥古斯特无法违抗父命，只好呆在家中，他的伙伴们出征归来，对他很是蔑视，极大地挫伤了他的自尊心。还有一次决斗，也因为歌德的禁止而取消，以致他被人看作是一只“可怜虫”。可以说，他

终生都生活在歌德的阴影之中无法解脱。

歌德把丧子之痛压在心里，创作《浮士德》的责任这个伟大的“概念”支撑他挺起腰板：“我只关心我的身体能够正常地自如活动，只要身体不出问题，其他一切就都不会有问题。如果一个人能从心并且也看清了自己的意愿所规定的最必然的道路，那么，他就不需要去想更多的事了。”

能够让歌德发自内心快乐的是两个孙子瓦尔特和沃尔夫冈围绕在他的身边，他和他们开玩笑。1831年，他最后一个生日就是和他们在一起度过的。为了避免人们对他 82 岁生日庆祝活动搞得太隆重，避免应付喧闹的场面，歌德决定带两个孙子到伊尔美瑙小住几天。这是他最后一次离开魏玛。8月27日，天气晴朗，歌德从伊尔美瑙又去加贝尔巴赫作了一次远足，山区视察员约翰·克里斯蒂安·玛尔独自一人陪同歌德游览。当车子爬到森林覆盖的山上时，歌德蓦地回想起当年初访魏玛路上的情形，也曾穿过这一片森林，夜间在熊熊的篝火边宿营并和同伴尽情嬉戏。他在这里的树荫下写过一首小诗。并把诗题在山顶小屋的板壁上。登上山顶，眺望曾经穿行过的峡谷，歌德突发冲动，想寻找当年用来过夜的那所山顶小屋。1813年8月29日，即生日的第二天，他曾

找到过这所小屋，并把题壁诗的笔迹加深，一晃又是近 20 年过去了。陪同歌德的玛尔用简朴生动的语言描述了歌德找到山顶小屋的经过：

“我们非常轻松愉快地爬上了基克尔汉的最高处，他从车中出来，先是站在林中的圆形空地上向远处眺望，然后便兴高采烈地赞叹森林的美妙，他高喊道：‘啊，要是我那亲爱的卡尔·奥古斯特大公爵还能再欣赏一次这种美景该多好啊！’他接着吩咐道：‘那间林中小屋想必就在这儿附近吧。我可以步行到那里去，马车就停在这里等我们回来。’说完，他真的神采奕奕地迈步穿过圆形山顶上面长得很高的覆盆子树丛，一直走到了那座十分熟悉的用房屋木料和木板盖成的三层楼的猎舍，一道陡立的楼梯直通到楼顶。我想领着他，但他拒绝了我，他快活得像年轻人一样，虽然再过一天就是他的 82 岁生日了。他说：‘你可别以为我爬不上这楼梯；我的身体还相当好。’当他走进楼上的房间时，他说：‘我在从前一个夏天曾和我的仆人在这个小房里住过 8 天，当时我在墙上写了一首小诗，我很想再看看这首诗，要是诗下面写着当时日期的话，那末就麻烦您给我把它记下来。’我立即领着他走到小屋的南窗旁，在这窗户的左边墙上有一首用铅笔写的诗：

群峰
一片沉寂。
树梢
微风敛迹。
林中
栖鸟缄默。
稍待
你也安息。

歌德 1780 年 9 月 7 日

读完这寥寥数行诗句，歌德老泪纵横。他十分缓慢地从深咖啡色衣服的兜里掏出一条雪白的手绢，擦干了眼泪，用忧伤的语调轻柔地说：‘是啊，只消片刻后你也入静！’他沉默了约莫半分钟，再一次望了望窗外那一片幽暗的云杉林，然后转过身来对我说：‘现在我们该又一次离开这里了！’”

从歌德充满深情的话语里，我们可以看出歌德对生命的留恋。他的这首短诗名为《浪游人的夜歌》，原文只有 26 个单词，语言精炼而意境深远，既描述了山顶美丽的景色，又抒发了内心感受，同样是歌德诗歌中的一首绝唱。这首诗发表之后，音乐家纷纷为之谱曲，曲谱总数竟达二百种以上。歌德也极喜爱

它，所以才会特地上山来寻找。

歌德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日，仍然每天孜孜不倦地工作，静静地等待死神的到来，他风趣地对爱克曼说：“像我这样年过 80 的人，几乎没有再活下去的权利了，每天都要准备长辞人世，安排好家务。”他把自己一生的成就归功于别人的帮助，并通过爱克曼向所有这些帮助他的人表示最后的谢意：“我可以谈自己，尽量谦虚地把自己的体会说出来。在我的漫长的一生中我确实做了很多工作，获得了我可以自豪的成就。但是说句老实话，我有什么真正要归于我自己的呢？我只不过有一种能力和志愿，去看去听，去区分和选择，用自己的心智灌注生命于所见所闻，然后以适当的技巧把它再现出来，如此而已。我不应把我的作品全归功于自己的智慧，还应归功于我以外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成万的事情和人物。我所接触的人之中有蠢人也有聪明人，有胸怀开朗的人也有心地狭隘的人，有儿童、有青年，也有成年人，他们都把他们的情感和思想、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以及所积累的经验告诉了我。我要做的事，不过是伸手去收割旁人替我播种的庄稼而已。”

在生命的大幕将要拉上之际，这个伟大的天才向所有的观众鞠躬致谢。

1832年3月10日，歌德旧日情人玛克西米莉阿涅的外甥、贝蒂娜的长子西格蒙特·冯·阿尔尼姆到歌德家中作客，受到歌德的款待。这个19岁的青年成了歌德生前接待的最后一位客人。小伙子希望歌德在他的纪念册上题词，歌德把3月6日作的一首叫《公民义务》的小诗工整地写在上面：

人人把自己的门前扫清，
市内各区就干干净净。
人人完成自己的课题，
市政委员会就太平无事。

这首风趣而严肃，以小喻大的诗成了歌德的绝笔诗之一。

3月15日，歌德在一次外出时受凉，得了重感冒。几天之后病情有所缓和。从病床上走下来，歌德向窗外眺望，枯草已经返青，他在心中默默地说：“春天快要来了。然而不等叶绿花开，在3月20日的夜里，病情突然加重，但歌德拒绝医生来看病，他似乎觉得没有危险。第二天，事情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歌德开始烦躁不安，他时而匆忙上床躺卧，时而匆忙坐到床边的靠椅上。为了缓和痛苦，他让仆人把

一个夹子拿来以便研究颜色，询问了当天的日期并且说：“这样，春天已经开始，我可以更快地复元了。”看来，他对自己康复抱有很大的希望。

命运这回不再照顾他了，他愈来愈无气力，似睡非醒，头上戴着一个绿色的眼罩，手中拿着一本关于法国七月革命的出版物，这是他翻阅的最后一本书。他的儿媳守在他床边，织着衣物，不时地去握他的左手。歌德不时陷入昏迷，最后一次苏醒过来时，他似乎感到生命正从躯壳中渐渐离去，更想长久地握住儿媳的手，气若游丝地说道：“来，我的小女儿，把小手递给我。”忽然，他把目光移向窗户，用最后的力气喊道：“把窗户打开，让更多的光进来。”这是人们从他的口中听到的最后的话。临死之际，他的右手在空中书写，然后慢慢地垂了下去，谁也不知道他想写的是什么。

1832年3月22日11点半，德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歌德离开了人世。

在举行隆重的葬礼之前，爱克曼怀着极度悲伤的心情，再一次瞻仰了歌德的遗容：

“在歌德去世后的第二天早上，我渴望再去瞻仰一次他的遗体。他忠实的仆人弗里德里希为我打开了安放遗体的房门。他直身仰卧，像睡着了一样；在

他那庄严崇高的面容上笼罩着一片深深的宁静和坚定。在宽大的前额里面还好像有思想。我本想要求得到他一绺头发，然而崇敬的心情使我未忍从他头上剪下来。没有穿衣服的遗体被裹在一条白色的床单里，人们在四周不远的地方放了大块的冰，以便尽可能长久地保持遗体不致腐烂。弗里德里希把床单揭开，而我惊讶地看到了他那极为漂亮的肢体。胸部是强壮、宽阔而厚实的；手臂和大腿丰满柔软而不见筋肉；两脚纤小而形状极为优美；他整个身体任何部分都没有一丝一毫过肥或过瘦和憔悴之处。

在我面前，一位完美的人物十分优美地躺在那里，我因而感到的兴奋心情使我在一瞬间忘记，不朽的精神已经离开了这样一个躯体。我把手放到他心脏的地方——那里是一片深深的寂静——然后就离开了，以便使我强忍住的眼泪尽情地流出来。”

按照歌德的遗愿，歌德的棺木葬在席勒墓旁边。两个心心相印的好友终于可以厮守在一起永不分离了。

二十九、绵延不断的影响

歌德去世后，德国文学界乃至欧洲文学界都为之悲痛，海涅说是标志着“艺术时代的结束”。哲学家、文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冯·谢林在歌德去世的悼词中特别强调了歌德对于整个德国的意义：

“有这样一些时期，在这些时期中，仅仅由于具有卓越经验、不可动摇的健全理性和不容置疑的纯洁品质的人物的存在，社会就受到他人的支撑和鼓舞。在一个这样的时代里，不仅德国文学而且整个德国本身遭受了它能遭受的最令人痛苦的损失。一个这样的人逝去了，在一生精神混乱之中，他曾像一个坚强有力的支柱那样挺立着，许许多多的事物都靠他支撑才存在着；他像照亮一切思想道路的埃及法老那样。他的本性同所有的混乱状态、同无法则性是相敌对的，他把他对人们的思想的巨大的影响力一直只看作是真理本身所起的作用和他自身行为适度

而产生的结果。在他的精神中，请允许我补充一下，也在他的心脏中，德国人一定能够发现对艺术科学、诗和生活等方面的活生生的东西所作的慈父般智慧的判断和最终的和谐结论。只要歌德活着一天，德国人就一天也没有感到过孤独和贫乏，尽管德国那时虚弱无力和支离破碎，但它在精神上却是丰富和强大的。”

而另一位文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在《歌德之死》一文中，更指出了歌德辉煌的一生对于整个时代发生的重大影响：

“我们伟大的诗人就这样离开我们而去了。那主宰众多事物的神圣力量在地上不再存在了。这个一直属于我们的、日日劳作的人已经穿上了永恒的礼服，发散出荣耀的光环。他的逝世如同日落。太阳使事物的形体展现出来，而具有世界影响的诗人是一切事物的灵魂的眼睛，是一切事物的灵魂的展现者。受到这位人物的活动的密切影响时代将会有多长呢？我们能够亲自确证这样一位诗人的存在，这对于我们这些他的同时代人来说就已经是一种奖赏了。他洞察到一切秘密中最大的秘密，即被人们视为司空见惯之事中的秘密。他所说的话将变成事实。18世纪是一个患有不治之症的时代，而新的时代就在一

个智者诞生的瞬间开始了。神性的预定力量使他这样一个人成了他那个时代的拯救者。——时代的灾祸难道没有落在他的头上吗？这是通过善所进行的拯救，因为伟大就是善。”

需要指出的是，对歌德的这些高度评价，主要基于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浮士德》第一部及大量抒情诗的杰出成就，而尤为卓绝的《浮士德》第二部此时还封存在歌德的书房，《西方诗和东方诗诗集》很少有人问津，第一版在他逝世后几十年都没有售完，也就是说，他后期的作品还不被当时人普遍接受。

在赞誉的同时，也不乏攻讦和批评。19 世纪三四十年代，“青年德意志派”的诗人们批评歌德保守倾向的政治态度，甚至说他是“公候的奴仆”，教会和民族主义者攻击歌德离经叛道的异教思想和世界主义。其实，在歌德生前，他也处在赞扬和批评的焦点，反对他的人一直源源不断，歌德生前曾把这些人分门别类：“第一类人是由于愚昧，他们不了解我，根本没在懂得我就进行指责。这批为数可观的人在我生平经常惹人厌烦；可以原谅他们，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自己所做的事有什么意义。第二批人也很多，他们是由于妒忌。我通过才能所获得的幸运和尊荣地

位引起他们吃醋。他们破坏我的声誉，很想把我搞垮。假如我穷困，他们就会停止攻击了。还有很多人自己写作不成功，就变成了我的对头。这批人本来是些很有才能的人，因为被我压住，就不能宽容我。第四类反对我的人是有理由的。我既然是个人，也就有人的毛病和弱点，这在我的作品中不免要流露出来。不过我认真促进自己的修养，孜孜不倦地努力提高自己的品格，不断地在前进，有些毛病我早已改正了，可是他们还在指责。这些好人绝对伤害不到我，因为我已远走高飞了，他们还在那里向我射击。一般说来，一部作品既然脱稿了，我对它就不再操心，马上去考虑新的写作计划。此外还有一大批人反对我，是由于在思想方式和观点上和我有分歧。人们常说，一棵树上很难找到两片叶子形状完全一样，一千个人之中也很难找到两个人在思想情感上完全协调。我接受了这个前提，所以我感到惊讶的倒不是我有那么多的敌人，而是我有那么多的朋友和追随者。我和整个时代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我们的时代全在主观倾向笼罩之下，而我努力接近的却是客观世界。我们的这种孤立地位对我不利的。”

对歌德作出最为公正客观评价的是恩格斯，他在称道歌德是“最伟大的德意志人”的同时，辩证地

分析了歌德作为一个天才诗人和庸俗市民的两副面孔：

“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他的气质、他的精力、他的全部精神意向都把他推向实际生活，而他所接触的实际生活却是可怜的。……我们并不像白尔尼和门采尔那样责备歌德不是自由主义者，我们是嫌他有时居然是个庸人；我们并不是责备他没有热心争取德国的自由，而嫌他由于对当代一切伟大的历史浪潮所产生的庸人的恐惧心理而牺牲了自己有时从心底出现的较正确的美感；我们并不是责备他做过官臣，而是嫌他在拿破仑清扫德国这个庞大的奥吉亚斯的牛圈的时候，竟能郑重其事地替德意志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宫廷做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和寻找一些无聊的欢乐。”

恩格斯的评论对歌德的一生作了高度概括，成为对歌德的经典评价。

由于歌德不可动摇的文学地位，对歌德的研究

工作逐步开展起来，1860 年门采尔的歌德研究和 1874 年至 1875 年海尔曼·格林《论歌德的讲演》建立了研究歌德的基础。格林宣称：“研究歌德的工作才只是一个开端，这一事业必将持续到不可预见的未来。属于歌德的第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了，但是今后，直到我们可以设想的将来，人们是不会在不断重新为自己塑造歌德的形象这一工作上舍不得花气力的。”

确实，一百多年来，对歌德的研究从来没有中止过。在歌德去世半个世纪后，最为完整的《歌德全集》问世，共四大部分，133 卷，其中诗文集 55 卷，科学著作 13 卷，日记 15 卷，书信 50 卷。1885 年歌德的遗稿全部公开，提供了大量资料，有助于对歌德的研究走向全面深入。此后歌德晚年著作中深刻的思想与智慧逐渐被人们所认识。

很多评论家都非常推崇歌德的人道主义思想，赞扬歌德是“真正的人”，以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最为有名，不过恩格斯在 1847 年 1 月 15 日致马克思的信中驳斥了这种看法：

“格律恩把歌德的一切庸俗市民习气看作人道的而加以赞扬，他把作为法兰克福市民和官吏的歌德称为‘真正的人’，而把歌德的全部巨大天才方面

都忽略了或玷污了。结果这部书就以最明显的方式证明了：人＝德国小市民。”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虽然恩格斯特别指出了歌德身上的庸俗市民习气不等于人道主义，但这主要是反驳格勒恩的片面观点，并没有单纯的抹杀歌德艺术作品人道主义的光辉。相反，恩格斯也称赞歌德是“最伟大的德意志人”。

歌德的作品之所以吸引一代又一代读者，长盛不衰，也正是因为作品中蕴藏的巨大的人性力量震撼人心。关于这一点，本世纪初德国一位文学评论家弗里德里希·贡道尔夫有着精辟的论述：

“歌德是现代世界的最伟大的永垂不朽的楷模。他的塑造人性的力量，不管是作为他的本能还是作为他的有意识的意志起作用，都已经贯穿于他的生命的整个过程和一切方面。歌德的塑造人性的力量把他的一切偶然的际遇都变成命运中的必然之事，也就是说，把这引起际遇都变成他的生命运动过程中的一个个他所特有的、充满意蕴的、必然的转折点……也正是这个塑造人性的力量把他的一切个人特点、把由大自然赋予他的、作为他的创造性活动的原材料的他的一切才能，都变成了具有文化意义的东西，都变成了活生生的有教养的形象，都变成了有生

命的实体。因此可以说，也就是他的这个塑造人性的力量把他的生命力变成了他的文学创作力。”

歌德宣扬的人性让无数的读者心灵更加纯洁，更加明净，使他成为人类生命的一个代表。一百多年过去了，他的作品中人性的光辉不曾稍减，在人类心灵普遍苦闷的时候，在人类追寻真理的途中，抬头就能看到，身材伟岸的歌德正高举着一块方向标，上面写着：人类会在前进道路上摸索、疑虑、犯错误，但最终不会迷失正途，魔鬼永远不会占有人类纯洁的灵魂！